

#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四卷

下册

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1914—1931

〔英〕G.D.H.柯尔 著

商务印书馆

D. 0. 1. 1. 0

82

89489

24. 0. 2. 1. 1. 0

#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四卷 下册

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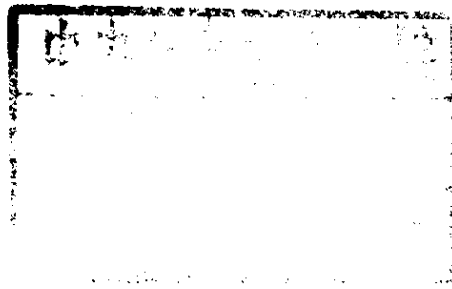
1914—1931年

[英] G. D. H. 柯尔 著

奚瑞森 译



\*200128904\*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年·北京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ume IV, Part II

**COMMUN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1914—1931

By G. D. H. COLE

LONDON, MACMILLAN, 1958

根据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伦敦 1958 年版译出

SHÈHUÌZHUYÌ SĪXIǎNG SHĪ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四卷 下册

〔英〕G. D. H. 柯尔 著

奚瑞森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370-4/D·110

---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16 千
印数 930 册	印张 13 1/4

定价: 11.90 元

# 目 录

第十三章	法国, 1914—1931年	1
第十四章	比利时和瑞士	41
第十五章	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	52
第十六章	西班牙和葡萄牙	74
第十七章	俄国从新经济政策到五年计划	93
第十八章	乌克兰	140
第十九章	波兰, 1914—1931年	149
第二十章	魏玛共和国, 1922—1931年	164
第二十一章	第二届工党政府(1926—1931年) 下台前的英国	198
第二十二章	几个国际之间的斗争(1922—1931年)	210
第二十三章	美国, 加拿大	243
第二十四章	从1914年到三十年代初期的拉美劳工运动	276
第二十五章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衰落和复兴	300
第二十六章	日本, 1914—1931年	324
第二十七章	印度, 印度尼西亚	330
第二十八章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345
第二十九章	社会主义运动和妇女的权利(1914—1931年)	358
第三十章	结论: 从1914至1931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364
附:	主要人物表	413

## 第十三章

457

### 法国, 1914—1931年

自1905年起直到共产党人与反共分子在1920年分裂, 法国社会党人组织了一个自称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统一党。这个称呼部分地显示了第二国际对争执各派施加的压力。倘若没有这种压力, 是否有可能实现任何种类的统一就大可怀疑; 而法国代表团在1905年以后的历届国际代表大会上的表现明显说明, 分歧绝没有消失。资深领袖让·饶勒斯(1859—1914年)和儒尔·盖得(1845—1922年)发现彼此不止一次处于对立地位, 特别是在采取国际行动防止战争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上。在对待反军国主义运动, 对待与资产阶级左翼采取联合行动问题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工会问题上, 他们对于应持何种态度方为正确也存在分歧。盖得仍然坚持必须将工会置于社会党控制之下; 而饶勒斯, 不管他心里偏好什么, 却愿意接受总工会在1906年的亚眠宪章中奠定的认为工会不应对党承担义务的理论, 因而与总工会的主体关系融洽。

参加历届国际代表大会的法国代表团由于在投票上的分歧而在关键时刻没有投票, 这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致的投票形成了对比。加之, 即使在工联主义者风潮开始平静下来之后, 商业同盟仍然坚定地坚持亚眠宪章, 而拒绝与社会主义者议会政治运动作任何形式上的联合。

尽管如此, 联合仍具有一定意义, 1905年以后, 饶勒斯确实 458 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无可争辩的首要地位。根据1904年的

考茨基决议<sup>①</sup>，不顾他的反对，社会党参加资产阶级居主导地位政府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作为联合的必备条件他接受了这个决议，而且这个问题在1904年之前没有再次发展到触发新危机的程度。米勒兰、维维安尼以及其最接近的支持者随即退党，社会党人形成了反对战前危机年代历届内阁的联合反对派。

然后，就在战争势必爆发、实际战斗尚未开始的时刻，饶勒斯被一名狂热的保王党分子暗杀了——这不仅是法国的、也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悲惨损失。倘若在任何其他时候下手消灭饶勒斯是会导致争夺继承权的激烈派系斗争的；但是在1914年8月，社会党人没有内讧的心情。对他们所有的人说来都似乎十分清楚：德国是侵略者，而德国社会党人由于投票赞成战争贷款，犯了背叛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罪。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在社会党议员之间还是在法国总工会领导人之间都不存在意见分歧。甚至像古斯塔夫·赫尔维这样的公开反对军国主义的人也在转眼之间变成了爱国派；事实上他们之中有些人，包括赫尔维在内，成了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最不妥协的鼓吹者。即使是不那么容易激动的社会党人也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法国并不希望打仗，尽管它的俄国盟友必须与奥匈帝国和德国共同承担触发战争的罪责。饶勒斯在国际（会议上）一贯宣讲保卫国家的权利和责任；1914年8月，随着德国人穿越比利时突然向法国发动闪电攻击，甚至那些早些时候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看法。不出数日，当社会党参加基础广泛的国防内阁问题出现时，并无明确的反对意见。法国社会党人以罕见的一致，不仅同意支持战争，而且同意他们领袖中的两位进入内  
459 阁；这两位领袖是马塞尔·桑巴（1862—1922年）和儒尔·盖得，后者在战前是社会党人与资产阶级的一切形式的合作的主要反对

---

① 见本书第3卷上册第45页。

者。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元老盖得在出任部长时已是六十九岁高龄，他在1914年这个危急存亡之秋彻底改变了毕生奉行的政策。桑巴刚五十出头，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不久之后，在1915年春，一位年轻得多的人阿尔伯·托马(1878—1932年)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作为军火部部长在组织军事生产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在战后由于出任国际劳工组织第一任局长，从而退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

绝不要认为上层——在社会党议员之间和法国总工会领导人之间——的这种一致意味着每个法国社会党人无不赞成社会党人参加“神圣同盟”政府。不过，反对派总算是暂时戏剧性地保持沉默。社会党和工会的较年轻的积极分子中有许多人应征去服兵役；地方组织暂时瘫痪，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再次产生影响。当德国人向巴黎迅速挺进时，听不见批评领导阶层的声言，只是在挺进受到遏制并开始面对进行长期消耗战的可能性以后，以及日益上涨的物价和经济脱节使工人阶级面临严重的直接困境时，才传来了反对停止阶级斗争和反对社会党的部长们屈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同事们的意志的抗议声。接着在1915年5月，冶金工人工会在阿尔芳斯·梅兰(1871—1925年)的坚强领导下，以反对力量的挑战姿态，毫无畏惧地宣称“这个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并指责法国和其他协约国政府的帝国主义的吞并目标；而《工人生活报》编辑皮埃尔·蒙纳特(生于1881年)和一小批工团主义者则竭力主张法国社会党人应仿效意大利人的榜样，宣布他们将不采取任何行动妨碍战争努力，也绝不与资产阶级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来支持它<sup>①</sup>。我们已经看到梅兰与制桶工人工会和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阿尔伯·波尔德隆(1859—1930年)一道出席了1915年9月的齐美尔瓦

---

<sup>①</sup> 关于意大利的态度，见本卷上册第30页。

尔得会议，在会上他们会同德国少数派代表联合发表了一个主张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宣言。<sup>①</sup>但是在那个阶段他们并不是广泛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尽管他们回国后便致力于这种力量的创建工作。毫无疑问，在1914和1915年时，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几乎一致支持战争努力，尽管对于社会党参加基本上反社会主义的政府是否正确和得策，是比较有疑问的。

战争爆发以后，社会党与法国总工会一反常态，立即建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以着重保卫工人阶级利益。但是用该联合机构自己的话来说，成立的宗旨在于“最大限度地发展他们于当时情况下在一切有关工人权利的问题（粮食供应、失业、免费就餐、津贴等等）上和国防工作中必须给予公共当局的支持”。这种合作态度虽然遭到日益严重的非难，然而大体上却维持到1917年后期，只是在克雷孟梭在那年11月出任总理，并开始奉行使他与所有怀疑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必要性的针锋相对的政策以后，这种态度才断然放弃。

在齐美尔瓦尔得，阿尔芳斯·梅兰会见了列宁，与他就工人阶级运动对战争应持何种态度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列宁要求梅兰返回法国，领导群众性的反战运动。梅兰宣称，他此来齐美尔瓦尔得，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国际，而在于号召各国工人通过国际行动立即采取步骤结束这场大屠杀，从而求得内心的平静。他深知，作为一个规模尚小、且无组织的少数派的发言人，即令他有领导群众起义的意愿，也绝没有这样做的力量。事态随即表明，  
461 梅兰并不属于列宁主义左派，而是属于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战胜列宁的比较稳健的和平主义反对派。他和波尔德隆回国后便着手组织反对派，成立了恢复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张工人阶级采取行

---

<sup>①</sup> 见本卷上册第33页。



动以争取通过协商实现和平；而冶金工人工会虽然遭到资产阶级报纸以及社会党和工会内部多数爱国者的激烈谴责，仍然在这个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基恩萨尔会议于1916年4月召开时，梅兰和他的集团由于政府拒绝发给护照而无法与会；但是沃克吕兹的亚历山大·布朗克(1874—?)和另外两个社会党议员不顾党颁布的禁令，参加了会议，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应有的谴责。

其实，到这时社会党内已开始出现一个少数派。在马克思的外孙让·龙格(1876—1938年)的领导下，这个少数派甚至不像梅兰及其在法国总工会内的支持者那样极端。在把战争的主要罪责归于德国人及维护国防权利这两个问题上，它与多数派意见一致，可是在认为工人应该要求实现“没有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和平以作为国际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基础这个问题上却又意见不一致。1916年，这个少数派仍然力量薄弱；只是到了第二年它才强大起来，由于那年春天的军事挫折，加之第一次俄国革命和日益强大的经济压力促使人们改变了态度，要求和平的愿望大为加强。

在法国如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俄国革命实际上乃是转折点。沙皇统治的崩溃不仅得到革命者和协约国的战争政策反对者的喝采，也受到可以说是所有社会党人——甚至是最富有爱国和改革精神的人的赞扬。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事件给予召开国际社会党会议的要求以巨大动力，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要结束战争并宣布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条件。但是，尽管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欢迎俄国革命，然而革命的影响却不是减少了、而是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多数派希望革命后的俄国将以新的热情继续进行战争，并派遣代表前往俄国促其实现；而少数派中的大部分人认为，462俄国革命是有利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强大新生力量，而在决定和平时，工人阶级将能发挥巨大的建设性作用。少数派在社会党和工会内实力都大为增强；但是它也日益分裂成为对立派系，其中

有一派寄希望于早日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而另一派则奉行革命路线，并号召工人效法俄国，推翻政府，掌握政权。第二个派别在社会党议员之中几乎没有、或者说根本没有追随者，因为它的实力是在工会和一些地方党支部中间。

接着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随即又出现了克雷孟梭政府。在以前的几个月里，不仅在工人中间，而且在以约瑟夫·夏约和内政部长路易·马尔维为首的一部分激进派中间，要求和平的情绪都迅速高涨，那些鼓吹将战争进行到底的人曾逐步进行大规模的鼓动来反对马尔维。克雷孟梭对和平主义者采取强硬路线，攻击马尔维过分讨好工人阶级运动，并奉行严厉镇压比较激烈的工人的政策，从而驱使大批在此之前全力支持战争努力的社会党人和工联主义者倒向左翼；同时，布尔什维克革命则使比较极端的左派具有了更为革命的思想。俄国的新统治者着手单独媾和，从而使德国人得以在1918年初发动强大攻势，这使得稳健的左派感到严重不安；但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认为俄国人此举是无可奈何，并且把东线的崩溃看作是加紧进行宣传以争取普遍和平的新的理由。

1917年春，已经发生大规模罢工，这些罢工主要是为经济问题，但同时也是对俄国革命具有高度热情和反战情绪日益增长的表现。组成工会保卫委员会的工会极左派一直在日益激烈地攻击法国总工会的领导。然而将近1917年岁尾时，在克莱蒙—费朗举行的法国总工会会议上，左右两派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终于一致作出决议，赞同威尔逊总统的和平建议，欢迎革命俄国的和平政策，并要求克雷孟梭政府立即公布它愿意接受的媾和条件。克雷孟梭的上台事实上使得工会内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政府的极端顽固主义。克莱蒙—费朗会议进一步要求召开法国总工会全体代表大会，权衡工会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

以左右两翼为了工会的团结作出的巨大让步为基础的这个协

议招致了极左翼的强烈反对。梅兰和波尔德隆被指责为背叛革命事业和向“爱国派”投降；以皮埃尔·蒙纳特为首的工会保卫委员会加倍努力以争取工会支持彻底革命的政策。1918年5月，在由于德军发动攻势而进一步大规模征兵之后，巴黎、里昂和圣艾蒂安和其他工业中心发生了广泛的罢工运动；这个运动比前一年的运动更带有政治色彩和反战性质。由于法国总工会迄今为止没有能够召开克莱蒙—费朗会议所要求召开的正式代表大会，工会保卫委员会单独召集了左翼代表大会并扬言要退出法国总工会——这是梅兰及其追随者强烈反对的一项政策。1918年7月终于在巴黎召开了法国总工会全体代表大会，为蒙纳特和以铁路工人领袖加斯东·蒙梭（生于1883年）为首的一批人对莱昂·茹奥（1879—1953年）和法国总工会领导进行激烈攻击提供了机会。会上有人企图解除茹奥的法国总工会秘书职务，但是他获得绝大多数票重新当选。会上通过的主要决议重申了克莱蒙—费朗会议的决议，要求以威尔逊总统的原则、俄国革命和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为基础实现和平——在包括梅兰、茹奥以及与之对立的极左派的决议提出人的三方声明中看不见有矛盾，至少没有承认有矛盾。

在此期间，社会党内的意见一直在迅速背离无条件支持战争<sup>464</sup>的立场。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之后，行政委员会向各地支部发出特别警告，告诫他们“不得哪怕是表面参加任何违背国际利益的宣传”，但是没有能够防止和平宣传和少数派意见的传播。1915年12月，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仍然几乎一致地通过一项决议，赞同继续进行战争，号召德国人成立民主政府，并且拒绝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恢复它的历史悠久的原则之前恢复国际关系。代表大会还宣称赞同继续支持战争贷款和支持三位社会党部长留职，并要求社会党团结一致奉行这项政策。但是1916年年初，形势开始变化，在4月举行的党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投票

反对皮埃尔·雷诺德尔(1871—1934年)提出的、宣称举行国际社会党会议条件尚未成熟的动议。在此之前,以让·龙格为首的稳健的少数派组成了保卫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久便与梅兰的恢复国际关系委员会发生了纠纷,当然,与皮埃尔·蒙纳特领导的工团主义的极左派的纠纷要严重得多。在1916年的其余时候,稳健的少数派实力继续增长,12月底在巴黎举行的全体党代会上,龙格和保罗·密斯特拉尔(1872—1932年)提出的一项动议仅以微弱多数被否决,该决议主张奉行完全以无产阶级利益为依据并遵循社会党国际战前方针的计策。第二项要求完全恢复国际关系的决议案以甚至更微弱的多数被否决。

465 1917年,在是否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问题上出现了斗争。在行政委员会断然拒绝要求参加之后,少数派决定单独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会议于1917年5月举行,并一致宣布赞同派遣代表前往斯德哥尔摩。同月晚些时候,正当前面提到的大规模罢工仍在进行时,党的全国委员会在巴黎举行了会议,会议在听取了马塞尔·加香(1869—1958年)和马里厄斯·摩代(生于1876年)有关他们刚结束的俄国之行的报告之后,一致通过决议赞同派遣代表前往斯德哥尔摩,同时还宣称主张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前先举行各协约国社会党会议,由它们制定有关媾和条件和战争责任问题的统一政策。然而,这种表面的一致却掩盖了巨大分歧;因为虽然少数派赞成无条件接受斯德哥尔摩的邀请,多数派在各协约国社会党人商定统一政策之前,却仍然坚决反对参加。

1917年9月,里波内阁倒台,班勒维组阁,由于不准社会党部长参加新政府,再次出现了社会党内部的表面一致,对新政府的组成多数派持反对意见,少数派则在原则上反对参加。但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不久于1917年12月在波尔多举行的全体党代会上,基本分歧再次表面化。在会上多数派以巨大优势战胜了稳健

的少数派这样一项动议：无条件支持斯德哥尔摩方案，反对参加政府，但是建议党在政府明确拒绝社会主义运动赞同的和平条款之前，继续支持战争贷款。极左派的一项反对投票赞成战争贷款的动议只获得了少数票。同时，社会党议会党团宣称他们赞同单独派遣代表团前往俄国，要求俄国人不要单独媾和；但是新上台的克雷孟梭拒绝发给必备的护照。

这种形势一直维持到1918年2月，当时由于政府拒绝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举行全面和平谈判的要求作出任何反应，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急剧向左转了。艾德里安·普雷斯曼恩(1879—1929年)提出的要求社会党人停止投票支持战争贷款的决议案仅以非常微弱的差数被否决。在以后几个月里，德军的大规模攻势照常进行，但终于被遏制；到7月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再次举行会议时，少数派已成为多数派。雷诺德尔的决议案只获得1172票，朗格的决议案则获得1544票，前者拥护旧多数派的战争政策，甚至为协约国为了“与德国进行斗争和破坏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而对俄国进行的干涉辩护，后者要求政府的和平条款与威尔逊总统的和俄国革命的和平条款相一致，谴责对苏联人进行的一切形式的干涉，并要求社会党甚至投票反对战争贷款，如果克雷孟梭政府不发给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护照的话。

1918年10月初在巴黎举行全体党代会时以1528票对1212票批准了党的政策的这一决定性改变。雷诺德尔已辞去《人道报》的政治主任一职，由马塞尔·加香接替，而路易·奥斯卡·弗罗萨(1889—1946年)则接替路易·杜布鲁伊尔(1862—1924年)担任党的书记。以前的少数派也在党的行政委员会内取得了多数支配权；但是前多数派委员未遭排斥，他们之中的主要人物保持了在委员会中的席位。大体说来，取得胜利的是龙格及其稳健的追随者而不是极左派，虽然后者提名的人选中有少数也被选进了委员会。

形势之所以有此逆转完全是由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事力量开始崩溃。巴黎代表大会之后不出一个月便实现了停战，随着战斗停止，德国和奥匈帝国发生了革命。

467 在这个阶段，重要的是弄清楚让·龙格及其支持者在1918年主张奉行的政策是什么。在“革命者”一辞的任何明确的意义上说来，他们都肯定不是革命者。他们绝没有考虑发动会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法国革命。他们与旧多数派中他们的敌手如出一辙，从议会政治和通过选举胜利民主地取得政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充其量只是希望以快于党的右翼所满意的程度迅速发展到社会主义，而且即使在战时也很不愿意与资产阶级左翼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虽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不愿意说这种联合永远不会言之成理。他们是帝国主义和秘密外交的强烈反对者，而且极不信任控制法国政府及其协约国的资产阶级政客。他们指责这些事物——帝国主义及其伴生物军国主义，不道德的和背信弃义的外交，以及肆无忌惮的政客——招来了战争，从而他们指责资本主义本身是国际争端的根本渊源。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必须促使无产阶级在每一个国家对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发动战争——内战，而是必须利用被压迫者的强大舆论压力来迫使这些邪罪势力就范，并把它置于民主控制之下。他们随即寻求的并不是作为同时结束战争和资本主义的手段的世界革命，而是通过协商实现和平，其条款将包括：普遍接受仲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取消秘密外交以及不公平的同盟和协议，并成立某种形式的国际政府，其力量足以威慑未来的侵略者和开始真正的国际合作过程。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与旧的多数派同样相信战争的主要罪责在于德国人，虽然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怪罪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和外交。因此，他们不是国防的反对者，而且在战争的全过程中始终愿意投票支持战争贷款，尽管越来越勉

强。换句话说，他们的见解与中立的瑞典的布兰亭或英国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大同小异；而由于这种见解容易被人歪曲，他们的名声要比他们以往任何时候的实际行为左得多，而且在战争期间遭到严厉的谴责，仿佛他们已经接受了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468

以上所述当然只适用于战时少数派中的稳健派——社会党内以让·龙格为首的一派，而不适用于社会党内人数不多的基恩萨尔派，或以蒙纳特和蒙摩梭为首的工会极左派，或者是追随梅兰和波尔德隆的不那么极端的工会派别。事实上最后提到的这些人发现自己处境非常尴尬，因为他们既不是信奉渐进的投票箱社会主义的议会政治家，也不是合乎列宁主义观念的彻底革命者，而是维护直接行动论和争取工会按照亚眠宪章独立于党派政治之外的工团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革命者，因为他们相信有必要在适当时候摧毁资产阶级国家，但是他们绝无意于以一个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新国家来取而代之，或者在一个有高度纪律和高度集权的党的领导下继续革命工作。相反，他们主张地方分权并依靠工人在他们自己的地方组织中的自发能力。他们期待革命来临，不是把它看作突如其来的成就，而是看作工人阶级为取得权力和责任而采取行动和进行自我教育这个连续过程的最高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他们看到鼓吹按布尔什维克方式进行革命的人控制了左派之后，就先是被迫退而与工会右翼合作以便维持工人阶级团结，然后在战争结束以后当总工会主体改变立场、奉行全盘改良主义的政策时，便干脆退出。

在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极左派严重缺乏领袖人物。它的队伍中有一些受革命工团主义熏陶的干练的工联主义者，如像皮埃尔·蒙纳特和阿尔弗雷德·罗斯默（生于1877年）；但是在政治上它并无杰出的代言人。以亚历山大·布朗克为首的、参加或支持4691916年基恩萨尔会议的一小批代表都是在群众中没有广泛号召力

的次要人物。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他们需要拿出时间来建立政治左派的新领导，但是直到战争结束和龙格的新多数派的非革命观点完全明朗化之后，在这方面才可能有所作为。

可见，在1918年末和1919年初，在法国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立即革命或者哪怕作任何革命尝试的问题。战前劳工运动中的革命人物与法国总工会的联系远远超过与社会党的联系；因为盖得派虽然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使用革命辞藻，其实就像饶勒斯的追随者一样不革命。即使在法国总工会内部，革命工团主义在战前已经有一个时期处于低潮；<sup>①</sup>在法国总工会内，就像在社会党内一样，在战争条件下进行的合作已经使领袖人物的态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俄国革命使社会党人和工联主义者中间的革命情绪再度产生；而克雷孟梭政府的反动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强了这种情绪。但是在1918年底，几乎没有人切合实际地考虑过以武力推翻政府的任何企图，虽然许多人打算为影响深远的社会和经济改组措施进行直截了当的鼓动。

因此，法国总工会在1918年12月发布战后纲领时，尽管提出了范围广泛的大量要求，却并未要求期望摧毁现存的国家或者“废除工资制度”，而后者在战前的工团主义宣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法国总工会首先要求的是：（一）以威尔逊原则为基础的并有工人阶级参加制定的和约；（二）一系列的社会和工业改革，首先是八小时工作日，并包括充分承认机关工作人员与私人企业雇员一样拥有工会权利，还有养老金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立法；（三）由  
470 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重建遭破坏的地区；（四）依靠对利润和遗产征税偿付战争债款；（五）成立一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来制订民族复兴计划；（六）“将一切必不可少的资源重归国家所

---

<sup>①</sup> 见本书第3卷上册第361页。



有,并依靠代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治社团作为工具,由国家控制对这些资源的利用。”可能除了最后一项要求之外,都是一些不经暴力革命便能满足的要求,事实上其提法也暗示不诉诸暴力革命。再有一层,最后一项是要求工业的广泛社会化并由工人和消费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而不是要求摧毁现有政府结构的彻底革命。诚然,这些要求都体现在“必须立即实现的”所谓“最低纲领”之中,而且并未明确撤消早先的革命主张。但是十分明显,法国总工会并未考虑直接采取列宁和基恩萨尔派一直敦促各国工人采取的方法。再者,莱昂·茹奥还受权同意作为克雷孟梭的一位同事出席和会。

当然,对于法国总工会对改良主义的这种让步并非没有异议,但毫无疑问,茹奥得到了多数派的支持。然而在当时情况下这一点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在1918年年底时,实际的工会会员总人数非常少。法国总工会从来也没有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在1914年以前,它的会员人数从未超过大约50万人,而且其中有许多人并不经常缴纳会费。它总是依靠“有觉悟的少数”积极分子——他们在必要时能争取到觉悟较低的多数的支持——而不是依靠广大会员;而且除了在战争工业中以外,它的组织受到了武装部队大量征兵和正常生产脱节现象的巨大影响。我想,没有人知道在大战结束时总工会究竟有多少会员,虽然众所周知,在大战期间,冶金工人工会的会员人数从4万人增加到了20万人。尽管有此增长,法国总工会的会员总人数大概要少于它战前兴旺时期的50万人;但是 471  
是从1919年初开始,会员人数的增长极为迅速,到1920年后期,总人数达到大约250万,战前的积极分子便完全淹没在人海之中。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暗示新会员必然接受总工会在大战期间奉行的改良主义政策。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并不接受;但是新的革命分子与其说是工团主义者,不如说是革命的俄国的赞美者,他们之中大

多数人并没有接过认为工会应完全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工团主义传统。他们团结斗争的共同目标往往是共产主义而不是战前类型的工团主义。所以，尽管拥护亚眠宪章的自治论者不断进行努力，工会内部的斗争仍日益成为社会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的一部分。

1919年，冶金工人仍然是法国工联主义的先锋，虽然由于停止军事生产，他们的力量正迅速受到损害。4月，法国总工会为了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一系列群众示威游行以支持其新纲领，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准备工作。同时，在复员和重新安置方面出现的困难以及急剧上涨的物价正引起一阵对经济不满的浪潮。在巴黎以外地区，五一节示威游行风平浪静；但是在巴黎，警察下令取缔这种示威游行，结果与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2人死亡，多人受伤，群情激昂。各工业区出现了罢工浪潮，主要要求增加工资和贯彻议会在1919年4月仓促制定的新的八小时工作日法。左派曾作过使罢工带有政治色彩的某些尝试，但并无多大成就。在大多数情况下，罢工工人取得了巨大让步，但是在左派力量强大的巴黎，在为实施八小时工作日法发生的一起纠纷中，冶金工人不顾工会的劝告，在一个由工厂代表组成的非正式的联合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罢工，结果遭到彻底失败——这是法国总工会所属各工会中最大的工会遭到的严重挫折。另一方面矿工却将他们各自独立的工会统一成了一个单一的谈判机构，取得了卓越胜利。作为冶金工人失败的后果，法国总工会内部革命派与改良主义派之间发生了激烈斗争。当法国总工会于1919年9月在里昂举行战后首次代表大会时，斗争立即就展开了。由于总工会领袖迫切希望取得不仅是改良主义者、还有老工团主义者的支持，他们托庇于重申亚眠宪章，该宪章维护直接行动的支配地位并申言工会有必要完全独立于政党之外；由于采取了这种路线，他们在表决时彻底击溃了极端

分子,虽然后者曾经基本上支配了辩论。

在此期间,在当时由龙格所领导的新多数派控制的社会党内进行着一场平行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主要的直接问题是加入国际问题。法国社会党是与1919年2月伯尔尼会议<sup>①</sup>开始的重建第二国际的工作合作呢,还是与第二个月在仓促拼凑的莫斯科代表大会<sup>②</sup>上成立的新国际共命运?还是另作选择,毋宁暂时置身于两个国际之外,等待机会来帮助建立一个基础广泛、足以包括各国所有的不论是革命的还是改良主义的主要工人阶级组织的新国际?以雷诺德尔为首的旧多数派完全赞同第一个方针,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拒绝与德国多数派友好会面的态度——虽然并未放弃迫使他们以前的敌人蒙受羞辱的决心。<sup>③</sup>暂时由俄国出生的鲍里斯·苏瓦林和费尔南德·洛里奥(?—1932年)充当最杰出的代言人的极左派自然愿意使法国党整个加入第三国际,该国际当时尚未制订后来在第二年引起许多麻烦的不方便的“二十一”条。但是控制着社会党的龙格派认为这两个方针中的任何一个都令人感到不安。他们希望先对第三国际多作了解,然后再加入;他们也不喜欢伯尔尼会议的倾向,因为这个会议似乎整个受到英国工党和德国多数派右翼的过多影响。因此他们情愿等着瞧,而暂时不与仍以第二国际代理机构身份存在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断绝关系。当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19年4月在巴黎举行时,大会上提出了三项对立的决议案。第一项建议立即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只获得270票;第二项主张无条件加入第二国际的决议案获得757票;第三项决议案是成功的,它建议法国党暂时维持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联系,但是建议邀请没有派代表参加伯尔尼会议的党和派系派遣

473

---

① 见本卷上册第290页。

② 见本卷上册第298页。

③ 见本卷上册第293页。

代表参加伯尔尼委员会提议今后召开的会议，并采取步骤在国际内进行清洗和全盘接受“阶级斗争的原则以及无条件反对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的原则，以便使国际立即真正地改变方向，仿效俄国、匈牙利和德国树立的榜样，走向社会革命”。可见，法国社会党在这个早期阶段的行动清楚地预示了日后导致建立维也纳联盟——或称“第二个半国际”的政策。<sup>①</sup>

这次巴黎代表大会的投票结果清楚表明：战时的旧多数派虽然被击败，却并没有销声匿迹。在参议院，在实际战斗停止以后它的议员仍有一个时期继续投票支持战争贷款。即使在右翼的主力不再这样做之后，有些议员依然故我，他们之中有11人在1919年7月投票支持战争贷款并因而受到谴责。左翼的大本营——塞纳支部——从而拒绝重新接纳有过失者为即将举行的大选中的社会党候选人；持不同政见者因而退党，并在不久之后另行组成了一个与激进党人密切合作、但并无实力强大的广泛追随者的“法兰西社会党”。然而右翼的主力仍然留在老社会党内。

474 1919年11月，举行了战后第一次按比例代表制进行的大选，除非少数派愿意参加选举同盟，这种选举制度对他们极其不利。在选举中，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党参加战斗的社会党面对着一个其组成宗旨在于继续维持克雷孟梭领导下的“神圣同盟”的国民集团。社会党人的遭遇不佳：社会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从104席下降到68席，尽管社会党的得票总数大为增加，党员人数也急剧上升（停战时党员人数曾减少到大约35,000人）。

选举刚结束，法国社会党人便重又投入了在他们参加国际这个问题上发生的斗争。在此之前，第二国际的拥护者已经失去他们所享有的几乎全部支持；因此主要斗争是在下列两方之间进行：

---

<sup>①</sup> 见本卷上册第337页。

一方是第三国际的彻底拥护者，另一方是那些认为应该在莫斯科的机构与西方各党商订的基础之上建立范围较广泛的国际的人，包括那些已经脱离第二国际的人。当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于1920年2月在斯特拉斯堡举行时，第二国际的剩余拥护者以1比13的劣势被击败，基恩萨尔派则得到了大约三分之一票数，尽管龙格的多数派提出了旨在延宕的动议案。顺利通过的决议宣称，各种革命的社会主义力量迫切需要重新联合起来，并认为莫斯科国际的纲领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之间并无相悖之处，但认为必须充分考虑工人阶级组织的现状以及西欧和中欧的舆论，并规定这些地区的党应与莫斯科国际的代表就建立新的统一的国际的条件进行磋商。遵照这项决议，党的行政委员会决定派遣马塞尔·加香和让·龙格前往俄国进行调查并与莫斯科国际进行磋商。后来党的书记路易·弗罗萨替换了龙格；为领取护照事宜稍事担搁后，代表团抵达了莫斯科，6月份，代表团成员从莫斯科来电要求授权他们以咨询身份列席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二十一条便是在这次会上确定的。法国社会党全国委员会表示同意，加香和弗罗萨参加了莫斯科代表大会，回到法国后他们便鼓吹接受二十一条以及法国社会党立即参加第三国际。 475

当党于1920年12月在图尔再次举行代表大会时，德国独立党人已经在哈尔举行了会议，并以多数票决定加入莫斯科国际。<sup>①</sup>在此期间，法国党的党员人数大为增加，从两年前的35,000人增加到了18万人；所以在图尔，决定权主要掌握在代表新入党的党员代表手里，旧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均势已不再重要。新党员大多数是左派的支持者，热烈赞同加入新国际，在他们看来，新国际是俄国革命精神的体现；但是他们之中有些人对于原封不动接受二十

---

<sup>①</sup> 见本卷上册第168页。

一条心有疑虑，倒不是因为二十一条不仅要求开除改良主义右翼、而且还要抛弃中派，而是由于工会从属于党控制的拟议违背了仍然受到珍视的工会独立的理论。在图尔，一向主张根据商定的条件建立范围较广泛的国际的中派分裂了：人数较多的一派与极左派一道支持加入莫斯科国际，只不过持有某些有限的保留；而人数较少的一派虽然也赞成有条件地加入，却希望附加一项条件，即拒绝将改良主义者开除出党，拒绝赞同工会从属于党的控制的拟议。右翼反对根据任何条件加入第三国际，但此举并无成功希望。在交付表决时，左翼结果以压倒多数战胜了右翼和中派的联合力量。两个少数派的代表因而退出了代表大会，胜利的左翼则着手接过了党的控制权，并把它从社会党改变成为共产党，而两个少数派则着手将社会党重建成为一个独立的党，它得到大多数社会党议员的支持，但失去了旧的党的机构及其官方报纸，包括《人道报》在内；在加香主编下，《人道报》成了新的法国共产党的喉舌。“莫斯科”终于俘获了西欧最大的一个社会党，而在此之前，它曾斥责它为革命事业的最危险的敌人。

这确实是一次极其重大的胜利，因为这使得法国共产党人无需白手起家去单独建立一个新党，相反地使它得以接过战前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之一的整个机构。而把建立一个新组织的负担推给他们的对手。然而也有美中不足之处。首先，参议院中的社会党议员的绝大多数拒不接受图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仍然忠于原社会党，而他们在逐步振兴该党的工作中是能够起主要作用的；第二，原社会党的一些传统仍然在它的后身——共产党中极有生气，以致后者立即卷入了以下两方面的派系斗争：一方面是莫斯科的彻底支持者和那些认为每个国家的工人是他们的组织方法和各该国社会党应遵循的直接政策的最佳判断者的人之间的斗争。因此，反共少数派得以相当迅速地重新建立一个过得去的有效组织，当

然并非不存在严重分歧和缺陷；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则卷入了与第三国际的一系列冲突，从而导致接二连三的清洗和脱党，使共产党经历了一段时期低潮之后，才在第三国际要求的基础之上重新建设起来。

在新的社会党内也存在严重的内部分歧。要龙格及其追随者忘却他们过去与以皮埃尔·雷诺德尔为首的“社会爱国派”的争执，或者要雷诺德尔派在国内或国际政策问题上与他们妥协，都477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老多数派是新的右翼国际的全心全意的支持者，而老的少数派则仍然希望建立一个范围较广泛的国际，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使对立集团以某种方式相聚一堂；在国内事务方面，雷诺德尔集团赞成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合作，而龙格派则主张社会党独立，并拒绝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由于他们一致反对莫斯科所奉行的使一切其他问题都从属于世界革命事业和保卫苏联对付其敌人的政策，这些分歧暂时就不显得那么突出，但不可能使其完全退居次要地位。然而老的多数派在参议院之外甚少有人支持，以致暂时只好要么附和龙格派的见解，要么完全脱党；不久之后，面对共产党人的强烈敌意，龙格的追随者被迫逐步采取了与他们以前的态度相比乃是大幅度向右转的态度。两年多之后，以“第二个半”维也纳国际联盟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中派才与右翼妥协，并于1923年5月在汉堡成立的新的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中联合起来。<sup>①</sup>随着战争的消逝，当初使老多数派与老少数派分裂的问题已无足轻重，因此中派在改良主义者与共产党人之间存身的余地也日益减小，尽管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中采取中间路线和团结有很多的理由。议会道路和苏维埃主义是两种能够产生强大的民众号召力的明确观点。在当时群众情绪激昂的情况下，中派理论却不幸并

---

<sup>①</sup> 见本书第684页。

非如此。如果在议会道路和苏维埃主义之间必须作一选择，龙格的追随者将何所适从也毫无疑问。在俄国革命所引起的激昂情绪的压力下，他们已准备对世界革命的概念作出相当大的让步，而在某些国家，这种革命可能需要使用专政方法并诉诸内战。但是他们从未认真考虑过适用于法国实际情况的方法。就法国政治而论，他们是议会道路的拥护者，尽管他们不同意伯尔尼会议所宣布的认为社会主义与议会道路在一切情况下都不可分割的说法；<sup>①</sup>这种态度实际上使他们愈加坚决地与右翼联合起来反对莫斯科，因为莫斯科方面绝无意对中派作出任何让步，它对中派的指责事实上要比对右派更加严厉。

因此，作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的后果，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在经过15年形式上的、但绝非风平浪静的统一之后重新陷于分裂。不过，新的分裂的界线本质上既不同于当初盖得与饶勒斯在德雷福斯事件和米勒兰入阁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也不同于战争期间使多数派与少数派分裂的那些分歧。此时争执发生在议会道路派与苏维埃派之间，所以龙格结果与雷诺德尔结盟，另一方面，以前是稳健中间派的加香完全投入了敌对阵营的怀抱，而被迫在两者之间作一选择的弗罗萨则暂时选择了莫斯科，虽然他根本不愿意接受第三国际着手实行的十分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控制。工团主义激烈分子大部分拥护第三国际，对工会独立问题精神上有类似的保留。确实应该注意到，在图尔，左翼派只是在反对全盘接受二十一条的强烈情绪作了实质性让步之后，才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图尔决议规定，十分严格的莫斯科条件只应该适用于未来，不应该包括开除任何愿意接受图尔决议并在将来据以行事的人。这项保留不久便使新的法国共产党与莫斯科国际发生了严重纠纷。季诺

---

<sup>①</sup> 见本卷上册第294页。



维也夫曾致函图尔代表大会，猛烈抨击法国中派，宣称第三国际不可能与他们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许多投票赞成左派决议的人根本打算接受第三国际就应该开除什么人的问题向法国党发号施令的要求，也绝不愿意赞同法国的政策完全从属于莫斯科领导的意志。这场纠纷暂时被掩饰过去，但是有鉴于莫斯科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可知它不久必将引起麻烦。 479

同时，新共产党继承了社会党的组织，包括主要为了选举和议会行动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地方组织结构。在弗罗萨担任书记时，党并没有在总的结构和工作方法方面与过去断然绝裂，虽然它丧失了它的大部分议会代表权。迫切的问题是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为竞相争取地方组织的支持而进行斗争的问题；而在这方面，虽然共产党人暂时成绩出色，两党作为一个整体的党员总人数却急剧下降了。为了说明下降原因，有必要考虑在第三国际问题上进行激烈辩论的同时，工业领域在发生什么事情。

在1920年最初的几个月里，生活费用空前上涨，爆发了新的罢工浪潮。2月，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公司所属的巴黎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开始了一场最重要的纠纷。首先，发动这次罢工既没有得到全国铁路工人联合会的赞同，也没有得到法国总工会的赞同。蒙梭梭领导的这次罢工迅速蔓延到其他铁路，铁路工人联合会和法国总工会只好给予支持。在白利安作出了似乎满足了工人的大部分要求的诺言之后，问题得到了解决；可是在工人复工以后，当局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实践这些诺言，骚动重又爆发。4月初，铁路工人全国代表大会主张在与法国总工会磋商后发动新的罢工，并在它提出的要求中列入了整个铁路系统立即国有化一项。在2月份发生劳资纠纷时，法国总工会曾责成作为战后复兴事业的咨询机构成立的劳工经济委员会<sup>①</sup>拟订一个铁路国有化计划； 480

<sup>①</sup> 见本书第470页。

在第二场劳资纠纷发生时，这份报告正在拟订过程中。法国总工会的领袖们本来非常希望在这份报告公诸于世并提交政府之前有一个喘息机会，但是面对工人阶级普遍存在的激昂情绪，他们同意支持铁路工人。于是宣布举行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当政府拒绝让步时，法国总工会便进而命令先是码头工人和海员，然后是其余运输工人、矿工、冶金工人和建筑工人，举行接近总罢工规模的声援性罢工运动。政府进行报复，逮捕了铁路工人工会的执委们和法国总工会的许多左翼领袖，并且宣布在罢工工人复工之前它拒绝参加任何商讨解决办法的谈判。眼看就要将罢工扩大到更多的行业去的法国总工会因此感到不安，并取消了声援性罢工，听任铁路工人单独战斗，而由仍在上工的工人提供财政援助。铁路工人确曾不顾他们的领袖被捕，继续罢工到近5月底。由于愈来愈多的人任意复工，他们被迫承认失败。政府为了进行报复，一方面大批解雇铁路工人，另一方面宣布解散法国总工会本身，虽然实际上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来这样做。然而其后果对于工会运动却是灾难性的。总工会会员人数从大约250万人锐减到大约60万人——比战前的会员总人数多不了多少。在共产党人在图尔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之前几个月，斗争性很强的工联主义浪潮基本上被平息了。

这次大罢工确实从一开始就有严重缺陷。在两条重要的铁路线上铁路工人拒绝罢工；而其他工业的声援性停工从一开始就只不过是局部性质的。政府依靠仍在上工的工人并通过广泛使用工  
481 贼，惨淡维持着残存的铁路交通和必要的供应，而几乎从一开始便存在着大批罢工工人任意复工的趋势。当局有效地动用了中产阶级来破坏罢工，而且在工联主义者之中，右翼与左翼之间始终存在着争执。当政府答应执行铁路法案时，法国总工会找到了取消声援性罢工的借口，但是该法案根本没有满足左翼的直接行动鼓吹

者的要求，而是加剧了议会政治论者与工人阶级方面的直接行动论者之间的争执。1920年5月，左翼工联主义已无能为力，因而即使在表面上也不再是一种革命的威胁；虽然工人阶级的政治舆论继续向左转，一直到它在图尔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工人阶级的行动却在达到高潮后低落下来，而国家集团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权力也已稳固。当法国总工会于1920年9月在奥尔良举行代表大会时，左翼没有因他们的失败而放弃决心，仍然要求法国总工会加入赤色工会国际——第三国际所属的工会机构。<sup>①</sup>但是法国总工会领袖轻而易举地使这个建议失败了，他们尽管说他们钦佩俄国革命，却指责这个建议违反亚眠宪章和工会独立于党派政治的整个传统。法国总工会抵制了赤色工会国际并重申忠于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sup>②</sup>（茹奥为该会副主席）；同时还重申在里昂拟订的纲领并表示赞同1918—1919年的改良主义政策。于是少数派退出了代表大会，举行了一次单独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在实际上并不退出法国总工会的前提下，他们成立了一个革命工团主义中心，并制定了一个对法国总工会所属各工会和联合会实行“钻心破坏术”的政策，希望以此来争取它们支持赤色工会国际。

接着出现了一个工会内讧的混乱时期。组成新的中心的少数派由若干成分组成——除了共产党人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而且作为一个整体说来，他们绝不愿意接受第三国际指定工会担任的配角角色。事实上，从一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便居于支配正统共产党人的地位，而由无政府主义者皮埃尔·贝斯纳任该中心的总书记。1921年夏，革命工团主义中心派遣两名代表——特马西和阿尔弗雷德·罗斯默出席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但是由于他们接受了赤色工会国际的从属于第

482

① 关于赤色工会国际，见本卷上册第335页。

② 见本卷上册第332页。

三国际的原则，回国后便被革命工团主义中心开除，该中心坚持要维护它的独立地位。在同一时期——1921年7月，参加法国总工会代表大会的左翼代表再次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因而再次举行了单独会议，在会上他们仍然在不真正退出法国总工会的前提下决定加强革命工团主义中心。他们然后利用他们的权力着手邀请所有工会派遣代表参加一次新的代表大会，会上他们提出了完全改组法国总工会的建议。作为这次大会的结果，是企图与总工会领导举行谈判，但是这次谈判几乎马上就破裂了，于是革命工团主义中心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在“统一总工会”的名称下，使自己成为与法国总工会公开对立的机构，但是仍然小心翼翼地宣称新机构是临时机构，为进一步的谈判敞开着大门。

此刻，工会左翼内部的冲突发展到了严重地步。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些工团主义者的支持下，使统一总工会在其章程内列进一项不仅指责资产阶级国家、而且指责各种形式的国家的条款，还说说服统一总工会派遣代表参加为了成立另一个国际而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会议。会议并未取得多大成就，虽然拟议中的国际倒是的确成立了；但是在第二年（1922年）的5月，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已十分强大，他们在巴黎和其他中心城市带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运动失败了。一个月以后，当统一总工会在圣艾蒂安举行代表大会时，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为一方与共产党人为另一方之间为争夺对运动的控制权进行了重大斗争，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A.波吉与赤色工会国际的俄国领袖人物阿诺德·洛索夫斯基进行了激烈论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从他们的对手的手里夺取了对统一总工会的控制权，但是他们无法说服它立即加入赤色工会国际，原因是该机构的章程中有些条款与亚眠宪章和工会的独立性两相矛盾。

可以料想，赤色工会国际一定会以毫不妥协的精神来看待这

种不肯从属于它的迹象。但是由于在俄国以外的地方很少有有效的支持，赤色工会国际便急于争取哪怕是一部分法国工会运动同意加入该机构；它在1922年11月的代表大会上同意从其章程中删掉招怨的条款，但是并没有随之同意改变其实际做法。在此基础上，统一总工会终于妥协，加入了赤色工会国际，在它的1923年布尔日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巩固了他们的控制。然而在他们取得胜利之后发生了进一步分裂。第二年，一个工团主义集团分裂出去，成立了自治工会联盟，两年以后，该机构成了与法国总工会和统一总工会分庭抗礼的革命工团主义总工会。从这时候起，统一总工会成了清一色的共产党机构，与法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并接受赤色工会国际和第三国际对它的管理权力。

在1920年的图尔分裂之前，社会党自称有党员18万人——大部分是新党员。在新的共产党接管了原来的党的机构之后，重建社会党机构的工作不得不重新开始。到1922年，重建的社会党拥有党员大约49,000人。在分裂后的第一届行政委员会中，有儒尔·盖得(死于1922年)、马塞尔·桑巴(死于1923年)和丁·保罗—班古这样一些旧多数派领袖，还有让·龙格和保罗·富尔(生于1878年)等旧少数派领袖，以及皮埃尔·雷诺德尔、范森·奥里俄尔(生于1884年)和亚历山大·白拉克(1861—1955年)等其他杰出人物，白拉克是1914年之前与第二国际有着密切关系的经典学者，是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卓越解释者之一。既然《人道报》已经落在共产党手里，《人民报》便成了它的主要喉舌。社会党在1921年的代表 484  
大会上重申了在统一各对立党派时拟订的1905年宪章，并发布了一个纲领，其中包括按照法国总工会提倡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化的广泛计划。在开始时，它不得不与共产党进行激烈斗争，共产党指责它背叛工人事业和维护资产阶级政权；它还必须就对资产阶级左翼各政党应采取何种态度作出决断，特别是从选举法看，它在

选举中取胜的前景主要取决于它能否物色到盟友来对付国民集团的候选人。1922年共产党改变策略，开始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统一阵线进行鼓动，但是这个建议在1923年2月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遭到否决。1924年1月，在马赛举行的下一次党代会上，社会党宣布赞同奉行与激进党人缔结地方性选举盟约的政策。在授权为即将到来的选举缔结这种盟约时，社会党宣称它将在“全部保留它理论”的前提下加入这种盟约，并宣称这并不意味着在议会中与激进党人采取联合行动和参加可能组成的激进党内阁。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党人在1924年的大选中，在大部分地区都与激进党人结成同盟来竞选，结果赢得了至少103席，而单独参加竞选的共产党人只赢得27席。这次选举的成功，加上激进党的胜利，使得激进党有可能以取得社会党支持为条件组成了以爱都阿·赫里欧为首的内阁。社会党人确实给予了支持，但是拒绝加入政府，虽然他们之中的实力雄厚的少数派赞成正式入阁。事实上，作为共产党所要求的“统一阵线”的唯一可行的替换物，就是一个事实上的“左翼卡特尔”。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在麦克唐纳在英国组成第一届工党政府之后不出数月，赫里欧的激进党政府就上台了；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这两个政府在国际政策方面进行了密切合作。当务之急是取消法国对鲁尔的占领，并且在赔偿问题采取较现实态度的基础上与德国达成协议。结果是1924年4月发表了道威斯<sup>②</sup>计划，  
485 并且在8月份举行的、也邀请德国代表与会的协约国赔偿会议上通过了这项计划。继这项协议之后便是鲁尔撤军，这项工作于11月完成。道威斯贷款成了制止德国的通货膨胀和稳定马克的基

---

① 见本卷上册第434页。

② 查尔斯·盖茨·道威斯(1865—1951年)，美国律师和金融家。后任美国副总统(1925—1929年)。——译注

础。①与此同时，麦克唐纳和赫里欧企图使国联同意以仲裁作为解决未来国际纠纷的手段；根据他们的联合动议，国联于9月通过了一项主张逐步裁军的决议。10月初，国联大会批准了有关仲裁的拟议中的议定书，并责成理事会于翌年召开裁军会议。但是，仅过了一个星期，麦克唐纳政府便在英国下议院由于自由党提出一项有关对坎贝尔控诉②的动议而遭到失败，月底时，工党便在“赤色信件”大选③中落选。11月初，英国保守党重新执政；两个“左翼”政府进行密切合作的短暂时期随之嘎然而止。在法国，赫里欧一直执政到1925年10月，但是随着英国工党政府倒台，在促进国际维护和平运动方面获得成就的希望实际上已经消失，虽然洛迦诺公约于那一年12月在伦敦签字。

当时，共产党由于共产国际强加于他们的政策而陷于分裂。共产国际在1922年的代表大会上猛烈抨击法国共产党让那些沾染了改良主义并企图延续旧社会党传统的人担任领导职务。共产国际甚至坚持撤换这些人，包括党的总书记弗罗萨在内，而代之以他们所提名的人。结果弗罗萨、著名的社会党作家保罗·路易（1873—1955年）和其他一些人脱离了共产党，组成了一个新机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盟，希望以此使对立党派重新联合。弗罗萨-路易集团一方面反对社会党的议会改良主义，另一方面指责共产国际的“专制的中央集权”，并要求恢复“1905年原则”。该集团宣称，不应忽视改革，但应该使之从属于为即将到来的革命作准备这个目标，在这场革命中，总罢工和工会应该发挥最重要的作用。该集团特别反对莫斯科坚持工会隶属于共产党的主张；它愿意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只是作为革命初期可能需要的短暂的临时措

① 见本书第647页。

② 见本卷上册第434页。

③ 见本卷上册第435页。

施,但是不得使之沦为“不负责任的寡头政治”,或者被当作“无产阶级军国主义”的外衣,而苏联红军似乎被看作了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潜在的实例。毫不奇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盟在重新联合各种社会主义力量的工作中没有取得任何成就。1924年,弗罗萨和该集团的许多其他人加入了社会党,而且在此后几年中还有其他人效法他们的榜样。联盟仍然存在,然而在1924年之后便无足轻重。1926年,社会党党员人数增加到111,000人,而在建党时自称有13万党员的共产党,其党员人数在1924年时减少到48,000人,并且在大肆清算异端邪说之后,1926年减少到仅仅15,000人,尽管在奉莫斯科之命在工厂、车间以及居民中建立党小组的基础上进行改组之后,党员人数在1928年又上升到大约5万人。

如我们在上文所见,法国共产主义运动从1920年对社会民主党人取得胜利的时候起,莫斯科的忠实支持者与持异议者之间便不断发生争执,前者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命令,后者维护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形成的自己路线而不接受外人发号施令的权利。然而持异议者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成份纯粹的集团。由革命的工团主义者而不是由共产党人形成的一个集团坚持传统,力主完全独立于政党之外,并且在同等程度上不愿接受共产国际、法国社会党或者法国共产党的发号施令。这个集团中有许多人对议会行动完全怀有敌意,即使那些不怀有敌意的人,也认为议会行动只起次要作用,他们仍然相信直接行动是取得无产阶级胜利的主要手段。这些人以前提倡过举行革命总罢工,现在仍然希望恢复战前法国总工会的兴旺时代。他们满怀希望加入了赤色工会国际,其时正当该机构欢迎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产业工联主义者和工厂代表们而不追究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否正统;不久之后他们便发现他们与之交际的人令人厌恶,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赤色工会国际的宗



旨并无意成为有权形成自己的政策的独立国际，而是要成为共产国际的驯服工具。像阿尔弗雷德·罗斯默这样曾在赤色工会国际成立初期起过非常积极作用的人，由于幻想破灭，退出了国际，重又恢复了昔日的工团主义鼓动，但是发现自己像政治运动中的中派一样陷于遭受两面夹攻的境地，既不能够与现在的改良主义法国总工会妥协，又不能与共产党控制的统一总工会妥协。他们仍然有一批追随者，但是他们发现已经不可能建成不同于两者的第三种群众性运动的余地。

与改良主义和莫斯科共产国际两者对立的这种工团主义反对派，所不同的它是法国共产党内部成长起来的政治反对派，尽管党内有许多人实际上对两者都拥护。这个政治反对派与其说是反对工会从属于共产国际，不如说是反对法国共产党从属于共产国际。那些持这种见解的人强烈反对由莫斯科来规定他们的政策和策略，反对由莫斯科来告诉他们谁应该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忍气吞声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其实并无意违背自己的愿望来加以贯彻，而且莫斯科的每一道新的命令和对异端邪说的每一次新的迫害都引起愤怒的反抗。当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从俄国扩大到国际范围时，法国有许多人倾向于支持托洛茨基，并附和他对苏联共产党日益官僚主义化所作的指责。即使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对于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遭到镇压、工厂里取消“工人监督”以及在新经济政策下部分恢复私人企业，感到严重不安。以往总是毫无疑问地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无不是正确和得体的革命行为，这种态度开始遭到越来越大的非议；而且与此同时，人们对于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和统一纪律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念，也全盘给予了敌意的审查。法国人可不是一个欣然接受别人比自己聪明这样一个概念的民族；莫斯科只好忙不迭地压制法国共产党人中间力主“高卢式地”独立于共产国际之外的种种倾

488

向。党的领导奉共产国际之命，依靠清洗来维持党纪，在清洗初期的牺牲者中有鲍里斯·苏瓦林——在法国宣传苏维埃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与他同时或继他之后还有许多人以信奉“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失宠。如我们在前文所见，法国共产党作为这些派系斗争的产物，1926年时确已沦落到非常低的水平，只保留了一小部分原有的党员。然而，即使付出了其影响遭到严重损害的高昂代价，它实际上仍然依附于共产国际，而被驱逐出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并没有能够另行组成任何有效的团体——部分原因是他们分裂成为两派，一派是工团主义者，另一派是以法国具体情况为基础的左翼政治行动的鼓吹者。因此，法国共产党虽经挫败而仍能存在，而且发展成为一个显然忠于共产国际可能要求它奉行的一切政策的团体。

在1929年以后的几年里，世界进入了经济萧条时期，但它对法国的打击要比对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打击来得晚，这主要是由于普恩加费在1926—1927年稳定法郎时所凭借的条件使法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很便宜，从而使通货膨胀暂时没有必要。因此，失业现象和劳工纠纷在法国出现的时候比别的地方晚，而导致1936年成立人民阵线的三十年代的动乱，其时机正好与纳粹在德国取得胜利后共产国际政策的改变相吻合。

此处毋需一一说明二十年代法国共产党中大量脱党和开除出党的事例。只要说明这样一点就够了，即仍然很活跃的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许多人并非如此——随即组成了一个后来叫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盟，它既拒绝接受社会党的改良主义，也拒绝莫斯科的集中的纪律，并企图在它的有限的党员中维持一种自由讨论和民主决定的制度。该团体最初成立于1923年，党员来自此后脱离共产党和被共产党开除的人，包括1930年的大批脱党分子。然而，它的追随者始终寥寥无几，当选为

议员的也只不过偶而有个人。

在此期间，社会党也有它自己的麻烦。它的队伍中、尤其是它的议员中，许多人由于对共产主义深怀敌意，而且看不到取得议会多数的希望，就想与资产阶级激进党人妥协，至少是缔结选举盟约，以便在按法国选举惯例每当没有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明显多数时而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相互支持。当然，有许多人希望更进一步，准备在两党的联合力量一旦足以组成联合政府时，便组成这样一个政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更左翼的社会党人愿意与共产党人缔结选举盟约，而在建立“统一阵线”的建议得到共产国际含糊其词的同意<sup>①</sup>后，共产党人便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有关这种“阵线”的建议。然而社会党内的大多数人，不论是在1923年最初提出时还是此后的许多场合都拒不接受“统一阵线”。如我们在上文所见，在第二年的选举中，社会党授权地方与激进党人作出选举安排，并使103名社会党议员的当选从这些安排中受益匪浅，490而单独竞选的共产党人只赢得27席。然而社会党人虽然支持那一年的赫里欧政府，却拒绝在政府中任职；赫里欧政府倒台后，“入阁派”与“反对入阁派”之间的分歧仍然其势不减。在1926年1月的党代会上，雷诺德尔、文森·奥里俄尔与保罗-班古力主参加政府，但徒劳无功，反对者有保罗·富尔、莱昂·布鲁姆(1873—1950年)和亚历山大·白拉克。翌年，党拒绝参加普恩加赛的国民联盟政府，该政府在若干激进党人参加下，完成了稳定法郎的工作。

在1928年的大选中，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的新口号“阶级与阶级对抗”，建议他们的追随者在第二轮选举中不要支持社会党候选人；但是尽管如此，社会党人借助激进党人仍赢得104席，而共产党人只获得12席，虽然在第一轮投票时共产党人得票100万张以上，

---

<sup>①</sup> 见本书第703页。

社会党人得票170万张。此后两党相互进行了激烈指责，共产党人指控社会党人沦为普恩加费的走卒，而社会党人反唇相讥说共产党人由于他们在第二轮投票中的行动，已将许多席位拱手让与右翼。

1929年10月白利安内阁倒台时，激进党领袖达拉第与社会党人商洽，表示愿意与他们联合组阁。社会党议会党团投票赞成接受这项建议，但是该建议在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被以微弱多数否决了，而且这个决定又在特别党代会上得到大多数票追认。然而，意见的冲突仍然很尖锐。在1932年的选举中，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再次在第二轮投票时互相支持，社会党所获票数增加到200万张以上，社会党议员的人数增加到112人，而共产党人所获票数和席位则再次下降。就在这时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短命的激进党内阁，这些内阁并无社会党人参加，但得到社会党人支持，它为几年以后的“人民阵线”铺平了道路。1932年，由于激进党人拒绝接受社会党人作为参加政府的条件的最低纲领，联合组阁计划告吹。这个纲领除了包括削减军备和禁止贩运军火之外，还包括制定社会  
491 保险总体系和实施四十小时工作周。坚持这些条件的态度招来了党内入阁派的反感，并为以雷诺德尔和艾德里安·马格(1884—?)为首的新社会党人此后脱党铺平了道路。不过这一事件属于以后的时期。

在本章所论及的整个时期内，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处在意识形态论战的动乱之中，但是很难发现论战各派对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任何真正重大的贡献。革命的工团主义是1914年以前的年代里法国的杰出贡献，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并无重要的新发展：战后的法国总工会不再是革命的了，尽管它仍然肯定忠于战前的亚眠宪章；而统一总工会不久便成了只不过是共产党的附属物，从领导阶层中清除了那些希望使之成为延续革命工团主义传统的工具的人

物。法国社会主义最初由于战时的分歧、后来又由于共产党人与反共分子之间的斗争而四分五裂，它在理论领域进行的论战主要是在国际政策问题上，而且其思想方法不具法国特色。法国共产党人虽然与共产国际不断有纠纷，却拿不出独具特色的主张；而非共产党人虽然最初为要求有“祖国”的权利、后来又为对资产阶级激进派应持的态度力辩，发现对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并无任何特别新奇的话可说。不论是雷诺德尔还是龙格都不是在某一方面有创见的思想家，也没有出现真正举足轻重的理论家来取代让·饶勒斯，或者哪怕是儒尔·盖得。

实际上，在这些年代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唯一新概念是法国总工会舍革命工团主义而取非革命的经济复兴纲领一产的产物。如我们在上文所见<sup>①</sup>，法国总工会在1918年拟订的复兴纲领中列入了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制订“工业国有化”计划纲要的要求，根据该纲要，国有化之后各该部门由生产者和消费者代表联合管理。在政府拒绝按要求成立具有广泛权力的经济委员会之后，法国总工会便着手成立一个独立的咨询机构——劳工经济委员会，其成员除了有各工会之外，还有全国消费合作社联合会、工业、商业、农业技术员工会委员会以及全国机关工作人员联合会。该机构负责制定复兴法国经济生活计划，以便“解除国家武装，并使之逐渐过渡到只不过是生产和分配的集体机构的时代；消除它目前具有的强制因素；剥夺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给予工人所向往的权利和他们适于承担的责任。”委员会通过9个小组委员会进行工作，在任命以后的第二年中着手拟订一系列建议，不仅涉及主要由合作企业复兴的战争蹂躏地区，而且涉及以某种形式的国有所有权和管理来取代资本主义的管理，这种所有权和管理形式旨

---

① 见本书第470页。

在调和生产者 and 消费者的要求并充分考虑有效管理当局的技术需要。在根据这个计划应予接管的行业——铁路和其他运输业，采矿和公用事业部门——中，不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所有权都应该归公，但是用委员会的报告的话来说，“我们并无意扩大或加强国家的影响，也无意首先求助于会把国家的必不可少的资源交由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去支配的任何体制。”因此，国有化企业的行政管理权应置于生产者代表和消费者代表之手，前者除了体力劳动者外还包括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后者除了合作社提名的人选外还包括国家和市一级提名的人选。这些事业的财政由公共当局负责，但是经理机构在与国家机器的关系中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劳工委员会在另一篇报告中为那些目前还不应立即实行国有化的产业的经营问题提出了平行的建议。它建议在各种产业中强制一切有关公司组成辛迪加，这种辛迪加不仅作为整个产业所需原料的独家采购者，还决定总产量，分配定额给每一家公司或企业，并负责指导投资和技术发展的方针。为了国有化和“辛迪加化”的产业之间的协调，将成立产业辛迪加委员会，并由一个中央指导委员会来统筹全盘经济，负责拟订和执行全面的国民经济计划。

1919年和1920年的这些总工会计划当然一部分是旧日的工团主义计划的继续，但不具备原计划的全盘反对议会道路观点的革命性质。茹奥和原计划的提倡者的许多论调可以追溯到费尔南·佩洛蒂埃和法国总工会的初期。但是茹奥已经抛弃了昔日坚持的这样的论点：工人完全能够自己管理全盘经济，既不需求助于国家，也毋需特别考虑消费者或技术人员在新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劳工委员会的计划是除资本主义投资商以外使所有的人进行合作，并在使国家和市政当局不参与实际经营的前提下利用它们。这种新式的“工人管理”与旧的工团主义概念在精神上区别很大，但显

而易见的是它是在战时所经历的“有指导的”经济（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中）的影响下从后者脱胎而来的。

这些计划一无成就。当然，从未出现法国人民在最近的将来可能会拥有的任何政府采用这些计划的可能；法国总工会本身不久便深陷在自己的内部纠纷之中，以致随即退居次要地位。劳工委员会在以最高速度工作了数月之后，便陷于无所作为的境地。法国总工会留下的唯一影响是在分裂以后的法国社会党的纲领中采纳了“产业国有化”的概念。从一开始，工会左翼——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团主义者都一样——指责劳工委员会的计划已变为改良主义，从而需要与中产阶级经理人员和资产阶级国家合作——事实上的确如此。茹奥雷希望争取过来与工会缔结亲密同盟的合作社在1920年的大崩溃中纷纷离去；而法国总工会即使在统一总工会分裂出去之前便已经元气大伤，以致断送了哪怕部分实现自己愿望的希望。尽管如此，总工会拟定的1919年和1920年的计划仍然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代里对社会主义思想宝库做出的唯一建设性贡献。然而唯一的实际成果是1924年赫里欧激进党政府成立了一个由雇主协会、工会、合作社和若干其他团体组成的新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但是，法国总工会却要求设置一个与政治议会掌握同等实权的经济议会，因为国民经济委员会只不过是一个咨询机构，只有权研究经济问题并提出政府可以任意接受或拒绝或置之不理的建议。该机构的设置并没有使法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实际变化。

为什么在1914年以后的年代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总的说来内容如此贫乏并缺少新的概念呢？也许这纯系偶然——只不过是出于缺乏杰出的法国思想家所致。但是我倒是倾向于相信，在战后法国当时的条件下，任何现实的思想家要明确看清自己的道路都是特别困难的。战争中法国损失惨重，不仅北部诸省遭到蹂躏，而

且更为严重的是年轻人的牺牲和文化方面所遭到的破坏。社会主义就本质而言是某种形式的乐观主义，其根本信念是社会能够而且应该通过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得到改善；而法国早在1918年时便已经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国度，这些人不相信旧教条，理论新风使他们感到恐惧而不是鼓舞。俄国发生的事件使一个人数不多、但畅所欲言的少数派深为激动并愿意接受俄国的领导，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号召他们采取并不需要作很多智力尝试的行动。然而，即使是社会党和工会积极分子中的多数派也对这种激励反应十分冷淡，或者即使反应热烈，但不久便发现这种激励不能令人满意，而且由于不存在其他任何强有力的可替代的激励，就变得怀疑一切而无所作为。还有其他因素——尤其是这样一个因素：法国人一向不愿意经常拿出钱来支持任何事业——这有助于说明社会党党员和工会会员人数为什么以完全异乎寻常的速度下降和几乎随时流动；但是毫无疑问，这种不稳定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缺乏任何明确的方向感的情况下，人们的情绪总是摇摆不定，忽而非常兴奋，忽而神情沮丧，随着情绪的高低而从各种运动中进进出出。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俄国革命都没有引起像法国这样的极为热情的欢呼，不过法国也正是一个最不能依靠这种热情作为持久活动的基础的地方。

诚然，对法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特性人们并不陌生：这些特性并非战争和俄国的事件所造成，只不过因此显得突出而已。这些特性在战前法国总工会里便已明显存在，而且在社会党里的小范围内也存在。在这两个机构里，钦佩和羡慕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团结和高度组织性的盖得派都是最可靠的因素；意味深长的是，盖得派的根据地主要在遭受蹂躏和破坏最严重的法国北部。与盖得派相比，饶勒斯的社会党追随者和抛弃党的领导的革命工团主义者都是动摇的集团，虽然他们动摇的原因各不相同。工团主义



者本质上是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整个传统的叛逆分子，总是迫切希望利用群众中的任何叛逆倾向，依靠的是他们在时机成熟时领导群众的能力，而不是任何组织群众的持久的工作。另一方面，饶勒斯则对共和传统忠心耿耿，在德雷福斯事件时他就表明了这一点。就本质而言，他是一个激进派政治家，由于把社会主义看作是1789年开始的大业的完成而变成社会党人。作为社会党人，他接受了第二国际的一项决定——1904年的考茨基决议<sup>①</sup>，即：除了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社会党不得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且他比任何其他社会党领袖都更为清楚地认识到有必要接受1906年的亚眠宪章所体现的工会的各项要求。但是他并没有由于接受了工会要求在精神上就不成其为激进党人和不那么热烈拥护这样一种主张：一切善良的人都有责任团结起来保卫共和国对付国内外的敌人。他的国际主义和憎恨战争的情绪也很强烈；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倘若他活到战争年代，他会坚决维护民族大业——虽然我认为他会保持冷静头脑，一有机会便支持通过协商实现和平。我确信，龙格比雷诺德尔更加忠于饶勒斯的精神，虽然就能力和富有想象的理解力而言远比后者逊色。然而，饶勒斯的政治激进主义是社会党内以他为首的一派中的不稳定因素，因为这种激进主义鼓励左翼的法国人在社会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或者至少是在社会党走自力更生还是与资产阶级左翼结盟这两者之间徘徊。我并非暗示饶勒斯采取这种态度乃是错误，尽管盖得派和工团主义者都以此对他进行攻击。我确信这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议会力量迅速壮大的必备条件。尽管如此，这种态度往往使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动摇，因为它有损于社会党人与非社会党人在政治和社会这两方面的鲜明界限，而划分这种界限却是法国盖得主义和德国

---

<sup>①</sup> 见第3卷上册第45页。

社会民主主义的特色,而且尽管方式迥异,也是革命工团主义的特色。

497 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这段时期,形势大不相同。工人阶级运动已经不再是介入资产阶级右翼与资产阶级左翼的冲突中的第三者,而成了反动派与激进党人混合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国民集团的主要对手。就选举而言,社会党人即便联合起来,其实力也远远不足以击败这个集团,但是在工会辅佐下,他们却有力量足以使该集团感到棘手,虽然还不能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如同在战后的意大利那样,存在着怀有革命情绪的广大群众,但是还远远不能成为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此外,虽然工会在战前曾经是革命的中心,1919年时,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俄国的事件和共产国际的成立使革命情绪的中心转到社会党内。法国总工会领导抛弃了老的革命学说,成了改良主义者;而且尽管在工会内,尤其是冶金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人工会内,还有大批左派革命分子,但当他们企图向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挑战时,他们却很快被击败,因为他们既不能指望法国总工会、也不能指望社会党给予联合一致的或持久的支持。法国总工会忙于制订它的工业国有化计划和要求成立一个具有工业议会权力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而剥夺了旧多数派对社会党的控制权的新多数派,至少在其领导阶层,简直就不比它所赶走的那派人革命。毫无疑问,在那些投票支持龙格和反对雷诺德尔的人之中,有相当多的日益成长的革命分子,但是这批人过了两年时间才强大到足以击败龙格和雷诺德尔的联合力量,并且使社会党的多数派成为共产党——至于把这个新党锤炼成共产国际所要求的格局,花的时间还要多得多。到第一件事完成的时候,革命热情的高潮已经衰落,革命行动的时机——如果真有过这种时机的话——已经错过。其实,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刻,这是除了寥寥无几的狂热分子之外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不论是工会、社会党还是

共产党人，都拿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代替办法。像意大利人一样，<sup>498</sup>他们忙于内讧，无暇认真考虑制订适合法国战后情况的新政策。

有一点也不应该略而不提：战后的法国由于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与其他冲动同时存在的是一股强烈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的情绪。这种可能以五花八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情绪，在诸如教师队伍和小公务员中表现尤为明显，而这两种人在社会党内都有众多的代表。这种情绪可以表现为非战主义或者对共产主义的同情，认为共产主义是通过革命实现和平的途径。文坛上提倡这种态度的两位杰出代表是昂利·巴比塞（1873—1935年）和罗曼·罗兰（1866—1944年）。曾以普通一兵身份在法军中服役的巴比塞于1916年发表了生动描写战争恐怖的《火》。尽管该书具有强烈的反军国主义色彩，仍获得了龚古尔奖。该书作者接着又写出了其他的反军国主义著作，其中包括《光明》（1919年）和《一个战士的话》（1920年）。战后他加入了共产党，最后定居俄国，直到去世。罗曼·罗兰最初以音乐作家、艺术评论家和佩盖主编的《双周刊》的主要撰稿人著称，战前他以离题万里的十卷本小说《让·克利斯朵夫》（1904—1912年）红极一时，获得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已经是一个非战主义者，1911年他发表了《托尔斯泰传》。战争期间他在瑞士避难，发表了他的非战主义著作《混战之外》（1915年），两年以后又发表了第二部研究托尔斯泰的著作。战后他开始对印度发生浓厚兴趣，尤其是对圣雄甘地，1924年他发表了一部研究他的著作。他在晚年改变了他的非战主义而热衷于通向和平的共产主义。（参见他的著作《通过革命实现和平》〔1935年〕。）然而1939年，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达拉第，支持盟国的反纳粹事业。

巴比塞和罗兰都是重要的人物，但是从根本上说，谁都不是社会主义者，谁都不能被看作是曾对社会主义思想作出过任何突出

499 贡献。他们对现代战争的惨无人道感到恐怖，从而对所有较老政党的政治家感到完全失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向往共产主义的原因。法国在战争中确实丧失了许多儿女，有的死去，有的残废，因此这种失望情绪非常强烈。这有助于共产党人取得对社会党的控制；但是怀着这种情绪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有许多后来纷纷脱党，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放弃了一切形式的政治活动，另有一些人随即又加入了社会党，成了它的非战主义派的支持者。然而，尽管社会党人在与共产党人决裂而陷入低潮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有过起色，却从未再次赢得产业工人主体的拥护。在整个二十年代，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作为对纳粹威胁的反应而成立人民阵线，法国工人运动无论在政治上和产业上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以致不能对总的事态发展产生任何重大影响，甚至不能通过集体谈判有效地保护工人利益。

## 第十四章

500

### 比利时和瑞士

#### 比利时

1914年8月,比利时的中立地位遭到破坏,从而使比利时工党成了(比利时)政府进行战争的坚强后盾。该党领袖埃米尔·王德威尔得(1866—1938年)加入政府,出任国务部长,从而开创了一项后来一直继续到战后的、在部长一级参加政府的政策。工党发表一项宣言,号召全体党员支持国防事业。面对德军入侵,政府搬迁,随即在法国领土上的勒哈弗尔建立了流亡政府。王德威尔得长期以来一直担任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主席,另一位比利时人卡米尔·休斯曼斯任书记。这就立刻产生一个问题:王德威尔得成为部长后,是否还能保持他作为国际的首脑的地位。与他同事的比利时工党领袖路易·德·布罗克尔(1870—1951年)也对他这样做是否得体表示怀疑,而王德威尔得则坚持他有权同时保持两个职位。以休斯曼斯为首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迁移到了荷兰的中立区,从而与该局主席和组成该局行政委员会的比利时人断绝了密切联系。这些人也仍然保留职务,但是由荷兰代表代替他们进行执行局的日常工作。地位仅次于王德威尔得的杰出领袖爱都阿·安塞尔(1856—1938年)留在德军占领下的比利时,并竭尽所能使劳工组织和社会党组织继续保持存在。

比利时工业在占领下受到严重损失,而且食品奇缺。劳工组织面对来自实施军事独裁的占领当局以及力图将工会代表排除在

501

主管失业救济的官方机构之外的雇主造成的许多困难，着手组织了一个失业救济体系。在处理由于德国人征用和协约国封锁而变得非常困难的食物问题时，社会党人约瑟夫·沃特斯(1875—1929年)在比利时国内起了杰出作用，而流亡政府则竭尽全力取得了进口供应品的许可。协约国起初拒绝取消或限制封锁，不过鉴于有发生大规模饥荒之虑，终于作出安排，成立一个接受美国和西班牙大使馆监督的比利时救济委员会，由委员会提供的食品获准通过封锁线。在美国参战之前，由赫伯特·胡佛主管此项工作，参战以后，工作由西班牙—荷兰联合委员会接管。

在德国压迫下，比利时的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不仅工业原料无法到手，不久之后德国人还开始拆卸工厂，把能够用于战争的一切工厂运往德国，同时蛮横地逼迫比利时工人在德国人的命令下工作，为占领军效劳。此举尤其在法语区引起了强烈反抗，但是在1917年德国人制定将比利时人大批递解到德国做工的新政策之后，情况大为恶化。将近6万人就这样被递解到德国，另有6万人被送往法国前线挖战壕，建造临时铁路并为德军做其他工作。在德国，这些比利时人被拘留在集中营里，再从此地成批送往工厂做工，或者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生活在劳动营里。在协约国和中立国，人们纷纷强烈抗议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是德国人不予理会，仍然不断加强他们的压迫，尤其是在1918年。

502 德国政府的政策是千方百计离间比利时的佛兰德语区和法语区，并在两种语言并用的地区偏爱佛兰德人。在比利时的佛兰德人中出现了一个由积极分子组成的党，他们准备与德国人合作以报答他们的偏爱并希望成立一个受德国保护的独立的佛兰德国。德国人鼓励这个运动，但是中立国的抗议以及并操两种语言的中部地区反对分裂的强大舆论使德国人有所忌惮，不敢明目张胆承认拟议中的佛兰德国。在布鲁塞尔，1918年2月11日爆发

了反对分裂的大规模示威，结果被德国军队用暴力驱散，但是对德国的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在此期间，在比利时以外的地方，王德威尔得及其在勒哈佛尔和伦敦的同事继续全力支持协约国为战争工作，而在国际的事务方面则持强硬立场，主张只要德军继续占领比利时领土就坚决拒绝与德国社会党人会见。流亡的比利时社会党领袖积极参加了一系列讨论战争宗旨的协约国社会党会议，并且与那些十分坚决地主张必须把战斗进行到底的人站在一起。德国人不仅占领着他们的国家和压迫比利时人民，还拒绝提供在战后恢复比利时独立的任何保证，并制定了即使不是公然吞并、至少也是要把比利时永远变成德国控制下的卫星国的计划——在德国人这样做的时候，几乎不可能期待流亡的比利时社会党领袖采取任何其他态度。这种态度在1917年荷兰—斯堪的纳维亚联合委员会在卡米尔·休斯曼斯合作下开始筹备拟议中的斯德哥尔摩国际社会党会议时引起了麻烦。留在国内并受到德国当局日益沉重压迫的比利时社会党人在许多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迫切希望看到战争能够根据会恢复比利时独立的条件迅速结束；他们中有些人，包括安塞尔在内，比流亡领袖更喜欢斯德哥尔摩方案。不过，他们并无有效办法可以影响流亡政府或者王德威尔得和比利时境外的社会党领袖，而后者的意见却是其他协约国社会党人所愿意接受的。

503

1918年11月签订停战协定前几天，社会党部长向比利时流亡政府辞职。此举起因于在比利时政府监督下法国雇用的一批比利时工人举行的一次罢工。这些罢工工人要求与从事类似工作的法国工人同酬；但是政府不仅拒绝接受这个要求，还扬言要以军法从事，给予罢工工人应得惩罚。鉴于已经停战，拟议中的行动没有付诸实施，但是辞呈并未撤销。不过，国王和流亡当局回到比利时以后，比利时政府几乎立即进行了改组，社会党人经比利时工党同

意参加了一个基础广泛的、负责从事紧迫的复兴任务的新联合政府。在新内阁中，王德威尔得担任司法部长，儒尔·德斯特雷（1863—1936年）和约瑟夫·沃特斯分别担任内阁其他职务。不久以后，爱都阿·安塞尔也入了阁。

从1884年到1919年大选，天主教党始终是比利时议会中的多数派，议会最初是在有限制的选举权的基础上、后来是在因富有阶级有两次投票权而有缺陷的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基础上选出。战后第一次选举是在真正的成年男子享有选举权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次选举中，天主教党人失去了多数派地位，但仍不失为最大的政党。3个主要政党——天主教党、工党和自由党——都参加了战后的第一届政府，该政府制订了大批进步的社会法。1914年时只有大约20万会员的工会，其会员人数在战后不久便剧增到大约60万人；到1921年，在天主教党赞助下组成的工会不算在内，中央工会委员会下属会员人数已增加到72万人。在战后形势下，社会党人依靠天主教左翼协助，在大多数问题上产生了强大影响。在1919年的选举中，工党赢得70个席位，相形之下，在1914年它仅占有34个席位。1919年，不顾雇主的强烈反对，“八小时工作日”成为法律，而且实施了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使税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还实施了养老金制度。但是，随着对资产阶级恐惧的减少，对这种立法的反对加剧了；而在工党内，反对社会党人继续参加为资产阶级政党所左右的政府的力量日益壮大。在1920年的党的会议上，反对参加政府的票数占三分之一，第二年则超过了五分之二。左翼开始在党内以“被剥削者之友”的名义下组成自己的团体；当党命令这些团体解散时，分裂分子在党的青年运动一派的支持下脱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部分组成了比利时共产党。在这些事态发展的压力下，社会党人于1921年退出政府。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席位在下院减少到68席，但是在根据修



改过的宪法进行选举的上院，则从 13 席增加到 52 席，而且在省议会和地方议会的局部选举中也取得了巨大胜利。在后来的几年内，天主教党与自由党的联合政府削减了失业津贴，修改了养老金法，并在若干方面攻击 1919 年给予的工会权利。这些反动措施加强了工党的地位，使该党在 1925 年的选举中将其下院席位增加到 78 席，从而首次成为第一大党，尽管离开成为独立的多数派仍有很大距离。因此社会党人拒绝单独组阁，但是同意与天主教党联合组阁，以便稳定货币，由于经济复兴耗费巨资，比利时货币已大为贬值。为稳定货币所作的初步尝试归于失败，在“摆脱法郎”的同时，比利时货币进一步惨跌。于是天主教党人与社会党人的联合政府由昂利·雅斯帕尔为首的各党联合政府取而代之，而且新政府终于在社会党人支持下稳定了货币。但是社会党人随即在兵役问题上与各资产阶级政党发生冲突，因为社会党人希望将服兵役期减少到 6 个月；1927 年工党退出政府，于是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改组成为天主教党人与自由党人的联合政府。从 1927 年到 1935 年，社会党是反对党。

在 1918 年以后的年代里，比利时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始终是积极的，却从未取得大规模的支持。只是到了二十年代后期在稳定货币危机时，由于失业严重并奉行包括对失业救济进行严格限制在内的国民经济政策，这个运动才开始重要起来。共产党人接着奉行了对工会实行“钻心破坏术”的有力政策，并主动领导一个非正式的罢工运动，结果导致严重骚乱以及社会党人和工会队伍中的尖锐分歧。然而在政治上共产党人很少进展，在 1929 年的议会大选中只获得 2 席，而且在党内共产国际正统支持者与数量很大的托洛茨基少数派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后者遂于 1928 年被及时清除出党。

在二十年代，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大部分仍然在战前那批领

袖的领导之下。埃米尔·王德威尔得仍然是公认的党的领袖。与他共事的有：路易·德·布罗克尔，他已经对第二国际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sup>①</sup>；约瑟夫·沃特，由于大战期间在比利时境内领导运动，他的地位已大大提高；老资格的合作运动者爱都阿·安塞尔；工会领袖科奈耶·梅丹斯（1880—1951年），他后来担任过阿姆斯特丹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副主席；还有昂利·德·曼（1885—1953年），战前他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者身份崭露头角，三十年代制定了他那著名的《劳工计划》并在继任党的主席之后，成了理论界有影响的卓越人物。然而，他在这个时期的活动已不属于本卷范围，后来的事迹也是如此，比方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国王的顾问留在德国占领下的比利时，因而被控与纳粹合作。

506 他本人对这件事的叙述是这样：由于相信纳粹已经赢得战争，他才留在比利时，希望以此来保护他的社会党人同事免遭德国人的暴行。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来，他确实成了通敌分子，因为他相信有必要与纳粹的“新秩序”妥协。这使他丧失了他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地位，战后他流亡瑞士，发表《孤独的骑士》这样的著作，为他的行径辩护，并继续写一些有关战后世界面临的危机的十分感人的著作。不管人们可能如何看待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德·曼是一位出色人物。他的法语、佛兰德语、德语和英语同样熟练，除了他的政治生涯之外，他还在德国、美国和比利时担任教授。他的最不同凡响的著作是《社会主义心理学》（1927年）。《劳工计划》（1933年）一书也是对经济计划政策的重大贡献，在此书中他附带攻击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走向“最后危机”的观念。

早在二十年代，德·曼就已经与王德威尔得和他的党的老一辈政治领袖经常发生争执，他指责他们全然缺乏建设性的经济政

---

① 见第3卷上册第72页。

策。他的论据的要旨是这样：无产阶级只要企图单独行事，至少在民主议会制政权统治下的国度里便毫无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只要它孤立地工作，它的成就只会限于在建立“福利国家”方面取得进展，甚至这种进展也只有在经济繁荣时期才有可能取得，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则随时有可能遭到损害。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在遭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层人民中寻求盟友，而在这些人之中他特别提到了小商人和农民，这些人是听凭大金融家和控制着若干必不可少的工业垄断资本家摆布的。不过，这些集团肯定不会支持任何广泛的社会主义化的计划，因为他们会认为这种计划是针对他们的。因此社会党人有必要拟订一个明确的计划，将社会主义化局限于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以及受垄断资本控制的工业，而且有必要向小企业家作出保证：他们不仅会免于社会主义化，而且在经过改革的公共信贷制度下，他们的待遇会比他们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好得多。德·曼希望通过提出这样一种政策来结束比利时政治的停顿状态，因为这种政策会把天主教党的主要追随者争取过来，而天主教党主要是依靠天主教工会的支持，只要这种支持继续下去，便会阻挠比利时工党取得政权。当1931年及随后几年的经济萧条严重打击了比利时经济并导致对于政府借以应付危机的紧缩通货措施的普遍敌意时，他的论据便更为有力。1933年，他终于说服比利时工党赞同他的《劳工计划》，这个计划大大改变了该党的号召力的性质。许多社会主义运动的忠实支持者不无理由地担心，在力图扩大它的号召力时，党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向一种损害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阶级合作；德·曼相当同情当时在法国发展的新社会主义运动，当这一点明朗化时，这种担心更厉害了。尽管如此，《劳工计划》的设想有其正确之处；因为毫无疑问，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处在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把工人阶级继续分别忠诚于工党与天主教党并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在社会主义方面不可能

507

取得任何真正进展的联合政府，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如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sup>①</sup>，早在1914年之前，比利时已存在着僵局，尽管修改了宪法，这种局面仍然延续到了战后时期，而德·曼则在打破这种僵局方面采取了意义重大的一步，尽管有可能付出工党的传统追随者众叛亲离的高昂代价。其实，并没有付出这样的代价，而僵局也未打破，因为天主教徒不肯脱离他们的党——天主教党。僵局仍然继续存在，实际上一直延续到现在。

508 在前一卷曾论及王德威尔得和德·布罗克尔的理论<sup>②</sup>，所以此处无需再加讨论，不过需要提到这样一点：王德威尔得在1917年为敦促俄国政府继续进行战争而访问俄国之后，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我们看到，他在1923年怎样回到俄国，以便为被控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充当辩护律师，结果扔掉辩护状以抗议对案件的不公正的处理。<sup>③</sup>王德威尔得在1918年以后格鲁吉亚孟什维克<sup>④</sup>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事业中也很活跃。他积极参加了1919年2月伯尔尼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和复活的第二国际。然而在思想方面，他除了战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之外很少有新的贡献，虽然作为司法部长，他在1919年到1921年之间对刑法和监狱改革有过重大的实际建树。总的说来，比利时社会党在战后时期是一个稳健的合法政党，愿意与各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从事艰巨的民族复兴工作，并深知除了在建成福利国家方面取得有限进展之外，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成任何建设性的社会主义计划。他们接受凡此种种限制的立场使他们经常遭受左翼的批评，但是他们总是设法使绝大多数比利时社会党人继续拥

---

① 见第3卷下册第617页。

② 见第3卷下册第646页和第653页。

③ 见本书上卷第187页。

④ 见本书上卷第207页。

护他们，并使比利时共产主义运动不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令人望而生畏的运动。说实在的，在战后的比利时，任何种类的革命活动都很少或毫无立足余地，这既是因为国家的形势显然需要为经济复兴共同努力，也是由于佛兰德地区的分裂主义者或主张自治的人的鼓动往往加强了人民的主体对现存的国家的支持。比利时共产党人内部四分五裂，减少了他们成功的机会，但是，即令他们团结一致，他们也不像是会产生任何巨大的政治影响。在工业方面，首先是由于货币贬值，后来又由于为稳定货币而采取的紧缩通货措施造成了失业和工资纠纷，他们的处境比较有利于他们制造麻烦，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始终只能捣点小乱子。在政治上和工业上，比利时工人阶级运动需要比较认真对待的敌手是天主教党人而不是共产党和它的各种各样的“外围”组织。它从来没有可能独力赢得议会多数；但是在自以为是的改良主义做法的范围内，它坚韧不拔地并凭借颇为高明的组织技巧，坚持下来了。

509

## 瑞 士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瑞士社会党是如何为促进交战国社会党人共聚一堂，以期结束战斗，而与意大利人进行合作的，也看到了如何主要由生长于瑞士德语区的罗伯特·格里姆（生于1881年）和生长于瑞士法语区的夏尔·南恩（1874—1926年）安排1915年的齐美瓦尔得会议的经过<sup>①</sup>。那一次会议和第二年的基恩萨尔会议都是在瑞士领土上举行的，自第一国际时代以来，瑞士成了举行国际会议的著名场所。在1914年之前，以奥托·朗（1863—1936年）为首的瑞士社会民主党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极右翼；但是

---

<sup>①</sup> 见本卷上册第32页。

在战争期间，尤其是在俄国革命之后，其中一大部分人急剧向左转，1919年初，党代表大会不仅投票赞成退出第二国际，还投票赞成加入共产国际。这次投票是动乱增长的后果，在前一年，日益严重的动乱导致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成立联合委员会，以便向政府提出要求，消弭随着工资落后于日益上涨的生活费用而累积起来的愤懑之情。该联合委员会于1918年7月在奥尔腾召开了一次工会和社会党紧急代表大会，决定除非政府满足其要求，将举行全国总罢工。政府并未按照要求作出让步；而且，政府出动军队镇压苏黎世的罢工工人并取缔为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而打算举行的示威游行，此举无异火上加油。1918年11月确实举行了3天总罢工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铁路交通完全陷于停顿。罢工提供的迹象使政府和雇主相信，工人情绪高昂，从而有助于工人在1919年赢得对八小时工作日的让步。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1919年赞成加入第三国际的表决结果并非问题的结束。这个问题被提交社会民主党进行复决投票，结果多数票反对加入。<sup>①</sup>接着这次反对参加共产国际而来的是党内分裂。早先以弗里茨·帕拉顿(1883—1942年)为首的一个极端派分裂出去组成了共产党，1921年，这一派又与新的脱党分子联合起来。在此期间，社会民主党在完全摆脱了它对莫斯科承担的义务之后，加入了“第二个半”维也纳国际联盟；<sup>②</sup>但是，当这个机构在1923年汉堡代表大会上与右翼的伯尔尼—日内瓦国际合并成为工党和社会党国际时，瑞士党由于担心加入该机构可能在它的队伍内造成新的分裂而没有加入。直到1927年它才下定决心与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共命运。到那个时候，在联邦国民议会中从来就只能得到两三个席位的共产党人已经几乎丧失了全部支持，可是在

---

<sup>①</sup> 见本卷上册第321页。

<sup>②</sup> 见本卷上册第338页。

1928年时社会党人却据有50席(1919年为41席),并在总票数中获得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数。然而他们却没有任何党员当选进入联邦执行委员会——近似于其他国家内阁的瑞士机构。社会党哪怕是成为国民议会中的最大政党也是1935年的事;他们根本没有成为多数派。

实际上瑞士社会党人在1918年和1919年短时间地向左转以后,又恢复了昔日奉行的稳健的改良主义政策,而且没有显示任何进一步的迹象说明他们要重新采取某种革命主张。党的主要人物 511 赫尔曼·格罗伊利希(生于1842年)患病多年之后于1925年去世,后来并没有出现可以取代他的杰出人物。曾经是战争期间和战后最活跃的左翼人物罗伯特·格里姆仍然是党的最著名的领袖,在社会党加入工党和社会党国际时成了该党的主要代表。

## 第十五章

### 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

从1914到1918年,战火蔓延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却得以保持中立。因此它们不可避免地要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被赶出比利时以后为它提供暂时的栖身之所,并且在促成不仅有中立国代表、还有交战双方工人运动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国际的书记卡米尔·休斯曼斯于1914年将他的办事处从布鲁塞尔迁到阿姆斯特丹,荷兰代表则暂时代替比利时人担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如我们在前文所见,1917年4月俄国革命爆发以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荷兰委员通过与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美国人磋商,向所属各团体发出请柬,邀请它们参加5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会议。还决定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一个荷兰—斯堪的纳维亚联合委员会,负责在休斯曼斯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合作下进行安排。这个方案后来的经过已在前文的一章中作了扼要叙述:①在本章中我们要谈的是战争期间和战后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境内的事态发展。

### 荷 兰

在1914年以前,以皮埃特·特鲁尔斯特拉(1860—1930年)为

---

① 见本卷上册第45页。



首的荷兰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之下，但是在运动内部有一个深受无政府主义者兼非战主义者多米拉·纽文惠斯(1876—1919年)影响的强大的非战主义和反军国主义集团，以及一个其主要人物为克里斯蒂安·科奈利森(1864—1942年)的工团主义派。运动内部还有一个以一家报纸——《论坛报》——为中心的左翼马克思主义集团；这个集团于1908年被社会党开除，第二年成立了有着毫不妥协的革命纲领的独立社会党。这个独立的党于1918年以后发展成为荷兰共产党，党内的杰出人物有戴维·维恩库柏(1876—1941年)、天文学家安东·潘尼科克(生于1873年)和诗人赫尔曼·戈特(1864—1927年)。《论坛报》集团的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并无人数众多的群众追随者；但是在分裂以后该集团与工会运动中的工团主义派建立了友好关系，在战争年代，在食品和其他供应品普遍缺乏的压力下，工团主义派的实力大为增长。确实，国外的战争状态在荷兰引起了相当大的动乱。荷兰与别的地方一样，俄国革命助长了革命情绪，虽然社会党和工会的主体仍然是坚定的改良主义者。俄国远在他方，那里发生的事情除了对极左翼之外，不可能对政策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德国则是另外一回事；当德国革命于1918年11月爆发时，突然激发了一阵革命热情。右翼社会党领袖、一向稳健的特鲁尔斯特拉突然转而信仰革命事业，号召荷兰工人仿效德国的榜样。工人举行了喧嚣一时的罢工，尤其是在一向是动乱主要中心的鹿特丹；有几天时间，该城实际上是在工人手中。然而大多数社会党领袖不承认特鲁尔斯特拉，政府则采取有力行动平息了动乱。荷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唯有追随维恩库柏和戈特的人数不多的少数派仍然奉行革命路线并参加了第三国际于1919年3月举行的成立大会。他们派去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工程师S·腊杰斯(生于1879年)在莫斯科一直待到秋天才返回荷兰，回国时受列宁委托要在阿姆斯特

丹建立一个共产国际西欧执行局，而几乎就在同时，在德国共产党主持下，共产国际正在柏林建立一个西欧书记处。这种重复 随即招来了麻烦。阿姆斯特丹执行局于1920年2月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与会的有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英国和美国的各组织的代表，代表共产国际与会的是迈克尔·鲍罗廷(1890—1954年)。不过警察第二天就破坏了会议，因此此事毫无实际结果，在此之后，莫斯科几乎立即结束了阿姆斯特丹执行局，将其职能移交给了柏林。

这次行动归根结蒂是一场理论争执。如我们在前文所见，荷兰的组织已与代表荷兰工会运动中反议会因素的工团主义工会建立了密切联系，而且已深受工团主义思想影响。共产国际在成立伊始时吁请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给予支持，而且尚未表明它有意使工会坚定地隶属于共产党控制，或有意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然而到1920年时，形势发生了变化，信仰共产主义的独立的革命工联主义已经不再有安身余地，也不可能再认可拒绝议会行动——戈特派中有许多人就是这种人——的组织。列宁在他于1920年发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抨击了这种偏向，戈特随即在《致列宁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中对列宁作了答复。戈特曾经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曾与列宁谈过话，但回国时恍然大悟。正如他在回国后对潘尼科克说的：“我本来指望此人成为、并把自己看作是世界革命的最高统帅，但是我无可奈何地认识到列宁始终考虑的是俄国，而且完全从俄国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戈特这番话并非指责列宁有民族主义思想或者把俄国的利益置于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他的意思是指列宁摆脱不了这样一个观念：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不仅对俄国、对每一个国家也必然适用。他的意思也是指列宁对于实际状况或者西方工人阶级的具体情绪都毫无真正的理解。

列宁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立论反对有些共产党人，因为他们称议会行动为“改良主义”而加以否定，<sup>515</sup>并认为在工会领导下工作必然需要与反动派妥协。列宁认为做出这样的假定是幼稚的：进行革命无需争取群众，也无需竭力利用一切可加利用的工具。戈特在他的《公开信》中的答复是：虽然在俄国以工、农、兵联盟为基础进行革命并由布尔什维克来指导和领导群众是切实可行的，在西欧，却绝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戈特提出理由说，在西方，农民、中产阶级下层和知识分子都有资产阶级思想而且反对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只好在没有他们协助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在他们的阻挠下——采取行动。因此他坚决认为，在西方，革命者至关紧要的任务是建立一支其力量和觉悟都足以独立行动的革命无产阶级队伍；而只有通过集中的力量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宣传才能做到这一点，与主张议会道路的人或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妥协，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等于是说，在完成这个无产阶级教育的任务之前，西方绝不可能有革命——换句话说，列宁要求立即进行的那种西方革命事实上不可能发生——这是共产国际自然不准备接受或者哪怕是容忍的观点。作为引起工团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根本争论的这场纠纷的余波，戈特及其亲密同僚退出了共产主义运动，而在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示过类似理论的其他集团——比如英国的席尔维亚·潘克赫斯特以及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其他集团——被迫要么放弃他们的异端邪说，要么认识到莫斯科国际中绝不会有他们的地位。这并没有妨碍荷兰共产党人中维恩库特领导的残余力量留在共产党行列之中，但是他们没有获得任何真正实质性的支持。维恩库特本人1927年由于反对当时共产国际政策中的宗派主义也被开除。

在此期间，荷兰社会党在抛弃了它的左翼之后，奉行了改良主义路线。在战争年代之后，它的实力比1914年时强大多了，1922年<sup>516</sup>

议会选举时获得568,000张选票,而在1917年的改革法开始实施成年男子选举权之前的1912年,该党只获得144,000张选票。1912年在下议院的100个议席中它拥有19席,1918年时拥有22席,而在1929年以前已增加到24席——将近总数的四分之一。它仍然奉行战前那种拒不参加联合政府的政策,但是在资产阶级政党愿意实施社会改革措施时却支持他们。1920年,荷兰社会党通过了一个分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化的纲领,这个纲领从垄断或高度集中的工业开始,并为业主提供充分补偿,但是该党要使它的政策的这一部分付诸实施是毫无希望的。在国际方面,它于1919年2月参加了伯尔尼会议并支持第二国际。在工业方面,它由于工会活动分裂成若干对立的运动——社会主义的、工团主义的、天主教的和中立的运动——而受到掣肘,这些运动都竞相争取会员,虽然它们偶而也在工业领域进行合作。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多米拉·纽文惠斯于1919年去世;但是他的影响由一个人数虽少、但很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保存了下来,该运动成了国际无政府主义活动的集合点。

二十年代荷兰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杰出人物是埃多·芬门(1881—1942年),此人是松散地附属于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所谓“行业书记处”中最强而有力的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的书记。自1915年至1919年,芬门任荷兰工会联合会书记;1919年在他协助下成立了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并由他担任名誉书记。他代表该联合会积极参加了1920年组织国际工会对当时沦为“白色恐怖”牺牲品的匈牙利进行抵制的工作,以及在苏波战争期间对运送军火到波兰进行抵制的工作。1922年,他在国际工会联合会召集的海牙国际和会上起了主导作用,而且翌年有一段时间他还担任国际工会联合会代理书记。后来他与该机构闹翻,但继续担任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正式书记。发生纠纷主要是由于芬门事先不

与国际工会联合会磋商，便率领一个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团在柏林 517  
会见了俄国运输工人工会代表团和洛索夫斯基，并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这导致了国际工会联合会领袖以及一些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领袖的强烈抗议。芬门表示愿意辞去他的职务，他为自己辩解说与俄国共产党人合作要比与西方资本家合作好得多，但是他没有得胜，联合委员会一事无成。尽管如此，他仍然担任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领导，不过不久之后，由于他与一家在比利时出版的、激烈攻击阿姆斯特丹工会领袖的左翼国际工会期刊有联系，他又碰到了麻烦。他被迫中断了与这家刊物的联系，但仍然保持了他对左翼的强烈同情。1932年，荷兰工党的左翼与党分裂，成立了一个单独的左翼政党，芬门同意出任该党主席，但是在他的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同僚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了这个职务，以便保持他对运输工人运动的控制。在国际工会联合会与该会希望使之完全受它控制的“行业书记处”之间一再发生的争执中，他始终主张各书记处独立，而且在说服别人同意他的观点方面非常成功。他逐步把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建成“产业国际”中最活跃的一个联合会，在许多国家中为他赢得了忠诚于他的追随者。二十年代，他极其强调作为维护和平的手段，工人阶级必须团结一致。但是在纳粹主义兴起之后，他的最主要的主张是在凡属可能做到的国家内加强工人阶级对纳粹主义的反抗。他积极支持奥地利人对塞帕尔和奥地利法西斯党的旷日持久的斗争，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又投身于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事业。1938年他身患重病，此后便在日益艰难的环境下继续工作。1939年战争迫在眉睫时，他将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的总部迁到了伦敦；但是两年以后，他接受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邀请前往作客直到康复。1942年底，他终因脑溢血在墨西哥去世。

芬门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工会领袖，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主义 518

思想家。他的著作《劳工的选择：欧洲合众国还是欧洲有限公司》（1924年）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攻击，并发出了工人阶级统一行动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呼吁。在许多演说和小册子中他有力地阐述了工人阶级必须团结一致的理由，认为唯有通过这个途径方能逐步建立一个可靠而和平的世界体系，并遏制大规模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力量的日益增长的能力。即使是那些与他发生争执的人也对他的诚恳和献身精神心怀敬意，并赞赏他为把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建成一支坚强的国际力量所作的不懈努力。但是芬门和在右翼与共产党人之间采取中派立场的其他领袖一样，也没有能够实现他所向往的和孜孜以求的团结。他在国际工会运动中是一位相当孤独的人物，他坚决反对他认为西方工会已深受其害的瘫痪状态，可是在为此而作的努力中却接二连三碰到麻烦。

## 丹 麦

在大战之前和大战以后，丹麦的社会主义运动甚至比荷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本质上更加是一种改良主义运动。大战爆发时，在下议院的总共149个议席中，社会民主党人拥有32席；但是为了粉碎反动的上议院的力量，他们一直与激进党人密切合作，在下议院他们共同拥有绝大多数席位，而且破天荒第一次在上议院也取得了多数席位。部分地是为了尊重第二国际的意见，他们嘎然而止，没有加入历届资产阶级政府；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全力支持这种政府来对付右翼。1913年的选举胜利提供了修改宪法的机会，1915年的新选举法规定男女都享有普选权，并规定实行比例代表制。此项法律到1918年才生效。在此期间，由于战争状况的压力，社会党人修改了他们以前的政策，容许他们的领袖托瓦尔

德·斯道宁(1873—1942年)参加激进党内阁,在内阁中担任部长 519

直到1920年。在丹麦,不论是俄国革命还是德国革命都没有导致左翼情绪的实质性的表现,虽然一个人数不多的、没有影响的共产党应运而生。在1920年的选举中,社会党人在下议院的议员增加到48名。四年以后,他们赢得55席,而且虽然不是多数,却组成了一个由斯道宁担任首相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这届政府执政二年,后来它的反对派的联合阵线把它赶下了台;但是三年之后即在1929年,社会党人把他们的席位增加到61席之后,又组成了一届政府,这一次部长中有3名激进党人。他们在激进党人的协助下制定了大量工业、农业和社会法律,并一直执政到德国人于1940年占领丹麦为止。然而他们从未致力于实施社会主义,或者哪怕是向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除非可以把以下几点看作是社会主义性质,保护“小人物”不受地主和垄断资本家剥削,维护罢工权利并与工会保持良好关系,以及在为实现福利国家而制定社会立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在一个有很高生活水平并有组织极为良好的农业合作运动的以农为主的国家里,要得到超过这种民众的授权,看来无疑是毫无希望的。丹麦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明显特征是非战主义,它甚至反对除了一小支边防军之外设置任何武装部队。不过,实施这项政策的企图远远超出了我在本章论及的时期。在紧接着1918年以后的那几年里,丹麦人在一个颇不平静的世界里依然平静地自行其是,虽然他们并没有逃脱1920年岁末开始的世界大萧条。在国际上,他们参加了1919年的伯尔尼会议并毫不犹豫地拥护第二国际。

## 瑞 典

就国内而言,瑞典经历了许多很大的动乱时期。如我们在前

520 文所见,在1914年以前,瑞典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并没有很大名气,虽然它的领袖贾尔玛·布兰亭(1860—1925年)在历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1914年,瑞典劳工运动仍处在恢复元气的过程之中,因为1909年的总罢工使它遭受一系列挫折,党员和工会会员人数锐减。<sup>①</sup>然而在政治上,这方面的损失由于1909年的选举改革法而得到了绰绰有余的补偿,这项选举法实施了成年男子(而非女子)选举权,使社会民主党首次成为一个强大的议会政党,在下议院的230席中拥有87席。他们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个稳健的、合乎宪法的政党,在大战爆发以后的1914年11月,他们宣称愿意在大战结束以后为了复兴工作参加联合内阁。党的一个左翼强烈反对这个决定,而且紧张关系一直继续到1917年批评者脱党组成独立社会党,这大概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之前的事。在此期间,布兰亭一直积极活动,为召开1917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而努力。布兰亭虽然与党内其他的人——其实可以说是全国——一样强烈赞成瑞典在战争中恪守中立,却被普遍看作是协约国的坚强支持者,而右翼各政党大体说来是亲德国的。布兰亭的亲协约国的同情态度是使左翼疏远他的一个因素,因为左翼始而采纳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路线,继而又采纳基恩萨尔会议的路线,不论是在战争期间或战后,都拒绝与资产阶级自由党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实际上在战争仍在进行时就出现了联合问题。保守党政府于1917年春倒台,经过几个月的动荡不定的局面之后,秋季的大选使尼尔斯·伊登为首的自由党人上台,在此之前国王曾企图组成各党派联合内阁,但未成功。伊登邀请4名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布兰亭和埃里克·帕尔姆斯提埃纳男爵(生于1877年)——参加他的内阁,这个建议被接受了,尽管

---

① 见第3卷上册第690页。



布兰亭不久之后便因健康原因而辞职。可见，在1917年到1920年的这几个危急的年代里，瑞典有一个包括社会党人少数派的政府，这个政府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并为上下两院选举实行普选权，从而完成了选举改革过程。<sup>521</sup>

1917年选举之前，社会党已经分裂。在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议席增加到86个，独立社会党另外获得12席。在斯德哥尔摩市长卡尔·林德哈根（1876—1950年）和前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泽特·霍格隆德（1884—1956年）的领导下，社会民主党的大约五分之一党员脱党后另外组成一个新党，该党立即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密切联系，尤其是与一直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布哈林的联系。独立社会党仿效俄国的榜样，随即采用了“共产党”这个名字，而且是第一批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之一。霍格隆德担任瑞典共产党的领导直到1924年，起初似乎对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并无可挑剔之处。但是时隔不久他便相信西欧早日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对于共产国际的统一指示越来越桀骜不驯。在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纠纷发展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当时霍格隆德断然拒绝服从命令，他说，大会制定的有关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新政策如被采纳，将使所有西方共产党迅速沦为无能为力的残余力量。继1923年马丁·特伦麦尔领导的挪威人反叛<sup>①</sup>之后发生的霍格隆德的反叛，使他被开除出党，但是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与他一道离开了党。其余的党员在新领袖——其中主要人物为卡尔·基尔博姆（生于1885年）——的领导下继续维持下去；使人感到相当意外的是，党员人数实际上有所增加，直到新领袖次第与共产国际发生纠葛并在1930年退党，只剩下以雨果·西伦（生于1892年）为首的一个少数派仍然

<sup>①</sup> 见本书第527页。

忠于莫斯科的组织。这一次，大多数党员在追随其领袖退出正式的共产党之后，单独成立了一个独立共产党。这种形势一直继续到1937年大多数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终于重新加入社会党。

522

1917年的分裂虽然遏制了主要的社会民主党的成长，却并没有妨碍此后几年内它的党员人数得以迅速增加。布兰亭主持了1919年2月的伯尔尼国际会议，在右翼国际的复兴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后来在1920年3月，内阁中的自由党和社会党阁员在赋税改革问题上闹翻，伊登政府辞职；布兰亭虽然远远没有掌握明显的多数，却组成了他的第一个清一色的社会党内阁，不过执政仅仅几个月。后来保守党重又执政，在他们执政期间，开始了战后的大萧条，其后果是选举向左转。在1921年秋举行大选之后，布兰亭组成了他的第二届的清一色社会党少数派内阁，而且仍然依靠自由党支持。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失业救济问题，为此他花费了巨额款项；主要是用于发放政府所开办的救济性工作的工资。1923年4月，布兰亭内阁与瑞典议会的多数派在发给救济的条件问题上发生纠葛，保守党重新执政。第二年保守党由于防御政策问题也在议会遭到失败，10月，布兰亭组成了第三届社会党内阁。然而他的健康衰退并于1925年2月去世，而由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查德·桑德勒(生于1884年)接任首相。

几乎从一开始，贾尔玛·布兰亭便是瑞典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位杰出人物。<sup>①</sup>他的整个一生始终是一个稳健派——坚信渐进主义和通过议会方法有条不紊地发展。他属于这样一种人：在战后重建国际的工作中，最强烈地坚持社会主义与议会民主不可分割，并着重谴责一切形式的专政。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在战争期间，他坚决支持协约国抗击德国，虽然他并不希望瑞典成为真正的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681页。

交战国。布兰亭是一位富有的教授之子，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时是一个对社会改革颇有兴趣的、有成就的激进派新闻记者；他以此身份在争取工会支持社会民主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897年当选为瑞典议会的第一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之前许久，他便稳固地确立了党的领袖地位。他虽然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毕生始终是一位志在改革的激进派，对于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超出福利国家范围的社会主义的任何方面——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兴趣。在这个限度之内，他是社会和工业立法的强有力的提倡者，不论与任何人交往他都颇能坚持己见，不过他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或理论既没有做出任何创造性贡献，也没有企图这样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瑞典社会主义运动由于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而在改良主义人士之中备受赞扬，他确实就是这条道路的典型代表。 523

桑德勒政府执政一年半之后于1926年6月倒台。失败的原因是其他政党联合一致在接受失业救济金的条件问题上反对它。于是自由党就组成了一个少数党政府，宣布奉行劳资和平政策，并于1928年通过了规定在劳资纠纷中强迫进行仲裁的法律。然而在政策方面，尤其是在国际事务方面，并无彻底改变；在布兰亭内阁曾任外相的B.O.恩顿继续担任瑞典驻国联代表。在1928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一落千丈，从1924年在下议院(总共230个议席中)占有105席减少到90席，而这一次以“工党”名义竞选的共产党则从4席增加到8席。保守党组成了又一个少数党政府，开始执政，但于1930年年中倒台，由另一个少数党——人民党——执政。1930年秋，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二年以后在1932年的大选中他们恢复了原有席位，在下议院获得104席，共产党再次获得8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同意组阁，由佩尔·阿尔文·汉森(1880—1946年)担任首相，从而在世界经济萧条处于最低潮时，社 524

会党人重又开始执政。于是开始了长时期的备受赞扬的社会党稳健统治，这种统治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由欧内斯特·威格福斯（生于1881年）任财相的社会党得以在处理经济危机而不诉诸传统的紧缩通货政策方面，显示出惊人的理财能力。不过，只好留待下一卷再叙述这些发展了。

## 挪 威

挪威是西欧唯一的国家，其劳工运动在俄国革命之后第三国际甫告成立时便整个加入了第三国际，不过它一发现自己要服从该组织的统一纪律的后果，便依旧团结一致地立即退出了。在挪威，在这个以前以农业、林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1914年之前工业发展进度十分迅速，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反对外国资本控制发展中企业的强烈情绪。在1905年以前，劳工运动方兴未艾，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居于头等重要的地位；但此后它便迅速成长壮大，它在议会的席位从1906年的10席增加到1912年的23席，不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走上了工团主义的方向，并带有用总罢工作为实现社会革命的最佳武器的倾向。但是挪威的工团主义者非但没有拒绝与社会党发生联系，反而着手去征服它，把它转变成工会运动在其中扮演主角的、革命的社会改革的附属工具。

挪威劳工运动的杰出人物是房子油漆工马丁·特伦麦尔（生于1879年），他在品德和威望方面都远远超过他的所有同事。特伦麦尔曾在美国住过一段时期，与后来组成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那几派人有联系。1905年返回挪威之后，他迅速确立了他作为新闻记者和演说家的地位，还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在卑尔根定居后，他成了左翼运动的领袖，1912年，这个运动成了工党内的独特派别，并致力于争取工党采纳它的意见。大战期间，他逐步确立了

作为罢工领袖和普遍不满的人的组织者的几乎毫无疑问的主导地位，这些不满的人不仅存在于产业工人之中，在应召服役、对于被迫放弃正常生活方式深感不满的陆军后备役中也是有的。他建立了与工人建立的各委员会进行合作的军人委员会；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在引起工人阶级普遍反抗情绪的艰苦的战时经济条件的压力下，挪威似乎在朝着它特有的社会革命迅速进展。到1918年，特伦麦尔派已经赢得了对工党的控制，后来他成了工党书记。但是在这个一触即发的危机达到严重阶段之前大战就宣告结束，挪威国内的紧张气氛随之缓和，从而避免了革命的爆发，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特伦麦尔及其追随者巩固他们对挪威劳工运动整个的控制。

当布尔什维克召集左翼社会党和其他革命派别参加1919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成员代表大会时，曾积极参加1915年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挪威工党接受了邀请，从而成了新国际的最初成员之一。然而特伦麦尔及其同僚从来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他们是革命的社会党人，主要采取工团主义态度，虽然他们并不像大多数工团主义者那样抵制议会政治行动，只要这种行动受革命的工业控制。必须记住，在这个阶段，莫斯科不仅争取社会党左翼分子、也争取像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这样的革命工业运动的追随者以及“革命的工厂工人代表”支持他们反对“社会爱国分子”，虽然这些工人代表大部分强烈反对列宁所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学说和任何类型的党的专政。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之前，与特伦麦尔的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的俄国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政府中是布尔什维克的伙伴，而列宁虽然十分坚持他本人对于革命策略的概念，却希望争取所有左翼派别支持世界革命事业。因此挪威社会党人得以在丝毫没有对列宁主义表态的情况

526

下前往莫斯科：他们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全心全意的同情者身份前往，但是他们对这个事业有他们自己的解释，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在挪威既不需要进行内战，也不需要接受任何独裁的国际机构对挪威社会党的策略进行统一控制。他们也没有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在实践中接受该组织的命令，或者开除党内右翼以便把他们的基础广泛的工党转变成莫斯科指挥的纪律严明的共产党。尽管如此，他们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宽容，因为它不愿意驱逐西方唯一整个投向它这一边反对改良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运动。

当然，在挪威本身有一个反对特伦麦尔政策并支持旧日的社会民主主义正统学说的、实力雄厚的少数派，而这个少数派不但在工党内、而且在工会内也有其追随者。然而在开始的时候，特伦麦尔的反对派并没有与左翼多数派决裂。左翼和右翼都极不愿意在工业领域或政治领域使运动分裂，因而被击败的少数派在工党和工会内待了一段时间以等待时机。然而时隔不久，信仰较深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认为继续与特伦麦尔联系在一起无异于承认他的左翼政策，发现这种压力并非他们所能承受，于是在1920年一个有实力的议会党团分裂出去，成立了一个以马格努斯·尼尔森(1871—1947年)为首的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工党获得29席，社会民主党8席。然而，特别是工会内的一些资深领袖却拒不追随脱党分子，仍然留在工党内，因为他们颇有根据地希望工党依附共产国际的局面不会长此下去。在采取这种方针的人士中有第二国际的老战士克里斯蒂安·霍尔特曼·克努里森(1845—1929年)，他退出了第二国际的现行工作，但拒不追随脱党的社会民主党人。

然而，不久之后特伦麦尔的党便与共产国际的莫斯科控制者发生了严重争执。起初，争执的主要问题是挪威工党开除某些共产党人的举动所引起，这些共产党人被指责违犯党纪——当然是

挪威党的党纪而非共产国际的纪律。共产国际从而宣布，不经它同意不得开除党员，并命令挪威人恢复被开除的党员的党籍。对于这一点挪威工党在一次代表大会上以169票对103票拒绝照办，从而抵制了共产国际的中央权威。从莫斯科派来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随即宣布共产国际不再承认挪威工党为其成员，但是将转而承认少数派，这些人退出工党后另行组成了共产党。

到了这个时候，特伦麦尔已经由于俄国的事态发展——尤其是1921年3月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镇压——而对一切幻想彻底破灭。他不再相信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还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他作为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所能接受的任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然而在起义之后过了两年时间与莫斯科的争执才导致最后分裂。到1923年初，特伦麦尔才得以把共产国际的支持者从工党内的权势位置上赶走，才得以促使党的领导对莫斯科自称有压倒一切的权利可对挪威工党事务进行干预的说法，进行毫不妥协的反抗。特伦麦尔坚决申明了挪威党必须是它的内部事务的唯一主宰的主张，从而抵制了共产国际的整个中央集权理论。1923年11月，党终于以压倒多数票决定退出共产国际。亲共的少数派随即成立了一个共产党，1924年时这个党已经强大到足以在挪威大选中赢得6席。但是此后它的影响迅速衰落，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它仅获得1席。在此期间，1920年退出工党并在此后加入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于1927年又回到工党，结果挪威人在两个对立的国际中的任何一个中都没有了代表。直到1938年，重新统一的工党才加入了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到那个时候，它已经非但抛弃了革命观点，也抛弃了它的大部分工团主义倾向。

在此之前许久，1928年，由于党在前一年的大选中在总共159个议席中赢得59个议席，组成了以克里斯蒂安·霍恩斯鲁德

(1859—?) 为首的它的第一个少数党政府，并立即提出了一个关于重新分配财富的、引起争议的法案。其它党派随即联合起来把政府赶下了台，但是三年以后它又于1932年重新执政，由铁路工人出身的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1879—1952年)担任首相。这届新政府与农民党结盟组成，虽然不是与农民党的联合政府；它满足于有益的社会改革立法，并且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和加强了对选民的控制。然而，关于它的成就，要留待本书后一部分再作交待。

挪威的情况极其明显地说明了社会党左翼中这样一部分人的困难：他们深切同情俄国革命，极不满意右翼改良主义的议会道路，但是又不愿意跟着莫斯科走或者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高度集中的职权。特伦麦尔领导的挪威社会党人在他们主张通过工人的大规模起义而不是渐进的议会方法来推翻资本主义这个意义上来说是革命者；但是他们从未从举行武装反叛来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这个角度来设想他们的革命。他们自始至终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反对使用武力，他们还表示要大力反对一切形式的军事开支和主张通过普遍仲裁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这种态度影响了他们的革命观念。他们不是依靠内战、而是依靠大规模罢工这个武器来取得革命的成功，为此他们需要工人阶级运动保持一致，所以他们完全不愿意采纳对中派进行激烈斗争、或者哪怕是将改良主义右翼开除出工党的莫斯科策略。不过他们的地位不同于其它国家社会党左翼的地位，因为在共产国际成立时，他们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党，结果他们成了共产国际最初的成员，而不会面对二十一条作为接纳他们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种地位还使他们能够坚决抵制共产国际的这一企图：威逼他们服从它对中派进行斗争的政策；并使他们得以在他们与莫斯科的分歧无法再加掩饰时完好无损地撤出他们的力量。然而，他们这个集团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还不足以使他们在与莫斯科决裂后继续单独奉行革命政策；



因此到了适当时候，他们便再次沉沦于改良主义政策，而就本质而言，这种政策与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策并无二致。

在我写作本书时，在战争和革命的危急关头领导过挪威运动的特伦麦尔仍然健在；虽然他已退出第一线的政治活动，却仍被尊为挪威社会主义的“元老”。除了是类似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的出色组织者和领袖之外，他还是许多领域——包括禁酒——的热心的社会改革家，他的社会主义始终具有强烈的伦理性。这有助于他在比他右倾的男男女女的中间取得在经济和政治事务方面的支持，并使他的影响得以在他与彻底的共产党人决裂之后仍然持续下去。然而这些特征也使他无法在共产国际中产生任何有效影响，而且他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使他在战后的年代里与其他西方国家的非共产党左翼社会党人断绝了来往。到挪威工党退出第三国际的时候，打算通过维也纳“第二个半国际”建立社会主义中间道路的企图已经放弃，所以这些挪威人在失去共产国际一切同情之后，仍然被排斥在国际运动之外。 530

## 芬 兰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芬兰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但是有它自己的议会，这个议会在芬兰自治问题上不断与俄国当局发生争执。在芬兰驻有一名俄国总督，而且俄国军队与芬兰部队在芬兰并肩驻防。芬兰部队虽是俄国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芬兰人却声称不可以派遣他们到国外服役。在1906年以前，芬兰议会根据阶级选举制进行选举，工人和小农很少有选出议员的可能性；但是在1905—1906年的俄国革命过程中，就连这个议会也只好进行改革，实施普选权——包括妇女——和一院制政府；而沙皇则在革命的重大压力下，被迫接受了这种改变。在根据新的选举制举行的

第一次选举中，社会党一举成名，在总共200个议席中赢得80席；新议会中有19名女议员——这是有史以来首批当选的女议员——，其中9名是社会党人。经过改革的议会立即着手制订一大批极为进步的社会法律，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项获准生效。沙皇专制政府战胜了俄国的革命之后，拒绝承认这种立法，而且它还得到击败革命之后选出的反动杜马的支持。俄国政府于1909年和1910年先后两次解散芬兰议会，并根据它自己的法律和敕令统治芬兰。在革命期间成立的社会党和工会组织遭到了镇压，他们的许多领袖被捕入狱或被流放。1910年以后，芬兰的自治终被废止，抵抗力量被迫转入地下。

531

然而由于沙皇统治日益困难，大战使芬兰人恢复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大战还使军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并且使劳工运动和社会党得以恢复活动。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沙皇政府企图强制征召芬兰士兵加入俄国军队并强迫芬兰新兵到芬兰境外服役，大战也成了新的严重的祸根。1916年举行了新议会选举，社会党人获得了明显的多数——在总共200个议席中获得103席。接着，1917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了。在此之前，芬兰议会从未要求脱离俄国完全独立——只不过要求在内政方面充分自治。但是在革命爆发时，社会民主党人表示支持芬兰完全独立，社会党的首相奥斯卡·托科伊（生于1873年）力促新的俄国临时政府承认芬兰的民族要求。克伦斯基非但不同意芬兰独立，反而解散芬兰议会，企图维持俄国的统治。在随后于1917年10月举行的选举中，社会党人丧失了明显的多数，议席从103席减少到96席，其他一些政党组成了一个没有社会党参加的政府。就在这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执政。1917年10月，芬兰议会宣布芬兰独立，列宁立即同意了芬兰脱离俄国独立的权利。1918年1月，苏联政府正式承认芬兰为独立国家，而且这一承认充分体现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之中。

然而就在这时，芬兰本身正迅速走向内战，因为尽管普遍要求独立<sup>①</sup>，但对于解放后应奉行的政策的性质却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总的说来，工人阶级强烈同情俄国革命，但是上层阶级和人数相当多的瑞典族(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对工人阶级和深得人心的土地要求心怀敌意，而且是亲德的。1917年年底之前许久，城市工人已开始组成赤卫军来继续进行革命，另一方面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曼纳海姆将军领导下，主要在乡村地区，已开始筹组一支通常称作“白卫军”的反革命卫队。这些敌对的部队不久便大动干戈。1918年1月，白卫军发动进攻，赫尔辛基工人成立革命政府与议会政府分庭抗礼，并占领了这个城市。在此后的斗争中赤卫军遭到失败，但是白卫军由于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无力统治芬兰，便召来德国人，德国人派遣一支军队占领了赫尔辛基。革命政府逃离首都；白卫军开始了恐怖统治，据说他们的对手有15,000人丧生。这场屠杀据说是对赤卫军执政的短时期内的恐怖行为的报复。赤卫军当然确有恐怖行为，但是规模较小。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的是白卫军而不是赤卫军，他们不仅杀人，而且把许多人关在条件非常恶劣的集中营里。与此同时，社会党议员——具体地说，几乎占议员总数的一半——被排除在议会之外，该议会于3月与德国缔结了一项条约，此时则着手要拟订新宪法，使芬兰成为君主国家，并邀请一位德国亲王——德国皇帝的姻弟、赫斯的弗雷德里克·查尔斯——登基做国王。弗雷德里克·查尔斯接受了这项邀请；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拿定主意前往芬兰，大战便以德国战败告终，因而他实际上没有做成国王。倒是曼纳海姆作为摄政王掌握了最高权力，并组成一个由保王党人和共和党人平分秋色的政府。在此期间，1918年6月，不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选民曾选出一个新

532

① 原文为“自治”，应作“独立”。——译注

的议会，正是这个新议会当初邀请赫斯的弗雷德里克·查尔斯来做国王的。

面对德国的战败，芬兰反动派迅速调整政策以便讨好协约国。冯·德·戈尔兹率领的德军部队被打发走了，曼纳海姆把他的白卫军改编成正规军以维持秩序。一定程度的宪法权利恢复了；1919年3月，工人——除了那些仍在集中营的人以外——被允许在新的议会选举中投票。社会党赢得80席，农民党赢得42席，成为第二大党。议会放弃了君主政体，于1919年6月投票使芬兰成为共和国，并成立以普选权为基础的一院制政府，但仍由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联合政府执政。曼纳海姆一再向协约国示意愿意加入他们干涉俄国的行列，起初是通过支持摩尔曼斯克的英国军队，后来又于1919年岁末增援尤登尼奇将军向彼得格勒进军。但是这些表示都没有被接受。直到1920年10月，芬兰政府才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缔结和约，可是第二年在卡累利阿发生的反对苏俄的叛乱再次危及两国关系。在常设国际法庭以俄国不是国联成员为理由拒不受理之后，芬兰政府将这个问题提交国联理事会。但是俄国坚决说卡累利阿是苏俄的一部分，并终于平息了叛乱。

自从1918年发生骚乱以后，芬兰共产党人便与社会民主党人分道扬镳了。1919年，根据法律规定解散了共产党，但是在温诺拉政府于1921年通过了停战法以后，共产党又恢复了它的存在，并在1922年的大选中赢得27个席位，而社会民主党人的席位则减少到53席。第二年，政府再次解散共产党，取缔了它的报纸，并监禁了它的大多数领袖，包括27名共产党议员中的25名。尽管如此，共产党仍然在1924年的选举中参加竞选，保持了18个席位，而社会民主党的席位则增加到60席。第二年，反社会主义的联合政府倒台，合作运动领袖、社会民主党人瓦伊诺·坦纳（生于1881年）组成了清一色社会党的少数党政府，该政府设法通过了第二个大赦法，使

那些由于参加内战而被监禁的人获得释放。在1927年举行的另一次选举中，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席次几乎没有变化，在此以后社会党政府在议会中被击败，因而辞职。此后直至1937年社会党一直是反对党，它在1929年以后不得不面对所谓“拉波”反共运动的兴起。不过，芬兰社会中后来的对立情况已不属于本章范围。

在这个阶段，与我们有关的是在芬兰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sup>534</sup>动内部在以下两种人之间持续存在的尖锐分歧：一方面是那些倾向苏维埃俄国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而指望西方给予指引的人。共产党中的杰出人物是奥托·库西农(生于1881年)，他在战争年代领导过社会党，后于1918年成为共产党领袖，在芬兰革命政府失败以后到俄国定居，成为共产国际中的重要人物。1939年时再次露面，成为俄芬战争中俄国人撑腰的芬兰人民政府的首脑。在社会民主党方面，主要人物是瓦伊诺·阿尔弗雷德·坦纳，他也是芬兰进步合作运动的领导人。坦纳最初于1907年任议员，1917年担任过一个时期的财政部长，1927年时曾担任总理。他曾是国际合作联盟中的卓越人物。由于他始终是芬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右翼并极其敌视共产主义，在两次大战之间他在社会党和合作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 第十六章

### 西班牙和葡萄牙

1914年8月欧战爆发时，西班牙是一个国内动乱频仍的国度。当然，这种状况并不新鲜；但是由于加泰罗尼亚的遍地暴乱在1909年这个“血腥年代”达到严重程度，并由于为反对一再征召后备役参加摩洛哥战争而进行的斗争，紧张局势加剧了。<sup>①</sup>两个对立的工会运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和社会主义总工会一直在迅速壮大；1914年7月，以前主要是地下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公然举行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才第一次公开化。

战争爆发时，人们立即可以明显看出，西班牙人的同情是界限分明的。总的说来左翼对协约国有好感，而保守党人和上层阶级则几乎一致亲德。然而，很少有人希望西班牙参战支援任何一方。1907年的卡塔赫纳协定规定，一旦出现威胁地中海和西北非的领土现状的情况，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应进行磋商，以便采取一致商定的措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时，从未进行过、甚至从未要求进行过这种磋商。西班牙保持中立，不久便开始从战争订货中获得相当大的利润，特别是从法国、还有英国和其他国家。后来随着潜艇战的发展，西班牙人在航运方面损失重大，但是西班牙的中立地位从未引起严重异议。国内物价急剧上涨，结果使贫苦阶级非常困苦，还使罢工、尤其是1916年和1917年的罢工迅速蔓延。1916年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761页。

春，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和社会主义总工会都发动了全国性的运动要求降低生活费用：5月份在马德里等地出现了为这个问题而举行的乱糟糟的罢工，7月，铁路工人宣布举行全国性罢工，后来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政府对付这次运动的办法是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停止宪法保障以及征召罢工的铁路工人服役。11月，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和社会主义总工会慑于群众的情绪，暂时将它们的分歧搁置一边，并缔结了“革命公约”，根据这项公约，他们同意共同发起总罢工来抗议高昂的生活费用。第二个月举行了二十四小时总罢工。

政府试图加强警察的镇压措施来对付日益严重的动乱；但是动乱继续发展，1917年3月，再次普遍出现罢工和骚乱。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与社会主义总工会再次举行联席会议来抗议政府的专横措施，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果。1917年7月，进一步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罢工，8月，社会主义总工会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的支持下宣布在全国各地举行革命性的总罢工。政府于10月进行反击，逮捕了大部分罢工领袖，并且对促成动乱的肇事者提出多起起诉。

在此期间，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决不是干扰政府权力的绝无仅有的人。从大约1916年年中开始，陆军军官中日益严重的动乱导致了所谓“保卫政务会”的成立，这种政务会表现了企图干涉政治事务的越来越大的倾向，要求对政府体制进行结构改革。由于接二连三的软弱无能的内阁在议会中并无坚定的多数作为后盾，由于传统的党派日益分裂成为敌对的派系，由于国王表现了日益倾向于要抛弃任何显示出有独立迹象的内阁——由于这种种原因，整个政府体系更为声名狼藉。选举并无济于事，因为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整个选举制度极为腐败，而且尽管政府对于随意操纵选

537

① 见第3卷下册第754页。

举已无能为力，选举的唯一效果也只不过是造成了政治僵局。在加泰罗尼亚这个最高度组织起来的不满情绪的中心，长期要求自治的压力有变成要求完全分离和独立的危险，而且军事当局与民政当局之间，以及中产阶级与大部分接受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领导的工人之间，权力之争连绵不绝。面对着派系逐鹿的这种复杂格局，政府的分崩离析似已迫在眉睫。将近1916年岁末，罗曼诺纳斯伯爵的自由党内阁企图解散军官政务会，甚至下令逮捕它们的领袖；但是国王进行干预，被捕军官获释，并获准继续进行鼓动。1917年4月，罗曼诺纳斯辞职，接任的保守党人达托可以说是向军官政务会投降了。此举招来了社会党人、左翼激进党人和共和党人以及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分子的一系列抗议声明；7月，加泰罗尼亚的议员们在巴塞罗那集会，扬言除非政府同意立即召开议会会议，他们将召集全体议员举行非正式会议。政府回答说，任何这样的会议将被当作叛逆行为对待。不过，非正式议会会议仍然于7月召开了，与会的有上下议院的社会党和左翼议员68人，会议要求修改宪法，并成立三个委员会来准备提交下一次会议的报告。

正在这个时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和社会主义总工会宣布了1917年8月的革命性总罢工。因此，实际上同时在进行着三场革命——军官政务会的军事革命，左翼政党的议会革命以及合并后的工会的工团主义革命。然而这三场革命的宗旨互相矛盾，他们绝不可能联合一致地推翻现存的政府组织。军方十分愿意在镇压罢工工人方面发挥作用，而且极不愿意把权力交给

538 不论是加泰罗尼亚主张自治的人还是左翼政界人士。左翼政界人士既敌视军官政务会，也敌视控制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的工团主义者 and 无政府主义者；而工会，或者至少是其中最强大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则极其敌视军方和鄙夷左翼



政党。在这种形势下，实权掌握在军队手中，军队在把罢工残酷地镇压下去之后，迫使保守党政府只好辞职。一个补空的联合内阁依靠举行新议会自由选举的诺言上了台。

然而，1918年2月的大选结果只是使政治僵局继续下去。3月，主要由几位前首相组成的“清一色天才内阁”就职，一直执政到11月初由于内讧而倒台，这正是德国人向协约国投降的时候。德国的崩溃自然对西班牙政局有影响，因为这似乎是以威尔逊原则为基础实现和平以及欧洲民主力量得到加强的前兆。在一个短暂的间歇之后，罗曼诺纳斯伯爵东山再起，出任首相，并匆匆前往巴黎，会见了威尔逊总统，不过回国后却发现他面临着一场由于巴塞罗那的激烈的劳资冲突而引起的新政治危机。1918年1月就已经出现了波及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的罢工浪潮；2月，巴塞罗那电力部门工人的一次罢工（即“拉卡纳迪恩”罢工）最初蔓延到一些其他行业，后来在3月份，又发展成为整个加泰罗尼亚的总罢工。巴塞罗那的民政当局与罢工工人达成了协议，答应了他们的大部分要求，但是接着军方插手，他们驱逐了民政当局，控制了这座城市。这些事件导致了罗曼诺纳斯内阁的倒台，在此后几个月，政府更迭频仍，但接二连三都在军方压力下被迫辞职。尽管极尽营私舞弊之能事，1919年春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举行的大选也未能产生有实际意义的议会多数。罢工仍然普遍存在，雇主组成了强大的单独的联合组织与工会抗衡，他们宣布采取一系列的关闭工厂措施，结果导致了广泛的骚乱和进一步的军事干涉。正在出现这种种动乱时，1919年4月国王的一道敕令宣布了八小时工作日，并于10月开始生效；与此同时，煤矿工人争取到了七小时工作日。也是在10月份，国王的敕令决定在加泰罗尼亚建立一个混合委员会来解决劳资纠纷。但是这些措施丝毫无助于平息动乱：在加泰罗尼亚等地，接二连三地发生罢工和关厂事件，而且同时发生越来越多的暴力行为，包括为

数不少的暗杀事件。

1919年12月,当时已有70万以上会员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在马德里举行了一次全国会议,决定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改组。以前各行各业各有单独的工会,此后则将在每一个地区成立一个单一的工会,或称工会联合会,工会联合会包括所有行业,并且再按行业分为商业或工业分会;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本身则将成为已经在某些地区成立的这种无所不包的地方工会的联合会。这个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会议通过了体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宣言,并临时通过加入新成立的共产国际的决议——人们当还记得,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举行的成立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除了向苏维埃型的革命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发出过呼吁以外,还向革命的实业家发出过呼吁。与这些决定有关的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要求在西班牙成立一个包括所有工人的“大一统工会”,并吁请社会主义总工会在这样一个机构中与它联合。

即使在马德里会议举行期间,巴塞罗那也在举行新的总罢工,以抗议雇主企图在关厂结束之后仍歧视工会积极分子。军事总督对这次爆发的罢工作出了反应,1920年1月6日,他宣布解散该城的全部工会,逮捕了一百多名工会积极分子。几乎就在同时,在萨拉戈萨的军营里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哗变,结果遭到残酷镇压,7名领袖被枪决。在此后几个月里,总罢工和某些行业的罢工空前频繁;在巴塞罗那和某些其他城市,雇主由于希望分裂工人队伍,开始自行组织对抗性的工会。6月,一向是稳健和改良主义的社会党在马德里举行了特别代表大会,以8,000票对5,000票,另外2,000票弃权,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只要接纳的条件令人满意。大会派遣两位代表前往莫斯科,以便商谈条件。但是仅仅过了几天,通常追随社会党的方针的社会主义总工会的代表大会便抵制共产

国际，以压倒多数票决定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这并没有妨碍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于1920年9月与社会主义总工会签订新的盟约，不过这个联盟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在巴塞罗那，在工团主义者与雇主组成的所谓“自由”工会之间爆发了新的暴力斗争；前者成立了一个名叫工团主义青年团的新组织，以便对付“自由”工会分遣队的暴力行为。新任命的巴塞罗那文官总督马丁内兹·阿涅多采取对策，逮捕了大批工团主义领袖，将其中许多人放逐到巴利阿里群岛中的马翁，并镇压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的积极分子。该机构立即宣布举行总罢工，11月底，罢工扩大到了马德里、巴尔毕鄂、萨拉戈萨和其他中心城市，此后又扩大到西班牙各地。社会主义总工会起初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进行合作，但是12月4日它取消了马德里和巴尔毕鄂的罢工，从而使那些地区的罢工陷于瘫痪。于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通告废除它与社会主义总工会的盟约，并指责社会主义总工会背信弃义。总罢工就此逐渐烟消云散。

这一失败使激烈的罢工行动时期告一段落。面临着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采取的严厉镇压措施，1921年这一年相对而言没有出现什么大罢工，尽管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与他们的敌对者之间继续发生无数的激烈争执。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领袖安吉尔·佩斯塔纳1920年12月刚从俄国回国便在巴塞罗那被捕，但是第二个月，社会党人费尔南多·德·541洛斯·里奥斯和戴维·安奎亚诺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就出使俄国、商谈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经过做了报告，结果委员会以9票对3票否决了“二十一条”。1921年4月，这项决议得到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的追认，代表大会以8808票对6025票反对加入共产国际。党随即分裂，少数派脱党后组成了以安奎亚诺、安东尼奥·加西亚·奎希多和E·托拉尔巴·贝西为首的共产党。在同一个月，

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在其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其他在狱中的人缺席的情况下,在勒里达举行了一次地区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在安德里亚斯·宁(1892—1937年)乔奎恩·摩林(1897—1937年)等人的影响下,决定派遣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即将举行的第三国际代表大会;但是8月份在洛格罗诺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不承认这一行动,而且在戒严状态结束、宪法保证恢复以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的正式代表大会终于在1922年6月决定退出共产国际,重申它反对政治行动,并决定加入在鲁道夫·罗克领导下即将在柏林成立的新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际。可见,除了社会党多数派和社会主义总工会以外,工团主义者也拒绝接受莫斯科的政策,此后支持这些政策的就只剩下了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以及为数不多的工会团体,尤其是从社会主义总工会中分离出来的矿工中的工会团体。

在此期间,西班牙部队于1921年7月在摩洛哥的阿努亚尔遭到军事惨败,被迫撤出了整个梅利利亚地区。这次严重失败引起了国内危机。安东尼奥·摩拉领导的新内阁拼凑并派出了一支14万人的援军;为这支军队征召士兵一举遭到了广泛反抗,人们群情激愤,要求对惨败的原因进行彻底调查;据说,这次惨败是上层人士腐败和指挥严重失当所造成。另一方面,军官政务会把这次惨败归罪于议会,并对政府任命毕加索将军为这一事件提出正式报告极其不满。面对他们的反抗,政府企图将他们解散,并代之以陆军部长控制的官方的政务会,但是非官方的政务会反抗,结果内阁被迫辞职。接着,以桑契斯·古埃拉为首的新保守党政府于1922年3月就职,毕加索报告提交给了一个由各党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及时地提出了三份对立的报告。古埃拉为平定局势作了一定努力,他恢复了宪法保障并召回了不得人心的巴塞罗那总督阿涅多;但是当议会辩论这些互相对立的报告时,讨论以暴力场面告终,以致政

府垮台，由暂时言归于好的自由党重于执政，并在1923年4月举行了一次大选，在选举中，社会党人主要由于进行了反对摩洛哥战争的强有力的运动，他们的议席从2席增加到6席，其中在马德里赢得5个席位。

自由党政府迅速发现它不仅<sup>5</sup>在摩洛哥问题上，而且在与教会的关系上也碰到了困难。它打算修改宪法，以便将宗教自由扩大到罗马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宗教。这引起了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于是政府仓促收回成命。在此期间，关于摩洛哥问题的辩论继续进行，并导致了对若干政界要人和国王的严厉指责，责备他们不该毫无道理地干涉军政事务。尽管新政府作过某种努力削减战争开支，但战争开支仍急剧增加，因此财政情况日趋严重；军官政务会对于针对军事当局进行的批评越来越感到愤慨。正当议会就长期的辩论将要做出结论时，加泰罗尼亚陆军总司令米古埃尔·普里摩·德·里维拉勾结加泰罗尼亚保守党人，发动了反西班牙政府的武装叛乱，并宣布成立军事执政内阁接管西班牙政府。自由党人首 543  
相阿尔库希马斯侯爵希望进行抵抗，但是国王拒绝支持他，于是他只好辞职。国王随即承认了普里摩的军事执政内阁的权力，并责成普里摩本人组织新政府。于是普里摩任命了一个新的、经过扩大的军事执政内阁，该内阁宣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将报纸置于严格的检查制度之下，并禁止一切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各省总督统统被解职并由军人接替，而且所有地方当局遭到了严重清洗并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同时，普里摩发表了一份告工人阶级书，宣布由国家调节工资和工作小时。西班牙议会两院议长晋谒国王，要求根据宪法召集新议会，但是国王只不过把他们的要求转交给了军事执政内阁，而该内阁则以企图复活已经过时的腐朽的议会制度为由加以拒绝。

这样，西班牙在1923年9月发生了它的革命，但是这一次革命

是来自军队而不是工人，结果是建立了彻头彻尾的军事独裁制度。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企图宣布举行总罢工来反击这次政变，但是社会主义总工会拒绝加入。在1924年春天到来之前，尽管罢工失败，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仍然保持了一点公开的组织的样子。那一年5月4日，它在萨巴德尔举行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与会代表237人，但是这是它在执政内阁统治下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同月，政府下令逮捕它的所有领导人，被捕人数多达200名以上，并下令关闭其地方组织——每个地区的统一工会联合会。它的残余势力转入地下，主要在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下苟延一时。它的一些积极分子逃到法国，组成了一个名叫“三十”的团体，并企图对西班牙进行武装袭击。1924年11月，他们实际上进军到了纳瓦拉的维拉，但是轻而易举地便被击败——部分原因是由于有奸细混入了他们的队伍，告发了他们的计划。在西班牙国内也发生了若干起小规模局部起义，但是没有出现反抗独裁政权的协同一致的行动。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在1923年9月的总罢工中社会主义总工会拒绝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合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中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受到的迫害。社会主义总工会和社会党的领袖们认为暂时谨慎是勇敢的主要表现，于是向这场动乱屈服了。议会 被弃置一边，社会党人丧失了 在议会中的代表权，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力量过于薄弱，如诉诸武力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普里摩·德·里维拉最盼望的是避免团结一致的工人阶级反对他的统治，于是不久之后便开始向社会主义总工会温和的领袖们作出主动表示。1924年12月，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公开宣布它同意社会主义总工会领袖弗朗西斯科·拉戈·卡巴勒罗(1870—1946年)接受军事执政内阁的国务委员职务，此后社会主义总工会便奉行一种

充分利用独裁政权所允许的自由的政策。1925年5月，戒严状态结束了，而那些愿意与独裁政权合作并且不从事任何革命活动的工会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工会自由，尽管不是政治的自由。当然这种宽容并不适用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它仍然处于秘密状态，并参加了若干起反对独裁政权的阴谋活动，但未成功。在此期间，军政府贯彻了若干旨在调整劳动条件和防止劳资冲突的措施。1926年8月，军政府发表一项新的劳动法规；同年11月，它颁布一道法令，成立一个全国劳工组合组织，并规定通过雇主和工人联合委员会的系统来调解纠纷。大约在这同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里昂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并决定在住在法国的流亡人士中间成立一个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接着，1927年7月在西班牙境内的巴伦西亚举行了一次秘密的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明确地成立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作为地下革命组织。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普里摩·德·里维拉打算设立一个纯属 545  
咨询性的由400人组成的国民议会作为军政府的文职辅助机构，但是不打算设立议会。他表示愿意让社会党人在国民议会中拥有6个席位，但是社会党在1927年10月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拒不准许任何党员出任此职，那些接到邀请的人便拒绝了邀请。然而第二年9月，社会主义总工会在马德里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赞成下属各工会派代表参加政府成立的公共组合团体，条件是代表应由自由选举产生并应服从有关工会的指示。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930年1月普里摩·德·里维拉放弃独裁权力并由贝伦格将军继任政府首脑。贝伦格将军执政伊始便恢复了宪法保障，并宣布大赦因政治或社会过失而被监禁的人，但是旋即表明，其实他打算在本质上保持普里摩在七年前开始实行的军事独裁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就连以前准备与普里摩妥协的右翼领袖也不

得不起反感。1930年年终之前，拉戈·卡巴勒罗与费尔南多·德·洛罗·里奥斯和英达勒齐奥·普里托一同支持了一个旨在推翻贝伦格和君主政体并建立共和国的阴谋。由于他们的计划暴露，他们被捕入狱——普里托除外，他逃往国外去了。但是革命大动荡所需要的力量在迅速复原。第二年，在海军将领阿兹纳接替了贝伦格之后，在西班牙各地举行了市政选举。如往常一样，总是宣称执政各党赢得了大多数席位，但是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赢得了所有大城市的席位这个事实却无法隐瞒。这些胜利使得以前与加泰罗尼亚主张自治的人达成协议的、以阿尔卡拉·萨莫拉为首的共和委员会公开要求国王退位并成立共和政府。国王拒绝退位，但是546 由于看到抗拒将会徒劳，他便同意停止行使他的权力，并且同意在西班牙的命运有待决定时离国他去。然后在自由条件下举行了选举，结果恢复了共和党占支配地位的议会。接着，本人是一位保守的天主教徒的萨莫拉组成了一个各党联合政府，但是由于他反对他的大多数同事的反教会政策，一年以后便辞职了。激进党领袖曼努埃尔·阿扎纳于1931年10月继他出任首相，但是激进派不久便退出了政府，从而使政府主要掌握在社会党人手里。此后政府在拟订西班牙新宪法方面的遭遇，以及导致1936年摩洛哥军事叛乱和随后年代的内战的事态发展，已不属于本卷所涉及的范围。西班牙人的情况，我们就谈到这里，他们暂时摆脱了君主体制和军队的统治，企图在一个一再显示没有能力为共同目标而努力的国度里实现共和国的团结。

在从1918年到1923年9月政变的这几个遍地动乱的年份里，西班牙的历史是一个几乎没有政府的国家的历史，因为虽然内阁更迭频仍，却没有一届内阁能够行使有效的权力来对付军方或者天主教会，来对付不断爆发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叛乱或者雇主和地主为镇压这种叛乱而使用的暴力措施。正如在1914年以前的那



些年代<sup>①</sup>一样，加泰罗尼亚，尤其是巴塞罗那，几乎不断发生暴乱，双方年复一年地进行了多起暗杀以及人身和财产的攻击；有许多有组织的地地道道的暴徒团伙，任何人只要给钱，他们就愿意为之进行暗杀。巴塞罗那警方连续不断地纠缠在这种骚乱之中，并广泛利用奸细为之效劳。警备部队不时进行干涉以平息骚乱，并对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团体进行攻击，但是从未做到把他们完全镇压下去。截然划分为左右两翼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力量态度暧昧。加泰罗尼亚右翼的主张自治的人虽然反对中央集权制度，并且要求重建自主的加泰罗尼亚议会，却往往准备恳求政府帮助镇压工团主义的骚乱，并帮助他们逐步建立驯服的“自由”工会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分庭抗礼。普里摩·德·里维拉以加泰罗尼亚陆军总司令身份发动政变时是在加泰罗尼亚右翼的主张自治的人支持下行事的，后者希望他利用他的权力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总的说来，陆军当局颇为赞成中央集权，普里摩转眼之间就只好改变论调，坚持把中央集权统治维持下去。1923年，在政变发生之前不久，在巴塞罗那成立了一个加布里埃尔·阿洛玛领导的加泰隆社会党，但是面对着加泰罗尼亚的强大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力量以及西班牙社会党的中央集权政策，它没有争取到大批的追随者。1923年以后，加泰罗尼亚左翼的主张自治的人的中心转移到了法国，弗朗西斯科·马西亚上校（1859—1933年）在那里开始致力于把埃斯格拉党逐步建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左翼政党。1926年11月，马西亚曾发动一次起义，但被镇压下去；此后，加泰罗尼亚主张自治的人不得不等到专制统治崩溃之后才重新建立强有力的运动。

从1918年到1923年，西班牙不断处在革命的边缘；但是除了军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761页。

方的力量之外，没有任何力量强大到或很好地组织起来足以推翻现存的国家政权，尽管其腐朽本质显而易见，甚至还是可鄙的。总的说来，权力的逐鹿者太多，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在任何建设性的纲领上联合起来。依靠极其腐败和毫无意义的选举制度建立起来的对立各政党毫无实权可言，也绝不坚持任何明确的或一贯的原则：所以国王可以几乎随心所欲地推倒内阁，实际上他滥用权力到了使有效的文官政府无法存在的地步。在团级军官政务会控制下的陆军对政界人士极为蔑视，对一切来自文官的批评非常不满，使自己成了一个政府完全无法控制的“国中之国”。教会掌握着垄断一切的权力，地位稳固，绝不容许削弱其权力的任何政治举动存在，而且任何政府只要胆敢对教会的垄断权表示异议，教会就

548 把它推翻。工人阶级队伍分裂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者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前者也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后者是区域自治革命的提倡者，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集中的权力，即便是他们自己的组织也不例外。工会运动分裂成了它所控制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和实际上是社会党的附属物的社会主义总工会。虽然这些对立的派别时常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和雇主，由于它们对工会运动的概念不同，每一次结盟后都几乎立即陷于分裂。社会主义总工会坚决主张各行各业单独成立全国性工会的原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则主张通过统一工会委员会实现地区性的彻底团结的原则。

面对着这种种分歧，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工业领域，都不存在出现统一的西班牙工人阶级运动的实际可能性。由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根据地在很大程度上说来位于西班牙的不同地区，前者在加泰罗尼亚和东南地区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后者在马德里的力量要强大得多。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对立运

动之间的敌对状态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有所缓和。然而也有些地区——比方说巴尔毕鄂——却存在一些地方性的冲突，两方中任一方都没有持续的有组织的追随者。必须永远记住，西班牙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存在着差异很大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和耕作制度，从地主家庭拥有的大片几乎未经耕种的土地，到加利西亚农民的稀少的土地，还有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沃洲和比较发达的农业，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就工业而言，唯一幅员辽阔的发达地区在加泰罗尼亚，其他地方只有小片工业区——北部和西南部的矿区，以巴尔毕鄂为中心的冶金工业区，还有为数不多的地方工业集中地区。马德里本身并不是一个大工业中心。在市镇上，有人数相当多的手艺人从事小规模的手工业；但是加泰罗尼亚这个吸引了其他地区的许多移民劳动力的地方，却是发达的工业的无容置辩的中心，它依靠整个西班牙作为它的市场，又是国内投资资本的主要来源。如果要出现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加泰罗尼亚，首先是巴塞罗那，必然要发挥首要作用。然而，在加泰罗尼亚领导全国范围的革命起义的道路上却存在许多困难。首先，加泰罗尼亚人在他们要进行什么类型的革命这个问题上绝不是一致的。他们之中有一个集团把自治的要求——成立实现区域自治的加泰罗尼亚议会放在了首位；但是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主张自治的人也不一致。支配着右翼的工业家要求自治，但是绝不是脱离西班牙其余部分——因为这可能使他们失去他们的优惠市场以及他们作为整个西班牙经济发展中首要的投资提供者的地位。比较激进的主张自治的人就不那么受到这种经济考虑的影响，但是即便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所希望得到的也是区域自治而不是完全独立。他们是联邦制的拥护者，而不是坚决维护自治的充分权利的彻底的民族主义者。

附属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及其地区代表——加泰罗尼亚工会“团结”运动——的加泰罗尼亚工人的领袖们也

具有左翼的主张自治的人的这种关于成立联邦的观点。然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受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控制，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形式和代议制政府，他们对于纯加泰罗尼亚议会与对于西班牙全国议会以及文官政府和军政府的机构几乎一样，抱敌视态度。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希望加泰罗尼亚自治，然而不是通过议会，而是通过一个以工农自由结合为基础的地方公社结构，而且不把任何专制国家机构置于他们之上发号施令。他们设想，将使加泰罗尼亚获得自由这个意义上的革命将是西班牙各地的工农共同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全西班牙的革命，因而他们反对任何会使他们与西班牙其余地区的造反同僚隔绝的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因此，资产阶级的主张加泰罗尼亚自治的人与接受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理论的工人之间绝无团结可言——唯其由于右翼的主张自治的人是这些工人在使巴塞罗那成为全欧洲骚乱最严重的城市的地方阶级斗争中最直接的敌手，情况就更是如此。再有一层，甚至在加泰罗尼亚的工人中间也有逆流，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并非加泰罗尼亚人，而是来自西班牙其他地区的移民，因此对于在加泰罗尼亚自治运动中起巨大作用的纯加泰罗尼亚文化的影响无动于衷。

即令不仅是加泰罗尼亚、而且是西班牙全国的产业工人都联合起来，没有农民的支持也休想有成功的社会革命。毫无疑问，在西班牙的许多地区，农民一有机会就愿意造反。但是，他们愿意为了局部的不满进行纯地方性的反叛，而不愿意进行全国规模的革命。他们可能在无政府主义演说家和组织者的鼓动下一再进行这种反叛，但是没有办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广大地区采取共同行动，或者以任何持久的方式把他们的局部运动与城市无产阶级的运动联系起来。再者，最不愿意反叛的地区是那些由于经济原因和由于教会在较富裕的农民中有着最大影响，而在农业上比其他

地方条件优越的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机会极少，或者毫无成功机会。在本章所论及的时期内，只可能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革命，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根本不是革命者，而与他们决裂的共产党人在这个时候几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派系。但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尽管控制着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其他地区——主要是东部和南部，却从来没有能够领导一次有效的西班牙内战。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集中控制，这种敌对态度本身就严重地妨碍他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在马德里相对的力量薄弱也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他们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使西班牙陷于无法无天状态，但是还不足以推翻妨碍他们的两种强大的集中力量——军队和教会——中的任何一种。正如事态所表明的那样，军队确实是在它的领袖一旦决心篡权时能够在全国强制实行任何法治的唯一的一股力量；而在西班牙，军队具有意义的是军官而不是士兵。毫无疑问，在有些场合下，士兵在某些地方曾作过某种努力来表明自己是革命的力量——比方说1920年1月在萨拉戈萨，但是这种起义是纯地方性的，轻而易举地便被镇压下去了。团级的“保卫政务会”控制下的军队不断采取行动，在旷日持久的摩洛哥危机中，这种政务会为历届政府制造了许多麻烦。然而这种政务会本身是一种妨碍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革命力量：只是在普里摩·德·里维拉以及军事司令部的大多数高级军官置身于运动的领导地位之后，文官政府才终于被推翻，可作为代替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革命运动才随即遭到镇压。

可见，虽然在1919年西班牙无产阶级似乎眼看就要团结在共产国际周围，并接受俄国在世界革命事业中的领导，实际上从未出现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反对各种形式的中央集中领导的情绪过于强烈，无法克服，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劳工联合会一旦发现莫

斯科自称有权不与西班牙革命者商量便决定他们的政策和组织，便退缩不前。其实，共产国际在非革命者的社会民主党人中要比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中的朋友多；因为社会民主党人赞成中央集权，而且不受列宁所激烈谴责的“左派幼稚病”的影响。但是，尽管是西班牙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运动为西班牙新共产党提供了党员，这个党循此方针争取到的追随者依然凤毛麟角，以致不论是对政府，还是对两个主要的工团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都不可能构成任何实际的威胁。

552 在这些年里，战前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几位卓越领袖去世了。第一国际时代曾经活跃一时的一位崇高的老战士安塞尔摩·洛伦佐，死于1914年11月。社会党副主席、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莫拉死于1924年；社会党的缔造者和领袖帕布罗·伊格里西阿斯（生于1850年）死于翌年。无政府主义作家理查多·梅拉（生于1861年）也死于1925年。在取代伊格里西阿斯和莫拉的社会党领袖中有：马德里大学的朱里安·贝斯特伊罗教授（？—1940年）；社会主义总工会的主要人物弗朗西斯科·拉戈·卡巴勒罗；在巴尔毕鄂居于首要地位的新闻记者英达勒齐奥·普里托，以及成为党的主要农业理论家的另一位教授弗朗西斯科·德·洛斯·里奥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尽管进行了种种活动，除了在与共产国际的谈判中起过主导作用的安吉尔·佩斯塔纳以外，没有产生任何杰出的领袖。在暂时拥护共产主义的人之中，后来与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发生联系的安德里亚斯·宁和何奎因·摩林乃是重要人物，而戴维·安奎亚诺、安东尼奥·加西亚·奎希多以及E·托拉尔巴·贝西则在共产党的建党工作中起了领导作用。

## 葡 萄 牙

在葡萄牙,1910年革命推翻了君主政体并建立了它所声称的立宪共和国,在此后的几年里,政变和叛乱接踵而至,来势迅猛,但是社会主义与此殊少关系。人数不多的社会党声称自1876年以来一直存在,可是从未产生任何重大影响。工会运动尤其从1918年以后较为重要,但是它受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控制,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与社会党则是水火不相容的。后者拥有的实力主要在葡萄牙北部地区,尤其是在第二大城、即除里斯本以外唯一相当重要的城市中心波尔图。在里斯本,社会党实力甚小,由工团主义工会当家作主,虽然二十年代由阿尔弗雷多·弗朗科任书记的社会党的总部设在那里。党的主要机关报《社会共和国》由何甘·德·席尔瓦主编,在波尔图出版。

在保王派与共和派之间,以及在共和保守派、民主主义者与激进派之间为争权而混战一团时,工团主义者有时以资产阶级左派教唆者的姿态出现,但是社会党人往往袖手旁观。在1926年激进派的反叛遭到失败以后卡蒙纳将军成为独裁者之前,议会选举经常举行,但一再被政府无耻地暂时操纵;而名义上是成年男子选举权的选举权已所剩无几,因为强制推行的文化考试把大多数工人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全部排除在选举之外。如同在西班牙一样,产业工人的主体对这种情况如果竟然作出反应的话,那么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然而,大体说来,政界人士与武装部队中对立的派别的斗争仍在继续着,后者一再推翻政府,并且在选举产生的总统任期届满之前许久就把他们赶下台。在1919年的战后动乱中成立了一个共产党,但是没有什么实力。随着1927—1928年独裁统治的出现,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活动

都遭到严厉镇压。工会活动受到禁止罢工的法律约束。在共和国时期，财政始终处于混乱状态，通货膨胀使农民和产业工人十分困苦。



## 第十七章

554

### 俄国从新经济政策到五年计划

俄国内战时期——1919年和1920年——通常被称作“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切事物必须从属于红军的要求，而且必须从属于这样一种需要：保证给武装部队和城市居民充分供应粮食，以防止苏维埃政权瓦解。1920年最后几个月，伦格尔终告败北，内战随之结束，这时便开始有必要刻不容缓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对政府结构和管理作必要的改革，使之适应国内的巩固和发展任务。一个极其迫切的紧急问题是缓和农民的严重不满情绪，他们之所以没有走向真正普遍的叛乱完全是由于农民认为白军比布尔什维克的征粮者更可恨；另一个问题是着手恢复在内战的影响下受灾严重的乡村和工业的生产。有两点乃属绝对必要：设法促使农民生产更多的粮食，并使更多的粮食可供城市消费，而无需继续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雷厉风行的征粮办法；同时开始逐步建立一种经济结构，使之有可能迅速实行工业化，并竭尽所能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以交换农民供应的粮食和农产品。

还有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即如何处理红军，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即如何处理不再长期需要直接服军役的那部分人。在内战期间，甚至不惜付出严重削弱工业战线的代价，曾从产业无产阶级中征召了大批积极分子加入红军，而且红军中的这部分人在战斗中损失惨重。然而，红军也起了训练从广大农民中吸收的共产主义新成员的最重要场所的作用，同时，它不仅成了一支有高度作战

555

能力的、纪律严明的战斗部队，而且也是共产主义宣传和行政管理的重要的潜在工具。问题是解散用不着再服军役的那部分红军并准许他们回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呢，还是以某种方式使他们依然组织起来，利用他们从事迫切的民用重建工作，而且也许还把表现出能力和可靠性的红军军人安置在民事组织的关键位置上——尤其在工会中。

在这方面，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托洛茨基是以后一项政策的提倡者的姿态出现的。他希望保持红军原来的组织，并利用他们在保持军事纪律的条件下经营大规模的民用企业。他还建议大批吸收红军军人进入行政部门、尤其是工会的主要工作岗位，以便加强行政制度和保证工会成为苏维埃政府和党在完成经济建设这个迫切任务方面的可靠助手。托洛茨基毫不犹豫地建议在经济建设的各大企业里实行这种“军事化”，或者希望把红军积极分子强加于工会，即使违背工会现有领导人或工会一般会员的意愿也在所不惜。他认为，对于比如重建遭到破坏的运输系统——铁路、桥梁、公路、运河——这样的艰巨任务，庞大的、纪律严明的“工业大军”是有用的，他对工会极其不信任，在工会中孟什维克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势力，而且既然战时条件的压力已经缓和，对“工人管理”和内部民主的要求便趋于强烈。再有一层，虽然内战已告结束，他认为要这样说还为时过早：不会再需要有充分实力的红军来进行战斗以支援其他国家——比方说德国——再次爆发的革命，尽管还有可能需要应付俄国本土的新的叛乱和干涉。

托洛茨基的这个政策结果被抛弃。列宁早在他于1921年3月宣布新经济政策之前，便亲自上阵反对这个政策。在一个时期内，的确曾使用红军部队来从事迫切的民政工作，但是不论是在工会还是在行政机关里，都从未企图把红军军人安置在关键职位

上——虽然他们之中很多人确实找到了这种职位。在列宁看来，在1921年最初几个月的条件下，当务之急是进行战略撤退，放弃内战强加于苏维埃政府的严厉措施，以便缓和农民的不满情绪，并把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直接责任限制在较狭隘的范围之内。他指出，内战已经使得这样一点不可逃避：苏维埃国家应该完全控制远比其领袖愿意做的和能够有效掌握的要多得多的经济活动。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损害了农村的一切生产积极性，并且使工业服从于一个临时拼凑而成的、高度集权的制度，这个制度使官僚主义做法以及一心不惜任何代价使他们的部门维持下去的心烦意乱的经理们规避全然行不通的规章的行为，大为增加。

对于内战结束时存在的全面经济危机所提出的问题，回答是1921年初春在列宁倡导下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起初新经济政策几乎完全是一个旨在增加粮食供应和应付农民牢骚的步骤，但是它对苏维埃经济的其他部分产生了直接的反响，而且迅速波及各行各业、工业，并在不久之后波及到金融和预算领域。这项政策的第一个实质性的、但却是影响深远的应用是以对农产品征收固定的实物税来取代出于战争需要对农民的多余粮食的征购，同时容许农民在准备了自己的口粮和纳税之后，处理他们的剩余农产品，用以交换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或其他物品，甚至在当地市场上卖现款。对农产品征收的新税税率要大大低于以前的强迫征购，以便使农民在一般年代有相当大量的农产品可以自行处理。但是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结束一种使农民不能增加产量的经济动力的制度，给予农民这种动力。据推断，农民用于交换或出售的粮食贮存的增加，会刺激工业生产更多的产品用于与农民进行交换，从而不仅有助于农业的复兴，也有助于工业的复兴。人们认识到，新经济政策将不可避免地最有利于能够增加产量的富裕农民，并认识到这种政策会导致增加农村的不平等现象，而且恰恰是巩固那些

557

最不同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策的农民的地位；不过人们认为，由于迫切需要增加粮食的产量和可向城市供应的粮食数量，必须正视这个前景——即令这与斯托雷平在1905年以后为建立上层农民阶级作为防范社会主义的屏障所作的努力，有令人不快地相似之处。

在工业领域也必须面对令人不快的后果。大规模工厂企业及其所属工厂由于大战和内战期间无人照管而破坏不堪，这种企业显然绝无能力增加产量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要使这一点成为可能，需要进行大量工业重建和资本投资，而且严重缺乏必要物资这个困难也有待克服。在短时间内，唯一能够迅速增加非农产品供应的办法是最充分地鼓励无需大笔资本费用便能发展的小规模形式的生产——即主要是个体手工业生产，或小工厂和合作生产者团体从事的生产。坚信大规模工业的优越性的布尔什维克十分不愿意看到这部分经济得到加强；但是在这方面他们再一次出于需要只得继续做下去，因为除非农民能够以他们自己消费以后的剩余农产品来交换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要期待他们提高产量是徒劳的。因此，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各阶段，最大的努力是使手工业工人和生产合作社作为供应农家非农业产品的来源发挥作用。

实行对农民的新政策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对1921年的春播产生充分的影响，而且由于该年灾难性地歉收，对这项政策的希望从一开始就落空了。主要由于这次灾难，食品价格急剧上涨，而相对而言由于制造业竞相抛售，工业品价格则大幅度下跌。由于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供给工业资金和供应其工人生活资料的整个制度有了重大改变，这种疯狂争夺更为尖锐。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工业企业，除了最小的以外，都是国营企业，它们从国家银行支取流动资金；它们所获利润纳入国家预算，亏损也由国家预算负担。

再者，工人领取的报酬大部分不是货币工资，而是配给券，有了配给券他们可以从国营机构根据他们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对他们的劳动价值所作的某种估计领取生活资料。这个制度起了高度平均主义的作用，但是绝没有提供提高产量的动力。这是一种没有盈余可为特别熟练的工人或努力工作的人提供报酬的一种被围困的经济的产物。

另一方面，根据新经济政策，产业工人不再像这样领取配给，而开始由雇用他们的企业支付工资。有相当一段时期他们仍然主要是领取实物工资，然而按照有关物品的通行价格折算后付给实物，应付的余额则以货币支付。这种改变为增加工资差别敞开了大门。但是这项政策随即产生的主要作用是：产业企业必须自筹资金来发放工人的工资，不能够为此目的简单地从国库提款了。同样，它们不得不筹措购买原料和燃料以及应付其他必需的日常开销所需的款项。它们奉命依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而不得指望国家给予他们资金。虽然新开设了一家专门的银行提供工业资金，它们只能按照工业不纳入国家预算并迫使工业在商业基础上改组其财政的新原则，在严格限制下从该银行支取款项。政府宣布了工业与国家“分开”的原则——虽然工业仍然是公有制。此举的直接后果是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从而迫使工业企业尽量迅速地把它们的制成品销售一空，并且为了应付它们当前的债务用完他们的原料。

559

面对着随即发生的工业品相对<sup>①</sup>价格的暴跌，只得让自筹流动资金的工业企业迅速采取集体自卫的措施。他们合并成了大“托拉斯”和联合企业，以着手防止别的企业以低于它们的价格出售商品来进行竞争。它们还在国家的极大鼓励下，为降低成本而

---

<sup>①</sup> 这只不过是相对的，因为卢布仍在迅速贬值，国家则同样在依靠印刷钞票来应付它的严重赤字。

把生产集中在效率较高的厂家。许多效率较差的单位关闭了，若干较小的工厂租借给了合作社，甚至租借给了私人，他们恢复了这些工厂的生产，作为新经济政策下建立的新私营企业的一个部分。作为这些措施的结果，工业品的相对价格随即急剧上升：事实上在不久之后，当农产品产量在1921年的灾难后恢复正常、争取农民提高产量以供应市场的措施取得预期效果的时候，事物正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了。1923年发生了“剪刀差”危机，相对而言，工业品价格扶摇直上，破坏了农民购买所提供的商品的能力；城乡之间出现了威胁整个苏维埃经济的新危机。

560 在革命初期，苏联领袖很少注意货币或金融政策，而且在内战期间，倘若不经常依靠发行钞票，他们也无法惨淡维持下去。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采取大刀阔斧的步骤，才能巩固国内外的经济，并使国家得以应付支出而无需求助于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通过强制工业自负盈亏、以使工业脱离国家预算的企图，有助于达到上述目标，但是单靠这一点还不够，还需要征收足够的赋税以应付政府和防务的日常开支，并且需要从税收中或依靠能有节余的个人或机构的贷款来为公共投资提供资金。1921年年中继 N. 克雷斯廷斯基出任财政部长的格雷戈里·索科尔尼科夫(1888—?) 力主恢复健全的理财方法。在他的主持下，开始征收新的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向能有节余的苏维埃机构和在新经济政策下颇有起色的个人筹措了贷款。索科尔尼科夫进一步致力于规定一种代表一定黄金价值的新货币单位——契沃涅特<sup>①</sup>，首先作为对外交换媒介，同时也是作为一种不像旧卢布那样容易贬值的国内货币，因为随着通货膨胀继续恶化，旧卢布不断迅速贬值。与此同时，索科尔尼科夫通过变革地审查行政费用，着手

---

<sup>①</sup> 契沃涅特(Chervonet)，等于10个金卢布，1936年废用。——译注

削减公共开支，从而使得公共支出与国库收入之间的差距大为缩小。他还通过大幅度限制信贷，迫使工业进一步采取降低成本的措施。事实上，索科尔尼科夫对苏维埃经济应用了正统资本主义金融的许多传统做法，办法是恢复金本位，并在财政上使用紧缩通货作为武器来控制在新经济政策下批准的、其实是强迫开业的工业企业。

除了工业以外，贸易也深受新制度的影响。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国家对外贸易实行垄断——在新经济政策下继续保持这种垄断——但是，除了国家机构无法控制的非法“黑市”形式以外，国内私人贸易几乎不存在。在新经济政策下，私人贸易又迅速繁荣起来。起初的意图是：这种贸易应该大规模地采取农产品与工业品直接以货易货的形式，而且现款买卖应该严格限于纯地方市场的交易。但是实践证明不可能维持这种条件，不论是对于剩余农产品还是小规模工业的产品，都不得不容许按照市场条件决定的价格自由进行买卖。因此，市场经济很快就渗透到大规模的企业。工厂在凡属可能的地方就购买它们需要的原料乃至燃料，并以同样方式处理它们的部分产品，虽然按道理说工厂仍应首先考虑国家消费机构的要求和公有消费工业。

在这种条件下，一种新型的私商——“耐普曼”<sup>①</sup>——出现了，他们主要是作为撮合卖主和买主的掮客，他们还时常作为替工业企业找所需货源的代理人，尤其是在需要超出纯地方性交易的情况下。这些“耐普曼”中有许多获利甚巨，积累了相当大的财富，于是国家就可以向之征税，发行公债时也可以要他们出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新经济政策下的苏联又恢复了资本主义工业和金融的做法，不同的是主要的工业企业属于公有，一切外贸掌握在国

---

<sup>①</sup> “耐普曼”（nepman）是二十年代的苏联在新经济政策下出现的从事私营商业的人和私营工业企业的承担人或业主。——译注

家手里,信贷仍是公共垄断的事业;有所不同的是国家始终有权取消或修正容许市场经济起作用的条件。实际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改头换面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分明是权宜之计,一旦那些控制着国家的人感到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恢复中断了的进程时,便打算给予社会主义以一定地位。从未明确说明新经济政策打算执行多久,或者通过什么步骤在时机到来时结束这个政策;但是无论如何列宁曾明确地期待这个政策持续若干年时间。

562 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工会运动有着重大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开始之前,关于工会在新社会中的地位,尤其是关于它们与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有一种意见认为,工会必须保持作为产业工人的谈判机构的独立地位,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与雇主谈判时大致同样的方式,与社会主义的工业的管理当局进行集体谈判,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它们能够期待苏维埃雇用机构对工人阶级的要求表现远为深切的同情。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阶级剥削已经消灭,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可谈判的了;工资和劳动条件今后可由苏维埃国家代表工人阶级予以解决;工会应该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应该主要致力于代表国家管理福利事业并与国家委派的经理进行合作以便竭尽全力为全社会利益提高生产率。与这些互相冲突的意见背道而驰的是关于工会及其所属工人在工业企业的实际管理中应起的作用问题所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意见。在早期,工会中有相当多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分子,这些人大部分宣称,在一个工人社会中,工人理应受委托直接通过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或者通过在分权和民主的基础上组织的工会,来管理他们自己的工厂和车间,以便为一般工人提供参加经营和管理的真正机会。在很大程度上说来,这种“工人管理”的提倡者在革命初期如愿以偿了,因为大部分从旧制度接收过来的经理们都被迫主要在委员会管理下工作。然而这种临时准备起



来的组织到了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都被废除了，当时的经理们被授予了大权来应付他们认为最紧急的情况。

内战刚结束，昔日的争论随即复始。一个“工人反对派”逐渐形成了，它的主要要求包括减少共产党内和苏维埃社会的工业结构内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工会自治和内部民主。在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起义之前发生的彼得格勒各工厂的罢工中，“工业民主”问题起了很大作用；而对集权的管理和官僚机构心怀敌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支持者中则居于突出地位。<sup>①</sup>在镇压起义的同时，对彼得格勒等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嫌疑分子采取了严厉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并未结束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曾在1917年的苏维埃政府中担任劳工委员的亚历山大·G.谢里雅普尼科夫(1883—?)是“工人反对派”的领袖，支持他的是以前非常有影响的亚历山大·M.科龙泰(1872—1952年)，他发表了一个阐明反对派立场的小册子。反对派主要是作为对托洛茨基担任交通人民委员时采取的政策的反击而形成的，而托洛茨基担任此职是为了处理使铁路恢复到更有效状态这个迫切任务。将近1920年年底，托洛茨基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阐述他的这样一项政策：将工会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并在国家所任命的人员的领导之下，利用它们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纲领的工具。这项将工会“国有化”的建议遭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拒绝；但是托洛茨基拒绝参加的党的十人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该报告一方面承认工会的独立机构地位，同时建议采取步骤来保证工会与国家进行合作提高生产率，打击敷衍塞责和旷工行为，并在党的领导下全面行动起来推进苏维埃国家的经济计划。其实，该报告提出的建议是：工会应该像

---

<sup>①</sup> 关于喀琅施塔得起义，见本卷上册第212页。

苏维埃和国家机器以外的其他关键机构一样，为共产党所渗透，以致成为党的政策的执行者，而在名义上又不从属于党或者国家。

564

“工人反对派”强烈反对这个建议，与他们反对托洛茨基主张将工会完全并入国家机器的计划的态度几乎一样。但是，由于十人委员会包括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中央工会组织领导人米哈伊尔·P.托姆斯基（1880—1936年）和列宁本人，工人反对派显然毫无达到目的的可能。事实上工人反对派被彻底清除了，其领袖被从权势岗位上降职，虽然没有被消灭；要是在党颁布禁止一切“宗派”活动的禁令之后，他们早就被消灭了。1921年，共产党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铁板一块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不久之后强加在它身上的。当然它已经充分表示了这样的见解：一旦党就某一个政策作出决定，每一个党员不论是否同意，都有责任执行这项决定。不过，在就党的某一项政策作出决定之前，仍然容许组成集团，为分歧意见进行宣传，容许争取支持，直到作出权威性的决定。

虽然托洛茨基的建议——将工会“军事化”，并在实际上把工会变成国家机构，不是由工会会员挑选的领袖领导，而是由官方任命的领袖领导，以保证工会的忠诚——遭到抵制，党实际采取的政策更接近托洛茨基的政策而不是工人反对派的政策。谢里雅普尼科夫及其集团主张工会既不受国家约束，也不受党的机器的统治。他们希望工会在会员自行管理以及把相当大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工厂团体这个意义上而言有内部民主，也希望工会成为无产阶级民主的直接工具，在一个工人社会里负责对工业的实际管理并对其经营实行广泛控制。他们实际上是共产党内的工团主义或近似工团主义分子，但是这样的人在党外的工人中间——比方说在曾经是左翼社会革命党的支持者的那些人中间，以及人数虽少却很活跃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集团中间——要多得多。在若干工会

565

产党之外，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更强调工会的职能是就工资和劳动条件进行集体谈判，而不是要求“工人管理”。然而这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两个问题上，工人反对派都不得不遭到布尔什维克领导——除了列宁的追随者以外还有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的强烈反对。这两个集团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散的“工人管理”，他们认为这与有效的工业经营和无产阶级专政指导下的统一的经济计划都是背道而驰的。他们认为，专政意味着整个工人阶级通过坚强的集中的纪律进行集中控制；而且他们认为，任何主张某一种工业或部门中的每一个工人团体应该对其事务行使权力——哪怕是作为整个阶级的受托者——的建议，都是一种“宗派主义”，或“山头主义”，会为集体利己主义敞开大门，并且断送为了整个无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采取统一行动的一切可能性。虽然作为共产国际的新成员，在共产国际对社会党右派和中派进行的斗争中，工团主义分子起初曾受到欢迎，却从来没有容许他们的见解普遍流行或者哪怕是存在下去。曾经争取他们拥护共产国际，是为了转变他们的信仰，使之接受正式的共产主义观点，从而把他们吸收到共产国际中来；当初的用意是在可靠的共产党领导下，使他们尽快消失。在共产党人看来，工会红色国际及其在各国的成员团体并不是有权自行制定政策的独立团体，而是应由共产国际以及在它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控制和管理的附属机构。工会从属于共产党这个事实尤其在法国引起了巨大困难，但是在俄国，共产党处于十分强大的地位，足能贯彻它的意志。

然而，除了托洛茨基以外，主要的领袖人物并不希望工会在名义上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希望工会保持非政府机构地位，并致力于为共产党而不是为苏维埃或人民委员会委员争取到对工会的控制。应该渗透到工会中去，而不是把它们接管过来，这是因为如果它们保持名义上的独立，就更有可能在争取提高生产的运动

566

中确有帮助，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利用它们作为在整个产业无产阶级中传布共产主义思想和政策的强有力的媒介。关于在这种安排下容许工会独立的程度——尤其是关于它们就工资问题不论是在全国范围还是在某种工业的工厂中与负责管理工业的机构进行集体谈判时有多大自由，还存在一些模棱两可之处，以及一些真正有疑问的地方。这个问题后来引起了麻烦，并且使托姆斯基被撤消了工会运动领导人的职务。但是1921年时，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没有任何总的经济计划，需要由中央来决定“工资基金”数额，或决定在各团体和各等级工人中的分配数额；因此仍然有可能进行试验并容许每个工业部门和团体有一定的余地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来力陈自己的理由，虽然已经有了有利于把主要谈判职能集中在中央工会委员会手里的强有力的推论根据。在那个阶段，工会刚脱离军事共产主义状况，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工人的主要收入不是工资，而是国家配给的口粮等等。整个发放工资的结构正在重新制定，因为工业必须做到在财政上自给自足，并自行支付工资；只要共产党的领袖们能够确使工会事事听命于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情愿让工会在同负责形成总经济计划的当局共同制定新形式的工资结构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没有接管工会，而是致力于使工会更加全面地受共产党控制，办法是把孟什维克和其他反对派分子赶出他们仍然把持的关键岗位，并且最充分地使用工会内的党小组，以保证工会服从党的政策。在这方面他们不久之后便极有成就，以致此后的反对意见主要完全来自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员，而不是来自排斥工会在苏维埃社会中起着共产主义作用的想法的孟什维克或工团主义集团。

工人反对派提出的檄文中颇为重要的一款是：“官僚主义”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损害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基础；而且理应掌握控制权的真正的无产者却越来越多地受到官员差遣和

纠缠，官员中有些人是旧政权的留用人员，他们不是工人，而是对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见不耐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这项指责颇有道理，如果不是如此倒反而是咄咄怪事。自1917年以后，苏维埃政府便被迫临时拼凑了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器，可是并无足够的人员可资利用，因此不可避免就要胡乱录用、来者不拒了。尤其是经济机关在很大程度上配备的是一些在新秩序下出于谋生的需要，尽管在政治上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却愿意在经济问题上为他们工作的人。在那些迅速升迁到掌权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中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动不动就滥用新近得来的权力的、自命不凡的小官吏。更有甚者，由于所有必需品——原料、制成品和部件——都极其匮乏，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复杂的“控制”机构，这种机构很快便变成了既使各个领域的经理们、又使无法再作工的工人们感到恼怒的“官僚主义”的机构。把这些困难归咎于“官僚主义”也就是自然的了，而且毫无疑问，大部分指责是罪有应得。但是麻烦的根源在于什物极其匮乏，而要补救这一点并非易事。

这种形势引起的一个激烈争执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为了缓和消费品以及工业所需机器和原料的短缺现象，是否应该加紧进口，尽管难于筹措支付进口货物的资金。力图在国内外稳定货币地位的财政当局自然反对这个方案，并且坚决认为在缺乏外国贷款的情况下，只有同时增加出口，才可能增加进口。然而，唯有促使农民将供应市场的产品增加到超过城市人口的需要，才可能提供较多的出口商品，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一方面因为农产品产量如有增加，其中一部分势必被农民本身所增加的消费量所消耗，另一方面因为城市居民仍然处于严重的食品短缺状态。显然，即便可能在较大规模上恢复农产品——尤其是谷物——的出口量，所出口的也不会是真正的剩余，而是剥夺了国内市场所迫切需要的农产品。唯一的问题是：这种需要尽管很迫切，是否必须

568

让位于以农产品出口交换工业品以及交换用于恢复工业生产的机器和原料这样一种更大的需要。

569 进出口问题同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之间——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小农农业和大规模工业各自的要求之间——这样一个甚至更大的经济关系问题密切相关。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新经济政策最初的宗旨主要是作为使农民提高产量的手段；而在工业和商业方面，新经济政策的宗旨主要在于争取增加可以卖给农民交换农产品的工业品。有鉴于此，侧重点就放在小规模手工业的恢复以及轻工业上而不是重工业上——因为用这种方式最容易立竿见影，而无需对新的生产工具进行大量投资，这种投资是正在挣扎的经济还无力承担的。面对眼前的危机，似乎有必要在“剪刀差”危机解决之前，暂缓进行工业发展的主要工程。对于这种必要性，人们的反应极为冷淡，这是因为它必然会加强农民——尤其是比较富裕的农民——的地位，还因为布尔什维克坚信大规模工业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而十分轻视他们被迫加以扶植的那些小规模手工制造业。他们不愿加强俄国社会中的农民成分，也不愿意加强手工业者的地位。他们希望在一旦可能时以大规模的工业化农庄来取代个体的小农所有制；他们相信，俄国在共产党统治下存在下去的前景取决于他们以完全现代化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结构来装备俄国的能力，这种结构的基础必须由重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来奠定。

因此布尔什维克极不喜欢新经济政策，他们之所以接受这项政策完全是因为非如此不可，而且把它了解为是暂时的。然而，“暂时”一词可能具有不止一个意义，新经济政策将实行多久的问题不久便变得尖锐起来。有不少人担心，新政策的重大成就不久便会使这项政策不可能再予取消，这在当时来说，既是由于小农农业地位牢固，也是由于“耐普曼”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私营企业在

零售贸易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那些最强烈地产生了这种疑虑的人很快就开始要求停止执行这项政策,并重作努力,恢复向社会主义的进程。特别是有些人吵吵嚷嚷说,随着“剪刀差”危机的解决以及工业品价格的相对下降,让农民在菲薄的国民收入中得到过多的一份,而且他们在消费中消耗掉了,应该采取步骤迅速予以纠正。托洛茨基是迅速工业化政策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显然,要迅速实现工业化,资源只能来自对农民的加紧剥削——因为在新经济政策下通过给予外国资本家投资商以工业发展特权来吸引他们的工作并未取得重大成果。有一点已开始明朗化:俄国——或者说得精确些是苏联,因为1922年12月它正式成立了——如果进行工业化,就必须依靠它不多的资源来支付工业化的费用,代价是在完成改变的过程中减少国内消费;这实际意味着负担的主要部分必然要落在农民身上,因为除了他们就再也没有别人可以负担了。 570

在这种环境下,经济学家E. I. 普里奥布拉任斯基(生于1886年)提出了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理论公式。他提出了“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主张,这与马克思在叙述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强调的“原始积累”是一致的。普里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苏联需要从农民那里取得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产业投资所需的资源,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能有效地恢复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因此,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和对农民征收重税,对于帮助社会主义的进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些反对普里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的人之所以这样做,就大部分而言,并非出于对农民的任何同情——总的说来,布尔什维克对农民颇为不屑——,而是由于他们担心农民会通过降低他们的产量而因此重现新经济政策旨在消除的那种危机,来挫败拟议中的措施。在一个短时期内,这种疑虑足以阻止领导阶层按照普里奥布拉任斯基或托洛茨基的建议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新经济政策被允许继续实施,但是在工业领域,一旦人们感到有可能把重点从

小规模轻工业转移到大规模重工业而又不致于引起新的农业危机时，这种转移便开始了。除了在未开垦的土地上开办庞大的国营农场的工作以外，任何打击农民的个体生产体系的工作都推迟了；为提高农产品产量，仍然主要依靠新经济政策给予中农以鼓励，中农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集团，总的说来他们能够作出比富农大得多的贡献，尽管恢复“自由市场”对富农的好处最大。

早在1921年当新经济政策还在初期时，普里奥布拉任斯基便  
571 开始阐述他的观点，并因此遭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当他在1923年以他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学说回敬列宁的指责时，列宁虽然在世，实际上已经丧失活动能力；N. I. 布哈林（1889—1938年）和A. I. 李可夫（1881—1938年）接受了新的挑战，他们辩称，普里奥布拉任斯基的方针必然会破坏革命赖以存在的、产业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可能很容易地不仅导致农业产量的急剧下降，甚至导致普遍的农民暴动。一时之间他们的论点颇占上风；但是实际上普里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的主张之所以遭到抵制并非由于本身存在错误，而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整个共产党十分愿意尽量地和尽快地竭力发展重工业；显然这就意味着为了取得所需资源而压榨农民。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应该立即开始这种压榨，还是推迟一下直到小农生产的进展程度已足以使农民应付这种压榨，而又不致于使他们穷困不堪到必然怨声载道而且还很可能被迫进行积极反抗的地步。实现聚集“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企图推迟了，但并未放弃。这个企图后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新提了出来，并在进一步以大规模向集体农庄过渡来取代农民个体耕作制度时见到了它的后果。然而在1923年，除了很笼统地提到以外，几乎没有考虑后一个问题，尽管早在1921年时普里奥布拉任斯基便已强调迅速发展大型国营农场从事谷物种植的重要性，而且一直竭力主张吸引外国资本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耕作的大规模实验进行



投资。

在新经济政策的效果问题上发生尖锐争执的时间正好与领导权之争的时间相同，这场斗争发生在列宁残废之后，而在1924年1月列宁去世之后更形加剧。列宁在他被迫告退之前，一直是无可置疑的革命领袖和革命的主要政策的制定者。内战结束之后，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由他一手制定，也是由他几乎是强迫党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项政策；要不是依靠他支配一切的权力，要促使党接受这项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列宁之后（即便是许久之572后），托洛茨基乃是第二号杰出人物，起初是在1917年的危急存亡之秋，后来是作为赢得内战的红军缔造者。在指革命领袖时，不仅是在国外才习惯于并提“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因为就托洛茨基作为演说家和组织者对广大革命工人和军人的影响而言，没有任何人堪与他匹敌或与之相近。在俄国以外的地方，列宁去世之后，托洛茨基会接替他在领导阶层的首要地位，这看来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毫无疑问，在俄国国内也广泛存在这种情绪。然而，在布尔什维克的杰出人物中，有大批人并无同感，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认为托洛茨基是暴发户，由于过去与孟什维克有联系并企图以“调停者”身份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架起桥梁而名声不佳——说不定首先认为他不是“老布尔什维克”，因而无权以此身份分享布尔什维克胜利的果实。毫无疑问，托洛茨基是犹太人这个事实也被认为对他不利，但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的反犹情绪要比广大的普通人少得多；因为在二十年代，尽管犹太人在孟什维克党内居于显要地位，在沙皇治下的社会上长期流行并被处心积虑地大肆用来作为转移群众怨愤的工具的反犹情绪，还根本没有成为革命党人的明显态度。主要由于刚才说的其他理由，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才根本不准备同意托洛茨基接替列宁的位置担任他们的领袖，而且这些人还可以从容不迫地找到更多理由来反对他。这

是因为托洛茨基在为缔造红军、赢得内战和重建运输系统所作的巨大努力中，在谈到他认为无能和刚愎自用的其他领导人时经常直言不讳。人们很容易指控他企图通过他对红军的控制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甚至指控他具有沙皇般的野心，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建立在个人独裁基础上的政权的首脑。使这种指控更加容易的是托洛茨基做了这样一件事：内战结束之后，托洛茨基建议利用红军作为民用建设的主要工具，把红军军人安置到遍布行政部门的要害岗位上去，并且使工会受国家任命的、主要来自他的红军僚属的领导人管辖，从而使工会“国有化”。

我认为，要说托洛茨基确实具有人们主要指控的那种野心，是十分靠不住的。我确信他对革命事业具有最真诚的献身精神，毫无个人的野心。但是他并不轻易容忍蠢人或者哪怕是分歧意见，而且对于任何不论理由是否正当、有妨碍他行事之虑的人，极不耐烦。他习惯于发号施令并且要别人服从他的命令；他喜欢作出迅速的和命运攸关的决定，而不要等到与决定所影响的人或自认为有权受到咨询的人商量。他专横而不老练，这些在战斗中对他有用的素质现在转而对他非常不利了。他曾与列宁共事并在他领导下工作，因为归根结蒂他对列宁的革命本能深为敬仰，愿意在即使他们存在意见分歧时向他让步。但是他肯定不愿意向任何其他人士表示类似的尊敬；他也绝不是一个能与别人在平等基础上共事的人。因此，尽管他极有威望，却非常脆弱；即使在列宁仍然视事的时候，在一同担任领导的同事中，千方百计破坏他对列宁和共产党事务的影响的大有人在。

我认为，还必须记住，托洛茨基就本能和信仰两者而言，都与其说是党的忠实支持者，不如说是苏维埃的忠实支持者。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他如何强调彼得格勒苏维埃、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在十一月政变的准备工作中的作用，以及他在这个问题上与列

宁各执一见的情况。<sup>①</sup>如我们所见，1917年夏，在梅茨拉容茨将其集团并入共产党以准备第二次革命时，他才加入共产党；他与行动中的党的首次接触的经验向他表明，党的许多领袖在响应列宁发出的采取革命行动的号召时是踌躇不前的。他没有忘记这些经验，他在1924年撰写他的著名论文《十月的教训》时表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许多场合发表的演说和采取的行动中确实也表现得十分清楚。对于共产国际的首脑、彼得格勒共产党人中的主要人物格列戈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年），托洛茨基率直地表示蔑视，认为他是在危急时刻以勇敢的言词掩饰极端的怯懦的、胡言乱语的革命者。对于L.B.加米涅夫（1883—1936年），他也认为他过于谨小慎微和气量狭小；而在托洛茨基与共产党的新任书记斯大林之间，从一开始接触便在气质上存在很深的鸿沟。最后提到的这种对立结果证明异常重要，因为正是斯大林在列宁去世之后成了与托洛茨基角逐领导地位和控制权的对手。斯大林先是利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盟友来策划推翻托洛茨基，然后在他们对他已经无用的时候把他们抛弃。结果证明，俄国革命的真正的恺撒是约瑟夫·斯大林（1879—1953年），而不是托洛茨基；可是在列宁去世时要意识到这一点——哪怕意识到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也需要卓有先见。

布尔什维克革命刚成功时，斯大林担任的职务是负责民族事务的人民委员，这个职务使他得以渐渐熟悉远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党讨论和决定总的政策的主要中心——的日常事务的苏维埃统治地区的关键人物。1919年，他奉列宁之召担任了第二个职务，使他与新的政府和行政机器的每一个方面发生了甚至更为密切的接触。这个职务就是负责工农检查院的人民委员，这个名叫

<sup>①</sup> 见本卷上册第87页。

工农检查院的机构是列宁为打击官僚主义倾向而设立的一个特别机构，它使隶属的每个行政部门接受可靠的党员即工农的不断检查，他们受权在任何领域进行干预，以纠正诸如官僚主义的无能和贪赃枉法等弊端。实际上，结果往往证明治疗办法比病更糟；工农检查院获得了坏名声，而且列宁本人随即指责它笨手笨脚和甚至采用残酷方法，以致使得勤勤恳恳的工作人员深受荼毒、怨声载道。575 尽管如此，工农检查院的领导者必然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得以插手行政机关的每一个部门，了解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每一个人，并随意擢升某些人和罢免另一些人。斯大林一方面从工农检查院的无所不在的活动中得到了好处，同时却逃脱了该机构的错误和过失的大部分罪责。然后在1922年，在撤换了曾起党的书记处作用的“三执政官”以后，他被任命担任共产党总书记这一新职，由维·米·莫洛托夫(生于1890年)担任他的主要助手。从理论上来说，即使根据新的安排，书记处无非是党中央委员会的有用工具，主要通过它下设的两个局——政治局和组织局——进行工作。但是斯大林已经是这两个要害机构的委员和两者之间主要联系人；这种集几个职务于一身的情况使他得以借助他在工农检查院的经验，将总书记一职发展成为大权在握的职务。组织局的职能包括指派任何党员担任某项据认为他最能为党效劳的工作，并在这样做时将任何党员从一地调往另一地，以防止他依靠地方或组织的追随者建立稳固的地盘。这项权力曾被非常广泛地使用，而且毫无疑问，往往基于非常充分的理由。但是显而易见这使得运用这种权力的人得以强有力地控制党的机器，而且实际上是控制全体党员；而斯大林绝不是一个不会充分利用这种机会的人。从内战结束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斯大林便孜孜不倦地工作使自己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器以及党员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的苏维埃政府行政机关的主宰。托洛茨基在他写的小册子《新方针》(写

于 1923—1924 年) 中随即把这个过程谴责为党的机构的“官僚主义化”，并且要求通过恢复比较民主的党的行动方式来加以扭转。

至于托洛茨基，尽管他在认为绝对有必要迅速行动时容易采取独断独行的方法，却坚决认为共产党唯有接受广大普通党员的有效管理，唯有这些普通党员不断得到新党员——直接来自工厂的产业工人在其中居优势——的更新，才能保持活力和推进革命事业。而被布尔什维克“元老派”看作是局外人和新党员的托洛茨基却竭力反对这批“元老派”在决定党和国家的政策时继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反对“元老派”的这样一个习惯：不与党员磋商就作出十分肯定的决定，然后以对党忠诚的名义号召党员完全服从。他说，在内战时期，诸如此类的做法可能不可避免，但是在需要计划和贯彻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方针”的和平时期，继续这种做法就是危险的错误。在革命以后参加党的新党员与“老布尔什维克”同样有权参与制定党的未来政策；但是，他断言，在“元老派”的许可下建立的官僚机构却蓄意排斥并压制这些新党员。他在对“元老派”进行这种指责的同时还指责说，由于接纳大批既非工人又非农民、而是知识分子、政客和旧官僚——后者同意为新政权效劳，并为国家和党的官僚机构提供了很大比例的成员——的人入党，党员人数大为增加。他又指责说，来自工人队伍的许多党的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党的机构内的官僚主义倾向的影响，与广大无产阶级失去了联系，而成为对“元老派”的中央集权的权威言听计从的官僚主义者。

可见，托洛茨基不仅呼吁共产党内要有较多的民主，以便政策可以自下而上地产生而不是由中央强加，而且呼吁改变党的成份，以便使党具有更明确的无产阶级结构。列宁去世之后，这些要求中的第二个要求得到了满足，首先是通过把很大比例的非无产阶级党员开除出党的大清洗，后来是通过敞开吸收大批的主要是无

577 产阶级的党员。然而，对于托洛茨基希望恢复党内民主的第一个要求，并没有作出与这一巨大变化相称的让步。相反，斯大林不断加强了对党的控制，并利用清洗作为武器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论点主要针对党的领导集团内存在的这样一种日益严重的趋势：把各种各样导致某些集团的形成的党内讨论一律谴责为“宗派主义”，理由是这些集团为了对一些应该遵循的政策提出独特的意见而采取共同行动。他说，他同意这样一点：“宗派”的存在是说明党内有问题的明显迹象，是一件憾事；但是他特别否认在某个具体观点上与中央核心小组有分歧就必然构成宗派，并认为单纯依靠对不论是“集团”还是“宗派”加以谴责并不能加以防止，除非是付出扼杀党的生命并使党沦为官僚机构上的赘瘤的代价。他坚持说，在任何必须应付国内外千变万化的形势的有生气的党内，在应该遵循何种政策这样一个问题上，必然会产生实际的和合法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应该通过充分而坦率的党内讨论来加以解决，而不应依靠暴力来镇压。他说，暴力只能驱使分歧意见隐蔽起来，而并不会解决分歧；解决分歧的唯一途径是容许集团和个人——因为个人在必须单独行动时往往孤力无助——提出各种各样观点，然后参照提出的所有论点，以民主方式集体作出决定。托洛茨基对于在革命现阶段必须由一党掌权不曾有过丝毫怀疑，事实上他坚决认为有此必要。他所要求的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党应该通过在全体党员中间不断进行密切磋商来制定自己的政策，而不是从中央小集团那里接受现成的政策。

578 不难看出，如果托洛茨基当初不是自信党的普通党员——或者至少是党的无产阶级成员——会站在他一边反对他所指责的极不得人心的官僚机构，他可能会对党的民主体制的优点具有不同看法。除非他相信民主程序会增进他认为革命应遵循的方针，他几乎不可能是一个坚韧不拔地提倡民主程序的人。然而他确实十

分真诚地相信，革命的成败，甚至是存亡，取决于产业工人的持续支持，并相信有失去这种支持的危险。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当时的实施方式既是为了加强富农在农村的地位，也是为了使“耐普曼”和小资本家在农民主体与产业工人之间居于关键地位，以便切断产业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的直接联系。与旨在与整个农村妥协、抹煞富农与贫农的界限的新经济政策不同，托洛茨基希望在农村恢复阶级斗争，由产业无产阶级与贫农合作，并煽动贫农来反对富农；为了做到这一点，在他看来，必须争取产业工人的主体积极参与其事。这个政策甚至根本不是从贫农的直接利益着眼，而是旨在切实迅速地发展工业化，而在短期内，它必定使多数农民、其中包括贫苦农民遭到损失。托洛茨基不是他最为鄙视的小农经济的朋友。他认为，甚至可以违背农民的意愿，强迫他们为加紧工业发展提供资金，从而对革命作出他们的贡献；他认为，只要停止姑息富农并煽动贫苦农民反对他们，就能最有效地迫使农民做到这一点。

可是，当托洛茨基在他的《新方针》和 1923 年底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反驳说他“低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的指责时，他显然是诚恳的。他指出，1921 年他完全赞成新经济政策中这样的部分：解除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强加于中农的征购负担，以便首先吸引他们提高产量。他还指出，他主要依靠农民出身的新兵 579 建立红军，便是以实例证明他对于农民作为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力量是何等重视。但是同时他总是小心翼翼，不说“工农专政”，而说“农民支持下的工人专政”；他回击指责他低估农民作用的人说，批评他的人犯了低估产业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这样一个严重得多的过失。其实，如果否认农民在革命专政中与无产阶级结成真正伙伴的能力就是低估他们，而托洛茨基确实低估了农民。他认识到——再没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产业工人有必要争取农民主体站在他们一边来反对反革命；但是他不认为农民本身能够

发挥建设性的革命作用。在托洛茨基看来，只有在农民成为红军军人并以此新身份接受布尔什维克思想灌输之后，农民才能发挥这样一种作用。在他仍然是农民的时候，可以安抚和诱导他保持对城市的供应，甚至提供供出口的剩余农产品。必须以能取得这样的结果的方式与他们打交道。同时也有必要采取步骤防止他们与同样受到新经济政策鼓舞的私人资本家结盟；这就需要采取行动，在农村中煽动贫苦农民反对富农，从而使那里的阶级斗争保持生气。眼前，最迫切的需要是把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到农民买得起的程度，并迅速发展工业以增加这种工业品的供应。但是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进展必须首先取决于通过对大规模工业的投资来加强产业无产阶级，而不取决于农民。产业工人和红军是仅有的可靠的革命力量；农民充其量只不过是他们被迫利用的工具。

580 由于持有这种观点，托洛茨基自然坚决提倡迅速向计划经济进展。他坚决支持列宁对于1920年成立电气化委员会时开始的宏伟的电气化计划的重视；他认为他同年担任为恢复铁路的有效状态而设立的运输委员会的主席，是走向制定总的经济计划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在这个阶段，列宁仍然认为设立任何总的计划机构为时过早，虽然他同意有必要成立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成员是人民委员委员会的大多数主要委员——作为经济领域总的协调权力的机关。经过说服，列宁无可奈何地同意设立总计划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附属于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4月正当新经济政策通过时开始了工作；但是从一开始，总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就规模有限，而在主要重点放在使新经济政策正常运行时，总的经济计划工作进展甚小。托洛茨基由于希望迅速地实现工业化，便希望设立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执行计划的机构；但是列宁主要注意电气化计划，希望借此首先使农业地区的生产方法革命化，他担心这个计划可能淹没在更广泛的总的经济发展规划里。当然，



关于在条件一旦成熟时实施全面的总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并无意见分歧。列宁担心的是立即尝试这样一个计划可能妨碍迅速电气化并妨碍在新经济政策下应予采取的至关重要的措施。

正当就俄国的经济政策进行大辩论时，俄国与世界其余地区的关系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协约国军事干涉和内战这两者的结束使俄国人得以腾出手来处理他们的有关经济建设的经济问题，但是也使他们面临着需要建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处条件。1921年1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承认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为独立国家，3月，英苏贸易协定签字。同月，俄罗斯、乌克兰与波兰之间的和约签字，从而为翌年成立苏联铺平了道路。1922年4月，欧洲战后解决方案中的两大被排斥者——俄国与德国戏剧性地签订了拉帕洛条约。是年6月，列宁病重，沃尔特·拉特瑙被杀害，进入7月后，在讨论对俄关系的海牙会议上，马克西姆·李维诺夫（1876—1951年）提出了向苏维埃政权发放大笔贷款以从事经济和财政建设的方案，但未成功。年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923年7月，它的联盟宪法生效。1923年1月，法国占领鲁尔，反对占领的长期斗争从而开始。7月，由于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没有驰援斯坦姆波利斯基，他被保加利亚反革命势力推翻和杀害。在德国，在整个春季和夏季，共产党人在武装起义的边缘上徘徊，但是最后断定他们已经错过机会。9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发动了一次为时已晚的暴动，但迅即被抑制在血泊之中。作为这些事件的续篇，共产国际的政策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修整<sup>①</sup>，包括清除1921年失败后就任的德国领导人以及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整个一系列的“宫廷革命”。1924年1月，列宁去世。他去世的第二天，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在英国上台。2月，英国承认

---

<sup>①</sup> 见本书第638页。

苏联，不久之后，为正式的英苏协定开始了谈判。5月3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一项条约；6月，法国的进步资产阶级政府首脑爱都阿·赫里欧继普恩加赉出任总理。8月，法国开始从鲁尔撤军，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道兹协定签字。同月月初，英国工党政府逮捕了《工人日报》的J.R.坎贝尔（生于1894年）；在此案撤诉后，工党政府与它赖以取得多数的自由党人发生了严重纠葛。10月8日，它在议会遭到失败，于是解散议会，诉诸国民公断。在随即举行的大选过程中，发生了季诺维也夫的“红色信件”事件，但是麦克唐纳处理不当，引起不幸，工党政府遭到了严重失败。<sup>①</sup>鲍德温继麦克唐纳出任首相，与苏联政府改善关系的努力就此嘎然而止。然而在这些发展的过程当中，法国政府终于承认了苏联。此外，在1925年，由于曾访问俄国的一个工会代表团回国后提出了一份大体上说好话的报告，英国职工大会同意设立一个英俄工会咨询委员会，其主要宗旨是改善英苏两国人民的关系。<sup>②</sup>

因此，到1924年，苏联虽然还面临极大的困难，在成为世界事务中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国家，它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1921年，许多人希望实行新经济政策将意味着逐渐放弃把苏联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企图，希望“耐普曼”和农民的共同力量将彻底损害这个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并在适当时候导致推翻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事实上，在布尔什维克本身也有不少人心怀这种恐惧，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富农的财富和影响的的增长、私人企业家对国内贸易的支配以及给予外国资本家特许权的做法。虽然在列宁的强有力的坚持下，这些布尔什维克对新经济政策给予默认，却从来没有为之高兴，而且时隔不久他们就大声疾呼说已经到了使整个体系告一段落的时候，即便不是结束整个体系。

<sup>①</sup> 见本卷上册第435页。

<sup>②</sup> 见本卷上册第437页。

然而列宁在世时始终坚持认为必需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并深信只要国家坚持对于对外贸易的垄断，并迅速推行电气化计划作为彻底机械化的经济结构的基础，就能成功地应付这个政策带来的危险。在他因病重而不能掌权时接管权力的三位执政者在他去世之后继续奉行他的政策。

列宁的著名“遗嘱”是在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时期写的，他在“遗嘱”中写下了他对于苏维埃国家以及领导和鼓舞它的天才——共产党的未来领导人物的看法。这个经常被人引用——而且是错误地引用——的文件直到列宁去世了几年之后才全文发表，而且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也不是正式发表——事实上在1956年以前从未发表过官方审定的文本。然而在1924年春，在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克鲁普斯卡娅提出的将“遗嘱”提交党代表大会的要求之后，曾在一次党员大会上宣读过这个“遗嘱”，关于它的涵义是不存在真正的疑问的。“遗嘱”于1922年12月列宁第二次中风以后数日由他口授，1923年1月又增加了一条附言。正是在这条附言中，列宁明确建议解除斯大林的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称他的特点是“粗暴”，建议由某一个“比较有耐心、比较忠诚、比较有礼貌、对同志比较关心而且不那么反复无常……”的人来取代他，——但是“遗嘱”没有说明继任者是何许人。在“遗嘱”原文中，列宁已经攻击了斯大林，说他作为书记“集大权于一身”，又说，“我不能肯定他是否始终知道如何十分谨慎地使用那种权力”。他对托洛茨基的描述是：“就个人而言，乃是现届中央委员会中最能干的人”，但是又说他的显著特点是“过于自信，生性容易受到纯行政事务方面的过多吸引”。列宁还表示担心这两个可怕的人物可能发生冲突，担心这样一场冲突有导致实际分裂的危险。他坚持说，由于党“建立在两个阶级之上”，它很可能不巩固，而且“如果这两个阶级之间不能存在一个协议，党的垮台就不可避免”。

除了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这些批评以外，“遗嘱”还提到了另外四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塔科夫。关于前两位，列宁说了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指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变——“当然并非偶然”，但是他又说，“不应该利用这一事件来反对他们，就像不应该利用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指1917年以前——来反对他一样。”关于布哈林，他的话有些模棱两可，称他是“党内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但是接着又指责他墨守成规，并且对于布哈林是否能被看作具有“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示“最大的怀疑”，因为“他从未学过辩证法，而且我认为他从未完全理解辩证法”。最后，列宁谈到У·皮塔科夫(1890—1937年)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意志和能力都很突出的人，但是过分偏爱行政和事物的行政方面，以致在政局严重时不能依靠。”后两个人是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委员中最能干的人被选中加以评论的。“遗嘱”没有明确推荐继任人选，只不过消极地建议解除斯大林的书记职务。不过，无法完全保密的列宁的话当然对斯大林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极其有害，这就使得这三位居然共同取得了继承权这一事实更加值得注意。

对这一点的部分解释当然是这样：在列宁去世之前许久就已经在进行继承权的角逐，而且这场角逐一直对托洛茨基这样一个对耍阴谋特别不擅长的人非常不利。事实上，在列宁去世之前那个月，托洛茨基与三位执政者之间的分裂实际上已达到决定性的程度，当时《真理报》发表了托洛茨基关于《新方针》的第一封信——后来收进了几个月后以此为书名出版的小册子里。托洛茨基对“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内官僚主义的增长的攻击，是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冲刺，深知这三个已经接管了指挥权的人已经为了破坏他的影响而联合起来。在这个时期，他除了是

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外，事实上仍然是党的政治局委员；不过他与政治局的联系已经名存实亡，他已经被排除在党的一些内部会议之外，党已经越来越多地置于斯大林的控制之下。然而在列宁去世时，斯大林并不感到自己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单独争取继承权。他需要既是共产国际首脑、又在彼得格勒党组织有巩固地位的季诺维也夫；他也需要在“老布尔什维克”集团中居于有威望的中心地位的加米涅夫。有了这些盟友的帮助，他感到有能力清除托洛茨基了，尽管托洛茨基深得人心、威望很高；他着手把大批经过挑选的新成员——大部分是由他的官僚们精选的——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将近25万名都是来自产业无产阶级的新党员入了党：这是托洛茨基最无法反对的一个措施，因为他一直在强烈要求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

列宁去世之后用了一年时间，就使得托洛茨基作为高官的地位变得不可忍受。在这一年内，借助党的机器作为工具，积极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1925年1月，他被迫辞去了他的最后一个职务——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在下年的几乎一年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在名义上仍然没有破裂。但是在1925年12月，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盟友们闹翻了；不出数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追随者便结成新的反对派，联合行动反对斯大林。这个反对派的逐渐形成是那一年早些时候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支持下作出的某些决议的后续行动。这些决议包括对农民作出重大让步，其中有一项让步是大批农民苏维埃重新举行选举，因为据认为这些苏维埃是受地方党的官僚控制的假选举选出来的。对党的积极分子下达了不许欺侮农民或迫害富农的命令；富农和中农租赁更多土地和雇佣工资劳动者的自由大为扩大。当这种和解政策开始见效，并由于缺乏农民希望购买的工业品而出现新危机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害怕了。他们开

始担心新经济政策的批评者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担心向农民让步和鼓励私商的政策正开始稳定，以致成为社会主义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他们开始附和托洛茨基提出的增加对大规模工业投资的要求，并号召开展运动来反对富农和“耐普曼”。斯大林则不失本色，对批评者进行了猛烈回击，否认他们对形势的描绘是正确的，并声称实际上国营和合作社贸易正在对私营销售取得优势，而且中农从让步中受惠超过富农，其相对人数也有所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斯大林采纳了他的反对者的部分政策：接受加快对工业的投资，并同意把增加的数额首先用于重工业，以便使苏联逐步摆脱进口机器和其他资本货物的状况。他用这个政策使他的反对者的其余建议和批评遭到惨败，进一步巩固了他对党和政府的控制。当负责军事的人民委员米·瓦·伏龙芝（生于1885年）于1926年去世时，斯大林的最亲密的盟友克·叶·伏罗希洛夫（生于1881年）接替了他，而伏龙芝的副手、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M·拉希维奇（1884—1928年）则被撤职。1926年10月，托洛茨基终于被正式开除出政治局，从而失去了对他作为领袖的最后一种承认。但是，过了两年时间才彻底消灭了反对派。虽然在1926年初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季诺维也夫对彼得格勒党的控制就已瓦解，但是在下一年才把他从共产国际的主席职位上赶下台；直到1927年10月，其余的反对派才被开除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一个月以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都被开除出党。季诺维也夫的做法一如其人，他不久便公开承认错误，并恢复了党籍，尽管他以前的影响并未恢复。托洛茨基最初于1928年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然后于第二年被从苏联驱逐到土耳其。当时，处决失宠前在党内身居高位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没有成为风尚。这是后来斯大林成为完全的主宰以及“个人崇拜”达到顶峰以后的事。但是被指责为“宗派主义”的意见分歧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政治罪行。

这样，从列宁去世到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只间隔了五年时间。<sup>587</sup> 后来过了很短一段时间，斯大林就不仅执行了托洛茨基的经济政策的大部分，而且还远远超过了他的政策：实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托洛茨基的纲领中所没有执行的部分是他所提出的扭转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的要求。相反地，这种倾向日趋严重，而且随着个人越来越多地代替集体领导，也势必是如此。斯大林的优势地位也意味着权力中心日益从苏维埃和向苏维埃负责的名义上的政府转向更为高度集中控制下的共产党。根据宪法，苏联是一个联邦国家，由若干独立的共和国组成，其中最大的共和国是俄罗斯；虽然许多关键职能掌握在联盟中央手里，共和国及共和国内部的各级地方政府仍拥有相当的自治权。最高苏维埃主要由党员控制，并且可以相当有把握地使它们不致于违抗党的意志；但是在乡村一级苏维埃，在新经济政策下，除非操纵选举——如新经济政策中期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这是一种很可能招致农民不满、甚至反抗的做法——，往往难于使它们唯命是从。另一方面，共产党是遍布整个苏联的单一机构，在各共和国或地区并没有自治的分支机构——尽管在所有重要的中心地区当然都有其地方组织。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单一的党，而“民主集中制”越来越意味着：政策由全国性或超全国性的领导在中央决定，然后作为全党责无旁贷、必须服从的命令下达。的确还存在领导需要来批准其决定的党代表大会，还有权力较小的党代表会议；从这些会议上，领导必须获得对其决定的承认，在那些大会和地方组织中，可以就上级尚未作出决定的问题进行辩论。但是，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实际上就不可能提出与中央领导的政策相抵触的政策而不被指责为“宗派主义”，并且有被开除出党之虑，对于那些<sup>588</sup> 被认为犯有“偏差”的人，随意地被开除出党是常事。在左翼社会革命党因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问题退出政府以后垄断了权

力的“唯一的党”，在其早期曾容许在正式宣布一项决定之前有相当大的自由可以表示对立的意见，甚至可以组成集团来提倡这种意见。但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尤其是在他与托洛茨基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中，这种相对的讨论自由迅速遭到破坏，共产党变成了强制下级严格服从中央下达的一切命令的铁板一块的工具。对于斯大林这样一个严厉控制党的机器的每一部分的人说来，要使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保证它们奉命保证做到的事是不难做到的；而党的官僚之所以必然会遵命办理，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否能够继续任职取决于他是否忠实执行中央的核心小集团向他下达的指示和暗示。

因此，“民主集中制”不再与民主制度有任何相似之处，除非假定民主制度只不过意味着党在其中央杰出人物的指导之下采取的统一行动——这正是斯大林使用这个名词时的真正涵义。因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正如只能有一个党表达工人阶级的集体意志，党也只能正确奉行一个政策，而这个唯一的政策必须通过党的领导来表现。企图把政策建立在普通人的无教养的观念之上，会使政策成为冲突意见的一片喧哗之声，会妨碍统一行动，并使党倒退到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声誉扫地的做法。只有一致的思想才能保证有铁板一块的行动，而只有使人们听不见冲突的意见，才能保证有一致的思想。毫无疑问，许多党员并不了解党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真诚地认为托洛茨基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攻击是他对他曾为之作出很多贡献的革命的背叛阴谋。斯大林当初如果没有说服大批共产党人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忠实地和不折不扣地执行列宁的教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他本来不可能如此有效地操纵共产党和如此牢固地确立他的优势。他之所以能够说服他们相信这一点是因为对他的行为的这种看法部分是正确的。列宁曾赞扬不容异说为革命美德，他动不动就指责抵制布尔什维



主义的社会党的老同志是背叛，甚至经常直言不讳地谈论他认为奉行错误方针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但是他仍然相信作为在同志中间商定统一政策的手段的公开讨论有其长处，而且他率直地对官僚主义表示了真正的厌恶。除了在十分危急的关头，他做事总是雷声比雨点大得多。另一方面斯大林则是雨点比雷声大：列宁指责他“粗暴”或“粗野”，这在更大的程度上指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词。

由于掌握了一个集中的党，加上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斯大林发现通过党要比通过苏维埃组织的间接统治更容易治理苏联。列宁曾经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首脑。斯大林则宁可作为党的书记行使权力而不担任任何政府职务。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二元权力体系的发展，在这个体系中，同样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和法令可以来自苏维埃代表大会或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也可以来自共产党——通过它的代表大会或者它的拥有两个极大权力的政治局和组织局的中央委员会，至于通过何种渠道，那完全要看领导的需要。名义上掌握在工农这两个合作阶级手中的专政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党被认为是这些阶级的代表，而产业工人则是在整个阶级运动中居于主要地位的“先锋”。苏维埃组织本身在代表权上对产业工人和农民厚此薄彼，但在似乎合乎时宜时，对这个组织仍然可以加以利用；不过在日益增长的程度，重大政策不仅在党的主持下制定，而且也依靠党的直接权力付诸实施。在这方面，斯大林也是效法列宁在革命时期树立的榜样，因为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列宁曾坚持十一月政变应该尽可能在党的主持和控制下完成。然而政变以后，列宁创立了就形式而言是苏维埃系统的而非共产党系统的政府结构，而且亲自正式担任权力来自苏维埃而不是党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因此，斯大林作出的以他的党内职务身份而不是以人民委员会名义统治苏联的决定，是一项十分重要

590

的关系到结构的决定，它把整个苏维埃组织变成了居于支配地位的党的附属品。

斯大林之所以决定如此行事可能部分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就击败托洛茨基而言，以党作为战场对斯大林说来要比主要在苏维埃里一见高低有利得多。在党内，他可以更为有效地利用托洛茨基不是“老布尔什维克”、而是历史上与孟什维克有瓜葛的新人这一事实。他可以呼吁他在党内的老同僚反对暴发户，也可以指责托洛茨基希望破坏党的影响。再者，他可以指望托洛茨基在攻击党的“元老派”时让人觉得似乎在攻击党，而且不管托洛茨基在群众中如何得人心，还可以把他看作是在与党的机构中任职的大多数人为敌。在托洛茨基那一方面，说也奇怪，他似乎不知道他树立了多少敌人，而且十分明显地低估了斯大林玩弄阴谋的能力以及他本人在对付敌手时采取的专横和经常的轻蔑态度所带来的后果。马克斯·伊斯特曼在评价托洛茨基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时，称他在斯大林及其盟友竭尽全力对他进行持续进攻期间不回击对他进行诬蔑的人是高贵性格的表现，我认为这一赞誉未免太言过其实。如伊斯特曼所说，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的行为的部分原因是他在关键时刻得了重病，但是也在于他目空一切，根本不相信他的威望可能如此严重地受到破坏。不论原因何在，他确实做了对敌人有利的事情。

现在回想一下，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实际争端究竟何在呢？要说明这一点谈何容易，因为正如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所预见的，有很大因素是纯粹个人的对立，因而两个人不可能在同一国家共同掌权，或者哪怕是共处。有时候人们提出了这样的说法：实际的争端在于斯大林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托洛茨基相信唯有把俄国革命变成世界革命，俄国革命才能存在。毫无疑问，托洛茨基与列宁一样，在1917年以后的头几年，确实有过后一种观

点,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仍然坚持这种观点,继续坚持他的“不断革命”学说<sup>①</sup>,这种学说使他相信俄国革命必然在适当时候扩大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但是斯大林也相信世界革命:他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意思只不过是说,即令革命扩大到其他国家的时间大为推迟,无需等待这个时间的到来就有可能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在1921年德国共产党企图政变失败之后,托洛茨基有过任何不相同的观点吗?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过;但是这完全是因为他相信,俄国革命如果得不到其他地方的革命的加强,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除非苏联既开始执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庞大的工业化计划,又通过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情绪以及敦促他们在国内对富农和“耐普曼”以及在党内对官僚主义和传统主义进行新的斗争,来维持它本身的革命精神。当然,托洛茨基在这个时期与斯大林的主要争执与国际政策或者共产国际的事务没有什么关系。“不断革命”的概念是就国内政策——俄国革命本身必须不停地进行下去这个概念——而言的而不是就苏联与外部世界打交道而言的。

因此,直接的争端主要与工业化问题以及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有关;但是不论在其中的哪一个问题上其实都不存在原则冲突。斯大林一如托洛茨基,相信苏联有必要高度工业化并逐步建立重工业,以便使自己摆脱依靠进口供应主要货物的局面。这确实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当初西方有共产党国家的政府供应苏联主要的货物,情况就要缓和得多。斯大林对农民也没有什么爱护可言;除非被迫,他并无意去迎合农民或者“耐普曼”。托洛茨基刚刚被清除掉,斯大林就在工业方面采取了恰好是他的敌手喜欢的政策;他在贯彻农业集体化时使用的方法,就其对农民的效果而言,远比托洛茨基所曾建议过的任何做法

---

<sup>①</sup> 托洛茨基的以此为书名的著作写于1928年,出版于1930年。

要残酷得多。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在选择适当时机方面存在不同看法；但是他们两个人中除了斯大林走得更远之外，就没有多大的不同了。真正根本性的分歧是在党的性质方面，即便是这个分歧也主要是由于斯大林控制着、而托洛茨基并不控制着党的机器才产生的。

可是托洛茨基深得人心，极有威望，如果不是他被牢牢地扣上“第一号公敌”的罪名，是无法清除他的。必须逐步制造一个莫大的反托洛茨基的神话，并且把这个神话深深地灌输到一切善良的共产党人的意识里去。为了掩盖斯大林的个人控制的增长，必须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专制主义的象征人物。即使已流亡在外，仍必须以稀奇古怪的指责对他跟踪追击，因为可以利用这种指责作为基础来消灭斯大林的以后的敌人，也是因为始终存在着足以威胁俄国以外——或许甚至是俄国国内——的正统共产党的强大“托派”集团。关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以后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情况，已属于本卷范围以外的时期。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以后苏联的历史也是如此。这一节文字就写到斯大林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在列宁去世之后掌权一两年的三个执政者分裂为止。

在结束本章时还有待考虑的是列宁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贡献何在。关于这一点，在本书前面一卷谈到1914年以前列宁的发展<sup>①</sup>时我曾写了许多，我不想再重复那一部分。我还曾试图阐明列宁在摧毁1914年以后第二国际的残余势力和建立共产国际方面所起的作用。<sup>②</sup>但是在这一点上似有必要作一总的估价。至于列宁在多大程度上如他自己标榜的那样是马克思学说的忠实解释者和发展者，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者，引导世

---

① 见第3卷上册第9章和第10章。

② 见本卷第2章。

界上一大批社会主义者灾难性地脱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正道，并在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幌子下，实际上建立了一个铁板一块的党对普通人的专政呢？我不可能希望找到一个将满足为数不少的读者的答案，因为列宁的品格和成就引起人们非常强烈的感情，因而在作出判断时不容易客观。

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显然列宁是一位忠诚的职业革命家。他把毕生献给了革命事业，从未想到要怀疑革命行动的正义性，或者确立任何其他目标作为与革命相竞争的动机。在他的一生，凡是醒着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刻不是在想到革命和为革命考虑，革命思想在他的所有著作和事迹中到处可见。当然这种态度是反常的，即使就沙皇政权统治下的一个俄国人而言也是反常的，尽管在沙俄时代，有不少小人物在青年时代所持态度与此相近，还有一些人出于对那种压迫制度和普通人所受的痛苦压迫的无法控制的憎恨，毕生持有这种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列宁是由于他的兄长被处决才具有这种思想，那很难说；但是毫无疑问，那一悲惨事件对他影响至深。无论如何，摧毁沙皇制度、并随即摧毁世界各地所有的暴虐政府，成了他的强烈的感情，而且在他的思想里，这种感情是 594 与被压迫阶级战胜他们的阶级敌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把这种胜利设想成为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在他的思想里，他把所有压迫者——保皇派、军国主义分子、封建地主、官僚和警察，实际上是把由军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警察国家构成的整个机构，都归为资产阶级。他毫不担心马克思的判断对于他主要关切的俄国的现状完全不适合。他深知在沙皇俄国，资本主义尽管是一股新兴力量，其势薄弱，而且被压迫者的主体并非产业工人——严格说来并非无产者——，而是农民，他们中有些人稍有土地，有些人毫无土地，其观点与产业工资收入者大相径庭。他在很大程度上考

考虑的是包括新兴资本家与封建地主的斗争在内的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问题，还有在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无产者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但是尽管他的行动的总框架是十九世纪后期基本上前资本主义的俄国社会，他的总理论的框架却主要是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角度构思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列宁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去适应俄国和其他不那么先进的国家的普遍状况，而不是从俄国现状出发独创一种学说。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当他保留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概念时，却又与马克思本人的概念大不相同，而与西方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后继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则更不相同。虽然他深谙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有关西方和俄国社会主义的文献，虽然他曾长期居住在西方，在拟订现行的政策时，却一向主要从俄国的角度出发，往往把他在考虑俄国的需要时得出的方案移植到其他国家。关于西方资本主义，他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印象，一种印象直接来自马克思，主要反映了马克思的判断基本上所依据的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的状况；另一种印象来自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不过595 主要是它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方面，而不是它在国内的后期发展。因此，他往往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或多或少有些夸张的看法，并往往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恶劣的方面——对殖民地人民的集中剥削和导致战争的两败俱伤的竞争——来判断当代资本主义；这种态度使他对改良主义毫无同情可言，这种态度一方面使他看不见改良主义在许多国家带来的真正的进步，另一方面使他确信改良主义政策不论对于结束殖民剥削还是防止战争都无能为力。尽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极为钦佩，这是因为他充分肯定它的结合严密和有效组织，也是因为他只凭表面价值来衡量其革命辞令。他对问题的看法是：德国人要清除德国皇帝和军国主义者

就必须进行革命，正如俄国人要推翻沙皇统治就必须革命一样，在1914年以前，他相信考茨基和反对修正主义的德国社会党人与他一样明确地看到这一点。在1914年以前，他从不理解：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多么彻底地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忘得一干二净，并且已开始从即将到来的议会胜利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认为这种胜利由于某种原因会为突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廓清道路。他相信德国人在谈到革命时，他们所指的革命与他心目中的革命是一回事。他把考茨基看成是伟大的革命理论家，其实考茨基只不过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议会取得进展的情况下重复已经失去意义的马克思的词句。关于其它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他所知更少，而对他所了解的那一点，他的印象也并不很深。他大大夸张西方潜在的革命情绪的强度，并且轻易相信这种情绪必然存在，而只需进行有纪律的革命领导，就可使这种情绪变为行动。因此，他热心于创立完全由革命志士领导的共产党，热心于对中派进行无情斗争，甚至更甚于对右翼的斗争，付出的代价是：在使新的共产党易于脱离群众而不是成为争取群众支持的有效工具的时候，分裂了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起初人数不多、但有纪律的布尔什维克集团可能做到迅速除掉孟什维克分子和人数众多然而不成组织的社会革命党。列宁不可能懂得为什么这种胜利不能在其他地方再现：他不了解俄国之所以有可能发生那样的事情完全是由于沙皇统治崩溃之后形势动荡不定，人口中的自由主义分子力量薄弱，由于完全不存在任何切合实际的中间道路政策；而在西方，稳健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论是否正确，却是完全切实可行的，而且不仅对于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集团，对于产业工人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必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就俄国而论，没有一个人比列宁看到得更清楚：没有农民大众支持，就既不可能进行革命，也不可能维持革命。1917年以后他不

断坚持说，必须认真对待产业工人与农民之间的联合或联盟，把它看作是真正的联合，而不是作为产业工人把农民拉着往前走这个行动的婉词。实际上他强烈反对富农，因为他深深懂得广大农民落在富农的领导下、有被拉进资产阶级轨道的危险。这导致他强调富农与贫农的差别和在农村发动阶级斗争的必要。但是这也导致他后来把中农置于他的庇护下，因为他认为中农是在生产力上支持革命的主要人物，革命给予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土地。列宁丝毫不喜欢小农经济，他认为小农经济原始并且必然要消亡。但是他在1917年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政策，尽管他深知此举的直接后果必然是使农民体制根深蒂固。革命的需要就是使多数农民必须站在革命的一边，而革命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

597 列宁不能容忍这样一种人：这种人认为产业工人作为革命先锋，应该向农民发号施令，并且强制农民违背自己的意愿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有可能把农业改组成为大规模工业，并随即使其生产能力大为提高。但是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普遍电气化，另一个先决条件是建立一个能够供应提高生活水平所需的丰富产品的工业结构。在取得这些成就之前，必须给予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方式——耕种土地的自由。他们应该作为工农专政中产业工人的伙伴得到这种自由，而不仅仅是被当作产业工人寡头统治集团的苦力和有用工具看待。

当然，在坚持这种真正的伙伴关系时，列宁坚决认为产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先锋，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领袖。农民，尽管不可缺少，无非是小伙伴而已，但是这与奴隶有很大区别。极其鄙视农民，以致希望把他们仅仅看作臣民的是左翼反对派，他们认为农民的历史使命只不过是“以与工业品相对而言尽量低廉的价格供给城市粮食——并且作为红军军人，为产业无产阶级而战。”



托洛茨基的观点有时接近这个观点，但是由于他非常尊敬他所缔造的红军，由于他相信军役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可以借以教会农民以不同方式思考和感觉，以便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成员，他没有完全持有这种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托洛茨基强调迅速工业化，并对富农以及新兴的中农阶级怀有敌意，仍能在农村找到支持者的原因。但是正是列宁在生前的最后几年中一直坚持必须把农民的主体当作盟友，而不仅仅是当作没有自己的权利的驮兽看待。

关于产业工人，列宁坚决认为他们在党建立新社会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他强烈反对一切对他说来具有宗派主义——即追求集体利己主义目标而不是整个工人阶级的目标——味道的东西。从早期开始，他就已经认识到作为组织工人并唤起他们的反抗精神的工会的重要性，但是他激烈反对“经济主义”<sup>①</sup>和所有希望工会主要致力于仅仅改善劳动条件的人。他曾坚持党必须着手控制工会，把它们变成可靠的革命工具；革命成功之后，他反对那些希望工会取得对社会主义工业的控制权的人，认为这样一种体制只会有利于各行各业的集体利己主义。他甚至更为反对认为应该容许每个开业的工厂委员会成为控制力量的主张，他宁可看到权力掌握在比较容易受党控制的集中的大的工会手中，也不愿意看到权力分属于很少接受、或根本不接受中央机构指挥的许多自主的社团。不过这两种解决方案他都反对，而是强烈主张由一人负责经营，反对任何形式的“工人管理”。由于他把无产者看作是一个必须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完成其建设性任务的阶级，他就把他在党的形成中发挥过主导作用的“民主集中制”概念引进到工业里。尽管如此，他反对托洛茨基的把工业军事化并使

---

① 见第3卷上册第423页。

工会变成从属于政府的机构的想法，因为他懂得这样一点的重要性：使工会保持革命性，既不会把它塞进官僚制度的模子，也不会企图这样做时触发工人阶级的普遍反抗。

在对俄国事务的处理方面，由于列宁对于革命的一些假定，他一再显示自己是一个特别明智的人。如果说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在处理俄国国内问题时从未听任自己由于他的狂热思想而失去控制；而在手段问题上，他具有在适当时机选择适当方针的惊人的能力。这种鉴别力使他在不同的时间选择大不相同的行动方式，  
599 同时也招致别人指责他前后矛盾，甚至犯了机会主义。然而，如果设想唯一正确的目标是进行革命和巩固革命——这自始至终是列宁的假定——，那么这两项指责就没有一项能站得住脚，因为列宁即便犯了一些错误，其行动始终完全符合这个目标。但是，一切其它事物都必须为之让路的革命究竟是什么呢？是否指随便什么革命，只要它有助于推翻沙皇和专制制度，并把资本家从权力地位上推倒而不管可能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呢？在列宁看来，当然不是。革命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暂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专政下，将消灭阶级差别，为出现没有阶级的社会廓清道路，“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来取代，而国家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则将消亡。在这些方面，列宁对于他所力图完成的革命有着明确的远见，并且认为这种革命是历史所孕育的革命，不论在革命的道路上可能遇到多少挫折，它仍然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他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在进行革命，倒是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接生婆。对他说来，革命已经作为一个未来的事实存在：它无需进行，只需加速和明智地加以引导。这一切当然都是马克思主义信条的一部分，列宁在阐明革命的目标方面没有作出任何新贡献。像马克思一样，他不需要对未来社会作乌托邦的想象，在未来社会中，人类将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他唯一关心的是达到在他看来已十分明确

的目的的手段。然而手段势必要影响目的，至少在此后的一段长时间内是如此。如果为了进行革命和巩固革命，竟有必要建立一个纪律严明和集中的、掌握着一个强大的权力机构的党；如果竟有必要把不仅是整个政府组织，而且还有能在其发展中起形成作用的每一个社会团体都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如果竟有必要把一切胆敢对党的卓越地位提出质疑，或者哪怕是对党已经采取的政策表示异议的人打入地狱，——像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还有可能放弃对人们的统治并发扬本应成为未来的无阶级社会的特色的自由精神吗？难道不存在为了消除恢复旧秩序的根本可能性而进行专政的党，会爱上自己的权力，而在反革命的危险不复存在时还极不愿意放弃权力这样一种巨大危险吗？难道不是官僚主义起了专政心脏的溃瘍的作用并为对专政建立牢固控制的人提供机会把专政——已不再是工人的专政、或者哪怕是党的专政——变成个人权力的工具吗？

列宁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一些危险——尤其是官僚主义败坏专政的危险。他认识到在内战一旦结束立即在党内恢复一定程度的民主的重要性，并且在他健在时竭尽全力来促其实现。在列宁领导时期，党在制定政策之前确实对政策加以讨论。但是他坚持在政策确定之后应该对之绝对服从——“民主集中制”的本色。我认为他很少注意到这样一种政策多么容易被即将使自己成为党的机器的主宰的、热衷权力的领袖所歪曲。他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所表示的忧虑与其说是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可能使自己成为独裁者，不如说是斯大林的“粗野”或者托洛茨基的急躁可能分裂党。关于托洛茨基，列宁并不担心他成为独裁者，我想列宁是正确的。说实在话，任何人倘若他的最高目标是攫取独裁权力，就不可能在他身上找到托洛茨基攻击党内官僚主义倾向时的那种热情。托洛茨基往往态度专横，但是我确信他并不是想要成为独裁者的那种

人。然而如后来的事实所明确显示的，斯大林倒正是这样一个人。“民主集中制”的做法为他敞开了道路。

601 倘若斯大林当初在苏联国内的反革命危险实际上消逝之后，没有不断坚持说继续存在来自外界的危险，从而给予专政以新的生命，那么专政的作为本会小得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尝试是在对资本主义国家持敌对态度的被包围情况下进行的，而由于在其他地方不存在革命，这些国家得以包围苏联并阻碍其发展，尽管它们在对苏联动用武力时犹豫不决。当然，由于法西斯主义崛起，至少从希特勒执政时开始，外来威胁大为严重；而绝不容忽视的是，斯大林主义的最恶劣的过火行为发生在上述情况之后。但是，总是有可能以苏联处于永远包围状态，因而不能丝毫放松对权力的严格控制为借口，以种种方式为继续进行专政和国家显示不出任何开始“消亡”的迹象作辩护。列宁去世不久，除了在意大利以外，法西斯主义还远远没有成为可怕的事物；但是在1917年以后，他有充分的机会观察到包围和抵制的事实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放松控制是十分危险的。当然，从军事共产主义退到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本身似乎使得这样两点有了空前的需要：加强党的控制和纪律，以防止重建的私营贸易感染整个经济。

然而，列宁确曾明确地认为专政无非是一种暂时的需要，是在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必然要放松并随即放弃的东西。我认为，他从来不是一个为权力而爱权力的人，也从未受到权力腐蚀。他的无情做法始终从属于他的社会目标——即最终建立一个自由的、无阶级的社会。人们普遍承认，他与人相处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架子，友好和平等。倘若说他没有什么社交风度，那是因为他很少私生活，事实上他是为革命——除革命以外很少还有什么别的什么——而生的。如果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年)当初对事业奉献较少，对她而言会是一件苦事。事实上，她确实吃了很大的

苦，只不过她欣然忍受罢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唯有与列宁的根本态度相冲突的人，才能挑出他的毛病，也就是说，唯有对于某人使自己完全成为革命的工具而不计较其它什么的这种合理性持否定态度的人，才能挑出列宁的毛病。如果说保全革命乃是最高的法律，那就无话可说了。然而是这样吗？如果不是革命的根本概念被歪曲，如果不是革命的目标丢掉了一半，或者如果不是权力——虽然不一定是个人的权力——成了最高的崇拜对象，它能够这样吗？当然，革命不论可能多么重要，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达到某个其他目的——据我看，就是增进那些其生活受到革命影响的个人的幸福和快乐——的手段。我确信，对列宁说来，即便他在某种意义上认为革命是实现人类幸福生活的手段，革命本身实际上已开始成为某种热切的愿望，所以在考虑革命的要求时，就看不见它对个人幸福或快乐的影响了。因为列宁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这样一种危险的思想习惯：认为由于某种原因，阶级比构成阶级的个人更为真实，而且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构成无产阶级的个人的幸福等同起来。我认为，他对于个人只有一种薄弱的意识，对于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状态的个人的幸福则几乎毫无意识。他不是把人看作是有必须与其他个人的同等要求协调一致地得到最充分满足的私人欲望的个人，而是看作可以利用来推进革命事业的工具。这种态度不仅使他对于他认为为了革命必须忍受的痛苦缺乏同情心，甚至还无动于衷，因此他对于造成这种痛苦并无悔恨或不安。甚至可以有根据地说，列宁没有实际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正义感——作为代替，他只有对于阶级非正义行为的强烈憎恨，这种憎恨使他看不见无法追究到阶级压迫的其他非正义行为。由于把革命当作无可置疑的目标，他愿意心安理得地采取任何他相信有助于革命成功的行动，并指责任何不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因此，虽然他并非生性残酷的怪

物——毫无疑问斯大林则生性如此，或者说后来成了这样一种人——，如果他真正感到是革命需要，他是愿意为任何残酷行为辩解的。

在我看来，这种态度从根本上说是不道德和无人道的。我这样认为是因为我相信，除了男男女女的个人幸福之外，归根结蒂什么也不能算是宝贵。唯有在我相信能利用革命来增进这种幸福或快乐而且不使用这些讨厌的手段便能获得这些好处时，我才赞成革命。我不仅相信这一点，而且还认为不相信这一点是罪恶的，并且认为谁要是把革命提高到本身就是目的的地位，或者认为阶级比构成阶级的个人优越或更真实，谁就犯了扼杀人类精神的罪恶。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列宁与斯大林同样不能宽恕——虽然除此以外，斯大林还有其他也许还是更恶劣的罪恶，比如个人的残忍行为和对无限的个人权力的欲望。我承认，俄国革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伟大的和值得钦佩的事件之一，而且承认倘若不是由于列宁极端忠诚，革命几乎肯定已经失败。因为我根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的胜利乃是注定的，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预先知道。我认为世界的未来是难以断定和不可预测的；因此，尽管我对之有所批评，我更加有意对这样的一个人表示敬意：在几乎完全依靠个人意志的力量完成革命之后，在疾病剥夺了这位舵手生命之前，他表现了如此杰出的才能，指挥革命在其初期胜利之后度过了重重艰难险阻。

然而，对于列宁作为伟大的俄国革命的鼓舞者和领袖的这种赞扬，不可能是绝对的。他对革命的热忱以及革命所依据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他不可能认识人的真实状况，或者正确评价除了他们贡献于革命事业或阻挠革命事业的能力之外的任何其他品质。他十分坚定地相信，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是阶级利益，并相信人从整体上说总是按照阶级利益行事的。当拉

狄克或者与列宁打过交道的西方社会党人告诉他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大部分并没有诉诸暴力或内战来推翻统治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愿望或意志时，他干脆拒绝相信这竟然可能是真实的，并坚决认为，西方共产党如能表现充分的活力和智谋，便能轻而易举地抛弃他们的“背叛的”领袖。在他看来，产业工人绝对注定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正因为如此，他准备分裂所有的工人阶级运动，完全相信无产阶级的主体会迅速在各地团结在共产党人周围，并背弃“社会叛徒”，接受革命领导。他全然不能相信，面对着阶级团结的号召，除了他所设想的阶级利益以外的任何其他考虑还可能起作用。当拉狄克等人告诉他波兰工人不会支持红军，企图以此说服他不要命令红军进军华沙时，他居然完全不能置信。据说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来打消他们的顾虑：“让我们用刺刀来考验他们吧。”这种看不到促使人们行动的复杂动机的真正力量的态度在俄国革命本身可能曾经对他有所帮助；但是在德国和西方，这种态度却使他打错算盘，后患无穷，因为根据这种错误估计，确定了共产国际分裂西方国家工人阶级运动的政策，致使共产党非但没有孤立“社会叛徒”，反而肯定无疑地孤立了自己。根据这种阶级斗争概念凌驾于其他一切事物之上的普遍优势的理论创立的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神话”，支配着列宁的思想，致使他看不见给他的敌人提供了主要的支持基础的力量们的真正存在。他作为革命的俄国的领袖是伟大的，但是与此截然相反的是，他不理解大多数人不仅是阶级中的一分子，也是有着各种各样动机——由于他本人没有切身经历，就不承认其他人身上存在这样的现实——的个人，从而后患无穷地误解了国际形势。

## 第十八章

### 乌克兰

乌克兰位于俄罗斯本土以南，现在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联合国承认它和更往北的白俄罗斯是主权国家。乌克兰有其自己的语言，或者至少是方言，在十九世纪时，逐渐形成了它自己的并非无足轻重的文学，包括至少一位杰出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作品。它还发展了自己的主要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具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因素；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这个运动受到了强有力的激励。然而，究竟有多大范围的土地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作是乌克兰的领土，是颇有疑问的。主要地区——东乌克兰，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包括加里西亚东部在内的西乌克兰却在奥地利统治之下，在加里西亚，波兰人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波兰地主对乌克兰农民行使权力，但是利沃夫（或称伦贝格）是乌克兰文化民族主义的中心。1917年乌克兰政府的未来领袖米歇尔·赫鲁晓夫斯基（1866—1934年）是利沃夫大学教授。在乌克兰本土（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以外地区，在俄罗斯的一些边疆省份中的大片地区居住着常常被称作罗辛人的民族，他们所操语言或方言与乌克兰语十分相近，但是大部分人没有民族意识，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中也没有份；在1918年以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一部分的喀尔巴阡山地区，有一些生活在匈牙利统治下的类似民族。在俄罗斯乌克兰，在诸如哈尔科夫和基辅这样的大城市里，有相当多的俄罗斯居民，有地阶级已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化，但是农村地区



基本上仍然保持着乌克兰的习惯。

在1917年以前，在东西乌克兰都发展了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西乌克兰，乌克兰社会民主党是联合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若干自治分支机构之一；在东乌克兰，波丹·雅罗晓夫斯基（1869—1914年）在本世纪初建立了乌克兰社会党，并于1903年与左翼民族主义的革命乌克兰党合并，1905年这个合并后的机构命名为乌克兰社会民主劳工党。在前一年，即1904年，作为全俄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分支机构，成立了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还有一个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乌克兰民主党。1905年“波将金号”兵变分子的领袖帕纳斯·马蒂乌申科就是乌克兰人：他最初逃往国外，但于1907年回到俄国时被捕并被处以绞刑。当然，在沙皇的武装部队中也有大批乌克兰人服役，其中有许多人除了会说乌克兰语以外，还渐渐学会了说俄罗斯语。在这样两种人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是城市里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人，他们往往从进行全俄革命以推翻沙皇统治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另一方面是那些首先效忠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乌克兰人。然而大多数乌克兰领袖并没有制定计划要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加里西亚乌克兰人非常喜欢奥地利统治而不喜欢俄国统治，他们的目标只不过是奥地利联邦帝国内实现自治；而俄罗斯乌克兰人大多数则想建立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这样的共和国内，当时生活在沙皇统治下的人数众多的各族人民将有可能实现民族自治。

191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的情况便是如此。乌克兰在这次革命中作出了贡献，沙皇统治的崩溃迫使他们向彼得格勒的新临时政府明确表明他们的态度。1917年3月，宣布成立由赫鲁晓夫斯基总统领导的、有人民议会——拉达（“议会”）——的乌克兰临时政府；翌月在基辅举行全乌克兰国民代表大会，大会要求建立一个乌克兰在其中成为自治单位的联邦共和国，而不是建立一个单独

607 的乌克兰主权国家。从3月到11月，拉达与彼得格勒的历届临时政府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商讨，但是在拟议中的全俄立宪议会举行会议之前，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夏季的几个里，在乌克兰等地，农民开始夺取土地，许多乌克兰士兵从军队里开小差回了家。接着在11月，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乌克兰领袖们不得不再次考虑应该采取何种方针。11月20日，拉达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但是仍然没有要求脱离俄国。大多数乌克兰领袖最初期待布尔什维克迅速崩溃，仍然希望在一个联邦共和国内建立自治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没有什么实力——在大城市以外地区几乎毫无实力——，因为以沃罗多米尔·维尼钦科为首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党截然不同。然而在12月26日，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帮助下，在哈尔科夫宣布成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与拉达政府分庭抗礼；于是开始了零星战斗，结果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掌握在拉达政府手中。接着德国人来了，他们是为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德国人民寻找粮食供应，非常愿意将乌克兰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并利用乌克兰来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且也许在他们赢得战争后把乌克兰当作德国的殖民地以及东进的跳板。德国人承认拉达政府是独立的乌克兰的代表，并邀请其代表参加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而布尔什维克在被迫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时，在条约中只好承认乌克兰独立并放弃对于划归乌克兰的那一地区的权力。总理维尼钦科为比较右翼的社会革命党人弗谢沃洛德·霍卢波维奇所取代，而拉达发现只好在德军占领当局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统治。这一安排并没有维持多久。1918年4月，在德国支持下，反动的军事指挥官、一个已大体俄罗斯化的贵族保罗·彼得罗维奇·斯科罗帕茨基夺取了政权，把拉达政府赶下了台；他进  
608 行独裁统治，事事听命于德国人，直到1918年11月大战随着同盟国崩溃而告终。于是斯科罗帕茨基立即被推翻，一个以维尼钦科为

总理的共和国革命执政内阁掌握了权力，并卷进了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战争，使问题复杂的是，德国占领军暂时还驻在乌克兰，直到他们在协约国的命令下才逐步撤退。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开进了革命执政内阁控制的地区，于1919年2月占领基辅。在此之前，1918年11月西乌克兰政府在东加里西亚成立，并宣布支持乌克兰政府；在南方，法国海军攻占了敖德萨和其他黑海港口，并在他们的保护下，反动的俄国“白军”开始集结力量，准备进攻布尔什维克。协约国开始进行干预，以支持“白军”；但是法国人没有足够兵力可以推进到海港以外地区，因而举棋不定。

乌克兰革命执政内阁也举棋不定。它与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使它右倾，1919年2月，维尼钦科由于他的社会主义倾向被撵出政府。然而“白军”不隐讳他们希望复辟旧政权并把农民夺取的土地交还给地主，而这是刚击败斯科罗帕茨基的革命执政内阁绝不能赞同的。邓尼金在集结了他的部队并从协约国获得了大批军需品和其他供应品之后，开进了乌克兰及其邻近地区以执行他的反布尔什维克使命，此时，他的部队在他们所占领地区的行径立即招致了全体农民的反感。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奈斯特·马赫诺（1889—1934年）的队伍在内的杂牌队伍大肆破坏他的交通线，并对他进行游击战。早在1918年，马赫诺就与布尔什维克合兵一处对付德国人控制的拉达。然后在7月他回到南乌克兰，组成了他的到处流动的游击军，并宣布废除所有州政府，还企图建立一个纯地方性管理的无政府主义制度（或称非制度）。有一个时期，马赫诺与红军之间有松散的联系；但是1919年春他与坚决要他的部队并入红军的布尔什维克决裂，成了比流寇好不了多少的人。他在骚扰邓尼金的部队并在他们挺进时占领其后方的地盘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在邓尼金被迫撤退时，马赫诺又再次与布尔什维克结成短暂联盟来对付他，并随即又对付反革命司令中的最后一个——伦格尔。外来的

干涉战争的结束对马赫诺的命运是致命的。他被迫偕同少数追随者逃过边界，从此从历史上消逝。<sup>①</sup>

在此期间，乌克兰武装部队统帅是西蒙·佩特利乌拉(1879—1926年)，他是革命执政内阁阁员，有某种社会主义背景，但主要是一个对社会政策并不十分关心的民族主义者。佩特利乌拉从一开始就在拉达中很活跃，在1918年11月对斯科罗帕茨基的反叛中领导军事方面的工作。他在革命执政内阁中成了维尼钦科的主要敌手，反对与布尔什维克妥协的任何企图。1919年2月，他退出了社会民主党，将维尼钦科赶出了政府，并企图争取法国支持建立独立的乌克兰。然而法国人一心要加强波兰作为他们的反布尔什维主义“防疫线”的中心地带；波兰人不仅对以前奥地利属下的西乌克兰提出了主权要求，而且对以前由俄国统治、但乌克兰人也声称有主权的大片各族杂居的土地也提出了主权要求。因此，佩特利乌拉争取协约国承认的企图失败了。

此后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期。以赫鲁晓夫斯基和维尼钦科为首的社会党人希望争取与布尔什维克妥协，准备同意在联邦性质的全俄国家内建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条件是乌克兰应该自治，而且应该保留对立的政党——至少是左翼和中派——的自由。另一方面，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仍然执意要争取协约国对独立的乌克兰的承认，而且由于希望做到这一点，派遣了多到几乎难以置信的代表团前往欧洲各国首都以及出席巴黎和会，为民族事业辩护并表示乌克兰是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不移的敌人。1919年3月，强烈反对革命执政内阁的做法的赫鲁晓夫斯基集团成立了保卫共和国委员会与之抗衡。一直支持革命执政内阁的佩特利乌拉随即修改了他的方针，说服新成立的委员会解散，并以鲍里斯·马托斯为首的、主要是社会民主党的内阁取代革命执政内阁。右翼随即企图发

<sup>①</sup> 关于马赫诺及其思想，见本卷上册第211页。

动反动政变，但遭到失败，结果佩特利乌拉控制了局面，但是控制了什么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控制的了，因为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掌握在红军、或者波兰人、或者俄国白军和占领了黑海诸港口的法国人手里。乌克兰新政府设在一列装甲火车上，被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除了对它那人数日益减少的军队所占领的日益缩小的地区行使权力外，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行使权力了。

在此期间，乌克兰没有派正式代表参加的巴黎和会反复辩论了乌克兰问题，但是主要涉及西乌克兰，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强烈支持波兰对西乌克兰的主权要求；而另一方面，劳合一乔治和威尔逊总统则对此持批评态度，希望对波兰施加压力，以制止皮尔苏茨基对西乌克兰政府发动的攻势。然而波兰人由于对法国人的支持有信心，仍坚持进攻，致使东加里西亚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西乌克兰人只好授予尤金·彼得鲁舍维奇独裁权力。这个独裁者没有能够制止波兰人前进，不久以后他的部队就只好撤退到东乌克兰，结果加里西亚全境落入波兰手中。巴黎和会于是认可了既成事实，同时保留了对有争议的领土的最终处理作出决断的权利。

当波兰正在入侵东加里西亚时，维尼钦科一直企图间接与苏俄政府谈判。这时贝罗·孔的苏维埃政府在匈牙利执政，但是该政府深知除非它能得到俄国的帮助，它几乎没有希望存在下去。维尼钦科向贝罗·孔建议：俄国人承认以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联合为基础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乌克兰人则允许俄国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开入匈牙利。布尔什维克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指责维尼钦科是小资产阶级反动派，表示不愿与他打任何交道。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政府正为与邓尼金斗争忙得不可开交，所以要警惕如此危险的一种冒险；果真它铤而走险，就可能不仅与波兰，而且与罗马尼亚发生纠葛，还很可能触发新的法国干涉行动。

到1919年6月中旬时，邓尼金部队已经占领了哈尔科夫，8月

份，他们向基辅挺进。佩特利乌拉得到东加里西亚军的增援后也向基辅挺进；两军同时抵达该城，并从不同方向占领了该城。这种局面不久便导致了一场争执，乌克兰人被迫撤退。然后东加里西亚军不经彼得鲁舍维奇同意就开始与邓尼金谈判，并缔结了一项规定该军放下武器的条约。彼得鲁舍维奇逃往维也纳，继续为加里西亚独立进行宣传。在军事上陷于绝境的佩特利乌拉继续斗争到11月，然后到波兰避难。东西乌克兰领袖相互之间进行了激烈谴责，前者指责加里西亚人背叛民族事业，后者则指责前者是秘密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拒绝与邓尼金共命运，这时协约国对自称是拯救全俄国摆脱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救星邓尼金是支持的。乌克兰人之间还存在重大的宗教分歧；东乌克兰信仰东正教，西乌克兰则信仰希腊正教并承认罗马教皇；此外，在东乌克兰占支配地位的是社会主义力量，尽管不是布尔什维克，而西乌克兰这时则是在反社会主义领导的管辖下。再有一层，西乌克兰首先是反波兰的，而不是反俄的，而东乌克兰则是在为摆脱俄国的控制而进行斗争。

612 这样，乌克兰战争便以东西乌克兰政府全部崩溃而告终；但是马赫诺和其他游击队领袖仍在进行战斗，以骚扰邓尼金的后方。邓尼金入侵俄国所获胜利是短命的：1919—1920年冬季期间，他的部队节节败退，直到1920年3月他被迫到克里米亚避难，在那里把指挥权移交给伦格尔将军。海军将领科尔察克也被红军消灭；协约国由于认识到武装干涉的政策再也没有希望，便从俄国土地上撤出了他们的部队。在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帮助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稳固地建立起来；它的民族主义的反对者尽管仍在外国继续积极鼓动，已陷于全然无能为力的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波兰避难的佩特利乌拉与皮尔苏茨基妥协，放弃了乌克兰对东加里西亚的主权要求，作为交换条件取得了波兰对于东乌克兰的独立要求的承认，但必须确定边界，把主要是乌克兰人或罗塞辛人居住

的大片边境地区割让给波兰人。佩特利乌拉签订这个协定并未得到实际已停止行使职权的乌克兰革命执政内阁的授权，因而他的行动遭到许多以前支持他的人的严厉谴责。随即回到苏维埃乌克兰并接受那里的新秩序的赫鲁晓夫斯基和维尼钦科对于佩特利乌拉签订任何这样的协议的权利持强烈异议。然而，所谓“华沙条约”曾使佩特利乌拉有可能在波兰帮助下着手创建一支新军，与皮尔苏茨基合作，共同入侵苏维埃领土。他的人数不多的部队参加了波兰对乌克兰的入侵和1920年5月攻占基辅一役；5月25日在该城成立了一个新的乌克兰政府，然而时隔一两个星期就被向前挺进的红军赶下了台。红军于6月11日收复基辅，此后便进攻东加里西亚，不久便开始威胁华沙。接着是俄国停止进攻，俄国人在华沙城下遭到失败，1920年10月，俄国与波兰停战，从而导致1921年3月签订里加条约。即使在实现停战、波兰人抛弃佩特利乌拉之后，佩特利乌拉也并没有绝望。他设法在沃尔希尼亚占据了一小片土地，并企图在那里与红军此时正以主力部队征讨的伦格尔达成协议。但是此举一事无成；里加条约签订后，佩特利乌拉被迫撤退到西加里西亚，在那里维持一个类似流亡的政府，直到1923年。后来他到巴黎居住，3年以后被犹太工人塞缪尔·施瓦兹巴特暗杀，这是对他当权时期在乌克兰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报复。佩特利乌拉是一个怪人。要称他“土匪”是一种误解，因为看来他的动机分明是为了乌克兰独立的一种真诚愿望，尽管他十分愿意把东加里西亚拱手让给波兰人，希望以此争取皮尔苏茨基支持他对东乌克兰的主权要求。他早年是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编辑，乌克兰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党员，但不久便在民族斗争的过程中放弃了社会主义，与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结盟反对赫鲁晓夫斯基和维尼钦科，后来甚至与有着类似的经历、过去也是社会党党员和民族主义分子的皮尔苏茨基联合起来。他的才华是在作为军事领

613

袖方面，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他并不考虑政策。俄波边境地区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局面使他得以在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成为在欧洲臭名远扬的人物；但是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重要性。乌克兰从未出现能够脱离俄国、建立它自己的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的任何前景。倘若德国当初赢得了战争，一个名义上独立的乌克兰倒可能作为德国的傀儡存在；但是从德国战败的时候起，除了建立一个在后来名叫苏联的国度内与俄罗斯紧密联合的苏维埃乌克兰以外，就别无其他可能性了。倘若当初布尔什维克被推翻，白俄取得了胜利，乌克兰不会有任何希望能够实现哪怕是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实现的那种自治。

至于乌克兰社会党人，值得一提的不多。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最有名的领袖是季米特里·Z. 马努伊尔斯基（1883—？）和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1873—？），前者后来是共产国际中的活跃人物，是乌克兰人，后者既非乌克兰人，也非俄罗斯人，而是保加利亚的多布罗加人，他曾在巴尔干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并被委任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sup>①</sup> 在乌克兰社会党人的非布尔什维克领袖中，主要人物是赫鲁晓夫斯基教授和维尼钦科，前者是民族主义文化运动中的杰出人物，后者除了作为政治家之外，还是一位文人。乌克兰社会党的缔造者亚罗舍夫斯基于1914年去世；除了佩特利乌拉以外，其他人物都只不过具有局部的重要意义，除非把无政府主义的游击队员奈斯特·马赫诺也算在内，关于他的奇特的观点，我们已经扼要地叙述过。<sup>②</sup> 鲍里斯·马托斯和伊萨克·马塞帕是社会民主党人，都出任过短期的总理。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没有产生过任何重要领袖，他们中有一些人沾染了严重的农民反犹主义思想。

---

① 关于拉科夫斯基，见第3卷下册第588页。

② 见本卷上册第211页。



## 第十九章

615

### 波兰, 1914—1931年

波兰在其大片土地在战争过程中遭受深重苦难之后, 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恢复了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而且, 它作为一个国家出现时其边界没有确定, 在此后若干年内还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在1918年的条件下, 它的独立要求主要是依据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其基础为民族自决权的十四点计划。但是在波兰人内部, 独立要求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大多数波兰民族主义者要求至少建立一个包括十八世纪被瓜分前的波兰的全部疆域的独立的波兰; 这意味着在其边界内包括大批乌克兰人或称罗塞辛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和日耳曼人, 其中有一些是居住在主要人口为波兰人地区的少数民族, 但另外一些人却居住在波兰人只占总人口中极少数的地区。事实上, 波兰民族主义者不仅求助于民族, 还求助于历史; 其中有一些人甚至使他们的主权要求远远超出了十八世纪波兰王国的领土范围, 并且希望建立一个包括整个乌克兰, 白俄罗斯, 整个西里西亚, 整个立陶宛, 也许甚至还有波罗的海各国以及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整个地区在内的大波兰, 即使不是在一个大一统的波兰国家内, 至少也是在容许主要的非波兰人地区进行有限自治的波兰联邦内。

1914年大战爆发时, 存在三个波兰——分别由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治理——, 这三块领土上的居民彼此对垒: 俄属波兰人为一方, 奥属和普属波兰人为另一方。居民分别应征加入三大国的武

616

装部队，他们的生产资源则被看作是斗争中每一国的资源的一部分。在战争过程中，在波兰土地上进行过多次战斗，大片土地易手，有的还数次易手。不论在人力上还是生产上都损失惨重，生活困苦不堪。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俄属波兰的大多数地区在德军占领下，受德国军政府管辖，但某些职能下放给了在德国军管下成立的波兰议会。战争后期德国人竭力征召波兰人入伍，并利用俄属波兰作为供应来源。德国人为讨好波兰人，还许诺在战后给予“维也纳会议建立的”<sup>①</sup>波兰以某种自治，而非独立，不过并未许诺把这种自治扩大到普属波兰或奥属波兰。许多波兰人只要他们认为同盟国可能获胜，便把他们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实现这种自治的前景上；1917年俄国的崩溃自然加强了这种看法，直到1918年夏明显看出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失败已迫在眉睫。此后，他们不得不赶紧调整他们的态度——在那年10月和11月最后崩溃到来时，这个调整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

在三个波兰之中，奥属波兰（或称加里西亚）的怨愤最少。奥属波兰人虽然不在奥匈帝国的两个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民族之列，确实在奥地利帝国中据有相当重要的、众所公认的地位，并在奥地利议会中组成了有影响的集团。他们享有相当大程度的区域自治，并且利用这种自治来统治加里西亚的主要是贫农的乌克兰（或称罗塞辛）居民。毫无疑问，为了抑制波兰人的权利要求，奥地利人有时似曾给予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要求以某种支持；但是总的说来，奥地利的政策对波兰人要求文化自由的愿望持同情态度，而加里西亚贵族在与俄属波兰——甚至与普属波兰——他们的同胞的处境相比之下，对自己的处境深感满意。以伊格纳西·达切恩

---

<sup>①</sup> 1814—1815年，英、普、俄、奥等国为结束反拿破仑战争召开了维也纳会议，废除了拿破仑于1807年建立的华沙大公国，把土地重新分配给了普、俄、奥三国，这是波兰历史上第四次被瓜分，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译注

斯基（1866—1936年）为首的加西里亚社会党人组成了联合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分支机构；1914年，他们与奥属德意志人一样支持奥匈帝国进行战争。事实上他们仍然赞同重建联合的奥地利帝国，只要有存在的希望。 617

普属波兰人不满他们在德国的处境的理由要多得多；因为他们长期顽强地抗拒普鲁士想要“德意志化”的企图——包括让德国移民在普属波兰定居，还有普鲁士对教育的控制以及普鲁士与天主教會的敌对。然而，德国统治下的波兰人却没有加里西亚的波兰人的那种集体表示自己意志的手段；即便如此，他们中间许多人仍然憎恨和惧怕俄国人，宁可要德国人统治也不要俄国人统治。在大战期间，牢牢地掌握在德国手中的普属波兰所遭受的苦难远没有奥属波兰或俄属波兰那样严重；1918年在德军被迫撤退之前，在驻扎在普属波兰的德国军团中组成士兵委员会时，该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的冲击。然而，除了在西里西亚的工业化地区之外，在德国统治的波兰居民区，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在1918年以后有相当一段时期，西里西亚的命运一直悬而未决，直到西里西亚为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所瓜分。

最后是以华沙为中心的俄属波兰。它是波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是以后来成为新波兰国家的杰出领袖的约瑟夫·皮尔苏茨基（1867—1935年）为首的波兰社会党的主要根据地。得到波兰产业工人主体支持的波兰社会党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激烈的反俄情绪，尽管党内有一个反对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进行任何形式合作的左翼。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皮尔苏茨基早年是一个活跃的社会党人，在他主持的秘密刊物《工人》上积极宣传社会

---

① 见第3卷上册第495页。

主义，他在宣传中严格区分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618 但是至少在1914年以后，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便迅速减退，而代之以强烈的反俄情绪的激进民族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不同，波兰社会党从来也不是反犹太的，或者哪怕是反乌克兰的。在二月革命以后有一个时期，该党对俄国的敌对情绪不那么显著；但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德国战败之后，敌对情绪又再次出现，因为波兰社会党中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布尔什维克有关波兰独立问题和确定波乌(克兰)边界问题的意图极其怀疑。皮尔苏茨基和波兰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与反对俄国统治的斗争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与波兰社会党对立的是其主要鼓舞者为罗莎·卢森堡的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这个党并不主张波兰民族主义或任何其他种类的民族主义，而是主张与俄国工人和沙皇帝国的所有工人共同行动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由于这个党有着强烈的国际主义情绪并强烈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它不仅与波兰社会党领导、还与列宁发生抵触，而且它支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1917年，它全力支持两次俄国革命；战争结束时，它联合波兰社会党左翼共同创建了波兰共产党，波共是最早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之一。然而即使在1918年时，它在波兰工人中的支持者也比继续追随民族解放者皮尔苏茨基的波兰社会党的党员要少得多。

1914年大战爆发时，皮尔苏茨基在加里西亚，他在那里一直设法组织一个运动，以便在奥地利的土地上逐步建立一支武装，在达切恩斯基和加里西亚社会民主党人的被动支持下对维也纳会议建立的俄国在波兰的统治进行游击战。皮尔苏茨基曾把他的追随者组成步枪队，并企图从奥地利当局获得步枪队的武器。大战开始

---

① 见第3卷上册第491页。

以后，他立即率领一支小小的武装力量开进俄属波兰，攻占了凯尔采城，但是在他无可奈何地同意把他的步枪队并入奥地利军队——然而作为由他自己的军官指挥的独特的部队——之前，他没有能够取得奥地利的支持。大战初期，在奥属和俄属波兰都进行了激烈战斗，俄国人成功地占领了加里西亚的大片土地，并击退了德国人对华沙的进军。但是在1915年春，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上述两个地区都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占领了这两个地区的大片土地。结果俄属波兰为奥地利和德国所瓜分，德国和奥地利分别在华沙和卢布林设置了总督。一年多之后，1917年1月，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共同在华沙为“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波兰成立了国务委员会和议会，企图为正在建立的波兰军队获得支持，以加强日益减少的德奥军队。皮尔苏茨基被委任为必须严格服从军事占领当局的国务委员会的委员，不久之后该委员会便在提出号召波兰人志愿参军的措词上与他们发生纠葛。1917年7月，在试图说服委员会总辞职以抗议强加于它的限制之后，皮尔苏茨基辞去了委员会委员职务。他随即被德国人逮捕，拘禁在马格德堡，在那里一直待到第二年由于德国崩溃而获得自由。在他被捕后不久，国务委员会自动辞职而为一个摄政委员会所代替，在该委员会之下，容许某种内阁掌权，但须受军事总督的否决权约束。以后就发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接着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停战谈判。波兰摄政内阁希望派代表参加那些谈判，但遭到德国人拒绝；当俄属波兰的一个地区——赫尔姆地区——被交给乌克兰时，波兰内阁辞职，奥地利议会中曾经要求波兰独立的波兰议员撤消了对奥地利政府的支持。在俄属波兰，在摄政者监督下，一个由官员组成的新内阁就职，摄政者还决定成立一个一部分由选举产生、一部分接受任命的名叫国务会议的议会。该机构于1918年6月举行正式会议，但是7月就解散，再也没有复会。最后，随着同盟国即将崩溃的迹

620 象明朗化，波兰摄政委员会于10月初解散了国务委员会，并企图成立一个代表整个波兰的新政府，来通过普选举行新议会选举。新政府于1918年11月3日宣布波兰独立，但是该政府随即被摄政们解散，他们任命了一个由官员组成的临时内阁。几天以后，加里西亚社会党领袖达切恩斯基在过去的奥地利的占领区所在地卢布林宣布成立波兰人民共和国。接着，从狱中释放的皮尔苏茨基于11月11日抵达华沙，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一直试图组成新政府的摄政者被迫辞职，在成立整个被解放地区的全国政府之前，把全权移交给皮尔苏茨基。自被瓜分以来一蹶不振的波兰已经准备恢复它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地位了。

在整个战争年代，波兰领导人之间一直存在尖锐分歧。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奥属波兰人曾支持奥地利反对俄国，而且几乎到奥地利崩溃前，始终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联邦体制的解决方案：加里西亚与尽可能多的波兰其余地区统一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普属波兰人仍然待在德国统治之下，他们并不是没有怨愤，但却没有能力采取任何行动。另一方面，俄属波兰人壁垒分明地分成两派：一派是所谓亲俄派，他们起初只要求在沙皇帝国内实现自治，后来又表示赞成在西方协约国和威尔逊总统协助下，实现波兰的统一和完全独立；另一派是所谓“独立派”，他们最初试图与奥地利人合作，但是希望通过同盟国的胜利——或许更公正地说，通过俄国的失败——实现波兰独立。波兰保守的右翼主体——以罗曼·德莫夫斯基为首的所谓国家民主党——支持协约国，大战期间它的代表机构是总部设在巴黎的波兰国民委员会。主要的左翼政党——  
621 社会党和农民人民党或解放党——采取与此对立的方针。另外一个农民党——以文森蒂·维托斯为首的、主要得到比较富有的农民支持的皮阿斯特党——的主要中心在加里西亚，在波兰成为独立国家之前，党内占支配地位的是亲奥派。属于社会党人的皮尔

苏茨基与非常保守的德莫夫斯基是冤家对头，这使得他们即使都深切关心在尽可能大的地区成功地建立新的波兰国家，也无法共同采取行动。

当然，波兰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土地所有形式各不相同，面积各异，有极小块的土地，也有大地产，大庄园在波兰东部最普遍。新共和国在 1918—1919 年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土地改革问题；面对农村地区的广泛动乱，当局作出了重新分配土地的慷慨诺言。在共和国的头几年，曾分配给贫农和无地农民一些土地，虽然与整个地区的面积相比不算多；规定了土地分配面积的最高限额——东部各省与波兰其余地区的限额有所不同——：超过最高限额的所有土地预定在此后若干年内逐步重新分配。但是时隔不久，许可的最高限额就提高了，重新分配的过程大为减缓，结果大面积的土地仍然掌握在大地主手里；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较小的、但却是殷实的庄园。在通过成人选举选出的第一届议会里，有大批代表农民的议员，他们以一票多数通过了雷厉风行的土改决议案，这对于使农民暂时相安无事起了一定作用，尽管直到 1920 年受俄波战争的爆发的刺激，才实际制定法律。战争甫告结束，地主就开始进行大肆鼓动来要求修改土地法；在鼓噪了一阵之后，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结果。1923 年，当时担任政府首脑的维托斯企图既修改土地法，又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土地法采取某种行动，但是唯一的后果是他下台。1925 年底，终于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在给予地主优厚补偿的基础上，以十年为期，每年重新分配 200 万公顷的土地。但是就连这个经过修改的计划也未付诸实施；在翌年皮尔苏茨基政变之后，就听凭整个重新分配的过程自生自灭了。

在皮尔苏茨基政变之前，土改问题缠住了历届政府，历届议会也不断辩论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之所以殊少成就，原因主要是：第一，有些集团虽赞成在土改范围以及补偿和重新分配的条件方面

进行某种改革，它们之间却存在具体分歧，这种分歧被本身就很强大的拥有土地者的势力利用了；第二，维托斯的皮阿斯特党不断动摇于中派立场和对右翼给予支持之间，因此除了最初几个月之外，从未存在过赞成采取任何明确行动的多数。比较激进的农民党的领袖斯坦尼斯拉斯·图古特（1873—1941）于1918—1919年在政府任职，1924—1925年再次在政府任职，但是从未处于能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从共和国成立伊始便被皮尔苏茨基抛弃的社会党则在议会中始终力量太弱，以致无法对事态进程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波兰社会党于1906年分裂，当时一个人数众多的少数派脱党，成立了一个其社会纲领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十分相近的左翼波兰社会党。这个新党在战争期间始终存在，后来于1919年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了波兰共产党。1916年，波兰社会党进一步分裂，以皮尔苏茨基为首的一个右翼少数派脱党，成为后来他在夺取个人权力的斗争中他个人的追随者的一部分。在1919和1920年，俄国人曾强烈希望发生以他们自己的革命为楷模的波兰革命，并希望这样一场革命会为世界革命扩大到德国和西方打开道路。在1920年的俄波战争时，他们仍然抱有这种希望，相信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会在俄军向华沙挺进时起来支持红军。<sup>①</sup> 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相反，大多数波兰人支持反对入侵者的民族大业，结果波兰共产党遭到取缔，被迫转入地下，并失去一大批支持者。波兰社会党继续进行活动，在皮尔苏茨基与德莫夫斯基和右翼各党一再发生争执时，它在多数情况下与他站在一起，而且继续把他看作是“左翼人士”，一直到1926年政变，在那次政变中不仅波兰社会党，还有共产党也支持皮尔苏茨基反对右翼政府。实际上，皮尔苏茨基在其政策与波兰左翼的政策已毫无和

---

① 见本卷上册第256页。



谐之后，仍然是波兰左翼的英雄；这不仅是由于他在民族解放事业中的贡献，也是由于他是德莫夫斯基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直到政变之后，社会党人才发现了他们的错误，并且此后已不能有效地对抗他在军队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权益集团的支持下建立的新政权了。

暂时被赋予建立波兰共和国的全权的皮尔苏茨基起初似乎愿意接受民主的议会政府制度，尽管他强烈反对1921年通过的宪法中严格限制总统权力并规定行政权须受立法权约束的条文。他说，他绝不同意在这样一种宪法下担任总统：1923年，他反而正式退隐了，不过从未有一刻停止发挥他的影响，他的影响在军中仍然十分强大，而且使他能够在政党之间挑拨离间，造成破坏性后果。1922年，在他拒绝竞选之后，他的密友、前社会党人加布里埃尔·纳鲁托维茨（1865—1922年）便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仅仅几天之后，他就被一名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暗杀，由资深的社会党人斯坦尼斯拉夫·沃泽科夫斯基（1869—1953年）继任，他在任期间无所作为，1926年皮尔苏茨基政变把他赶下了台，换上了与皮尔苏茨基有私交的工程师和前社会党人伊格纳西·莫斯彻斯基（1867—1946年）。在纳鲁托维茨遭暗杀之前，皮尔苏茨基基本上是民主议会政府制的支持者，虽然他希望有一个更有权力的总统并减少代表形形色色的宗派集团的政党的数目。但是纳鲁托维茨被杀害624一事使他的态度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即相信议会制度不可靠。与纳鲁托维茨竞选的是民族主义右翼的候选人，纳鲁托维茨当选是依靠社会党和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选票，他的当选使极端民族主义者深感愤慨。在后来三年里，皮尔苏茨基等待时机，然后在1926年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仍然主要是作为极端民族主义右翼的反对者。即便在1926年的政变以后，社会党人也没有完全停止支持皮尔苏茨基：曾于1918年到1919年在共和国的第

一届政府中任总理的社会党人叶德尔泽叶·莫拉泽夫斯基(1870—1944年),于1925年再次出山担任公共工程部部长,并在此后三年一直担任此职。还有在1920年到1921年曾任副总理的达切恩斯基也于1928年再次出山担任议会议长(典礼官)。

当然,在任何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波兰社会党的态度和政策都始终是激进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1919年选出的第一届议会中,该党有相当强大的议员阵容,但是1922年它失去了相当多的席位,只得到41席——还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在1928年举行的下一届选举中,它的情况大有好转,席位增加到64席,尽管它不得不与皮尔苏茨基在1926年政变后建立的新党——政府集团——竞选。此后,面对着皮尔苏茨基政权日益独裁的情况,这个党衰败了。1928年,共产党尽管作为非法的党,却得到了7席,但是他们的议员在企图以大声喧哗压倒“独裁者”之后随即被撵出了议会。

在共和国建国之初的第一届议会中,社会党人和他们的农民党盟友在其它激进集团支持下,制定了一些有益的工业和社会法,包括八小时工作日法在内。但是波兰的经济形势极坏,只是由于美国的援助物资及时运到,才避免了大规模饥馑。后来在1920年,俄波战争转移了人们对于经济措施的注意;战争结束后,左翼625 实力大减,以致无法再取得什么进一步的进展。1923年秋发生的广泛罢工和骚乱,遭到了当时掌握在保守的右翼手中的政府的武力镇压。在对一次铁路工人罢工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发生了短暂的大罢工;在克拉科夫,举行了实际的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工人占领该城大部分地区达两天之久,后来才被军事当局攻占。由于波兰人与在人口中占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纠葛,这些工人的骚乱复杂化和加剧了。根据和约,波兰有义务成立一个给予这些少数民族以文化自治的政权。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最重要的是东部诸

省的乌克兰人以及遍布波兰大部分地区、但在前俄属波兰人数最多的犹太人。只要选举相对说来是自由的，这些少数民族就能把相当多的议员选进议会，从而使左右两翼的政治斗争复杂化，并使政府难以取得始终一贯的多数。波兰存在着强烈的反犹太主义，尤其是在像国家民主党这样的右翼政党中间。波兰右翼政党也对乌克兰民族主义深怀敌意，而且不顾和约，对它大肆暴虐地进行镇压，甚至企图将乌克兰人地区“波兰化”。如我们在前文所见，皮尔苏茨基曾梦想在联邦基础上建立大波兰，让构成联邦的各民族集团在他们的各该地区内享有自治。但是这种联邦计划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设想上：波兰的版图能够包括整个立陶宛、整个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里西亚的大部，也许甚至还有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以及东普鲁士；即使在这个基础上也不可能解决犹太人问题，因为犹太人与其他民族杂居，他们需要的是文化自治而不是区域自治。

在俄波战争之后的善后安排使这样一个大波兰的希望黯然失色，始终遭到大部分民族主义右翼反对的这种联邦计划实际上消失了。在战争期间，有一个时期波兰曾与乌克兰游击队领袖西蒙·佩特利乌拉达成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佩特利乌拉放弃乌克兰对东加里西亚的主权要求，交换条件是波兰帮助建立一个包括俄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的独立的乌克兰。这个协议遭到了其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攻击，认为它背叛了乌克兰民族主义事业；由于布尔什维克成功地把乌克兰的主要部分并入了苏联，这个协议毫无结果。但是根据 1921 年的善后办法，波兰兼并了东部的一片面积相当大的地区，其居民更接近乌克兰人（或称罗塞辛人）而不是波兰族，并且信仰东正教而不是天主教，所以在新波兰，不论是在东加里西亚还是更往北的边疆省份，仍然有着为数众多的非波兰族居民，他们极其反对“波兰化”；而且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在民族上和宗教上也徒然地意识到与苏联境内的他们的乌克兰邻居有

626

着一种亲缘关系。

更往北，波兰人虽然没有能够兼并立陶宛全境，确实得到了它的一大部分领土，包括古城维尔纳<sup>①</sup>——一个位于主要是立陶宛人或白俄罗斯人居住的腹地的、波兰色彩很浓的城市，因此即使在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也存在令人烦恼的少数民族问题。因为波兰国家往北延伸到维尔纳及更远的地方之后，便使苏联与立陶宛隔开，从而使苏联除了通过波兰以外，无法前往德国和西方。这就使得俄国不可能再援助苏联领袖仍然在希望的德国革命。波兰以武力占领的维尔纳地区是当初法国设法在布尔什维主义向西欧发展的道路上设置的一道屏障——“防疫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根据1921年的善后安排波兰取得该地，这是俄国遭到的最严重挫折。西里西亚的解决办法也规定在新波兰包括一个德意志少数民族；而在南方，外喀尔巴阡的罗塞辛并入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该地区的与乌克兰人有密切血缘关系的居民便无法再与苏联直接接触。

可见，波兰是由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统治民族控制的多民族国家，这个民族极其不满和约强加给他们的对少数民族的义务，并通过其统治阶级来逃避这种义务。因而产生的民族冲突非常不利于建立一个有效的统一的工人阶级运动，并加深了波兰人占支配地位的波兰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分歧，后者从少数民族中吸收他们的许多追随者，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号召力。共产党在波兰是非法政党，并且仍在进行地下活动，这一事实使得人们非常难于估计它的真正人数。看来它在开始时有着人数众多的追随者，但是由于在俄波战争期间它把入侵的红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它的号召力大不如前。战斗结束以后，它着手重建它的队

---

<sup>①</sup> 维尔纳，即现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维尔纽斯。——译注

伍，在临时凑合的地方政治组织的主持下，在议会中只得到寥寥数席，这些组织由于进行选举暂时获得了合法地位，但是随时有可能被解散，其文献随时有可能被没收，其候选人即令当选，也随时有可能被逐出议会，然后被逮捕入狱。主要来自战前的社会民主党的它的旧领导与共产国际发生了纠葛，因为在有关1923年德共行为的争论中，共产国际的成员大部分支持布兰德勒；<sup>①</sup>此后，控制权便转到了共产国际可以接受的一个新集团手里。在共产国际于1921年以后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上，在波兰产生了很大麻烦，因为许多波兰人认为这种策略不适用于波兰的具体条件。如我们在前文所见，1926年，不仅是波兰社会党，共产党也支持皮尔苏茨基夺取政权，但是很快就不得不为他们的错误后悔了。1928年，共产党及其亲密盟友获得了50万张以上的选票，波兰社会党则得票100万张以上。

至于波兰社会党，它仍保持强烈反对俄国的态度，并在1926年之前一直认为皮尔苏茨基是反对国家民主党人及其盟友的保守民族主义的、人民民族主义的领袖。1926年5月发生政变时，波兰社会党刚退出为应付严重经济危机和采取措施稳定币制而成立的联合政府。社会党和工人阶级的领袖们希望，继皮尔苏茨基夺取政 628  
权之后会成立一个由波兰社会党和人民农民党控制的工农政府；这些政党吁请皮尔苏茨基解散议会并下令举行新的选举，他们深信左翼政党会在选举中赢得多数。但是皮尔苏茨基决心破坏而不是加强议会的影响；他最中意的是保留一个由右翼控制、然而又意识到对军队和舆论的潮流无能为力的议会。这一点刚刚明朗化，波兰社会党在与党内的皮尔苏茨基钦佩者进行内部斗争之后，便宣布自己反对新政权；到了一定时候，它以反对党身份参加了1928

---

<sup>①</sup> 见本书第647页。

年的竞选。在这个基础上，它既与波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结盟，又争取独立波兰社会党的多数党员回到了它的队伍，为了奉行更激烈的路线，这批人于1922年在沃列斯拉夫·德罗布纳的领导下脱离了波兰社会党。1928年的选举后，老波兰社会党领袖达切恩斯基当选为议会典礼官（议长），另一位坚定的老战士赫尔曼·迪亚芒德（1861—1931年）继他出任党主席。还有一位老战士费力克斯·佩尔（生于1871年）于1927年去世。1928年，实力有所加强的党既在议会选举中又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它有时单独地、有时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犹太人同盟联合，在若干城市取得了决定性的多数席位，包括罗兹、卢布林还有维尔纳——在最后这个城市是与人民农民党联合。该党还拥有华沙市议会主席一职。

然而，当皮尔苏茨基在资本和金融阶级的主体以及军队的支持下着手以非党集团形式逐步增加他个人的政治追随者时，上述成就并没有使波兰社会党免遭严重打击。1928年的选举使皮尔苏茨基无法完成他所希望的宪法修改——大大扩大总统权力而削减议会权力——，因为修改宪法需要三分之二多数。只是到了反对党候选人受到相当大压制的1930年选举时，皮尔苏茨基集团才赢得了绝对多数，而且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达到所要求的三分之二的席位。直到1935年，皮尔苏茨基才强使议会以所要求的多数通过他的新宪法——即使这时也是靠玩弄议会诡计。不过，他是如愿以偿了，但谁能想到，成功以后不出几个星期他便去世了，而由所谓“上校政权”继承了他的权力。

1926年以后发展的、1930年以后得到更进一步发展的皮尔苏茨基政权，就本质而言是独裁政权，尽管它容许议会维持一种虚设的存在，保留着议会的大部分形式。这个政权建立在两个权力来源之上——皮尔苏茨基本人的巨大威望以及忠诚于他的军队。这

个政权于1926年在除了前普属波兰以外的所有地区消灭了德莫夫斯基和国家民主党人的势力，并在此后瓦解了维托斯的右翼皮阿斯特农民党，迫使其领袖人物流亡。就这样，它消灭了它的那些保守派对手的力量，并促使他们的大部分追随者转而支持它；它还得到以前支持左翼政党的许多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因此，皮尔苏茨基政权完全有能力严厉对待其对手——波兰社会党、共产党、人民农民党以及一些少数民族集团，包括犹太人在内。起初，皮尔苏茨基对德国的纳粹政权采取强硬路线——甚至到了向法国人建议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地步。只是到了后期——从1936年到1938年，他的继承者才显示了站在纳粹一边的迹象。波兰独裁制度在皮尔苏茨基主持它时，与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殊少共同之处。它同情贫苦阶级而不是保守的贵族，但是在这些贵族的坚决反对下，它发现无力完成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只是在皮尔苏茨基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才在意识形态上显示了与纳粹主义的亲和性；而三十年代的这方面的发展已不属于本卷所涉及的范围了。

## 第二十章

### 魏玛共和国, 1922—1931年

1921年, 共产党起事失败, 德国共产党内部以及它的领袖与共产国际之间随即发生了纠纷; 在此之后, 党员人数急剧减少了一半以上, 新领导奉共产国际第3次代表大会指示, 不得不制定崭新的政策。为应用于全世界而制定的这项新政策起了一个十分容易使人误解的名字“统一战线”, 这个名词的意义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人们在下列两者之间进行了区分: 一个是“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 其形式是进行谈判, 商讨共产党领导与社会民主党领导或工会领导采取统一行动问题; 另一个是“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 这个名词意味着共产党采取行动煽动群众, 办法是在对工人主体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上进行鼓动, 以便迫使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领袖支持共产党的建议, 或者驱使他们与他们自己的追随者的愿望对立。在一定程度上说, 两种策略都被认为是合法的, 附带条件是: 不论使用两种策略中的任何一种, 共产党都不得与它们的社会民主党敌人妥协, 而应该坚持与它们谈判, 以便离间它们与其支持者的关系。如我们在后文所见, 共产国际本身就是本着这个精神与第二国际和“第二个半国际”进行了谈判,<sup>①</sup>但是在讨论中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方针, 结果谈判很快破裂。情况与此类似的是: 在英国, 共产党申请加入工党, 十分清楚, 它如被接纳, 它就有权继续倡

---

<sup>①</sup> 见本书第682页。



导自己的政策。不言而喻，它没有被接纳。在德国，出现了共产党 631 是否应该准备参加在德国一些州的社会党政府问题；但是主要重点在于“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首先在于试图取得工会和根据 1919 年的法律成立的工厂委员会的支持，办法是号召采取行动以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希望对雇主进行的更加强有力的直接斗争可以有助于使群众转向比较革命的思想状态。关于在“统一战线”方面应采取何种策略，德国共产党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以路德·费舍尔（生于 1895 年）为首的一个左翼集团担心，由于奉行“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策略，或者哪怕是由于在奉行“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时动辄妥协，共产党非但不能征服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普通成员，反而会被其对手所征服，眼看着自己的党员被吸引过去。但是大多数共产党领袖否认现实中存在这种危险，并为新政策辩解说，鉴于党在 1921 年的灾难后力量比较薄弱，奉行这种政策是正确的。

当然，整个“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是：共产国际承认在 1921 年的挫折之后，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立即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在 1922 年 11 月和 12 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在世界广大地区正在出现“资本主义反攻”以及有必要在目前不利条件下避免任何种类的“盲动主义”，已经谈了很多。共产国际的领袖仍然深信，革命行动的机会不久之后会再次出现。他们绝没有放弃这样一种信念：世界资本主义正接近它的“最后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很快就会为新的革命进展重新创造所需要的条件，他们仍然期待德国在这种进展中居于关键地位。但是他们承认，革命暂时还不切合实际，因此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参加工人为改善或保卫他们在资本主义下的地位而进行的 632 日常斗争，以扩大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从而为革命铺平道路。这就是 1922 年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责成共产党采取的“统一战线”

政策的意义。

行动中的新政策最初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体现了“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政策”的1923年的德国铁路工人罢工以及同年6月沃尔特·拉特瑙被杀害后出现的政治示威。1921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加入了天主教中派约瑟夫·沃思领导的联合政府；在该政府执政时期，于翌年6月颁布了一些维护法律和秩序的紧急法令。拉特瑙被杀害后，这些法令为保卫共和国法所取代。出现了矛头针对保皇反动派的“拥护共和国”示威游行，除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以外，共产党人也参加了这些示威游行，但是共产国际随即告诫共产党人不要投身于保卫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的行列，理由是这样一种妥协远远超出了对于“统一战线”的宗旨的任何合法的解释。于是共产党人后退了，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参与日常的经济斗争以及加强对工厂委员会的控制方面。通过建立对立的共产主义工会来分裂工会运动的政策肯定已经抛弃，唯有在共产党人被开除出“自由”工会而别无选择的余地时，才容许另组工会。到1922年11月举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德国共产党已经有幸在这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正在这时沃思政府倒台了，而由以人民党的威廉·库诺为首的右翼政府所取代，社会党没有参加政府。1923年1月，德国共产党的来比锡代表大会投票赞成与社会党采取联合行动，以对付以路德·费舍尔、福卡迪·马斯洛夫(1891—1941年)和欧内斯特·台尔曼(1886—1944年)为首的左翼反对力量。这时，法国人借口  
633 德国不履行凡尔赛条约规定的赔偿义务，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进军鲁尔，于是开始了占领所引起的一场大斗争。鲁尔矿工于1月23日举行罢工，一星期以后法国人接管了占领区的铁路。在鲁尔居民中开始了普遍的消极抵抗运动，运动随即得到德国政府支持，它保证承担抵抗的费用。

这里不准备拿出篇幅来详尽叙述 1923—1924 年的鲁尔斗争。我们目前关心的不是斗争本身的事件，而是斗争对于整个德国国内形势的影响。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进军鲁尔是因为他们指责德国人存心不履行赔偿的付款，并声称有权占领鲁尔地区作为德国履行(凡尔赛)条约的保证。德国人反驳说，他们不可能满足强加于他们的大得不可思议的权利要求——这的确是事实。但是毫无疑问，德国还有一些强大的势力反对“履行”条约的整个政策，并千方百计地尽可能破坏有可能进行的付款。当然，对鲁尔的入侵预料会使履行条约更加困难，无论如何，除非居民、雇主和工人都愿意与占领军通力合作，情况就只能是这样；而且，即使当初他们愿意通力合作，可是如果法国人随心所欲地尽量攫取并运走该地区的产品，鲁尔损失的煤和铁也会导致整个德国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居民完全不像是会愿意与占领当局通力合作，占领当局倒是很可能遭到鲁尔工业中的工人和敌视履行条约政策的民族主义分子这两个方面的激烈反抗；事实上，这些派别尽管彼此水火不相容，而在共同的抵抗运动中却携起手来了，由于法国人试图利用占领作为手段来促进旨在建立永远脱离德国其余地区的新国家的分裂主义运动，抵抗愈加激烈。在法国支持下扶植起来的名不见经传的傀儡们领导的这种分裂主义运动的活动，不仅在鲁尔、而且在德国其余地区都引起了强烈的情绪，起了迫使德国政府全力支持抵抗运动的作用。政府的支持包括：开支巨额款项以维持拒绝为法国人工作或者其企业关门的工人，用于补偿受到不利影响的雇主，以及用于从国外购买物品来代替鲁尔产品，供应德国其余地区。然而，要提供这种支持，唯有大量发行额外的纸币。由于在鲁尔占领行动开始之前就已出现的通货膨胀，德国马克一直在贬值；在占领进一步产生压力之后，通货膨胀迅速变成了灾难，到了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的时候，货币在国内和外汇方面就已几乎丧失一切购买力。对

634

马克进行的一种惊人的投机交易大大加强和加速了这种贬值，这对于工人以及在甚至更大的程度上对于德国中产阶级中依靠比较固定的收入为生的人，都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工资和薪水的购买力都灾难性地下降了；储蓄、养老金以及一切按币值固定的资本的收入，实际上已不顶用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所有债务人都因此受惠，因为可以几乎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还清了债务，以致靠贷款或债券提供资金的资本主义企业成了它们靠借钱买下的资本资产的、没有债务的业主。财产和收入的大规模重新分配开始了，吃亏的是工资收入者、养老金领取者和固定利息的小投资商；大批中产阶级的破产不仅在支持社会党的工人中间、而且在社会党的死对头中间，都激起了革命情绪的高涨。

实际上，鲁尔斗争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陷入革命的局面。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下降而产生的赤贫状态为共产党提供了许多新的成员，共产党希望推翻魏玛共和国，并以俄国为模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那些希望恢复军人统治并建立“右翼”专政以取代共和国的反革命人物，其实力也大为加强，而且在形势鼓舞之下相信：为人憎恨的魏玛政权的崩溃已指日可待。共和国正式承认的军队——国防军已经处于不受文官当局控制的很大独立的地位，因而就像在1920年一样不能依靠它来保卫共和国对付反革命活动。共和国还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仓促拼凑了一些名为“黑色国防军”的非法部队；而对于保卫共和国来说最不可靠的是“自由军团”，这支队伍非但仍然存在，随着德国经济状况的恶化，它还吸收了许多新兵。最后还有巴伐利亚人，他们要求在联邦帝国范围内自治，保留它的反革命军队，而且与国防军的地方部队、“自由军团”以及希特勒的纳粹追随者——当时仍然只限于巴伐利亚——保持密切联系，这些纳粹追随者要求向柏林进军，推翻魏玛共和国，并且希望在这次冒险行动中得到巴伐利亚政府和巴

伐利亚国防军的合作。

因此，在1923年的德国，在极右翼和极左翼都有革命的阴谋分子。尽管如此，这两个动辄进行殊死斗争的极端派都反对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而且反对那些支持法国和比利时唆使的分裂主义运动或者出于恐惧或自私的利益、愿意与占领军合作的人。结果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形势。帝国政府掌握在以库诺为首的右翼联盟手里，库诺代表的是从通货膨胀中获利并无意抑制通货膨胀的资本主义权益集团。大部分已在社会民主党——除了格奥尔格·累德堡为首的一个小集团外，非共产主义的独立党人已于1922年9月回到社会民主党——内重新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者没有参加库诺政府，而且在大多数问题上反对该政府，但是他们承担了保卫魏玛共和国的义务，并反对都是靠牺牲社会民主党才获得进展的两个革命阵营。

1923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季，工人——甚至可以说是除了从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中获利的那些人以外的全体人民——的经济状况不断地迅速恶化，到8月初，德国政府再要执行承担对鲁尔占领当局进行消极抵抗的费用的政策，显然已经行不通。进一步发行纸币分明已经无济于事，因为纸币已丧失全部购买力——以致到了这样的程度：钱越多，流通总额所能买到的东西越少。给予抵抗运动的支持不得不停止，而且除非愿意听任整个帝国在混乱中崩溃，要想使德国经济重新站起来，就必须寻求解决办法和争取外援。在这个危急时刻，库诺政府下台。以资本主义权益集团的另一名代表、人民党的古斯塔夫·斯特雷泽曼为首的一个新的“大联合政府”开始执政，社会党人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保卫国家为理由参加了政府。到了这个时候，资本家阶级已经通过取消其债务榨取到了最大利益，因而愿意在旨在结束通货膨胀的措施方面进行合作。斯特雷泽曼本人开始相信有必要与法

636

国人达成协议,并争取美国和英国协助来一方面迫使法国人妥协,另一方面在财政方面给予德国帮助。他认识到,要做到这一点德国必须准备这样做:一方面要求修改根据凡尔赛条约对它提出的权利要求,同时采取“履行”条约的政策,并作出真正努力来实现条约中切实可行或能够使之切实可行的规定。因此斯特雷泽曼政府于1923年9月27日宣布结束鲁尔的消极抵抗,并在帝国银行首脑赫贾尔玛·沙赫特协助下着手筹款发行新的、稳定的货币来取代此时已毫无价值的马克,并着手说服协约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立即对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和为了使这种赔款成为可能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进行调查。这些事态发展首先产生的结果是发行一种名叫“租税马克”<sup>①</sup>的新的临时货币,当局声称这种货币的基础是以德国经济体系的不动资本资产为抵押,其实毫无基础可言,只不过是停止发行完全贬值的马克纸币和中断了旧货币的银行贷款。第二个结果是:通过斯特雷泽曼在伦敦和美国的谈判,成立了由美国担任主席的道威斯委员会,该委员会致力于研究德国的支付能力并拟订在旧马克已不复存在期间使德国货币得以稳定的建议。

在鲁尔冲突的那些年月里,德国从左翼或右翼方面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其宗旨南辕北辙的两股革命力量大体上起了彼此抵消的作用。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德国共产党人在1921年失败后一直奉行谨慎的政策,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下,他们依靠这个政策一直企图把社会民主党人的追随者争取过来,并改善了与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党两党党内的左翼人士的关系,在这两党重新合并后,还改善了与新的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的关系。在萨克森和图林根,这种因素最强,因为1923年这两个州都是占支配地位的左翼社会党政府执政,它们与

---

<sup>①</sup> “租税马克”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货膨胀时期发行的一种以地租抵押为基金的马克。——译注

帝国政府有严重争执。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加强这些政府的实力以抵抗帝国政府和国防军，共产党是否应该参加这些政府和担任政府官职。有些共产党人赞成这个方针，认为它符合“统一战线”的口号，而共产党左翼则指责这个方针由于与信誓旦旦要维护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叛徒”联合而必然背叛共产党的原则。再有一层，随着对鲁尔的占领所引起的混乱和灾难的恶化，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德国是否已再次处于革命形势之下，以致共产党人有责任去设法利用普遍骚乱这个机会来建立共产党专政，从而恢复直接革命的政策，尽管大多数共产党人认识到这种企图是否能够成功颇成疑问，而且许多人认为此举的后果可能是触发右翼的反革命行动并使之成功。 638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共产党人自然要与莫斯科商量，去请教共产国际。然而他们发现，对于应该采取何种方针，共产国际也很没有把握。当时的德共领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1881—?)前往莫斯科磋商，为等待共产国际拿定主意，在莫斯科滞留达数月之久。在他离国期间，党的其他领袖对未来的方针举棋不定，既不能明确地准备革命起义，也不能决定不准备；1923年10月，布兰德勒终于回到德国，当时他的党仍然一团混乱，但是布兰德勒已奉命必须举行革命起义。在此期间，留在德国的德共领袖已决定参加萨克森和图林根政府，这两个政府都面临被国防军部队用武力颠覆的危险；布兰德勒回国后，成了经过改组的萨克森政府的成员。于是帝国政府决定废除萨克森政府，将萨克森置于由帝国任命的一位文职专员的治理之下；为支持这项政策，派遣了国防军部队去占领萨克森。面对着军事入侵，萨克森政府感到无力抵抗，只好听凭被颠覆；图林根政府不久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终于为在德国其他地区起义进行积极准备、但主要依靠萨克森和图林根支持的共产党人认识到成功的一切希望已经消逝，因而在最后一刻取

消了起义。然而，放弃起义的指示没有及时到达汉堡，在那里，几百名共产党人起来夺取了市中心，但是由于没有群众支持，随即被镇压下去。在其它地方，拟议中的起义根本没有举行；但是取消起义一举并没有使许多共产党人免于被捕入狱，或者使共产党免于遭到取缔并被赶入地下。

639 在德国北部和中部发生这些事件时，在巴伐利亚正在策划相反性质的革命，那里的以冯·卡尔为首的右翼政府在斯特雷泽曼内阁开始执政之前已经与帝国政府发生了纠葛。社会党人进入斯特雷泽曼内阁一举使巴伐利亚人大为恼怒；人们纷纷议论，说是要进军柏林，消灭魏玛共和国，途经图林根和萨克森时顺便消灭这两个州的社会党政府。巴伐利亚人与柏林的以海军将领冯·特皮茨为首的极右翼有联系，并且希望冯·洛索夫将军领导的驻巴伐利亚的国防军部队会与他们联合。但是对共和国发动实际战争的命运攸关的决定，却迟迟没有作出。不过在9月26日，巴伐利亚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将独裁权力授予了冯·卡尔总理。斯特雷泽曼在国防军将领的压力下进行了报复，将全部行政权力授予了国防军部长，部长又将这项权力下放给国防军司令冯·西克特将军。此举的后果是巴伐利亚的独裁者在名义上要听命于冯·西克特，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巴伐利亚人是否会屈服，以及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是与冯·西克特还是与冯·卡尔合作。

在此期间，1921年在慕尼黑建立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党）的希特勒一伙继续鼓吹对柏林进行公开战争并争取鲁登道夫将军加入，但是这伙人还远远没有单独行动的力量。它需要冯·卡尔的支持，至少也需要冯·洛索夫的国防军部队恪守中立。在这个时刻，冯·洛索夫决心拒绝服从冯·西克特而听命于冯·卡尔；10月22日，那位巴伐利亚的独裁者“受德国人民委托”接管了驻巴伐利亚的国防军，从而公然反抗帝国政府，预示了内战的



凶兆。正在这时，斯特雷泽曼由于迫切希望在防止右翼极端派推翻共和国的同时安抚右翼，授权冯·西克特对萨克森和图林根政府采取行动，于是这两个政府不得不立即决定是进行武装抵抗还是屈服。萨克森政府的成员布兰德勒拒绝为主张抵抗承担责任，除非社会民主党人保证全力支持；而社会民主党人由于意识到他们不能指望萨克森和图林根以外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主体的支持，不主张进行武装抵抗，从而为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机会，把取消拟议中的暴动的罪责推在了他们身上。但是，尽管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社会党人这样听凭自己被国防军罢了官，他们的罢免结果仍使斯特雷泽曼政府中的社会党人的地位岌岌可危。驱逐萨克森和图林根政府并无宪法授权，这项行动是国防军根据最近授予它的特别权力执行的。其实在授予这项权力时，政府中社会党人的地位已经名存实亡了。他们辞职之后，斯特雷泽曼立即组成了一个完全依靠右翼资产阶级政党支持的新的帝国政府。 640

这些事件对于缓和巴伐利亚与帝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然有所帮助。但是巴伐利亚一些有权势的人物不准备就此罢休而不采取果断行动一劳永逸地推翻魏玛共和国，并随即结束斯特雷泽曼履行凡尔赛条约以及在此基础上与协约国政府和美国人达成协议的政策。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由于仍然希望挟持冯·卡尔和冯·洛索夫与他们共事，在与北德极端派磋商之后继续他们的准备工作，并在最后决定于11月8日在慕尼黑起事，倒不是要推翻冯·卡尔，而是为了迫使他与他们共命运。那天晚上，大批纳粹党徒在希特勒率领下冲进了冯·卡尔正在发表演说的大厅，劫持了他本人和冯·洛索夫，要求他们同意加入拟议中的向柏林进军。冯·卡尔和冯·洛索夫在压力下佯作同意，于是宣布将成立新的帝国政府，由希特勒出任总理，鲁登道夫担任进击柏林的最高司令，冯·洛索夫担任国防军部长，冯·卡尔仍然是巴伐利亚的独裁统 641

治者。

然而，冯·卡尔和冯·洛索夫完全无意按照这项安排行事。他们已决心与帝国妥协；第二天早晨，他们就调动国防军部队和警察对纳粹党徒及其极端民族主义支持者采取了行动，他们的抵抗轻而易举地便被镇压下去。纳粹党徒企图以大规模示威游行进行回击，但是警察向示威者开枪，驱散了他们。希特勒及其他纳粹党徒被逮捕，并被判处在要塞内短期拘禁。鲁登道夫则逍遥法外；当然，冯·卡尔和冯·洛索夫并没有由于他们以前拒不接受帝国的权力而受到惩处。这样，纳粹分子第一次以暴力夺取政权的企图没有成功；这次失败使希特勒决心通过改组他的队伍，找到一条会使他那一方面具有合法形式的、通向权力之路。

在此期间，占领着鲁尔的法国人一直在竭尽全力煽动他们所控制的那些德国地区的分裂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保护下成立了一些分裂主义的地方政府，但是无法行使任何权力。如我们在前文所见，11月，德国政府授权发行新币租税马克作为稳定币制的一个步骤；12月，在英国和美国的压力下，任命了道威斯委员会来考虑德国支付赔款的实际能力。同月，中央党右翼的威廉·马克斯接替斯特雷泽曼担任总理；但是改任外交部长的斯特雷泽曼保证只要切实可行，就要“履行”凡尔赛条约的条款；他仍然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控制者，与沙赫特密切合作，共同指导财政事务。1924年4月，道威斯委员会提出了报告，经过长期磋商后，8月9日签订了关于德国赔偿付款的道威斯协定。于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终于开始从占领区撤退，11月，撤退工作完毕；德国在根据道威斯协定提供的大笔贷款的帮助下，在协约国政府可以接受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专心致志地开始了经济建设工作；协约国政府仍对能够榨取到的赔偿寄予过多的希望，尽管鲁尔的斗争使德国的经济遭到了破坏。

1922和1924年先后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主要内容是由于1921年和1923年10月的灾难问题相互谴责。在两次代表大会上，把主要过失归罪于两个人——在鲁尔斗争时分别担任德共领袖和共产国际顾问的布兰德勒和卡尔·拉狄克。党的新领袖对于失败后被撤换的那些人的指责是：（一）共产党参加泽格纳为首的萨克森左翼社会民主党政府以及图林根的左翼社会民主党政府是极大错误；（二）如果当初组织较好，起义本来可能成功，如果继续下去，即使失败，也比在关键时刻可耻地撤退好。布兰德勒在为他的行为辩护时完全承认准备工作存在严重缺陷，但是他中肯地指出，他奉召前往莫斯科，在关键的两个月里留在那里，等待共产国际辩论应该遵循何种方针，因此，只是到了准备起义的机会已经失去的时候他才回到德国，当时面临的形势说明起义除了惨败以外，绝不可能会有任何其他结果。在他参加萨克森政府的问题上，对他的指责是他这样做时并没有逼使对方接受任何唯一能证明此举言之成理的条件。在讨论“统一战线”策略时曾频繁提到共产党参加不是完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政府”的可能性；关于“工人政府”一词的涵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诠释。季诺维也夫等人在事过境迁之后提出理由说，这样一个政府必须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范围内的单纯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严加区别。他说，这必须是一个在废除资产阶级国家基础上的政府，是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政府，是一个从一开始就驱逐任职的资产阶级公务员并以武装自卫来对付资产阶级进攻——包括他仅仅认为是资产阶级工具而蔑视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进攻——的政府。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论点，这个政府除了名称不是以外，实际上必须是一个共产党政府。显然，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左翼社会民主党政府从来也不是这样的政府：两个共产党部长参加这些政府后也并没有在任何本质方面改变它们的性质。布兰德勒的

643

回答是：当他于10月回到德国时，看来至关紧要的是加强萨克森对于帝国政府武装部队试图推翻泽格纳政府的抵抗；等到他一旦有时间估量形势，他认识到由于缺乏适当准备，共产党在德国普遍举行起义已毫无成功希望。甚至在萨克森，他也发现人们普遍相信，帝国部队进入该州并非针对社会党政府，而是针对正在准备对共和国发动政变并威胁要在前往柏林途中开进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反革命的巴伐利亚人。布兰德勒辩解说，之所以在国防军有长驱直入之虑时没有能够准备进行武装抵抗，主要就是由于存在这种信念。布兰德勒通过推论，尽管不是公开地，还间接地强烈批评了共产国际领导在它是否希望德国暴动问题上犹豫不决，以致错过行动机会。

与这场争论纠缠在一起的是另一场与德共对工会的政策有关的争论。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共产党人应该渗透到现有的工会中去并争取它们执行激烈的革命政策，这是“统一战线”策略的一部分。然而，他们这样做的企图不断导致工人被开除；而且在1923年那种极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下，还有大批缴纳不起会费的工人退出  
644 工会。共产党的左翼辩解说，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既不容许那些被开除出工会的人成立新工会，也不设法把大批失去会员资格的人组织起来。还有一个极左派认为现有的工会反动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而且这个极左派抵制“统一战线”策略，希望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到处成立新工会，并希望离间一些老资格工会的会员使之脱离所属工会，并吸收那些失去这些工会会员资格的人和甚至是被开除的人。这个极左派遭到德共新旧领导的反对，但是在1924年6月和7月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这一派人仍然产生了影响。

工会政策问题之所以在德国以特别尖锐的形式出现，原因之一在于：在1918年以前，德国工会虽然在某些工业中力量强大和组织良好，但比起英国来不仅工人分散，而且传统上一直分裂为若干

对立的意识形态集团。“自由”工会规模最大，这一部分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有密切的——虽然不是形式上的——联系；基督教工会会员主要是天主教徒，虽然不完全是天主教徒，其主要实力在“自由”工会力量较弱的鲁尔和莱茵兰；还有力量弱得多的第三部分——即所谓赫希—邓克工会，在意识形态上它们笃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大战期间，工联主义在冶金工业中有过巨大发展，而一个强大的工厂的工会代表运动也出现了并往往奉行激烈的政策，它的许多领袖与独立社会党有关系，还有不少人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为首的斯巴达克运动<sup>①</sup>有关系。在革命过程中，涌进了大批在此以前置身于工会运动之外的新会员；主要由车间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工人委员会包括许多上述的新会员，对工会的老资格领导形成了某种挑战。核心领导主要是支持战争的多数派社会党党员的“自由”工会，急急忙忙与雇主达成协议，并得到最充分的承认；同时它竭力超然于政治之外，并阻止其会员提出可能妨碍工业转入和平时期的生产的要求。这种态度使他们与左翼分子发生了矛盾，后者要求一切权力归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并力促在工业的管理中进行革命性的改革。在多数派社会党党员和大多数老资格工会领袖看来，立即推进社会主义化是不切实际的；他们敦促说，当务之急是尽速恢复生产以便使人民不断得到供应。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化问题必须暂缓处理，而留待全体人民将要选出的立宪议会来解决。

645

因此，当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立宪议会选出之前仍然是最终的权力来源——因为临时政府接受这些委员会授权——时，对于老一靠领袖们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是将委员会争取过来，防止

---

<sup>①</sup> 斯巴达克运动是德国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梅林、蔡特金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起的革命运动。他们发表署名“斯巴达克”的《政治书信》，因此又称斯巴达克派。——译注

它们受左翼控制。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出色成就；由于他们的全国范围的有效组织，使他们能够让他们的支持者大批当选为委员会委员，因此，当工人委员会举行代表大会时，多数派社会党代表和“自由”工会代表居于绝大多数，既取得了对代表大会所成立的执行委员会的控制，随后又利用该执委会作为工具把它的权力移交给了立宪议会，从而废除了自身的权力。当然这意味着断然抛弃“委员会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意味着承认各种倾向的社会党在其中都居于少数地位的共和国。这完全符合多数派社会党党员以及像卡尔·列金(1861—1921年)这样的老工会领袖的议会民主概念；但是，这不仅使“斯巴达克”共产党人，而且使左翼的工厂工会代表和独立社会党人的大多数支持者自然很不愉快。对于后者来说，即便他们并非共产党人，而且在纯粹的“委员会政府”  
646 问题上意见分歧，也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希望暂时保持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利用它们作为争取社会主义化的工具，并且在未来的政府结构中给予它们至少是某种公认的地位。尤其在柏林，还有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左翼分子在工人委员会中居于多数地位，他们强烈反对工会领袖的谨小慎微的政策。柏林的冶金工人领袖和柏林工人委员会中的杰出人物理查德·缪勒是左翼独立党人中的主要人物，他十分愿意与斯巴达克运动的成员合作，直到这些人不顾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劝告，表示支持一项使他们脱离左翼多数派的暴动政策。

由于右翼在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上及其中央委员会中的胜利，以及1918和1919年初过早的和准备不周的斯巴达克起义的失败，左翼独立党人和左翼的工厂工会代表陷入了困难境地。他们不愿意把有组织的工业运动的控制权交给列金和自由工会总委员会，或者是解散他们自己的、建立在工厂直接选举基础之上的组织。实际上，哪里老的“自由”工会势力强大和资格老，那里老一辈领袖

就自主行事并与雇主妥协。雇主之中大多数人渴望与他们打交道，以便恢复车间纪律，并避免针对私营企业和为了维持传统的劳资关系而进行的广泛罢工。但是，特别是在“自由”工会软弱无力而且大批工人第一次组织起来的地方，老一辈领袖就不可能防止完全不愿意接受老领导的训练有素的稳健做法的新工会自工人委员会中脱颖而出。于是在战前把老工会排斥在外的地方和部门出现了主要在左翼领导下的新工会，而且即使在老工会比较强大的地方，它们的领导也常常受到左翼影响下的工厂工会代表委员会的挑战。在1918年11月革命以后的头几个月，由于工人争取提高工资以跟上日益上涨的生活费用，罢工风起云涌，连绵不断。在许多这样的运动中，“自由”工会保持了或取得了控制权；但是，在有些地区，特别是在柏林、萨克森和鲁尔，左翼影响仍然强大，而且新工会或地方集团奉行的是工会总委员会无法阻止的富有战斗性的方针。 647

尽管从1918至1924年的整个时期里，在道威斯贷款的援助下取得了最后的稳定，德国仍处于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下。当然，在1923年法国进军鲁尔之前，通货膨胀远不如1923年以后那么猛烈；但是对于继续采取行动来调整工资以适应不断上升的生活费用，以及因此鼓励工会的战斗性，通货膨胀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在以下两方之间出现了大辩论：一方主张必须在已经建立的工会内部为更积极的政策进行斗争、以保持工会团结，另一方认为这些工会十分反动，以致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与之决裂并成立会奉行革命政策的对立的工会。共产国际由于企图诋毁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的声誉并逐步建立红色国际劳工联合会作为共产党控制的对立的工会，从一开始便支持后者。但是在1921年以后，迅速发生世界革命的希望趋于黯淡，共产国际转而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口号，这时共产党人留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下属的工会之中并努力把它们争取过来，就成了新政策的一

部分，而成立对立的工会的政策倒成了危险的异端邪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德国共产党人内部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一直在新工会中积极工作而反对老工会。在1923年和1924年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这种分歧表现得十分明显。1923年的共产党起义计划惨败以后，布兰德勒及其集团被赶出德共领导阶层，这时新领导中包括若干曾强烈批评“统一战线”政策的人，  
648 比如路德·费舍尔。这些领袖接管权力时正当新老会员由于鲁尔斗争造成的极端困苦而大批失去工会会籍，从而使整个运动丧失了战斗力。即使是1918年革命的唯一、最大的胜利——八小时工作日，尽管已赋予法律效力，面对着资本主义权益集团在斯特雷泽曼政府及此后几届政府中的绝对支配地位，也不得不被放弃；而在危机中购买力大为降低的工资在币制稳定之后一段时期仍然处于极低水平。

1923年12月发行租税马克一举丝毫没有解决稳定问题。由通货膨胀引起的额外发行纸币的做法已经停止，新的临时货币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暂时的基础。但是租税马克并无真正后盾，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信心魔术”，除非什么能使货币具有真正的新基础——而在当时情况下，如无外援，德国完全没有能力做到这点——，“魔术”就不可能继续变下去。这种援助唯有美国能在充分的规模上提供，它有充足的黄金供应和巨大的资本资源可用作海外投资。由美国人担任主席的道威斯赔款委员会的一个至关紧要的宗旨是铺平道路，以便向德国提供足以使它有可能在可靠的黄金储备基础上建立新币制的巨额贷款。斯特雷泽曼尽管急于与法国达成协议并制止德国经济的分崩离析，却认识到他成功的最大希望并不在于设法与法国直接打交道，而在于争取英国人和美国人插手，协助他使德国资本主义自立。如我们在前文所见，他成功地促使美国人参加了道威斯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回避了德国支付赔



款的总义务问题，而把有关此后几年内应支付款项的一项建议与另一项有关提供国际贷款、使德国人得以实施金本位币制和获得进行国际支付的直接手段的建议联系起来。在谈判初期，工党在英国上台；道威斯报告发表后不久，法国的普恩加费倒台，由爱都阿·赫里欧领导的左翼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取代。这些政治变化极有利于道威斯建议被接纳；1924年8月初，签订了道威斯协定。协定要求由协约国政府对德国财政进行很大程度的控制，并将德国铁路移交给一个须有协约国参加的特别机构；在这方面，协定条款遭到了德国的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的猛烈抨击。然而，道威斯计划却使稳定币制变得切实可行，而一旦实现了稳定，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就开始源源流入德国，以便利用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德国对资本的渴求所造成的特别有利的牟利条件。这种渴求使德国愿意给予借贷者和投资者高额利润。在包括长期和短期资金在内的外国投资的帮助下，德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得到了非常迅速的恢复，非常低的工资有助于德国制造商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战胜其对手，而充足的资本来源又使德国制造商能向顾客提供支付手段。这种复元大部分是不健全的，这既是由于公共机构为建造蔚为壮观的公共工程大肆挥霍，也是由于这种随时可以收回的钱是借来的或者投入了长期性的工程而无法动用。因此德国经济极其依赖美国源源不断提供贷款。然而暂时出现了一种高度繁荣的外观，德国资本主义摆脱了通货膨胀造成的债务以后，似乎获得了新生。

在这种状况下，随着就业人数激增，德国工人开始有可能脱离他们已堕入的深渊，并逐步使工资回升到比较可以容忍的水平。为实现这一点，老“自由”工会的地位要比它们的左翼对手有利，因为后者的力量在危机期间遭到了更严重的破坏，而“自由”工会则逐渐恢复了它们的部分力量——实际上更受政府欢迎的基督教工

会的情况也是如此。

1923年社会民主党人被赶出政府之后仍留任总统的艾伯特于1925年2月去世，于是产生了根据魏玛宪法选举一位继任者的问题。在3月份的选举中，各大政治集团都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右翼各党的候选人雅尔斯博士获得1,050万张选票；多数派社会党的奥托·布劳恩（1872—1955年）获得近800万张选票；1923和1924年曾担任总理的中央党右翼领袖威廉·马克斯获得近400万张选票；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欧内斯特·台尔曼获得200万张选票。民主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候选人分别获得150万张选票和100万张选票；最后是纳粹党提出的鲁登道夫将军只获得25万多张选票。这意味着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明确的多数，而根据宪法就必须再举行一次投票。中央党试图说服右翼各党支持马克斯，但是它们拒绝了。然而社会民主党人决定撤回布劳恩而支持马克斯，取两害相权取其轻之意——鉴于马克斯的极其反动的历史，这是一项值得注意的决定。当然天主教工会也支持马克斯，民主党人亦如此。面对着各种力量的这一联合，右翼各党撤回了雅尔斯，而提出了当时已七十八岁的兴登堡元帅代替他，巴伐利亚人民党和纳粹党同意支持兴登堡。对兴登堡和马克斯都完全反对的共产党人再次提出了台尔曼，尽管仍然遵循“统一战线”策略的共产国际试图说服他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一道支持马克斯。在4月举行的第二次选举中，兴登堡获得1,450万张选票，马克斯获得将近1,375万张选票，台尔曼再次获得200万张选票。年迈的元帅出任他从未表示过赞成的共和国的总统，结果进一步加强了国防军对文官政府的控制。前斯特雷泽曼政府财政部长、曾任埃森市市长的行政管理专家汉斯·路德博士于1925年1月继马克斯出任总理，并一直担任到1926年5月马克斯重又执政。正是在路德担任总理时，1925年10月缔结了道威斯协定的续篇——洛迦诺公约，在洛迦诺

公约正式签字以后，协约国军队随即于那年12月撤出了北莱茵兰，包括科隆在内。

道威斯报告发表以后，德国随即于1924年5月举行了一次大选；主要的竞选问题是应该接受这个报告，还是由于报告建议由外国对德国财政进行控制、有失体面而应该抵制这个报告。在这次大选中社会党一落千丈，从原来在帝国议会中的169席减少到100席；共产党获得375万张选票，获62席，纳粹党获得将近200万张选票，获32席。新的帝国议会中出现了主张接受道威斯计划的多数，但其人数还不足以通过计划所要求的宪法修正。因此于1924年12月又举行了一次大选。结果社会民主党额外获得了将近175万张选票，而共产党所获票数却减少了将近125万张，共产党的席位从62席减少到45席。在另一极端，纳粹党得票数减少了100万张以上，只获得14席；而也反对道威斯计划的国家主义党则获得50万张票。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是道威斯计划的支持者，由于国家主义党人正处在放弃他们的反对态度的过程之中，第二次选举大大加强了斯特雷泽曼的地位，并为批准道威斯计划以及外国资本源源流入此时已稳固地处于资本家和国防军共同统治之下的德国，铺平了道路。革命活动时期肯定已暂时告一段落。社会民主党人安下心来奉行在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反对活动的稳健政策；纳粹党和共产党暂时还远远没有足够的力量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

1924年选出的帝国议会一直存在到1928年5月。这时德国的恢复工作已经有了长足进展，工人阶级的条件已经大有改善。这种结果加强了社会民主党人，而严重地削弱了极右翼。与1924年12月相比，国家主义党失去了将近200万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人却增加了100万张选票，获得900万张以上。共产党也增加了大约50万张选票，获得325万张票；而纳粹党得票却还不到100万张。资产阶级政党略微有些失势；但是国家主义党人失去的席位中有许

多为分裂出来的右翼小党派所得到，在随后发生的危机中，这些小党派的大多数支持者倒向了纳粹主义。

在这种起了变化的选举形势下，社会民主党人再次与曾经支持斯特雷泽曼的“履行”条约政策的资产阶级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的确，他们在新内阁中名义上居于支配地位：他们的领袖赫尔曼·缪勒(1876—1931年)任总理，鲁道夫·希尔夫丁(1877—1942年)任财政部长，卡尔·塞弗林(1875—1952年)任内政部长经济计划工作的提倡者鲁道夫·威塞尔(生于1869年)任劳工部长。斯特雷泽曼继续担任外交部长；参加内阁的有民主党人、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以及人民党——斯特雷泽曼的党。从问题的表面看来，社会党人似乎控制着要害部门，只要他们能够与斯特雷泽曼在外交上合作，包括在赔偿问题上的合作——看来这并无严重困难，因为社会党人完全赞成斯特雷泽曼为其卓越提倡者的“履行”条约的政策。

653 尽管如此，现实却与表面现象大不相同。国防军的力量依然完好无损。以道威斯计划为依据的财政政策由协约国与沙赫特博士共同控制，他深知如何利用这种控制作为手段来巩固德国大资本家权益集团的力量。这些权益集团虽然迄今为止一直支持斯特雷泽曼，却强烈反对社会民主党重新参加政府以及斯特雷泽曼逐步建立“大联合政府”的愿望，这个联合政府将依靠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中产阶级对以私营企业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共同支持；这个权益集团没有对国家主义党人、总统和国防军头目的反共和国政策表示赞同，却对新政府、尤其是希尔夫丁表现了深恶痛绝的情绪，希尔夫丁发现他掌握在帝国银行和大金融权益集团手中几乎束手无策。再说，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可以与斯特雷泽曼在外交事务上顺利合作，而与斯特雷泽曼的人民党合作却是另一回事，该党强烈反对社会党人恢复八小时工作日、尤其是在失业保险方

面制订进步的社会法的愿望。社会民主党人发现他们提出和通过这种议案的企图遭到他们在联合政府中的伙伴的阻挠，而且实际上一事无成，尽管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工会通过成功的集体谈判，在有限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处境。在社会民主党内部，这时由前共产党人保罗·李维(1883—1930年)领导的左翼强烈反对社会民主党根据这种条件参加政府，但是他们的意见遭到否决，李维是在1921年被共产国际开除后回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党部长们就职了，即使当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无能为力时，仍然主要由于两个原因而留在政府里——他们希望与法国和解并解决赔偿问题，而且他们相信他们在最近的将来所能希望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国来对付国家主义党人、纳粹党人和军事首领形成的反革命力量。迫使兴登堡接受一名社会党总理并在选举中击败国家主义党人和纳粹党人，似乎是重大胜利；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人满足于成为共和派，他们放弃了任何可能打乱在接受道威斯计划后出现的朝不保夕的繁荣局面的行动。1929年，斯特雷泽曼自己的党——人民党要求希尔弗丁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即使在这个时候，社会民主党部长们也是眼看着他被赶下台，只不过抗议了事，他们依然留在没有希尔弗丁的政府里。

在此期间，斯特雷泽曼一直在为修改道威斯计划和争取协约国军队撤出他们仍然占领的那部分莱茵兰而积极进行谈判。他的总目标首先是确定德国的赔偿义务总额，结束外国对德国的铁路和整个财政的控制，并争取外国军队以及外国的管理部门完全撤出德国。在1929年8月的海牙会议上，他成功地使他的大部分要求为协约国所接受。由一个美国人任主席的新委员会拟订并体现了赔偿问题的最后解决草案的杨格计划于6月发表，为海牙的讨论提供了基础。在1930年1月最后通过以该计划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之前，曾出现新的障碍，但是1929年8月在海牙达成了初步协

议。

这样,斯特雷泽曼似乎巩固了他的地位;但是8月海牙会议之后,内阁在失业保险问题上发生的严重分裂随即导致了危机,斯特雷泽曼几经周折,方于10月2日通过妥协转危为安。当天晚上他得了致命的中风,随着他的去世,“大联合政府”的基础便立即消失了。海牙协定通过了,但是完全依靠斯特雷泽曼的影响才相聚在一起的繆勒内阁在帝国议会已不再能得到多数,因而被赶下了台。1930年3月,“大联合政府”因失业保险问题的争论而解体,中央党右翼领袖海因里希·布吕宁出任总理。在此之前不久,保罗·李维于2月去世,他的去世使社会民主党左翼失去了一位卓越领袖。

即使在布吕宁就任一个将社会党人排斥在外的政府的首脑之前,由于1929年秋的美国股票市场危机,德国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确实有许多人曾拒绝承认这次危机有任何深远的意义,并预言会迅速恢复景气。但是这次危机的直接后果是本来源源流入德国的美国资本嘎然而止,而且由于收回短期贷款,开始了向相反方向的资本流动。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德国的复元是美国资金大规模流入的直接结果,复元能否继续取决于能否维持这种流入。德国的金融家和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借的是“短期贷款”和借款,或者是长期的投资。因此在美国人要收回债款时,就无法偿还了。即使不存在这种情况,没有源源不断的外资,德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维持下去。随着1930年2月芝加哥小麦市场危机和5月纽约股票市场的新的、更为严重的危机和恐慌的到来,对德国经济的影响也远为严重;布吕宁发现自己面临国内崩溃的严重威胁,试图用把负担转嫁给工人的办法来应付。面对着普遍的破产和日趋严重的失业,消极接受资本家控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各种极端的党派——一方面是国家主义党人和纳粹分子,另一方

面是共产党人——迅速得势，吃亏的是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迫为共和国的日益严重的困难分担罪责。危机时期开始了，3年之后希特勒上台才告结束。

这场斗争的历史已超出了本卷所涉及的时期的范围。这里有待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的是德共在1923年10月举行拟议中的起义失败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它抛弃了领导阶层中的布兰德勒并接受一批新领导人——柏林的马斯洛夫和路德·费舍尔以及汉堡的欧内斯特·台尔曼。这些新领袖属于左翼，而左翼曾热衷于批评布兰德勒和拉狄克对于“统一战线”政策的解释，反对共产党参加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左翼社会党政府，而且其中大部分人还反对在已经存在的“自由”工会内工作而不去促进对立的运动。因此，虽然在1923年10月以后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已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新领导仍然认为自己有责任奉行符合当前形势的最极端的政策。最意味深长地体现了“统一战线”的1923年8月的大罢工，是库诺政府倒台和促使共产党人把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斯特雷泽曼“大联合政府”一举，最激烈地斥之为对工人阶级的背叛的直接原因。面对这种形势以及左翼社会党人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倒台，不可能再有以与社会民主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概念。共产党人投入了激烈谴责社会民主党人的运动——对普通党员和领导人一律加以谴责。主要受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会在1923—1924年的经济逆境中丧失了一半会员，这个事实也影响了共产党在这个领域的政策，因为看来，争取遭到严重削弱的“自由”工会就不如在工厂中逐步建立与之对抗的新的革命运动来得重要了。结果使得共产党在“自由”工会中的影响下降，而且使得共产党人在反对“自由”工会提名候选人的斗争中企图力争直接选进合法组成的工厂委员会。

德共政策的这种向左转发生在1923至1925年，此后就出现了

大幅度的逆转。1925年年中，艾伯特去世，兴登堡当选为总统；在总统选举中，共产党成绩极差。这时已经有必要承认新的共产政策效果不好，于是不论在德国还是莫斯科都把责任归咎于马斯洛夫和路德·费舍尔，他们立即被赶下了台，而由台尔曼主持工作。这时，在俄国，斯大林已经赢得了对托洛茨基斗争的胜利，但是还没有与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决裂，而缓和一下西方各共产党的革命主义则是符合俄国的愿望的。因此，德国党在台尔曼领导下特别是在工会事务中明确地向右转，重整旗鼓，到经过1923—1924年的灾难后正迅速复元的“自由”工会中去打地盘。在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中，共产党人推荐的工会候选人为工会采纳，并在工会的赞助下当选，而不是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去竞选；在社会党人再次成为右翼资产阶级内阁的反对派的情况下，共产党才有了拉拢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可能。在1925至1928年的经济复元时期，德共奉行一种与当时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协调的、肯定是不革命的方针。

然后在1928年，政策进一步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在那年大选中取得良好效果的社会民主党人<sup>①</sup>又参加了斯特雷泽曼的新的“大联合政府”，从而再次成为公开的“社会叛徒”；同时，斯大林在清算季诺维也夫之后，在俄国发动了新的向左转的运动，具体形式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消灭富农和仓促地实现农业集体化。德国共产党人尽管比社会民主党人得票少得多，在大选中的得票也大为增加，因而在鼓舞之下相信国家主义和纳粹主义已一蹶不振。说也奇怪，此时德国共产党右翼——老的布兰德勒集团——在党中央委员会中赢得了多数，把台尔曼赶下了台。但是德共右翼的胜利是短命的：奉莫斯科的命令，右翼分子立即被撤换，台尔曼再次被安置在一个准备执行共产国际的急剧向左转的命令的

<sup>①</sup> 见本书第651页。



委员会之首。从此以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就卷进了最后导致1933年希特勒胜利的斗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再次成为头号敌人：“自由”工会再次成了应该与之斗争的、工人事业的叛徒。在这些年代里，共产党人始终坚决不肯认真对待纳粹的危险，甚至在某些场合还与纳粹联合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比如1931年企图换掉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那次公民投票。

1930年3月缪勒的帝国政府倒台后，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中成了反对派，可是仍然保持着对普鲁士和其它某些州的州政府的控制，因此仍然是国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928年，共产党人已经与普鲁士政府——奥托·布劳恩和卡尔·塞弗林（1875—1952年）是其中卓越人物——形成尖锐对立，起因是一年一度的柏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按照习惯，这种游行一向是所有工人阶级团体联合举行的。1928年共产党人决定单独举行示威游行；普鲁士政府由于担心发生严重骚乱，便禁止一切示威游行。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工会服从禁令，但是共产党人却决心违抗禁令。警察首脑、一个名叫佐基埃倍尔的社会民主党人命令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有多人死亡。在纽科林的工人阶级居住区筑起了街垒，坚持了两天。共产党人发出了举行总罢工的号召，但是无人响应。于是他们亲自出马，加倍谴责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而且如我们在前文所见，随后还与纳粹联合起来，企图推翻它。但是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尽管权力日趋衰落，却一直执政到1932年冯·巴本取代他们，才毫无抵抗地下台。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1928年的选举中取得胜利之后参加帝国“大联合政府”是否正确问题，意见必然存在分歧。当时，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已经民怨沸腾；但是美国资本仍在源源流入，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出现的最佳情况是共和国通过外资不断流入而得到巩固，尽管共和国有其种种缺点。斯特雷泽曼的

去世以及使这种资金供应中断的美国大萧条的开始，使局势完全改观；事后回想起来，当初缪勒内阁倘若立即辞职，而不是等到几个月以后被推翻，情况显然会较好。事后还回想起来，在布吕宁出任普鲁士总理之后，社会民主党人在普鲁士继续担任官职似乎是一种错误；因为这使他们势必要参与他的措施，并且促使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普遍不得人心，而且随着形势每况愈下，驱使它的许多支持者背弃它——有些转向共产主义，但是更多的人则转向了纳粹主义。鉴于美国（经济）的崩溃，当时要团结工人阶级进行最后斗争来反对纳粹主义，也许已经为时太晚：至少不论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从他们的大不相同的立场出发，进行过任何这样的尝试。德国革命从未从继它的初步成就之后接踵而来的失败中复元。甚至从1919年的头几个月开始，它就一直在几乎不断地退却，因为从未出现过德国工人阶级统一起来进行革命、或者哪怕是捍卫革命的局面。根据人们的情趣，要谴责社会民主党人或共产党人是不难的：谴责社会民主党人依靠诺斯克和“自由军团”来镇压左翼，从而背叛了革命，并责备他们听任旧官僚机构掌权和听任国防军随便重新显示其力量；要不然就是谴责共产党人一再分裂工人阶级运动，一味追求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作为牢固基础的、想象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我而言，我谴责两者，我认为麻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当时党显然没有正视反对旧的容克-军国主义旧秩序而夺取政权的含意，而情愿靠回避实际问题过日子，把革命辞藻与改良主义的作法融而为一，从来不曾打算回答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努力中所牵涉的问题。大体说来，这种回避实际问题的作法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进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各政党所共有的；但由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最强大的运动——实际上是其它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主要效法的楷模，这种作法就是最大的灾难。

德国人民在这件事中更是苦难深重。可是即使到了今天也很少有迹象说明已经吸取了教训。

不论可能有什么其他疑问，在魏玛共和国存在的最后几年中德国共产党人奉行的政策祸患无穷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即便在这些年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大有可以批评和谴责之处，共产党人与纳粹党徒携起手来对付他们，也是罪恶的、愚蠢的。可以提出理由说，主要罪责不在按共产国际的命令行事的、对德国形势几乎毫不考虑的德共，而在于驱使他们这样做的斯大林。不过这个借

660

口失之牵强，因为德国人没有权利对斯大林如此言听计从。其实整个事件是由于共产国际完全控制了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以及斯大林本人完全控制了共产国际——而产生的祸患无穷的错误的

一个突出例子。这种情况使任何西方的共产党都不可能有干练的领导，因为任何领袖只要表现有任何独立判断的才能，就立即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被清除。台尔曼之所以被接受为领袖完全是由于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这样的才能，只不过是一个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的傀儡。唯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斯大林坚决奉行不仅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对苏联也祸患无穷的政策，动机何在。共产党人最经常地提出的解释是：纳粹主义绝不是真正的危险，它如果破坏魏玛共和国获得成功，只不过将为共产党的胜利铺平道路。纳粹主义没有被当作一回事，只不过被看作是德国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中的孤注一掷，而且没有能力建立任何不会由于内部矛盾而迅速崩溃的政权。如事态所显示，这种观点极易使人误解。如果不依靠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纳粹主义确实不可能持久存在；但是这也不能保证，倘若纳粹主义引起战争并且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它就不会在长时期内把它的纪律强加于被征服者，就不会长期破坏社会党或共产党取得成功的一切希望。即令当初有可能预言它在战争中终将失败——拙见以为不可能作此预言——，要假定斯大

林当真有意先让纳粹在德国取得胜利，以便促成导致纳粹覆灭的世界大战，那也未免过分。显然他不可能打这样的算盘。

那么，斯大林打的是什么算盘呢？他似乎相信一个历史发展的总“图解”，根据这个图解，革命和反革命形势交替出现；而且似乎认为这样一点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每当革命形势似乎临近时，不管可能来临的革命的性  
661 质如何，共产党人的任务是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加速革命的到来，并相应地支持革命的力量，即令它们的宗旨与共产主义的宗旨针锋相对。根据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下一次革命将是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被看作一条规律，任何其他可能性都不予考虑，无产阶级被设想为唯一值得考虑的革命力量。因此，根据假设，任何削弱现存秩序的运动都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值得共产党支持。这可能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错觉：斯大林与他之前的列宁一样，首先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为了革命起见，本能地倾向于同情革命。但无论如何，对于德共在1930—1931年支持纳粹党人，斯大林应负的责任是无可争辩的；甚至可以论证这样一点：由于他下令给予这种支持，使得希特勒取得了政权，从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倒不是因为他预见到或策划了这些事情，而是因为他那武断的历史图解使他致命地走入歧途。毫无疑问，即令德国工人联合起来反对纳粹党人，纳粹党人当初也可能取得政权；可以肯定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分裂以及德共在关键阶段给予纳粹党人的支持，把胜利拱手让给了希特勒。

在本章结尾时，如果有人问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在1918至1933年它衰落的这段时期内对社会主义思想有何贡献，答案必须是：它几乎毫无贡献。1918年时，它的右翼和左翼领袖都一样，全然提不出任何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的真正概念。当然，在极左翼有些人认为得救之道在于在一切可能的方面效法俄国的榜样，他们时而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时而又要求由新成立的共

产党专政。也有些革命家，首先是罗莎·卢森堡，认为单纯的“盲动主义”是愚蠢的，而且早在1918年就已经担心俄国革命会堕落成为破坏工人的创造力并导致个人或党的核心小组专政的党的专政。另一方面还有像考茨基这样的人，他们不仅厌恶任何形式的专政，而且实际上还提出理由说：俄国革命根本不应该发生，或者至少在如此落后的一个国家应该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然而，几乎不可能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任何创造性贡献。关于德国社会党在1918年面临的问题，几乎丝毫没有考虑过，在随后的几年中，考虑也很少。 662

可见，社会党人在他们获得最初胜利的时刻，即使对于他们责无旁贷地要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帝国废墟上建立的新社会的基本组织，似乎也很少有概念。组成临时政府的6个人——多数派社会党人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兰兹伯格以及独立党的哈阿兹、累德堡和埃米尔·巴特——中谁都从来不是理论家，而且由于他们最初采取的行动是让非社会党人领导各部，并任命两位社会党人——每一派一位——参加每届内阁以便密切注视部长，却又没有明确的权力，因此他们的临时政府活脱是为应付十万火急的情况而临时拼凑成的东西。然而这却产生了严重后果，因为这使旧公务员得以在新部长领导下留用，从而把旧社会的行政传统带进了新社会。这显然是艾伯特至少希望做的事情；但是独立社会党的部长们看来是提不出任何代替的计划的，尽管累德堡和巴特曾经希望把权力至少暂时保留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手中，并且看到了把权力留在旧秩序的支持者手中的危险。让旧法官和法院存在，从而延续旧帝国司法传统的危险似乎也没有得到认真考虑。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选出和召开应该为新秩序提供正式宪法的立宪议会问题上；唯有“委员会政府”的彻底提倡者提出怀疑：作为符合民主原则的唯一方式，按照议会的方针，是否应该通过普选选出这

663 个议会。多数派社会党人与独立党人之间的争执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样一个议会问题，而在于选举的时机以及在议会举行会议之前作为工人和工兵委员会的产物的政府有权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这方面的大问题是土地改革问题。是应该立即以革命的名义剥夺易北河以东大地主的土地，并把他们的土地变为公有财产或移交给农民，还是应该把整个问题留待立宪议会去作出它认为合适的决定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哪怕暂时把土地留在地主手里，政府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他们得以采取步骤来逐步建立反对新秩序的力量的基础——比方说，在他们的庄园上为很快便给革命带来这么多困难的“自由军团”提供庇护。

议会民主制度的维护者多数派社会党人切望尽速使立宪议会行动起来，并决心把一切有可能留待它决定的问题留待它去作出决定。这附带也给了他们击败独立党人和整个左翼的最好机会，因为他们拥有优越得多的选举组织，而他们的对手则不会再有时间逐步建立一个有效的分庭抗礼的运动。但是如果立即举行选举，也必然会有社会党人——所有集团汇合在一起——无法取得多数的危险；而如我们所见，情况正是如此，因此制定新宪法的任务和决定新社会将依据的基本原则的任务便交给了一个显然不会着手去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的机构。事实上，起草新宪法的任务一开始便落在非社会主义者普鲁斯教授身上；而多数派社会党人在其中占支配地位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则赶紧把权力让给了立宪议会，从而使立宪议会得以掌握全权。对于它的权力，除了在任何条件都不抵制共和国的右翼极端分子和在最初几个月的混乱中轻易地被排斥的共产党人以外，没有任何人表示怀疑。说得客气一点，多数派社会党人并非直接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他们的目标只不过是他们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合法道路的议会民主制度；在这个问题上，独立党人四分五裂，无法提出

664

一个意见一致的代替办法，尽管他们曾经设法使立宪议会迟迟不能产生，并且抢在它开会之前以革命和体现革命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了某些至关重要的决定。

与土地改革同时存在的大问题是工业的社会主义化问题。资本家的财产，或者哪怕是其中的主要部分，是不是立即转归公有和接受公共控制呢？在这个问题上，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多数派社会党人和许多独立党人都反对打乱工业企业的基础，赞成把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并赞成在这期间设法恢复现有公司的生产，同时往往还补充说，必须作出某种安排让工人参加管理。人们普遍担心社会主义化的任何企图会进一步使生产脱节，并使现在的混乱有增无减；还有人担心协约国政府会否决社会主义化，或以此作为借口来没收社会主义化的财产充作赔偿。就多数派社会党人而论，他们还主张把这种问题留待立宪议会去解决，而在工会领袖之中，许多人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化，而是像卡尔·列金在战前提倡的那样<sup>①</sup>，赞成某种形式的“共同决定”。结果德国工业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管理下复苏，而留待立宪议会去考虑的是：如果要社会主义化，则应该社会主义化到什么程度，以及在满足工人参加管理的要求方面，如果要有所行动，则应该做些什么。

因此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当在魏玛起草宪法时，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化委员会，探讨公营企业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关系这个总问题，鲁道夫·威塞尔以社会民主党提倡计划经济的主要人士姿态出现，于1919年5月向立宪议会提出了他的主要建议。但是当时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威塞尔无法使议会接受他的建议，不久便被迫辞职；社会主义化委员会一无成就，只不过提出了一系列宣言性的建议，而在变成积极的法律——从未成为事实——之前，

---

<sup>①</sup> 见第3卷上册第312页。

这些建议并不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唯一的结果只不过是建立了1919年3月便已许诺的工厂委员会的法定制度；但是授予这些机构的权力受到了审慎的限制，以便防止它们具有政治性质或者进行任何真正的经营管理。它们的主要职能涉及像工作福利这样的问题，虽然它们也给予工人一定程度的保护，使他们免遭任意的解雇。它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改变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根本关系，或者建立任何形式的共同管理制度——更不用说实施任何种类的社会主义化。其实，德国社会党人完全不准备解决社会主义化问题，他们总是拒不讨论这个问题，把它当作在“革命之后”才会发生、在革命到来之前无需讨论的事。战前制定的唯一方案是列金关于雇主与受雇者共同管理<sup>①</sup>的设想，而一旦雇主们从1918年事件使他们陷入的惊愕中清醒过来，他们就会把这些方案抛到一旁了。如革命前一样，铁路仍然是社会主义化的；管理仍然基本上与以前一样，只不过工会的谈判此刻得到了承认，并且开始进行一定程度的共同磋商。没有任何主要行业——就连煤矿也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化；看来多数派社会党人甚至也没有为此感到遗憾。德国资本主义得以保持原状，而且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危险一旦消逝，它们又能够显示其力量了。魏玛共和国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从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归于立宪议会的时刻起，情况就必然会演变到这一步。

在此后的一些年里，尽管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还有左右两翼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继续进行激烈争论，却没有任何人对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任何重大贡献。共产党人为适应共产国际不断改变的要求十分繁忙，无暇进行任何有创见的独立思考，尽管他们之间一直无休止地辩论革命的策略以及诸如“统一战线”的正确

---

<sup>①</sup> 即本书第564页所说“共同决定”。——译注



解释这样的问题。社会民主党人也几乎是一味忙于辩论诸如策略、民主原则的要求以及共产党未来的独裁者的邪恶等问题。由于他们始终处于守势，他们感到没有必要详细阐述他们认为毫无希望实现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诚然，他们的主要财政专家希尔弗丁确实认真考虑过民主的赋税制度问题，威塞尔也曾企图设计过以国家控制而不是以普遍社会主义化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某些要点；但是除了这两位以外，新的贡献是非常少的。在1918年以后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战前时期伟大的修正主义争论、或与希尔弗丁1910年发表的著作《金融资本》、或与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1913年)相提并论的，尽管后一部著作回答她的批评者的第二卷到1919年才出版，而由保罗·李维编辑的她的重要小册子《俄国革命》到1922年才出版。战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出现任何新的理论家，它的理论斗争过多地在俄国的保护下进行，以致产生不了它自己的有创见的思想。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届工党政府(1926—1931年)

#### 下台前的英国

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失败后,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工会在得以重建它的已耗尽的基金和把因经济崩溃而脱离工会的会员争取回来之前,一直处于纯粹防御的地位。然而政治上的劳工运动并未经历类似的衰落,倒反而由于工人对于改善失业救济金条件的日益增长的要求而受益。在1924年工党政府下台后,失业救济金条件恶化,因为按照规定,那些据说“不真心诚意找工作”的人不得领取救济金,而且领取“不受契约约束的”救济金的期限也缩短了。在1927至1929年这段时期内,世界贸易和就业状况普遍有所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似乎不那么风雨飘摇;但是在英国,主要由于保守党政府犯了错误,按战前美元的汇兑比价恢复了金本位,因而在主要受其影响的“萧条区”失业率仍然很高,社会不满情绪也迅速增长。因此,在1919年的大选中,工党处境大为改善,获得了289席,而1924年只获得151席。这使它比获得260席的保守党遥遥领先,但是如果把自由党的57席也计算在内,它与其对手相比仍处于少数派地位。因此工党再一次面临着在自己没有取得多数的情况下必须决定是否执政的局面,尽管这时它的地位比1924年更加巩固。它的领袖毫不犹豫地决定组织政府;拉姆齐·麦克唐纳在没有与自由党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出任首相,但是双方谅解:如果他的政府把它的政策限制在不攻击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的范围内,自由党人可以给

予他足以维持政权的支持。与自由党人的默契排除了采取任何重要的国有化——哪怕是煤矿的国有化——措施的可能性，但是这个默契与旨在通过扩大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的措施，以及旨在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通过协议逐步裁减军备的国际政策，特别是通过“关税休战”使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国际政策，似乎完全一致。以下几个领域的主要任务落在了外交大臣阿瑟·汉德逊和贸易大臣威廉·格雷厄姆(1887—1932年)身上，因为麦克唐纳没有像他在1924年那样身兼首相和外交大臣二职。在国内方面，情况似乎是顺利的，因为以劳合-乔治为首、主要受经济学家J. M. 凯恩斯(1883—1946年)鼓舞的一部分自由党人在自由党工业调查报告《英国工业的未来》(1928年)和选举中出版的一些小册子——比方说凯恩斯和H. D. 汉德逊所著《我们能够征服失业》——中推出了一个有关国家控制和增加就业的积极行动的广泛纲领，这个纲领至少与工党本身作为它的选举宣传的一部分发表《如何征服失业》(本书作者所著)之前提出的任何纲领同样先进。自由党人并非一致支持劳合-乔治与凯恩斯共同提出的建议；但是似可合理地假定：劳合-乔治集团至少愿意暂时让工党执政，因为他们设想工党会有所作为来贯彻它所宣扬的关于失业问题的政策。

当第二届工党政府于1929年6月开始执政时，世界经济前景对于在这个领域和在国际事务方面采取行动都似乎是有利的。但是它才开始执政，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就发出警告：经济战线的一切并不很妙，而到了1930年年中，世界经济危机显然已颇为严重。根据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解决德国赔偿问题已经证明行不通，修改计划分明已经势在必行。然而严重得多的是，自从采纳道威斯计划以来一直在源源不断涌入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美国资本洪流突然枯竭。这种收回资本的举动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的经济复元依赖美国金钱的流入，没有美国金钱，不仅德国人无力支付赔

款，欧洲的整个信贷结构也有迅速崩溃的危险。然而不可能阻止美国人在他们寻求“流动性”的过程中把他们的资本留在国内，甚至也不可能阻止他们尽量收回他们在欧洲的贷款和投资；许多欧洲的贷方发现，他们用短期贷款方式从美国借来的钱投资于长期才能见效的企业之后无法变成现金了。美国经济崩溃的全部后果经过几个阶段方才明朗化。起初有许多人希望股票市场崩溃之后会迅速复元，希望美国人会以足够的规模恢复贷款，以便使欧洲经济避免灾难。但是，人们很快就清楚地看到美国经济中的不平衡力量非常强大——尤其是农业方面相对购买力的低落——，并看到美国人正束手无策地陷入资本主义所曾经历过的最严重的萧条，并使西欧和中欧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与他们一道遭殃。

经济前景黯淡这一点是在工党政府执政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明朗化的。但是在1930年时，失业人数已在迅速增加；政府改善了发放救济金的条件之后使维持这些条件的费用增加得更快了。同时，萧条的蔓延对英国的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除了美国市场趋于衰落之外，每个国家随着困难的增加，都使用减少进口的办法以期改善它的收支平衡状况。此外，随着各国的进口市场一个接一个地丧失，每个出口地区都千方百计地寻找代替的市场；英国  
670 作为自由贸易制度下仍然开放的主要国家，是倾销在别的地方销不掉的剩余货物的明显选择。这严重影响了英国的已经被美国危机打乱的收支平衡，而根据正统财政学的传统方案，正确的补救办法是紧缩通货，以降低英国的物价和鼓励外资流入。不幸的是，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顿像最反动的银行家一样在他的金融问题看法上是完全正统的，而且还利用他的全部影响和固执劲儿——这两者他都非常突出——来阻止政府花费它可以避免花费的钱。这意味着他们认为扩大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人数——并从而提高购买力——的建议代价太高而不予考虑；还意味着因为直

接开支较少，他们认为强制越来越多的失业者，而供养他们赋闲，要比安排他们进行有效劳动可取。政府由于无法制订任何应付失业的有条理的方案，最初便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右翼铁路工人领袖 J. H. 托马斯（1874—1940年）——几乎是最坏的选择——去解决，后来又派一些人与他共事，如乔治·兰斯伯里和苏格兰事务部次官托马斯·约翰逊（生于1882年），还有曾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的保守党转党分子奥斯瓦尔德·摩斯莱（生于1896年）。这几个人之间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即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也不可能动摇斯诺顿奉行他在财政上的正统方针的决心。

到1930年年中政府执政已一年时，登记的失业人数从1929年6月的9.6%增加到15.4%，到1930年年底时，失业人数已多达250万人。在此期间，摩斯莱率先要求执行旨在增加就业人数的更大胆的政策，由于未能说服托马斯，便将他的建议写成备忘录——“摩斯莱备忘录”，在兰斯伯里和约翰逊同意下提交内阁。内阁拒绝采纳，摩斯莱随即辞去政府职务。10月，这个问题提交给工党代表会议，摩斯莱在会上攻击政府并为他的政策辩护，最后只不过以1,251,000票对1,046,000票的微弱少数被否决——这是在全国各地的工党支持者中间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明显迹象。摩斯莱继续他的运动，1931年2月发表一本名为《一项国策》的小册子阐述他的建议，支持他的人之中包括约翰·斯特拉契（生于1901年）和安努林·比万（生于1897年）这样一些著名的左翼人士。过了不久，由于未能取得议员主体的支持，摩斯莱脱离了工党，成立了一个名为“新党”的党，该党不久之后便发展成了英国法西斯主义的初期组织。只有四名工党议员——其中一名是他的妻子——追随他进了新党，其中约翰·斯特拉契几乎立即就辞职了。其他曾经支持摩斯莱备忘录的人——包括比万——拒绝与这个新的举动发生任何瓜葛。毫无疑问，摩斯莱曾期望有许多的追随者：他毫不理解使所

有不论其对工党政策多么挑剔的社会主义者与工党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忠诚情绪。他本人对工人的事业也没有任何忠诚可言。在此期间，政府接二连三地陷入困境。1930年10月宣布的、它提交新议会的立法纲领只字不提失业问题，因为除了硬撑下去并希望交好运之外，它对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并无丝毫概念。

然而此后情况并无好转，而是越来越迅速地恶化。在自由党的压力下，政府甚至采取了以异常法案来削减赡养失业者的费用的做法，这个法案把大批失业者、尤其是已婚妇女排除在有权领取救济金的工人行列之外。政府还任命了一个由政治上的反对派控制的特别委员会——五月经济委员会，就减少公共开支的方法提出报告。该委员会及时地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报告，由于该报告把形势描绘得甚至比实际情况还要坏，结果促成了外国对英镑的挤兑，使得政府不依靠外国的大笔贷款协助，便完全不可能维持英镑的币值。事实上从美国和法国的中央银行获得了巨额贷款，但是由于对英镑的不信任情绪日益增长，这笔钱渐渐花光了，于是  
672 又需要进一步的贷款，但是并无保证这次的贷款不会像以前那样迅即化为乌有。这时，英格兰银行的反动总裁蒙塔古·诺曼似乎利用了他与美国的关系促使他们为今后的任何贷款提出附加条件。至少斯诺顿是这样通知他的内阁同事的。工党大臣们面临这样一种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削减失业救济金并采取其它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厉行节约的措施，要不然就只有取消斯诺顿所狂热地热衷的金本位。

看来很明显，大多数工党大臣此刻处于极其困惑的状态。他们不懂国际金融，而且他们还错误地推定斯诺顿是懂的。麦克唐纳与其余的人一样困惑。过去有很长一段时期他一直主持经济咨询委员会，在委员会中不仅托马斯和其他大臣是委员，凯恩斯也是委员，但是斯诺顿不是委员。委员会接二连三地辩论了一些应付局

势的权宜办法，尤其是凯恩斯力促实行财政关税，以减少进口，为国库增加收入；但是麦克唐纳拒不容许作出任何结论，其实是斯诺顿在幕后拒绝采取除了一再紧缩通货之外的任何其他方针。

最后的危机终于来到了。麦克唐纳要求他的内阁同意大刀阔斧地紧缩开支而牺牲失业者的利益；当大多数内阁成员退缩时，他宣布政府辞职，并以新的“国民”政府首相身份重新出现，该政府主要由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组成，还有少数同意追随他们的主要工党人士——其中有斯诺顿和托马斯，他们就这样与麦克唐纳一道脱离了他们效劳了大半生的劳工运动。新政府宣称自己是为“拯救英镑”而执政，但是它的几乎第一个行动就是取消在此之前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金本位。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它并无选择余地，因为形势太坏，已无法按官定汇兑比值维持英镑的币值。但是它接着便开始实行的是使一个世纪以来的整个财政政策彻底改变的保 673  
保护关税制，而不是实行凯恩斯所要求的财政关税。

1931年工党政府的下台甚至比7年前它的前任的下台更不光彩，因为这是该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处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而使英国所处的整个局势的结果。众所公认，这种局势十分困难：英国不能通过任何手段幸免于世界危机的反响造成的影响。政府政策的缺陷在于它听凭形势每况愈下，不作任何努力来执行凯恩斯的政策或者执行它自己早先答应要执行的政策。出现这种情况并非由于大多数工党大臣个人无能，不能胜任本部门工作，而是由于他们不懂财政问题，尤其是由于麦克唐纳从来没有能够拿定主意，而是听任斯诺顿去否决一切本来可能有助于改善情况的措施。内阁中与这两个人物同样是最重要的汉德逊在紧急时期一心扑在外交事务上——首先是裁减军备筹备会议和为缓和国际紧张形势而作的其它努力，他在危机最后阶段与拒绝接受拟议中的牺牲工人阶级利益的“节约”措施的人联合起来之前，是很少参加国内事务的讨

论的。

事实上，在决定性的决裂到来之前许久，麦克唐纳就一直越来越脱离他的大多数同事。他一直与“上流社会”人士过从甚密，享受他的职务所给予他的很高的社会地位，只与寥寥无几的内阁同事往来，还往往明显地不理会和怠慢其余的人——包括汉德逊和兰斯伯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甚至不再是他以前曾经是的那种非常右翼的社会主义者；他轻易地相信自己在民族危机的时刻是不可或缺的领袖——尽管他对于他希望把民族引向何处毫无概念。大战期间由于他态度暧昧，而且多亏资产阶级报纸对他进行了恶毒攻击，他获得了完全不该得到的、更接近于左派而非右派的名声；由于这个缘故，克莱德河畔派宁可恢复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不要诚实而缺乏想象力的J·R·克莱恩斯。从此以后他一再显示他十分同情党的极右翼；但是在1929年之前，他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是某种社会主义者；他的公开言论含糊其词，模棱两可，这有助于掩盖他背离哪怕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程度。他在1931年的行动终于暴露了他的真面目：此后一些年内他得以在保守党占优势的政府内担任有名无实的首脑，但是他已无足轻重，他实质上本来就是无足轻重的人物。

麦克唐纳的同事中只有少数人追随他支持“国民”政府。升到子爵爵位的斯诺顿在紧接危机之后举行的大选中对他以前的同事极其刻毒，但是迅即与新班子发生了争执，并辞去“国民”政府中的职务以抗议政府的关税政策。在大多数方面，就社会主义者的素质而言，斯诺顿要比麦克唐纳在一生任何时候够资格得多；但是他基本上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把他对自由贸易和金融的正统观念的热衷与他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这些信念使他全然不可能接受任何非正统的应急方法，而且随着情况不断恶化，与麦克唐纳的犹



豫不决一样，使他成了主要障碍。此外，他自以为是最正直的人，他完全不可能相信他所做的或者没有做的事情有任何并非绝对正确的地方。辞职以后，他干脆从政坛上消失。他撰写了一部自传，在这部自传中，他把最大限度的罪责推给其他每个人，但是坚决声称自己一贯正确。至于J·H·托马斯，他从未自封为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位干练的工会领袖，精通代表铁路工人为工资和劳动条件进行谈判之道，但是完全不同情他们的更广泛的目标——对国有化无动于衷，对他们要求参加对铁路营运的管理则是非常敌对。在工党政府执政期间，他比大多数人更为密切地与麦克唐纳合作，是最初提倡以关税来限制进口的人之一。如后来发生的事情所显示，675他最缺乏的是通常的诚实意图。

在危机之后于1931年秋举行的大选中，工党由于失去了它最著名的领袖和未能采取有效行动而声誉扫地，结果遭到惨败而下台。它的议席从289席减少到46席，其中不包括没有依靠党的正式赞助当选的6席。这6席包括3名没有得到正式支持就竞选的独立工党议员——其中有詹姆斯·马克斯頓（1885—1946年）——，以及另外3名议员，其中两名与独立工党有密切关系。在工党执政期间，独立工党对它越来越不耐烦，工党执委会表示除非独立工党候选人接受党的全部纪律，否则不予赞助。在举行选举时，独立工党在脱离工党的路途上已经走了大半路程，翌年它终于离开了工党，使自己沦为介于工党与共产党之间、无法发挥任何有效影响的孤立境地。

大选使其余的大部分工党领袖丧失了了在议会中的席位。在下台的内阁的成员中唯有乔治·兰斯伯里当选，并被选为议会领袖，这倒不是因为他希望担任这个职务，而是由于没有其它人选。克莱门特·艾德礼（生于1883年）成了他的第二把手，后来接管了领导权，因为面对日益发展的战争形势，兰斯伯里的非战主义导致了他

在1935年的辞职。1931年落选的汉德逊于1933年才回到议会，此刻他已经是奄奄一息的人了。他并未恢复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是在精力容许时，继续致力于他作为时乖命蹇的裁减军备会议的主席的工作，虽然到了这个时候，成功的一切希望已经由于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而破灭。1935年，他疲惫不堪地去世了。在大多数问题上，他始终站在党的右翼，他根据自己的见解忠诚地为党服务；并且是战后年代党的命运的主要设计者。他再三作出最大努力使党团结，消除分歧。大战期间，主要由于他的努力，才没有把反战的独立工党开除出工党；尽管他具有强烈的稳健的信念，却一再支持对党内分歧采取容忍态度。与他的许多老一代的工联主义者同伴一样，汉德逊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是一位自由党人，在他早年支持劳工代表制委员会时还保持了他的许多自由主义观点。在他于1917年与悉尼·韦伯携手在渐进社会主义基础上重建工党之前，他几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1917年以后，他始终坚定地站在渐进主义者一边。汉德逊缺乏个人的吸引力，也绝不是一个演说家，虽然在情况需要时他也可以发表出色的有推理的演说。有时候他发脾气，态度粗暴，但是他绝无恶意，而且对劳工事业极其忠诚。令人陶醉的“上流社会”对他并无吸引力，他也没有挥霍的爱好，不致于走入歧途。他缺乏富于想象的洞察力，尽管如此，他是一个完全可靠的领袖，可以永远信赖他做出最大努力而毫不顾惜自己。

随着1931年的大崩溃，第一代英国工党领袖不光彩地退出了战斗。基尔·哈迪由于战争使他灰心丧气，早在1915年便已销声匿迹；但是在1931年之前，战前领袖中的其余的人——麦克唐纳、斯诺顿、汉德逊、托马特——仍继续控制着党。在1931年以后，在汉德逊几乎失去战斗力的情况下，剩下的只有乔治·兰斯伯里以及约维特、克莱恩斯和另外几个暂时没有选进议会的人。年轻的一

代——其主要发言人包括克莱门特·艾德礼、赫伯特·摩里逊(生于1888年)和休·达尔顿(生于1887年)——就要崭露头角。他们在工党失败后分阶段缓慢重建党的工作中遭遇如何,这已经不属于本卷叙述的范围了。我们暂时就写到工党处于战前以来历次选举中最不走运的时刻,写到由于它的最受普遍欢迎的领袖在既不为他们自己也不为那些在党最困难的时刻始终忠诚于党的人增光的环境下背叛,它的威信遭到严重损害。众所公认,1929—1931年的工党政府不幸不得不面对需要采取新的和冒险的解决办法的非常困难的形势。众所公认,由于缺乏议会多数,它无法提出有任何通过希望的建设性的社会主义议案。然而它毫无理由在处理失业问题时优柔寡断,因为在那个领域,当初倘若工党曾坚决地致力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它会有把握得到足够的自由党支持使它得以使下院通过其提案,并使它深信下院也不敢否决这些提案。明显的事实是它缺乏决心,不敢尝试就连比较进步的自由党人也一直在竭力主张的事情,而是听凭自己束手无策地被卷进灾难。然而工党成立伊始便宣称国家有责任将就业维持在令人满意的水平:“工作的权利”是社会主义者的口号中最古老、最持久的一个口号。尽管如此,工党政府竟听凭自己受骗,以致相信赡养数以百万计的无所事事的人要比安排他们工作、让他们生产人民需要的有用的东西来得经济。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深处有一种信念,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造成失业,而且容易一再发生危机和萧条,因此不改变制度——这一点显然他们目前还无能为力——就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作为。他们与他们的政治对手一样未能理解凯恩斯对他们所说的增加就业的作用:由于保持了购买力,增加就业之后会进一步再增加就业机会。他们也丝毫不理解凯恩斯理论的更广泛的涵义以及这些理论对于指明走向经济稳定的道路的重要性,这种稳定会给予资本主义以新生,条件是它要接受一项服

677

从公共规划和控制的措施。如果当初他们理解了凯恩斯的理论，他们大多数人就不会以它将使资本主义更加强大为理由抵制他的意见了；因为他们本人就希望资本主义存在下去，直到他们准备取代它。他们简直没有理解“新经济”——1931年时这个理论仍然只不过阐述了一半，只是到了罗斯福将其中部分理论付诸新政时期的高度试验性的实践时才开始为人们所普遍理解。也许不应该在这方面过分严厉地评价工党，因为不理解新经济理论的情况在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中间同样存在。不过，应该根据多少有些不同的标准来评价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为赞成奉行与凯恩斯建议的政策十分相似的政策的一代人辩护过。倘若当初麦克唐纳和斯诺顿，或者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愿意率先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其余的人就会追随他们；但是除了很少人相信的摩斯莱和人们不屑一顾的糊涂的左翼分子兰斯伯里——他从来不懂政治，也永远不会懂——以外，根本没有人率先采取行动。

正当工党为它在1929年的选举取得进展作好准备时，也是正当它浪费执政的机会时，左翼社会主义者的一些小集团却尽可能使工会在大罢工和1926年的矿工罢工失败后仍保持战斗精神。如我们在前文所见，雇主的主体有意识地停止了进攻，没有因为在那年取得胜利而走极端，宁可利用这个机会与不再经得起公开战斗的工会达成协议。工会代表大会虽说没有热情，还是欣然参加了“蒙德—特纳”谈判，这次谈判是以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为首的一个势力强大的雇主集团发起的，谈判宗旨是改善雇主与工会的关系。矿工工会书记阿瑟·库克和独立工党领袖马克斯顿立即带头反对谈判，发表联合宣言并发起了全国性的抗议运动。这次运动对工会运动的主体影响很小，它们使响应战斗号召的人泄了气。然而，这个运动的确倒是适应了独立工党对工党官方政策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助长了独立工党在随后几

年内对工党政府政策的怨恨。“蒙德—特纳”谈判毫无结果，因为英国工业联合会和全国雇主联合会到了紧要关头不愿意同意蒙德雇主集团准备向劳工方面作出的让步，后来也从未成立像“蒙德—特纳”会议建议的那种常设性联合机构。然而，会议实际上帮助工会 679 度过了它存在期间的一个尴尬时刻而没有造成任何具体的损害；因为蒙德的倡议对于防止其他雇主在工会力量最为薄弱和迷失方向的时刻对它进行正面进攻，毫无疑问起了一定作用。工会代表大会会员人数在1920年的最高记录曾上升到650万人以上，1926年已经下降到不足450万人。到1931年，它下降到370万人，到1934年，它继续下降到不足330万人。不过最后一次下降主要是后几个阶段的经济萧条而不是大罢工的后果。因罢工而减少的会员人数接近100万人——加上日益严重的失业，已完全足以使工会对于进行任何危险的冒险望而却步。

## 第二十二章

### 几个国际之间的斗争(1922—1931年)

在前文的一章里<sup>①</sup>，关于几个对立国际之间的斗争我们谈到1921年2月建立维也纳联盟。从那时起，有一段时间存在三个互相竞争的国际——或者说四个国际，如果把1922年12月在柏林建立的工团主义国际也包括在内。然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从未有过广泛的追随者，虽然他们在西班牙有大批支持者，在意大利和荷兰，支持者也不在少数。在苏联，奈斯特·马赫诺于1921年离开该国后，无政府主义运动便告结束。此后，剩余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流亡世界各地，到处都对在俄国建立的专制政权进行激烈谴责，但是没有能够产生任何巨大影响，因为他们与他们所在国的主要舆论发生了同样的分歧。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中拥有一些有说服力的作家和演说家，在俄国人中有艾玛·戈德曼、亚历山大·伯克曼和沃林等人，还有德国的鲁道夫·罗克（生于1870年）和意大利的马拉特斯塔的继承者等等；但是在西班牙以外的任何地方，他们都没有构成真正重要的运动。

在两个分别以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为中心的对立的工会以外其余三个国际中，如我们在前文所见，维也纳联盟并不自称在任何正式意义上说来是一个国际。它只是一个“工作联盟”，旨在为一个设法使敌对的社会主义派系重新团结起来的无所不包的国际铺

---

<sup>①</sup> 见本卷上册第287页。

平道路。实际上它只存在了两年，到1923年5月汉堡代表大会时便与复活的第二(伯尔尼)国际联合起来，成立了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合并终于结束了中派运动，这个运动的宗旨在于承认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必须因国而异，并且承认不论是议会民主还是苏维埃专政都不可能恰如其份地被规定为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方法。在承认这两点的基础上使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和解。起初，“第二个半国际”似乎在许多方面比较接近共产党人而不是伯尔尼国际的议会道路论者；但是共产国际对中派的断然的和措词激烈的否定使中派的支持者甚至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倒向了敌对阵营，而且1921到1923年之间发生的若干特殊事件进一步削弱了中派人士的地位。1922年4月，他们为使两个主要敌手和解所作的努力获得成功，在柏林举行了所有三个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但是两个极端党派中的任一派都从未认真对待的这次聚会在相互激烈的指责声中开始和结束。以拉狄克为首的共产党人猛烈指责“社会爱国者”，后者则痛斥共产党人对待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和即将在俄国接受审讯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以此作为回敬。然而尽管存在这种不可调和的态度，两个极端党派的任何一方都不准备在那个阶段听任会议以绝对分裂告终。共产党人同意应该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公开审讯，并同意应该容许来自伯尔尼国际的外国律师进入俄国为他们辩护；他们还同意任命一个联合委员会来研究格鲁吉亚问题。第二国际的代表则在原则上同意尽快召开有社会主义运动各派代表参加的正式联席会议，考虑组成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国际的问题。然后三个机构的代表设法商定了一个一致同意的宣言，吁请各国工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日以及为防止失业和争取承认劳动权的立法而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宣言还进一步要求“无产阶级采取联合行动来对付资本家的进攻，来拥护俄国革命并争取各国恢复与俄国的

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争取重建无产阶级在每一个国家和国际中的统一战线”。已经成立的九人委员会——每个机构派出3名委员——将继续进行谈判，并采取步骤来召开拟议中的无所不包的团结会议。

在这种种表面的接近的底下，却存在着极大的虚幻。共产党人毫无意图将共产国际合并到一个在其中必须与右翼或他们一直十分激烈地指责的中派进行真正合作的、无所不包的国际中去。右翼也并无任何意图与共产党进行友好合作。但是这两个极端派别谁也不愿意为中断谈判承担责任。共产党人由于从世界革命的总的挫折和经济萧条的到来中受到了磨炼，已修正他们的策略，并开始从“统一战线”——对此有可能赋予大不相同的涵义——的角度来谈问题。共产国际的领袖们所说的“统一战线”是指从一个共同组织的内部、而不是从外部进攻右翼和中派的机会，希望利用这个优越地位使他们的对手的追求者脱离他们的领袖，从而加强俄国以外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右翼那一方面则深知大多数国家的工人之中的亲俄情绪的力量，因而担心如果让人看起来在对待俄共领袖时采取不妥协方针会失去工人的支持。唯有“第二个半国际”的中派真正要和解，希望争取两个极端派别支持他们的中派观点。

团结的滑稽戏不可能长期演下去。九人委员会于1922年5月在柏林举行会议，但是没有得出结论。6月，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讯开始，而且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导致了王德威尔得及其辩护律师  
683 同事们为抗议进行审讯的方法而退席。<sup>①</sup> 主要由于这个缘故，九人委员会拒绝再次举行会议，三个国际之间的全部谈判嘎然而止，虽然季诺维也夫和洛索夫斯基在1923年1月法国入侵鲁尔时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国际工会为采取联合行动与几个对立的社会党国际

---

① 见本卷上册第187页。



和国际工会联合会进行了新的接触。这次接触一部分是1922年12月由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召集的、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和平会议的产物，参加会议的有代表各种各样的工会、合作社、社会党以及非战主义者机构的700名代表，包括俄国本身的工会或合作社委派作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人。然而季诺维也夫和洛索夫斯基的联合呼吁遭到了阿姆斯特丹和社会党机构的粗暴拒绝，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社会党机构在早先关于团结的谈判破裂之后实际上倒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1922年9月，由于1920年海勒分裂<sup>①</sup>而已经人数锐减的(德国)独立社会党以多数票决定与社会民主党重新统一，以便结成共同阵线来反对沃尔特·拉特瑙遇害以后的反动派，从而使维也纳联盟失去了它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翌月，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一举使本来就严重分裂的意大利社会党人处境恶化。这两次事件严重削弱了中派的力量，中派由于共产党人在统一谈判的过程中的表现已经幻想破灭。促使“第二个半”国际与第二国际联合起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大概是独立社会党实际上即将消逝；因为尽管该机构以格奥尔格·累德堡为首的一小部分人企图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党维持下去，在党的多数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后，它就毫无重要意义了。曾经是维也纳联盟的中流砥柱的奥地利人必然会受到德国事态的强烈影响，他们仍然希望作为魏玛共和国的一个邦加入德国；而且即使把这一点除外，他们的力量在国内也日趋薄弱，因为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天主教会已从1918年陷入的混乱中复元。即使对于奥地利领袖奥托·鲍威尔和弗雷德里希·阿德勒来说，似乎也不再存在成立无所不包的国际的真正希望，而面对着共产党人对他们的那种态度，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在遭到共

---

<sup>①</sup> 见本卷上册第168页。

产国际的傲慢无礼的抵制之后，他们便决心竭尽全力争取右翼来更积极地保卫此刻遭到资本主义方面几乎是全面攻击的社会主义运动。因此，在1923年的汉堡代表大会上，第二国际与“第二个半”国际妥协了，弗雷德里希·阿德勒在遭到某些压力下出任新的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联合书记，这个国际成立于汉堡，但是总部设在伦敦，这样阿瑟·汉德逊和英国工党便可以警惕地密切注视它的工作。起初，与阿德勒同任书记的是英国纺织工会领袖汤姆·肖（1872—1938年），他的有利条件是他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但是当拉姆齐·麦克唐纳在1924年初组成他的第一届工党内阁时，肖成了一名内阁阁员，只好放弃他在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中担任的职务，然而没有人接替他。阿德勒成了唯一的书记，直到工党政府于1924年11月下台时肖又短时间地恢复他的职务。除了阿德勒以外，负责国际日常事务的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全是英国人。当英国工党政府于1924年初开始执政时，该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更换了。

新国际刚成立，紧急的问题便纷至沓来。在德国，对法国占领鲁尔进行的全国性抵抗造成了一种有使币制全面崩溃和使魏玛共和国在一片混乱中瓦解危险的形势。在占领的背后，是关于赔偿问题的争执以及法国对于德国政府的欺诈行为的指控。最大的麻烦是：紧接着汉堡代表大会之后，保加利亚发生了政变。斯坦姆波利斯基的农民党政府被推翻，他本人被谋杀；保加利亚广泛社会党站在赞可夫一边反对农民党人。在赞可夫取得政权的同时对斯坦姆波利斯基的追随者采取了严厉措施；9月，政变时置身事外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与农民党人联合举行武装叛乱，遭到了血腥镇压。同月，在西班牙发生了普里摩·德·里维拉革命政变。几乎在每一个地方，欧洲反动势力似乎都甚嚣尘上，达到了新的顶点，欧洲工人阶级的影响则下降到了战争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接着潮流变了：奥地利社会党人在1923年10月的选举中做得很出色，两个月以

后,英国工党也在选举中取得了巨大胜利,结果成立了第一届麦克唐纳政府。几个月以后,爱都阿·赫里欧在法国执政,担任激进党联合内阁的首脑;在丹麦和瑞典,社会党人在议会中的实力大为加强,以致可以独立组成少数派政府。所有这些议会成就大大地鼓舞了稳健的社会党人,虽然在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情况仍然每况愈下,虽然人们迅即发现在西方取得的议会成就只不过是暂时的。瑞典社会党人刚上台,英国工党政府就在沉重打击下下台,在“红色信件”选举中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924年5月的选举中遭到失败后,在将近年底时举行的第二次选举中大有起色;由于采纳了道威斯计划,赔偿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而且采取了步骤实施新币制来取代完全贬值的马克。这些发展为新国际提供了许多可以讨论的问题,即使新国际没有对事态进程产生任何真正重大的影响。新国际主要关切的问题之一是保加利亚危机。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与赞可夫的政变并无正式联系,但是该党的一些领袖曾暗中参与其事,政变成功后该党接受邀请参加了新政府,从而参与了政府对1924年9月农民党与共产党的起义进行的镇压。它作为政府集团的成员参加了随后举行的大选,从而在议会中取得了大批议席,尽管事实上选举是在非常不民主的选举制度下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他们参加政府辩护时强调说,在当时的环境下,赞可夫政府为保加利亚民主制度提供了最大的希望,并声称他们是利用在政府中的影响来限制在秋季叛乱后进行的镇压的。然而在这方面,结果证明他们的影响几乎根本不存在;1924年3月,他们正式退出政府,恢复了他们的独立地位,不过在随后的几年中,成了变本加厉的镇压的牺牲者。如我们在前文所见,保加利亚两个敌对的社会党——其中一个成了共产党——相互强烈的仇恨由来已久,这有助于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在赞可夫政变时的态度。在早先的一章里已经谈到共产党未能

686

驰援斯坦姆波利斯基的根本原因。<sup>①</sup>

从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退出赞可夫政府的时候起，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便全力支持该党反对政府及共产党和农民党叛乱分子，它指责后者采取大规模谋杀和暴力行动，激起了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该国际在1924年3月和1925年6月召开了两次巴尔干社会党会议，在会上，它企图促使巴尔干各国社会党共同采取行动以防止它们之间——尤其是在马其顿——的战争，并增进友好关系。在第二次会议之前不久，保加利亚内战再次爆发，在索非亚的教堂里发生了著名的炸弹惨案。<sup>②</sup>就在这次起事之前，共产党议员被撵出了议会；从这时起到1927年以前他们在议会里一直没有议员，到了1927年才容许他们成立“工人党”，在随后的选举中获得4席。在此期间，社会民主党人于1926年开除了他们的某些曾与赞可夫政变有密切联系的领袖——其中有阿森·赞可夫，必须把此人与他那比较有名的同姓者区别开。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专政仍然存在；甚至以扬科·萨卡索夫为首的稳健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只能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他们的活动。在1931年起义之前，共产党毫无疑问得到工人阶级主体的支持。在他们被击败并被赶入地下时，他们仍然是一个有势力的集团；但是与农民党和城市手工艺者的某些阶层结成联盟进行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作为坚强后盾，又获得了一些更多的支持。工党和社会党对于共产党人同对于一心要把法西斯统治的形式强加给巴尔干各国的反动集团是同样激烈地反对的。

在向1925年8月新国际在马赛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书记处全面回顾了汉堡代表大会以来的事态发展并对已经达到的阶段发表了意见。在书记处看来，尽管在匈牙利、意大利、西

<sup>①</sup> 见本卷上册第269页。

<sup>②</sup> 见本书上卷第271页。

班牙和保加利亚反动专政得以立足，过去两年来工人阶级的前景仍有了明显改善。报告赞扬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党共同努力解决赔偿问题并在这方面至少取得了部分成就。书记处还祝贺国际大体上成功地维持了大战前夕在社会和工业立法方面取得的成就，尽管在经济萧条的掩盖下有人对这些成就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没有取得新的成就；但是报告认为目前的条件有利于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与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以及它们的下属运动采取联合行动，实现进一步的逐渐的进展。报告强调了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追求这个目标的必要性，但是并未暗示与共产国际或者俄国人进行任何种类的合作来实现这个目标。相反，书记处似乎相信，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至少是在俄国以外的地方，在内部分歧的压力下即将崩溃；并且相信，不久之后，置身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之外的走入歧途的社会党人——或者至少是西欧的社会党人——会回到国际的怀抱。

据报告认为，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在1925年面临的至少有三项任务：进行反战斗争并为保证“持久和平”创造条件；对“阻碍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反动派进行斗争；“为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而斗争，其标志之一必须是八小时工作日的最终胜利。”换句话说，除了在彻头彻尾的反动派当政的国家之外，工党和社会党国际所考虑的大致是恢复1918年以前第二国际的活动——逐步改善国际关系，并通过议会和工会的努力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维也纳联盟的半革命主义理论已经完全消逝；共产主义不再是潜在的盟友，它的政策至少部分地还适用于逐步改革的道路已被武力堵死的国家；共产主义是应予反对的一个敌人，既然那种早期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被认为不再存在，希望共产主义将失去它的吸引力。

这种态度并不妨碍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力促它可以对之施加压

力的各国在法律上承认苏维埃政府。实际上，到1925年年中承认苏维埃政府的已经有：德意志共和国(1922年)、英国、意大利、挪威、奥地利、希腊、瑞典、中国、丹麦、墨西哥、匈牙利和法国(1924年)以及日本(1925年)。因此，在大国之中，唯有美国仍然拒绝承认。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在支持俄国的权利时明确表示，它希望承认俄国的早期结果将是俄国国内制度的自由化以及普遍释放政治犯——特别是那些属于对立的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犯。它还要求红军撤出格鲁吉亚和恢复孟什维克格鲁吉亚共和国的独立，并随即停止苏维埃对于毗邻的独立国家——尤其是爱沙尼亚——的干涉。它强烈支持1924年8月的格鲁吉亚起义，并抗议那一年12月在爱沙尼亚发动的未遂政变。流亡国外的俄国政党曾派遣代表参加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一些会议，使它对俄国的态度深受影响，这些代表是：犹太联盟和孟什维克党的阿布拉莫维奇，社会革命党的苏霍姆林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泽雷泰利，后者曾由国际授权准备出版一本介绍俄国状况的小册子。1924年年底英国工会代表团从俄国归来时，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立即发表声明，猛烈攻击代表团关于俄国经济日趋改善、俄国的宗教自由以及国际所属各党的领袖对之有不相同意见的其他问题所说的好话。国际的声明指责英国职工大会主席A. A. 帕塞尔(1872—1935年)和书记弗雷德·布拉姆莱(1874—1925年)为了实现他们所要求的英俄工会友谊而特别粉饰苏联，并指责他们无视俄国破坏国际工会联合会的企图和违背他们理应代表的运动的利益。

关于意大利，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当然采取强烈反对发展中的法西斯政权的方针，并竭尽全力帮助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决定性阶段的意大利社会党。当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吉亚科莫·马特奥蒂(1885—1924年)于1924年6月被法西斯党徒暗杀时，国际在表示惊骇的同时抗议说，法西斯主义的这一兽行“给了它自己永远无法

复元的打击”。国际宣布：意大利无产阶级是“战胜恐怖政权的道义上的胜利者”。它对意大利社会党人抵制议会正式表示赞许，并似乎对法西斯政权早日垮台的前景表示乐观。然而，它除了表示抗议并对逃离意大利的社会党流亡者——大多数人逃到了法国——提供有限帮助之外，便无能为力了。

到1925年马赛代表大会时，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在除了瑞士以外的每一个欧洲重要国家都有某种隶属于它的政党，但是在欧洲以外只有人数不多的美国社会党（15,000人）和阿根廷社会党（1万人不到一点），以及小小的英属圭亚那工会（1,000人）。在算作国际的成员的党派中有流亡的俄国的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乌克兰的党、格鲁吉亚的党和亚美尼亚的党，还有一个设在维也纳的流亡的匈牙利团体，包括孔菲和波姆在内。关于这些流亡党派，都没有党员人数的记载。在其他党派中，人数最多的是英国工党，有党员300万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工会集体入党的。独立工党虽然隶属工党，却是单独加入国际的（有党员5万人）。单独加入国际的还有社会民主联盟的人数不多的残余组织（2,000人）和中央费边社（不到2,000人）。人数仅次于（英国）工党的是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869,000人），再往后是比利时工党（621,000人，包括下属各工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570,000人）。另外只有3个党党员超过10万人——捷克斯洛伐克（将近20万人）、瑞典和丹麦。其次是法国（99,000人）。波兰有65,000人，分属3个党，但其中大部分属于波兰社会党。捷克斯洛伐克党实际上有5个下属党——捷克人的、德意志人的、罗塞辛人的、匈牙利人的和波兰人的，但是唯有捷克党（116,000人）和德意志党（72,000人）有众多的党员。国际下属的其余政党人数都很少，意大利党不过31,000人，从人数很多的挪威工党分裂出去的一个挪威社会民主党只有8,000人，该党到1938年才参加国际。据国际宣布，它的下属各党

(流亡的党除外)的党员总人数为628万人,其中752,000人为妇女,在最近的选举中他们的候选人获得的总票数为2560万张票,其中将近800万张票是在德国,大约550万张票是在英国。这些党总共有1000多一点议员,约为议员总人数的15.5%。它们总共有311家报纸。其中半数以上在德国。

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由一个38名委员的执委会和9名委员的执行局主持工作。1925年,在最著名的执委会委员中有:阿瑟·汉德逊、奥托·鲍威尔、让·龙格、路易·德·布罗克尔、格鲁吉亚的H.G.泽雷泰利(生于1882年)、阿瑟·克里斯皮恩、德国的赫尔曼·缪勒和奥托·威尔斯、荷兰的W.H.弗利根、西班牙的儒利安·贝斯特伊罗、捷克斯洛伐克的安托宁·奈梅克、瑞典的阿瑟·英格伯格、南斯拉夫的齐弗科·托帕洛维奇、丹麦的卡尔·马德森、法国的亚历山大·白拉克和意大利的克劳狄奥·特雷弗斯。美国的维克托·伯格和莫里斯·希尔奎特名义上也是委员,但是自从1923年的汉堡成立大会以来就从未参加过任何会议。少数著名的原来的执委退出了——其中有麦克唐纳、王德威尔得、斯道宁、J.H.托马斯、特鲁尔斯特拉和布兰亭(他于1925年2月去世)。执委中有相当多的人——比方说布兰亭、特鲁尔斯特拉、王德威尔得、德·布罗克尔、奈梅克、缪勒、马德森以及在有限的程度上说还有麦克唐纳——在1914年之前在第二国际中很活跃。整个说来,国际的执委会是一个老战士的集会,大部分人来自战前的右翼和中派;事实上执委会里是清一色的欧洲人——而且还主要是西欧和中欧人。在巴尔干,它只有很少的追随者;在毗邻俄国的国家之中,唯有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来的人多。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与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在许多问题上进行相当密切的合作。1919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国际工会联合会,美国劳工



联合会及其领袖塞缪尔·龚帕斯参加了那次代表大会。龚帕斯在巴黎和会上对于成立国际劳工组织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个代表政府、雇主和工人的三方组织，将附属于拟议中的国际联盟，但是在它自己的国际劳工“立法”这个领域内完全自主。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代表大会时，似乎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劳联会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并在其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甚至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美国人担心德国人会在国际工会联合会中居于过份强大的地位；他们也希望该组织完全超脱于政治之外，特别是不要与社会党发生任何联系。他们还极力认为拟议中的会费过高；但是这项反对意见只不过是次要的。当龚帕斯及其代表们回到美国时，他们发现在美国存在与西欧不无相象之处的劳工骚乱。联合矿工工会要求矿藏国有化，铁路工人兄弟会要求根据普拉姆计划把铁路国有化；<sup>①</sup>关于以英国工党为模式、以工会作为基本成员成立（美国）工党问题，人们议论纷纷。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共产党和左翼也在进行相当积极的鼓动，而且当局为扑灭这种鼓动已经快要采取镇压措施。美国劳联领袖暂时对工人阶级当前的情绪作了某种让步：比方说龚帕斯本人同意担任普拉姆计划联盟的主席职务。然而美国劳联领导完全反对成立任何种类的工党和与社会党人——哪怕是极右翼的社会党人——结盟。因此他们对国际工会联合会的热情迅速冷却，龚帕斯随即连珠炮似地要求该组织官员不要发表有关政治问题的言论和干预政治事务。国际工会联合会答复说，在欧洲的现状下完全不可能严格区别政治问题与劳资关系问题，也完全有必要号召各国政府采取符合工人利益的行动。它还促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劳联本身曾发表过许多政治言论，尤其是关于俄国；并提醒龚帕斯注意他自己在普拉姆计划联盟中的地位。国

---

<sup>①</sup> 见本书第732页。

际工会联合会显然在唇枪舌战中占了上风，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结果。美国劳联在1920年6月的蒙特利尔代表大会上决定将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问题交由执委会处理。后来又发生了许多进一步的争论；美国人拒绝向国际工会联合会缴纳会费，并且否认隶属于该组织。龚帕斯甚至在1920年12月写了一封信，宣称“国际工会联合会已经成为以苏维埃主义为其必然归宿并有着实现‘社会主义化’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纲领的国际政治团体。”

这当然是一派胡言；但是在美国劳联随后的几届全国大会上，龚帕斯的态度取得了胜利，结果与欧洲工会运动彻底分裂。我认为美国劳联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主要并非由于国际工会联合会普遍关心政治问题——因为美国劳联也是如此——，而是由于尽管阿姆斯特丹激烈反对共产主义和红色国际工会，却赞成西方各国政府承认苏维埃，而美国劳联却像美国政府一样，并不如此。在美国，反共采取的形式是拒绝承认俄罗斯共产党国家的存在，以及激烈反对共产国际和红色国际工会。美国人甚至对于欧洲的右翼，也没有区别对待。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主义，因此无论共产主义在什么地方抬头，他们都会与之斗争。当然，他们也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因此不愿明确区别共产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形式，认为前者是——用龚帕斯的话来说——后者的“必然归宿”。不久之后，就在龚帕斯于1924年12月去世之前不久，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敌对态度，这主要是由于当欧洲的社会主义浪潮在经济萧条中被击退时，阿姆斯特丹国际及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开始更加关心德国和其它地方直接得救的任务而不是攻击资本主义或者要求普遍社会主义化。但是这种改变远远不足以使美国劳联回到阿姆斯特丹国际中来。

实际上，这时候主要在英国工会的推动之下，国际工会联合会本身已成为战场。在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汉堡成立大会上，国际

工会联合会的两位书记之一、荷兰人扬·奥德基斯特(1870—1950年)宣称该联合会愿与新的社会党国际合作；共产党人面对着右翼与中派的重新联合，决定开展一个争取建立所谓“统一战线”的新战役，而利用俄国工会作为这一战役的前线。因此全俄工会理事会向阿姆斯特丹建议采取一致行动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阿姆斯特丹国际的行政委员会答复说，只有俄国工会停止攻击国际工会联合会并真正独立于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之外，它才会同它打 694 交道。当这个答复招致俄国人的愤怒反击时，来往中断了。

这时英国职工大会秘书弗雷德·布拉姆莱在国际工会联合会1924年6月的维也纳代表大会上对该联合会进行了强烈批评；经过激烈辩论后，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对俄国人缺席表示遗憾并指示执行局继续与他们进行磋商，以争取他们按照国际工会联合会成员的入会规则和条件加入该联合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J. H. 托马斯辞去主席职务，由左得多的 A. A. 帕塞尔继任。会上还选出了第三位书记(英国人)，与在此之前分担书记职务的奥德基斯特和他的德国同事约翰·萨森巴赫共事。翌月国际工会联合会执委会邀请俄国工会入会。俄国人的答复是建议阿姆斯特丹国际与它的冤家对头红色国际工会举行联席会议。于是国际工会联合会要求俄国人具体说明他们以什么作为讨论的基础；俄国工会领袖托姆斯基答复说，德国工会准备在“动刀子的阶级战争”和“与一切形式的阶级合作决裂”这个指导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合作。他建议阿姆斯特丹与俄国工会举行初步会议。国际工会联合会总务委员会不顾英国代表投票反对，于1925年2月拒绝了(托姆斯基的)建议，但是宣称它愿意接受全俄工会理事会按现有规章入会。

在此之后，俄国人与英国职工大会总务委员会于1925年4月在伦敦举行了会议，会上同意成立代表两个机构的英俄咨询委员会，俄国人同意加入一个以阿姆斯特丹的机构为基础的新的工会

国际，英国人支持俄国人与国际工会联合会双方代表举行无条件的会议。但是经过多次进一步交换意见之后，国际工会联合会不顾英国会员投票反对，拒绝修改它的1925年2月的建议，并且否决了  
695 英国人提出的要该联合会重新考虑其态度的建议。这时英国工会已处于导致1926年总罢工的危机的前夕。当总罢工失败、英国矿工不得不单独战斗时，工会红色国际和共产国际都对英国职工大会进行激烈攻击，痛斥他们“背叛”矿工。在此期间，俄国工会筹集了为数甚巨的款项援助矿工，并要求职工大会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共同组织国际支援，包括对煤实行禁运。在英俄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上，双方代表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虽然英国代表继续敦促国际工会联合会与俄国人之间举行无条件的会议。这些事件导致不久之后英俄委员会的结束，并使英国人完全放弃了促使俄国人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企图。这整个事件的发生当然起因于英国工会代表团1924年访问俄国以后英国工会舆论暂时的急剧左转。随着总罢工的失败，这种向左转的趋势出现了大幅度的逆转；阿姆斯特丹国际继续走它自己的道路，再没有提倡工会团结的人找麻烦了。

这绝不可以认为在1924到1926年这一段期间，英国工会信仰了共产主义。英国工会中的卓越人物帕塞尔、布拉姆莱和乔治·希克斯(1879—1954年)既非共产党人，也不在任何意义上赞同作为一种理论或政策的共产主义。不过有关新经济政策下俄国经济进展的所见所闻使他们获得了良好印象，而且他们还热心地认为，即使在政治领域根本没有团结，工会的团结也可能是切实可行的。由于对立的共产党工会几乎没有使他们烦恼，而且主要工会中的共产党的影响——尽管有A.J. 库克的存在——也没有给他们很大烦恼，他们不能理解大陆同事的反共情绪的激烈程度，这些同事中大多数人与他们的经历迥异。他们似乎认为各国组成一个单一的联合运动是自不待言的；他们期待工会红色国际在俄国工会一

旦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时会几乎毫无痛苦地消逝。在这些年里，696  
尤其是在麦克唐纳政府在“红色信件”选举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后，  
英国领袖确实希望有一个较有战斗性的工会政策。与他们之前和  
他们之后的领袖相比，他们是“左派分子”，但是这与作为共产党人  
或者希望将英国工会运动置于共产党的控制或影响之下是大不相同  
的。布拉姆莱曾经是积极的独立工党宣传家，帕塞尔曾经是一个  
基尔特社会党人，建筑工人领袖乔治·希克斯是老的社会民主联  
盟的资深盟员，继布拉姆莱担任职工大会书记并在总罢工期间主  
持职工大会工作的W. M. 西特莱恩(生于1887年)，在年轻时作为  
电气工人的车间代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左翼分子，但是在他就职  
之前早就大幅度向右转了。在总罢工时担任职工大会主席的钢铁  
工人领袖阿瑟·帕格(1870—1955年)一向以稳健派著称。

可见从1926年以后，工会的国际关系已经大致恢复到3年前  
的光景。英国人与大陆人之间的争执确实一直继续到1927年，当  
时在8月举行的巴黎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拒绝重新选举帕塞尔为  
主席，并且接受了3名书记中的两名——奥德基斯特和J. W. 布  
朗——的辞呈，剩下了萨森巴赫一人继续担任书记。在此之后，英  
国职工大会随即终于结束了在此之前一段时候已经名存实亡的英  
俄委员会。翌年，国际工会联合会中的裂痕得到弥合。西特莱恩  
当选为主席；英国人在设法治癒由于他们在1926年的失败而遭受  
的严重疮伤时已经不再去麻烦国际。

在此期间，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在不像国际工会联合会那样惶  
惶不安和走弯路的情况下继续它的工作。1925年的马赛代表大会  
决定将总部从伦敦迁往苏黎世，搬迁工作于年底之前进行。阿德勒  
继续担任书记，但是在1928年之前，全部由英国人担任委员的行政  
委员会为包括主要国家的委员的执行局所取代。工党和社会党国  
际的下一届代表大会直到1928年才举行，这一次是在布鲁塞尔。697

在这些年里，领导机构中的活跃分子大部分没有改变，只不过有一些成员由于在他们本国政府中任职或离职而分别辞去在国际中的职务或复职。在所属各党方面也并无多大变化。瑞士人终于在1926年加入了工党和社会党国际，此后冰岛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也加入了国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挪威社会民主党人在与没有加入国际的挪威工党重新统一之后退出了国际。除了受委托代表巴勒斯坦工人的犹太社会党被接纳之外，没有任何非欧洲的新党加入国际。阿根廷党分裂成了对立的派系。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格鲁吉亚孟什维克仍被认为是国际的所属政党，代表人数与以前一样。在奥地利，德国党与捷克党虽然进行相当密切的合作，却是分别加入国际的。在英国，独立工党的党员人数已经下降到仅仅3万人。

书记处向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提出的长篇报告，从整体来看，几乎不像是基本上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报告。其中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涉及像国际联盟的政策和结构、裁减军备和法西斯主义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论对于社会党人是多么重要，与向社会主义社会进展的直接方针甚少关系。诚然，报告承认试图取得这样的进展过去是，当时仍然是不切实际的。关于在稳定形形色色的经济——尤其是根据道威斯计划稳定德国的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报告多所议论；而且虽然指出了许多国家的失业现象仍然严重，报告却将这一点归因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基本的弊病。报告似乎期待着在越来越稳定的条件下日趋繁荣的经济时期的到来：报告丝毫没有暗示只不过一年以后的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即将引起的大萧条。共产党关于危机即将到来的预言被当作主观愿望——毫无疑问是如此——而不予考虑；但是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中也存在主观愿望，其领袖似乎甚至满足于社会立法领域的非常缓慢的进步，而且还似乎把主要希

望寄托在加强国际联盟上，以它作为和平和裁减军备的工具。在德国问题上，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自鸣得意的情绪显而易见。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的相对成就，报告非常高兴，而且对日益严重的纳粹主义威胁没有显示出先见之明，虽然报告充分注意到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征服意大利工人阶级运动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在此以前，意大利党已经加入了流亡社会党的行列，关于该党党员人数，无法提供统计数字。

到1931年7月，当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在维也纳举行下一次代表大会时，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书记处的报告在头等重要地位提到世界经济危机，称之为“资本主义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危机”，而且支配着“全世界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生活”。然而报告没有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共产党人一直盼望的“最后危机”。相反，虽然报告承认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却把危机说成是“资本主义商业盛衰周期中的一个阶段”，而且与对待以前的危机大致相同的态度对待这次危机，说以前的危机“总是通过同样几个阶段——上升、繁荣、危机、萧条、再次逐步上升”。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报告作者显然期待资本主义像前几次危机时一样，从新的危机中恢复；报告宣称社会党的重大任务是“与经济危机作斗争，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又说“有一件事对于两项任务来说至关紧要——维持和组织和平”。工党和社会党国际远没有着手利用危机作为手段来鼓动人民的革命情绪，而是希望促使各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危机，还打算继续他们在危机开始之前便已经开始的争取和平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军。

的确，报告承认，作为经济灾难的后果，法西斯的危险变得比以往更加严重和更为普遍。书记处不得不在报告中写道，南斯拉夫也成了遭受独裁统治的国家之一，波兰向独裁统治走了很远，在德国、奥地利和芬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已进入关键阶段。与

此形成对照的是，工党在英国执政已将近两年，丹麦社会党人与激进党人也联合执政了大致相等的时间。在捷克斯洛伐克，从1929年下半年以来，也是包括社会党在内的联合政府执政。此外，在西班牙，在1931年4月的市政选举中左翼获得胜利之后，社会党也参加的一个共和政府最近就职。在提出这篇报告时，欧洲没有别的地方是社会党人执政的。

在法西斯主义取得迅速进展的一些国家里，1931年的斗争转向了建议修改宪法以便消灭代议制政府。不仅在德国如此，在波兰、奥地利和芬兰的形势也是如此。在德国，纳粹党人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取得了巨大收获；两个月以后，皮尔苏茨基的追随者在波兰大选中获胜，但是没有获得修改宪法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sup>①</sup>同月，奥地利社会党人在选举中取得了好的结果，但是未能阻止奥地利法西斯党的武装团伙日益猖獗地进行恐怖活动和暴力行动。<sup>②</sup>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对于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对言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攻击，对逮捕社会党领导人和屡次进行谋杀以及对法西斯分子的猖獗的暴力行为，一再提出抗议。然而，除了抗议和对世界舆论呼吁，希望借此对未来的独裁者产生某种影响以外，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国际还继续强烈抗议在苏联和诸如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已处于法西斯统治形式下的国家对政治犯进行不断的而且确实是严厉的迫害，并通过为纪念被暗杀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而筹集的马特奥蒂特别基金来尽量救济遭受法西斯压迫的一些牺牲者。然而，所有这一切与迅速增长的需要相比必然是微乎其微的。

经济危机的一个结果是使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与国际工会联合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1930年10月，两个机构在科隆举行联席

---

① 见本书第629页。

② 见本卷上册第230页。



会议，并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就应该采取的应付危机的措施起草了一份报告。几个月以后发表的委员会的报告主要强调资本主义未能维持足以吸收迅速增长的生产率的购买力，并且强烈反对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在收支平衡的困难的压力下所采取的紧缩通货措施。报告力陈维持工资水平以保持工人阶级购买力的重要意义，并力陈减少工作小时以扩大就业的必要性和提高离校年龄以作为减少青少年失业的特别手段的可取之处。报告是一份长篇文件，主要叙述的是社会党为应付经济萧条所采取的已经为人熟知的政策。报告像以往多次提到的那样，支持劳动权或者通过保险或援助以维持生活的权利；报告还强调政府有责任通过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机会。尽管这个报告与国际工会联合会以及社会党国际的报告有联系，效果却甚微。经济萧条每况愈下；以紧缩通货的措施应付萧条的做法——事实上使萧条更为恶化——一直继续到罗斯福在美国就任总统后开始实行一系列名为“新政”的措施。然而这已经不属于本卷所涉及的范围。

1931年，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仍然代表着它在192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时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主义运动。1929年，阿瑟·汉德逊出任英国工党政府外交大臣后随即辞去他从一开始便担任的国际主席职务，自1929年开始，埃米尔·玉德威尔得重又担任主席，恢复了1914年之前他在第二国际的职务。到1931年时，已有一些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老一辈领袖去世，其中著名的有德国的赫尔曼·缪勒(死于1931年)、罗马尼亚的雅各布·皮斯蒂纳(死于1930 701年)、比利时的约瑟夫·沃特斯(1875—1929年)和波兰的赫尔曼·迪亚芒德(1861—1931年)；但是就大部分而言，仍然是同一批人掌舵。格鲁吉亚的泽雷泰利于1929年辞去了他在领导机构中的职务，到1931年时，流亡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中间已经出现了激烈争执，因为他们解除了苏霍姆林在领导机构中的职务，却又没有就新的

人选达成协议。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继续代表流亡的孟什维克。在意大利方面，流亡的社会党对立派系于1930年7月归于统一之后，彼特罗·南尼（生于1891年）出任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领导机构中的新的意大利代表。在阿根廷，尽管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作了努力，对立的社会党之间的分裂并未弥合；国际在吸引更多的非欧洲社会党进入它的队伍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就。1931年2月，英国独立工党再次企图说服工党和社会党国际领袖召开一次来者不拒的社会党会议，但是国际答复说，这样一种集会只会为破坏分子提供一个方便的讲坛，因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仍然非常关注国际联盟事务，尤其是在裁减军备筹备会议方面表现了对裁军的关注，这次会议终于做出安排在1932年2月举行正式会议。代表英国工党政府的汉德逊在这方面特别活跃，在辞去国际的主席职务以后仍与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保持密切联系。国际还曾坚决支持关于缔结国际关税休战协议的建议，英国工党政府贸易大臣威廉·格雷厄姆是这个建议的策划人之一。

总而言之，在1931年时，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在继续进行它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所一直进行的类似活动，差别仅仅在于它不得不比以前更加重视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危险以及采取特别措施以应付资本主义国家中日益严重的失业的必要性。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为了使工人阶级得以在更大程度上团结一致去面对这种危险或使几个对立的国际之间的尖锐对抗得到缓和，采取了任何行动。

702 现在我们必须从工党和社会党国际转到谈谈它的主要对手共产国际。那个机构在其早年每年举行一次正式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执行委员会被授予非常大的权力。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共产国际所赖以建立的理论认为，一个单一的、集中地领导的运动有权控制世界革命的战略和战术，因此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不应该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权决定自己的政策和领导的独立机

构，而应该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必然的结果是共产国际可以向它发布命令，共产国际执委会有权推翻不仅是各国党执委会的决定，而且甚至是任何一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我们必须在对世界革命进行集中控制领导这个总的框架内研究共产国际史——当然，尽管这个理论并不总是能够付诸实施。

共产国际按时分别于1919年、1920年、1921年和1922年举行了头四次代表大会。但是第五次代表大会到1924年夏才举行，当时决定今后的代表大会每隔一年举行一次。事实上，尽管共产国际作出了规定，1926年根本没有举行代表大会，下一次代表大会到1928年方才举行。之所以时间间隔这样长肯定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俄国国内，斯大林与其敌手之间的权力之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如果听任代表大会照常进行的话，这场权力斗争毫无疑问会在共产国际中的大规模的派系斗争中反映出来。到1928年时，（俄国的）这场斗争的比较尖锐的阶段已经以不仅是托洛茨基、还有季诺维也夫的清除而告终；虽然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新的较量已在深入进行，由于斯大林牢牢地掌握着政权，他感到可以冒一下风险容许代表大会举行。事实上这是布哈林最后一次露面，此后他随即被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岗位上降职，从此斯大林便在共产国际中发挥更为巨大的直接作用了。

在共产国际存在的头几年，它曾相信自己是在乘着世界革命的浪头前进，而且如我们在前文所见，为了到处建立具有有保证革命热忱的共产党，它一直全力以赴地甚至以超过对右翼社会党人的斗争势头，对中派进行斗争。但是到1921年时已经可以明显看出，革命浪潮正在衰退，必须略作停顿才可能把革命成功地扩大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在1921年德国发生的事件之后<sup>①</sup>，还可以明显

---

<sup>①</sup> 见本卷上册第169页。

看出，盲动主义政策非但没有将广大工人争取到共产党人这一边来，反而适得其反。在俄国本身，在1921年1月的彼得格勒罢工和对喀琅斯塔得起义进行镇压之后，内部的战略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体现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与之俱来的给予农民的比较随和的待遇。这种内部变化必然会对俄国的对外政策以及作为俄国与外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关系中的工具的共产国际产生反响。列宁本人就曾谴责患左倾幼稚病的外国共产党人；在1921年6月到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恳求共产国际所属各党不要出于宗派主义而脱离工人的主体，而要表示愿意与他们合作，从而与他们建立联系，即使这需要与右翼或中派领导下的团体采取共同行动。诚然，列宁在提出这一意见时还用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一句名言说，共产党人建议与社会党人进行的合作将“像维系受绞刑的人的绳索那样”维系社会党人。

704 这样，在1921年6月产生了“统一战线”的概念，在随后的几年里引起这么多有争议的解释的便是这个极其模棱两可的名词。“统一战线”最初提出时，不论其根本意图何在，意味着从前些年的极端的分裂战术后退了。由于这个缘故，它遭到了许多西方共产党人的激烈反对，就在最近，他们还奉命与右翼和中派立场的“社会叛徒”完全断绝来往，现在却又奉命与他们联合了，对这一点他们认为很难理解。他们得到的解释是：对共产党人来说，避免犯两种截然相反的错误是同样重要的。一种错误是“机会主义”，这就必然要付出忘记革命目标的代价，为取得工人阶级的眼前支持而牺牲原则。另一种错误是“宗派主义”，这牵涉到拒绝参加争取实现对工人阶级主体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改革运动，从而使自己脱离劳动群众。他们还被告诉说，共产党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走一条笔直的和狭窄的路。实际上这意味着它们必须想方设法与它们最近所决裂

的那些党合作，同时又要避免被这些党俘虏并维持独立行动的权利；而且还进一步意味着：尽管现有的工会受右翼领导，共产党必须到这些工会内部去工作，设法促使它们更具战斗性，而且必须避免设立力量太弱、无法有效领导劳资斗争的对立工会。

当然，在这种表面变化的背后，俄国的领袖们，或者至少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认识到，近期发生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消逝，在今后几年内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加强他们的实力，以便在机会再次到来时他们能够处于较强大的地位，而他们认为这种机会肯定是会再来的。正当俄国不得不从合乎外来干涉和内战时期的政策大大后退一步并致力于在新经济政策下加强本国实力的时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得不从争取近期革命的策略改变为争取领导工人主体进行日常斗争来改善处境或防止处境恶化的策略。

除了“到群众中去！”以及从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辩论中产生的“统一战线”这两个口号之外，还有其他口号。人们已开始广泛利用成立“工人政府”的呼声；对于这个口号也可以作出大不相同的解释。可以认为这个口号意味着凡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共同拥有多数票支持的地方，共产党就应该准备参加联合政府，然后这些政府按照议会民主的习惯做法进行治理，制定先进的改革方案并利用它们的政治权力来加强工人阶级的地位。705  
在一些邦议会暂时实现了社会党与共产党多数联合的那部分德国地区，实际上就是这样来理解“工人政府”这个口号的。<sup>①</sup>但是也可以认为“工人政府”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苏维埃政府，而且全靠人们吃不准上述理解中哪一种理解正确，才能使这个政策得到普遍的赞同。1921年作为俄国人的西欧事务主要顾问的拉狄克显然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则同样明显地

---

<sup>①</sup> 见本书第642页。

倾向于后者；但是就目前而言，俄国舆论的主体则支持拉狄克。此外，1922年关于“工农政府”的议论很多；1923年，就在保加利亚的斯坦姆波利斯基农民政权倒台之前，俄国人召集了一个国际农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红色农民国际”。由于缺乏任何可靠的农民主体的支持，这次冒险没有成功；但是这显然是作为与新经济政策改变对俄国农民态度有关连的国际行动。实际上，在已经变化的环境下，布尔什维克是在想方设法来加强他们在世界上的有效力量，不仅是通过更多地参加产业工人的日常斗争来加强他们在产业工人之中的有效力量，而且还在那些意识到受统治阶级压迫的农民之中增加他们的有生力量。

因此，在1921年和以后的两三年内，共产国际的政策大幅度地向右转了，它曾企图取得立足点来影响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和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会的会员。由于第二国际所属各党断然拒绝了共产党人的建议，新政策在工会中取得的进展远远超过了在政治领域取得的进展。大体说来，放弃了建立对立的工会的企图，而且共产党人在已有的工会中在获得有局部影响的职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即使在政治方面，政策的变化在德国也有一定影响，在共产党内部引起了非常尖锐的矛盾，而且只是靠着俄国人或共产国际的强大压力，政策才得以贯彻。德国共产党于1923年1月举行的来比锡代表大会对海因里希·布兰德勒领导下采取的新方针表示赞同，只不过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由于鲁尔斗争的后果以及德共本身和共产国际在这方面应遵循的路线问题上的摇摆，新方针又被推翻。<sup>①</sup>在这次灾祸之后又继之以布兰德勒失意，因为季诺维也夫以他作为替罪羊，虽然事实上这次失败主要应由共产国际负责。

---

<sup>①</sup> 见本书第655页。

继道威斯计划的谈判之后，1923年德国发生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对共产国际政策的重新考虑。这时人们划分了两种“统一战线”的界限——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内容包含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上层的合作，另一种是抵制这种合作的“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其宗旨在于使共产党人与基层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会员在一个共同的运动中团结起来，共产党人希望能够引导和控制这个运动来适应他们的目的。季诺维也夫表示赞成第二种“统一战线”以及对“工人政府”一辞进行适应这种“统一战线”的、并使之包含某种无产阶级专政的解释。这样，共产国际的政策再次向左转，但是却没有回到1919年策略的极限——因为人们仍然承认，眼前不存在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当务之急是唤起工人，加强他们在追求近期经济利益时的战斗性。

此外，还存在相反的思潮。如我们在前文所见，1924年以后，随着工党政府倒台后经济状况的变化以及矿产危机的临近，英国工会向左转了。争取英国工会的支持，来对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施加压力，机会大好，不可坐失；在1925到1926年之间，俄国工会 707 被利用来推行工会事务中的“统一战线”政策。在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随着布兰德勒在德国党的领导地位被取代，政策似乎肯定要向左转；但是实际上在此后一两年内，共产国际在不同的方面奉行不同的政策，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明确的方针。这种模棱两可的状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本应在1926年举行的代表大会从未举行。1925年，接替布兰德勒的德国左翼领袖也以左的偏差的罪名被清除出党；仓促接受了新方针的欧内斯特·台尔曼（1886—1944年）成了德国共产党的公认领袖。

在此期间，俄国共产党内部日益发展的争论达到了顶点。在列宁去世后争夺领导权的较量中，斯大林已经取代了托洛茨基；然后在1925年年底时，以前是盟友的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主要在

应给予富农何种待遇问题上反目。翌年，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这一年年底，季诺维也夫被撤销了他在共产国际中的领导职务，并由布哈林接替——肯定是向右转的行动。1927年，俄国以外的共产党对它们领导阶层中的左翼分子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清洗，而在俄国，斯大林与其对手之间的斗争其势不减。同年，事件接踵而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失败；英俄贸易协定结束；维也纳的七月起义失败，还有一系列其它事件在俄国引起了一系列的战争恐怖。这年年底之前，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已经被清除出党，共产国际政策史上的“统一战线”时代遂告结束。到1928年举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有人宣称，与早先的立即革命时期和奉行统一战线策略时期都不同的战后历史上的“第三时期”即将开始，但是根本没有人明确知道这个“第三时期”包含什么内容。有一些人——包括布哈林在内——认为资本主义的恢复过程可能继续下去，从而同意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书记处向1928年的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中所作的判断；另一方面，其他一些人预言资本主义世界眼看就要发生会为新的革命进展打开道路的危机。布哈林由于深知不会让他长久担任共产国际的领袖，乃在他以主席身份发表的演说中阐述了这两种见解中的头一种见解，并激烈攻击斯大林力图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政策越来越僵化。他援引以前收到的一封列宁来信说：“如果你把所有不是非常顺从的聪明人都驱逐出党，而只留下千依百顺的白痴，你肯定会毁灭党。”难怪布哈林迅即被解除了他的重要职务而且没有任命任何人来接替他。斯大林绝对不希望面对一个凭借他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名义领袖的有利地位可以向他的权威提出挑战的对手。

实际上，在1928年共产国际举行的正式代表大会之后，直到1935年才又举行正式代表大会，这时，希特勒在德国已执政两年，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早已经过了它的最低潮。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



的时期里，由于一度强大的德国劳工运动的衰落以及经济萧条对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劳工运动的影响，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对此，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运动已使其思想逐渐适应。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经济萧条虽然就其后果而言比资本主义早先的任何危机都更具破坏性，与之俱来的却不是新的工人革命行动，而是在共产党人以前寄予厚望、认为十之八九会效法俄国榜样的国家中的反革命行动，以及在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这样一种最不革命的要求：采取措施，有计划地使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正常运行的状态，从而限制失业和紧缩通货强加给贫苦阶级的苦难。1928—1929年时就已经宣告其到来的“第三时期”结果证明不是一个无产阶级胜利前进的时期，而是法西斯主义大规模发展的时期，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力量总撤退的时期，以及共产党队伍陷于严重混乱的时期。总的说来，共产党人对于初期的经济萧条的初步反应是向左转，因为资本主义危机最初似乎提供了明显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加紧革命鼓动并得以煽动群众反对那些似乎不能为他们谋什么福利的社会民主党领袖。1928年有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德国共产党右翼在该党执委会中取得了多数，但是随即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被开除出党。此后德国党又恢复了事事听命共产国际的状态，并发现自己面对着纳粹党人在1930年9月的选举胜利最先明确显示的、日益强大的力量。在经济萧条期间，共产国际置身事外，因为它无法对事态发展产生任何重大影响，而且苏联一直在进行的内部斗争在世界各地产生的反响也使它越来越烦恼。在这些年代里，俄国人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解决艰巨的农业集体化问题十分繁忙。斯大林则忙于在苏联国内肃清富农和摧毁残余的反对力量，以致无暇他顾，只能给予外界事务次要的关切。在俄国以外的许多共产党内存在“托派”的纠葛；虽然经济萧条自然为它们带来了许多新党员，尤其是从失业者和青年中间吸收的党员，

这些新党员颇不容易保持在这种被认为是必要的、不重视各该国的不同状况的刻板纪律管束之下。从1924年斯大林最初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起，共产国际就越来越成为俄共的用于保卫苏联对付其敌人的辅助机构，而不是一个维护工人阶级总体利益的世界性的运动的、有组织的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之中丝毫不存在广泛的革命情绪的情况下，其实它也只可能是这样。因为，既然就社会主义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而论，德国显然已无取胜希望——而且看来中国也完全失败了——，下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何处发生呢？肯定不是在法国，或者英国，或者美国，或者哪怕是甘地的影响最大的印度。当然不是在比较顺利地经受住经济萧条的斯堪的纳维亚，或者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日益疯狂的反动势力面前正不断退却的奥地利，或者在皮尔苏茨基正迅速扩大他的独裁权力的波兰，或者在霍尔蒂的地位仍然完全没有动摇而工人阶级运动则已几乎完全衰落的匈牙利。毫无疑问，在墨西哥存在较大的革命潜力，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也有某种特有的革命。但是这些颠覆活动即使具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倾向——似乎不大可能——，也与共产国际在资本主义世界关键地区所面临的形势几乎风马牛不相及。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提供了捣乱的机会，但是仅此而已；而捣乱尽管对于苏联与外界打交道可能有某种用途，却丝毫也无法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成立共产国际时抱有的奢望再次出现。

在我开始写作本卷时，纳粹党人还没有在德国执政，罗斯福总统还没有在美国开始实行新政。在经济思想领域，J. M. 凯恩斯的概念还没有完成此后几年中方才完成的革命。凯恩斯步J. A. 霍布逊的后尘，确实已经宣告试图以纯粹紧缩通货的措施来应付失业的影响乃是蠢举，认为这种措施只会使失业更为恶化；但是对于他的概念的理论基础以及这些概念对于在充分就业基础上重建资本

主义具有的潜在作用，人们仍然所知甚少。社会民主党人像共产党人一样还在辩解说，危机和大规模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反复出现的现象，只有采纳社会主义化的经济才能消除这种弊病，虽然社会民主党人由于反对革命，要求采取会导致资本主义复元并同时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处境的治标办法，而共产党人则希望和预言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即将来临，尽管他们眼下除了显然不会发生世界革命之外还拿不出任何办法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共产党人仍然认为法西斯主义无非是资本主义为抵抗工人阶级的要求而采取的强暴的和独裁的方法，而拒绝承认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新力量，诚然它是在资本主义支持下起作用，却有它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基础。毫无疑问，就巴尔干各国、波兰和匈牙利、甚至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或半法西斯主义具有的形式而言，共产党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要忽视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因素并且认为比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阶级具有它肯定并不具有的力量和影响，也是最令人误解的。当然，尽管德国资本主义要强大和发达得多，如果把希特勒简单地看作资本家的傀儡，甚至认为纳粹主义的发展由于它没有能力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不久便会自生自灭，从而实际上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有帮助，这种看法就更加不切实际了。共产党人及时地开始理解到法西斯主义是他们最可怕和最危险的敌人，于是便改变战略和寻求盟友与他们共同进行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征讨。但是，只是在希特勒消灭了魏玛共和国并且作为他统治欧洲、甚至是统治世界的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巩固了他在德国的政权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由此可见，在本卷所涉及的整个时期内，对立的几个国际所代表的政策南辕北辙，以致根本不存在它们采取联合行动的任何可能性。伯尔尼国际及其后继者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始终反对世界革

命的整个概念以及完全由工人阶级的代表进行统治的概念——当然，对于自称代表那个阶级的党进行一党统治，那就更为反对了。

712 上述国际是议会民主论者，除非在凡属可能的地方，通过在普选权基础上进行的自由议会选举，确认各该国全体人民的大多数同意建立社会主义，否则它们就不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权利。在不举行这种选举可能性的国家里，它们实际上没有这种使命，它们只能抗议将它们排除在外的不民主做法。至于那些确实大体存在民主议会制度的国家——即它们寄予希望的国家，它们设想的是人民的大多数逐渐信仰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条件逐步改善，而在大多数被争取过来之后，会出现一个仍然是逐步的转变，在这个转变阶段的期间，就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其中和平共处的混合经济。为了取得向社会主义的这种逐步进展，显然需要使资本主义尽可能保持繁荣并避免国际战争。于是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及下属各党就热衷于和平事业、国际仲裁和裁减军备，并且在它们的国家由于世界经济萧条而备受打击时希望协助经济恢复的过程，而不是利用经济萧条使资本主义的困难更加严重。

与这种观点相反的是，共产党人从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设想世界形势。在他们看来，俄国革命是必然要发生的世界革命的开创阶段，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内部矛盾的压力下迟早必然崩溃，而在世界进化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是它唯一可能的后继者。俄国人指出了道路；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着不可逃避的义务，来仿效他们的榜样，并且使用在使俄国革命达到胜利以及使它在这么多强大的敌人面前得以立足方面行之有效的方法。即使不得不推迟早日迅速进行世界革命的希望，也只是推迟而已，而不是放弃。对时机选择可以提出疑问，然而不论对结果还是应采用的方法却没有  
713 怀疑余地。即将到来的革命是世界范围的，是浑为一体、不可分割的，虽然革命的时机可能因国而异。因此，至关紧要的任务是激发

各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情绪，并乘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困难重重的机会来加剧革命动乱，而不要考虑对于工人阶级当前处境的后果。当然，有必要支持工人的当前要求——因为这是争取他们支持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日常斗争的结果只有在它影响革命成败的前景时才有重要性。

共产党人并不希望修补资本主义，使它能够在社会主义逐步实施时继续维持下去；他们希望摧毁资本主义，如果暂时还不可能，就尽量骚扰和麻烦它。尤其在他们等待资本主义在其主要的力量中心崩溃时，他们总是借助在资本主义的部分力量所依赖的从属国家——殖民地或经济势力范围——制造麻烦，来千方百计对之进行斗争。俄国不仅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亚洲国家，共产党人这样做时最顺手的工具在亚洲，首先是在一直在孙逸仙领导下经历其本身的革命的中国。在对英国人进行争取自治的斗争的印度，在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在中东国家——从英国占领下的埃及到长期以来一直是英俄角逐之地的波斯，也存在机会。在亚洲和东地中海以外的地方，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存在煽起对美帝国主义的反抗的机会；在南非，在受白人统治压迫的矿工之中存在机会。所有这些机会都没有被放过；俄国和共产国际的使者在几乎所有的地方一直很活跃。此外，还有无数外国革命者被送到苏联接受革命宣传艺术和苏维埃辩护术的训练。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盟的崩溃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都是重大打击，这714不仅是由于此事在远东的影响，也是由于它对于共产党的威信的更广泛的反响。但是为帝国主义者制造麻烦的政策并未被放弃：这项政策从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得到了新的动力，因为萧条最沉重地打击了最依赖世界市场推销其主要产品的国家。除了共产党人之外，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也是动辄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些弊端，并要求给予被奴役人民以自治权；但是他们考虑问题往往不是主要从殖

民地叛乱或不发达国家的革命的角度出发，而是主要从帝国主义国家的逐步让步以及在仍然受贵族封建统治的国家建立民主代议制政府的角度出发。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在亚洲或非洲或拉丁美洲与在欧洲或美国一样，不可能进行合作。虽然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提倡者，并且要求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和消除种族歧视，他们赋予了“社会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不同的涵义。

在我论述几个对立的国际的情况到1931年为止时，它们之间的矛盾并未解决，甚至时至今日，观点之间的矛盾也仍然没有解决。除非要么苏联崩溃，使得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世界力量没有可资替代的实力基础，要么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失去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主体的忠诚——除了德国以外，从未发生这种情况——，情况必然是如此。再有一层，这种矛盾必然支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事务，尽管永远会有许多社会主义者个人对两个极端党派都抱严厉批评态度，既不愿意认为苏联是应该仿效的无可指摘的光辉榜样，也不满足于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信仰议会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自鸣得意的渐进主义。如前文一再表明的，中派在两个庞然大物之间被碾成了齑粉。

## 第二十三章

715

### 美国，加拿大

如我们在本书前文所见，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相当迅速地发展到大约1912年以后，在1914年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失势。<sup>①</sup>我曾在本书第三卷里略微解释过这个事实，所以无需再作重复。我只需说：在1914年以前抑制社会主义运动的那些因素在战后起了大得多的作用，而且在三十年代的那几个经济萧条的年头一度短暂中断之后，一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我确信，其中主要的因素是美国资本主义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交货”方面的杰出成就——唯有趋势最急剧地逆转的萧条时期是例外——以及美国工人在这种不断上升的生产率中占有的巨大份额。当然，自从三十年代实行新政以来，后者要比以往明显得多。美国工会的谈判实力有了戏剧性的增长，并且被用来不仅争取提高工资，而且争取远为优厚的社会保险和改善地位，所用办法不是攻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不断施加压力争取较好的就业合同，从而挤压资本主义制度。在此期间，以往以极其敌视工会要求著称的美国资本主义已大体上基本改变了它的战略，并且认识到以作出巨大让步——它有丰厚的赢余，绰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换取工会和工人阶级支持的好处。在一种其特色为几乎不断地充分就业的、迅速扩展的经济中，就物质意义而言美国资本主义付给了工人优厚的报酬，以致他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776页。

716 们并不花费精力来试图推翻资本主义而是与之合作，但与此同时，有鉴于这种状况有可能不能无限期持续下去，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有备无患的状态。

奉行这项政策比较容易，因为美国社会由于移民人数锐减，要比以往远为单一，结果欧洲对于美国思想方式的影响——包括社会主义的影响——急剧下降。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受接二连三的移民浪潮所带来的欧洲思想支配：社会主义从未使美国出生的工人主体向往，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阶级结构很不固定，他们并不认为他们个人毕生处于无可救药的低劣的社会地位。由于不存在有权势和有根基的世袭贵族，由于有可能依靠个人努力提高社会地位，这就使得阶级意识不像在欧洲那样变成一种强烈的情绪。虽然在1914年之前，可供大规模逃避工资奴役的“边疆”早就几乎关闭，在工资制度范围内改善物质条件的前景仍然十分良好，足够减弱对社会基本结构作革命性改变的愿望。在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大多数工人——思想里，社会主义是一种不符合美国国情和甚至遭到厌恶的外来学说，之所以遭到厌恶是因为社会主义似乎意味着大大增加国家对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及强加给人们违背美国的自由概念的官僚主义控制。

1914年时在美国存在的那种社会主义只是少数派的信仰，这种少数派部分地是由欧洲移民和从其移民父母接受思想的子女构成，部分地是由唯心主义者所构成，他们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是建立在道义责任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任何阶级斗争的概念上。

717 第二国际的崩溃以及大多数欧洲社会党支持他们各该国政府是对美国社会党人的沉重打击，他们曾认真对待国际的反战和反帝国主义声明，大多数人发现难于理解国际怎么竟然可能崩溃。由于1914年一时还不存在美国直接卷入战斗的问题，美国社会党人还无需面对投票赞成或否决战争信贷问题。起初他们只是旁观



者，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是否能在结束这场讨厌的斗争方面有所作为。一个人数不多的少数派，包括威廉·英格利希·沃林(生于1877年)、A. M. 西蒙斯(生于1870年)和约翰·斯巴哥(生于1876年)，决定支持协约国，指责德国军国主义是一伙坏蛋并指责德国多数派社会党人是叛逆的教唆者。至少有一些威斯康星州的德国血统的美国人显示了“亲德”迹象。但是美国社会党人的主体由于对于交战双方不加细致区别，满足于指责这场斗争是发生于大国之间的资本帝国主义竞争的“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违背了黎民百姓的意志和利益把他们卷了进去。1914年9月，美国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向各欧洲党建议在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以便讨论结束战争的办法。各交战国的社会党对这项呼吁不予理会；但是一些欧洲中立国的社会党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力主在欧洲中立国、而不是在美国举行拟议中的会议。美国社会党接受了这项建议，于是为1915年1月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作出了初步安排。在这个阶段，美国人仍然希望各交战国社会党能同意派出代表。当他们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时，他们失去了兴趣。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书记卡米尔·休斯曼斯写信贬损这次拟议中的会议，称之为时机不成熟，于是原议作罢。<sup>①</sup>美国社会党随即拒绝再向执行局缴纳会费，听任它的第二国际成员资格因不履行义务而放弃。

此后，在放弃了使欧战结束的企图之后，美国社会党在1917年之前一直致力于使美国不致于卷入战争。这种态度使他们有一个718时期与威尔逊总统站在一边，而且在一段更长的时期内使他们与若干美国的非战主义团体站在一边。有一个时期，除了人数不多的亲协约国集团之外，社会党人一致主张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交战国实行全面禁运，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个要求使他们与德国的支持

---

<sup>①</sup> 见本书第30页。

者站在了一边时他们随即放弃了这个要求——因为协约国掌握着制海权，它们已经切断了与同盟国的贸易，如果实施禁运，实际上只会意味着拒绝供应物资给协约国。1916年，当威尔逊总统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将近结束时开始要求实行军事“有备无患”方案的时候，美国社会党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还采纳了阿兰·路易斯·本森在《诉诸理智》一书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要求：除非为了击退实际的入侵，在宣战问题交付全民进行公民投票之前，美国不应宣战。主要凭借这个建议，本森于1916年被作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提出，在此之前，尤金·德布斯(1855—1926年)主要由于健康原因，拒绝再次竞选。本森得票不多，只获得585,000票——比德布斯在1912年获得的票数少三分之一——，这部分原因是本森不像德布斯那样是全国知名人物，也是由于社会党的确一直在失势，也是由于1916年时威尔逊总统仍然对于处于社会主义运动边缘的许多美国进步分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翌年，由于德国发动了漫无限制的潜艇战，美国参战了，社会党人面对着既成事实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浪潮，不得不决定何所适从。1917年4月在圣路易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美国社会党采取了强硬的反战方针，只有寥寥无几的代表支持约翰·斯巴哥提出的主战的少数派报告。反对战争的决议在交付全体党员复决投票时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的赞同。此后，美国社会党，包括人数不多并日趋衰微的劳工社会党在内，不得不面对迅速增长的反对力量和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因为邮局不许社会党报纸使用邮递而阻碍了社会党报纸的发行工作，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党演说家和作家因触犯特别法而被监禁，这种法律是为了处理一切被控阻碍兵役征召和以任何方式妨碍进行战争所需措施的人而仓促制订的。法院严厉处置了美国战争政策的批评者和反对者；威尔逊总统本人完全支持联邦公职人员中比较坚决地迫害

社会党人的人。除了联邦制订针对煽动行为的法律——尤其是1918年的反煽动法——之外，各州也相继分别制订了进行镇压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仅针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也针对该运动的右翼，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美国劳联下属各工会的支持；在塞缪尔·龚帕斯的卓越领导下，美国劳联采取了强硬的主战方针。在1917年以前，虽然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中的左翼工联主义者常常受到法律的无情对待，虽然经常动用州和联邦的部队来对付罢工工人，大体说来，美国是一个容许有广泛范围的政治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国家；但是从这个国家参战的时刻起，这一切都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不仅是反战的演说家和作家，还有一切可能被控在任何方面阻碍战争进行的人，都朝不保夕，随时有遭到法律惩处、甚至遭到肉体伤害的危险。

此外，美国社会党在1917年采取的反战立场使它丧失了许多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其中除了已经提及的人以外，还有阿兰·本森、厄普顿·辛克莱（生于1878年）和C. E. 拉塞尔（1860—1941年）。主战的社会党人开始组织一个与美国社会党敌对的美国社会民主联盟，它包括一个实力雄厚的名流集团，但是追随者甚少。这个团体不久便与其它主战的进步集团合并成为“国家党”，在党内查尔斯·A. 比尔德（1874—1948年）也很活跃；但是这个运动没有根基，迅即消逝。尽管出现这些背叛，有一个时期美国社会党似乎颇为稳固。它在1917年秋的市政选举中，尤其是在纽约720的选举中获票很多；在纽约，莫里斯·希尔奎特（1869—1933年）竞选市长，他获得的票数之多在历来的社会党候选人中乃是空前绝后的。但是人们不久便看出这种实力是虚有其表。在战争年代，党员人数一直不断下降；到1917年年底，由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威尔逊总统公布的大多数社会党人情不自禁大为赞同的“十四点”计划，党的处境变得更困难了。首先是“十四点”计划问

题，不久之后是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中的态度，导致了修改圣路易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奠定的反战政策的要求。美国社会党内的反德情绪更为强烈；同时在党内，衷心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一派人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之间的矛盾开始发展。然而，在当时进行镇压的条件下，要召开可能解决这些分歧的正式党代表大会似乎并不切实可行；而根据党章，又唯有正式党代表大会才能授权修改圣路易政策。最后在1918年8月，美国社会党确实召开了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与各州的区域性组织的书记共同参加的政策会议，但是这次会议除了暴露党的队伍中存在很大分歧之外，一事无成。反战政策仍未正式改变，虽然这个政策分明在驱使党员脱党；右翼与左翼在苏维埃革命问题上的争执仍未解决。问题就这样摆着，一直到1918年10月和11月同盟国的崩溃使美国社会党人面对一种新形势，此刻问题已不再是支持或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成了采取什么政策——革命的还是改良主义的政策——作为战后时期行动基础的问题。

总的说来，战斗结束时美国出现的形势是奇特的。美国参战一举引起了一阵强烈的“百分之百的美利坚主义”，这不仅是针对那些采取反战或非战主义方针的人，也反对一切形式的左倾主义和那些未能使自己与美国“生活方式”打成一片的移民。这种态度削弱了工会，尽管它的大部分领袖支持了战争工作；因为面临日益上涨的物价而坚持提出经济要求的每一个企图都被指责为不爱国。工会活动确实从未在美国得到在欧洲得到的那种重视。虽然在某些行业里，至少在熟练工人之中，工会活动有着巩固的地位，在广大的移民工业人口中它只接触到一小部分人。有许多雇主，包括很大比例的大企业公司在内，抵制集体谈判，认为这与“合同自由”相矛盾——虽然其中只有少数是在1918年年底以前为了排斥独立工会而成立的公司工会。这项禁令已被广泛用来作为阻止

工会组织者进入非工会地区或部门吸收工人加入工会的手段，哪怕是温和的美国劳联类型的工会。一般说来，美国雇主极其敌视工会活动；虽然他们在战争期间在一定程度上克制住自己不对工会活动本身采取主动措施，他们却不放过任何机会对一切显示战斗精神的工会进行严厉打击，并且千方百计将整个运动与其极有战斗性的左翼等同看待。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是左翼的象征，这个毫不妥协的机构在1917年以前早就已经失去它的大部分力量，在西部矿工联合会背叛之后，其主要实力在东部各州和中西部各州的移民工人中间；但是，它仍然遭到了猛烈攻击，并被利用来作为使一切形式的战斗性工会活动声誉扫地的工具。此外，反工会的雇主从中产阶级的舆论以及两大政党的联邦和州一级的政治家那里获得了对他们的反劳工组织运动的广泛支持。威尔逊总统虽然就国际政策和社会政策而言都算是进步人士，却与其他人一样激烈反对一切他认为是阻碍战争努力的人，并且积极鼓励他的部长们，比如邮政部长阿尔伯特·伯尼森以及后来的司法部长 A. 密契尔·帕尔默，对社会党人以及被控进行“反美的”煽动性活动的所谓工团主义者进行专横的起诉。

大战的结束并没有使这种迫害或者反工会运动缓和，而是使两者都变本加厉了。工会抓住战争压力中止的机会来坚持它们的经济要求，而大雇主则非但没有迁就工会，反而进行报复，大规模地进行反对工会的运动，坚持不论是否工会会员都可雇用，这意味着剥夺工会化和集体谈判的一切权利，并广泛成立旨在使他们的工人脱离民主工会的“黄色”公司工会。同时，由于停战还没有在法律上结束战争，根据反煽动法进行的起诉仍在继续，而且尽管提出了要求赦免的上诉，那些已因战时犯罪入狱的人仍在狱中。在大为扩大的规模上，对工会采用了经由法院下达禁令的做法。1919年时，罢工风起云涌，其中有许多遭到了州和联邦军警的暴力镇

723 匪；大公司雇用了一伙工贼和告密者渗透到工会和左翼组织里，以便破坏它们的工作和检举“鼓动者”——这个名词用途广泛，几乎适用于一切种类的工会和社会党活动。这种大规模的迫害对于驱使甚至是比较稳健的工会向左转自然起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劳联加入了要求赦免入狱者的行列，它的下属一些工会在反对雇主进攻的斗争中采取了有相当战斗性的政策。它们还曾企图在美国劳联支持下，把在此以前成功地拒之于工会门外的某些大工业部门——尤其是钢铁工业——工会化。威廉·Z.福斯特（生于1881年）被推为决意吸收大批无组织的工人的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首脑，他一度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中很活跃，但是后来是“二元工联主义”的反对者和以“钻心术”破坏美国劳联现有下属工会这样一种政策的主要提倡者。一度势力强大的混合钢铁工人工会在1892年的移民耕地大罢工中遭到大失败后已失去控制，钢铁业于是成了反工会活动的据点。在1919年的新斗争中，二十四个各自声称有权组织某一部分钢铁工人的独立的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统一的、但却是争吵不休的组织委员会，它直接吸收会员，以后再把他们按行业分类，归入相应的地区性工会。委员会要求集体谈判的权利，恢复因从事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无数工人的工作，废除公司工会，在劳动时间和工资方面作出一些让步。大钢铁公司拒绝了这些要求，1919年9月，3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他们面对州警察的最残暴的反罢工行动，持续罢工了6个星期，在罢工过程中有18人死亡。后来罢工失败，工人慢慢恢复了工作，他们一直没有组织，直到产联在1937年组成了它的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才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对工会权利的承认。后来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并数度成为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的福斯特，在1919年罢工时是一个深受欧洲工团主义思想影响的工团主义者，热衷于以“钻心术”破坏美国劳联，以便使它转而奉行有战斗性的工业政策。在钢

铁工人罢工失败后，他转到了共产党人方面，成了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的主要人物。

然而，尽管1919年发生了激烈的劳资冲突，美国工联主义的主体仍在强烈反社会主义的人士的领导之下；而由于它们的反战态度而被沾污的各社会党则没有从工会中吸收到什么党员，虽然历来忠于它们的工会人士中有一些人，比如马克斯·海斯（1866—1945年）和詹姆斯·H. 摩勒（1864—1944年），仍然忠诚于它们，而且它们也确实从美国劳联以外的少数工会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尤其是从以悉尼·希尔曼（1887—1946年）为首的混合被服工人工会得到支持，该工会的会员主要来自尚未与美国思想方式完全同化的移民。 724

然而，在战争期间党员人数锐减的美国社会党在停战以后确实极其迅速地、源源不断地增加了新党员，其中大多数不是来自美国劳联下属的各工会，而是来自没有同化的移民，这些人除了从事制针业的人以外大部分都没有加入工会。结果是党的成分和态度都发生了突然的、令人震惊的变化。新党员入党十分迅速，以致不出数月，党员总人数便超过了1914年以前的水平。然而，新成员主要来自不同的来源，而且大部分不是吸收进了州和地方的党的正式组织，而是吸收进了单独的语言联合会，党给了这些联合会特殊的地位，它们不受州和地方党机构控制，只从属于党中央。美国社会党原来失去的党员主要是美国出生的人，并包括西部诸州的大量追随者以及小农场主和佃农社区中的一些人，因此美国社会党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东欧和东南欧移民的党，这些移民自然而然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受到欧洲当代事件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俄国革命以及霍亨索伦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继沙皇帝国之后走向瓦解而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在1918年11月以前，由于美国社会党人全神贯注于他们的反战斗争，俄国革命对他们的影响不大；

但是一旦这场斗争结束，他们就不得不应付欧洲革命对美国人民的全部影响，特别是对那些还没有完全同化、而在最近移居美国的人的全部影响。此外，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在应付这种影响的同时还必须面对严厉程度不减以往的迫害。因此，他们的最著名的领袖尤金·德布斯因为在战争仍在进行时发表的一篇反战演说却实际上在停战后很久被判处长期徒刑，尽管事实上司法部曾对这篇演说是否包含任何违法内容表示强烈怀疑。

725 进入1919年后越来越可以明显看出，美国社会党的大分裂在所难免。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的时候起，在美国成立某种共产党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或者是由美国社会党内的布尔什维克派取得对党的控制，或者是他们退党后另组对立的党。眼前唯一有疑问的是：极左派将由于希望取得对党的控制留在美国社会党内呢，还是立即分裂出去另组新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美国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暂时牢牢地掌握在共产主义的反对者——那些反对战争而且强烈反对在美国进行任何苏维埃式的革命的人——手中。但是执委会应该改选了，届时在对立派系之间显然必将有一场激烈的较量。

1918年11月，美国社会党内部的纠葛开始严重起来，当时党在芝加哥的各斯拉夫联合会不退党的情况下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宣传同盟，而波士顿的拉脱维亚联合会则创办了一个左翼刊物《革命时代》，由德·里昂在劳工社会党中的老同事路易斯·弗莱纳任编辑，他在战争期间投到了美国社会党这一边，最近出版了一本包含对共产主义事业有说服力的阐述的书《革命的社会主义》。1919年2月，弗莱纳的刊物发表了由美国社会党内的左翼分子起草的宣言和纲领，大约一星期以后，纽约的左翼分子仍然是在不退党的情况下成立了一个公然宣称以夺取控制权为目标的、党的“左翼支部”。这个左翼要求美国社会党取消要求立即社会改革的整个纲



领，而着手建立工人委员会，以便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包括工人通过工人苏维埃控制工业、废除国债、将银行、铁路和全部对外贸易社会主义化，并要求在国际上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的斯巴达克运动成员建立联系以推进革命。 726

左翼从这些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有利地位出发，会同已经掌握在左翼手中的这些语言联合会，着手尽量夺取美国社会党地方组织的控制权。美国社会党“元老派”领袖在其敌手利用一切机会破坏他们的影响时并未等待，而是立即进行报复，开除支持左翼的地方组织并企图组成在他们自己影响下的新地方组织。没有被开除的左翼分子进行报复，与这些语言联合会商定提出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参加即将举行的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并保证两个集团一致投票支持这个共同的名单。纽约左翼也决定在1919年6月召开所有左翼集团参加的全国会议，以便为夺取即将举行的美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控制权铺平道路。

在对新执委会进行投票之后，而在正式点票和宣布结果之前，美国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5月举行全体会议，会上决定对其反对派采取强硬行动。在这次会上，执委会首先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严厉步骤，以8票对2票中止了曾赞同左翼纲领的7个语种联合会的党籍——这样就一举开除了美国社会党党员总数的大约三分之一。此外，执委会接着以7票对3票废除了密执安州联合会的会章，该会实际上并未参加左翼，但曾通过决议，扬言要开除任何继续提倡美国社会党的纲领所规定的近期改革的会员。仿佛这还不够，执委会非但没有宣布新执委会的选举结果，反而宣称它收到许多有关选举舞弊情况的报告，因而它认为必须下令将实际的选票送交总部检查，然后再决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最后的这个决定导致了党的马萨诸塞州支部的反叛，它在第二天举行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参加拟议中的左翼会议。支持执委会的马 727

萨诸塞州少数派于是退出原支部，并要求执委会承认它是真正的马萨诸塞州支部，执委会随即照办了。执委会还在检验了提交给它的全部选票之后接着宣称执委会选举无效，并规定新执委会不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它决定于8月底召开的特别党代会产生。

这样，即将卸任的执委会开除或停止了党员总数中远远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的党籍，而没有给予广大党员任何机会来决定他们希望怎么做。不论在新执委会选举中可能发生过什么舞弊行为，似乎可以明显看出左翼以种种手段事实上夺得了大多数席位。然而开除出党一举使党内投票能力的平衡大大改变，并使得在即将到来的党代会上“元老派”有可能——虽说不见得肯定——有足以取胜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党内的左翼分子不得不认真考虑：坚持夺取对党的控制权是否有任何好处，立即退党并成立他们之中许多人决心要成立的共产党是否较为妥当。他们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那些被开除出党的语言联合会十分自然地决定要采取步骤成立共产党，并邀请左翼的其余部分与他们共同采取行动。但是主要由土生土长的或同化了的美国人构成的左翼的其余部分在这个问题上四分五裂，这主要是由于这一部分人之中有许多人不希望加入一个主要由斯拉夫人和其它最近移居美国的人支配的党，他们仍然希望能够将美国社会党的多数派争取过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当左翼的全国会议于1919年6月举行时，左翼的两派人都参加了；但是，主张立即退出美国社会党并成立共产党的建议被否决后，主要由各语言联合会和已被开除的密执安州代表团组成的少数派立即退出了会议，并进而采取步骤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多数派继续举行会议，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来暂时处理其事务，并商定在美国社会党举行紧急代表大会的同时在芝加哥再召开一次会议。新成立的共产党也决定在同一个时间和地点举行成立大会。这

样一来就是预定要在8月底举行三个截然不同、却又是互相重叠的集会。这时左翼组织设法掌握了当初选举美国社会党新执委会时的大量原始选票，宣布这些选票显示左翼候选人已正式当选。这些候选人随即在克利夫兰举行会议，宣称自己是美国社会党名正言顺的执委会。然后他们恢复了被老执委会开除或停止党籍的所有集团的党籍。老执委会则以牙还牙，除了那些已被开除者以外又开除了俄亥俄州支部。不过，新“执委会”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也没有企图阻挠老执委会召集的代表大会的举行。

芝加哥的活动以8月29日仍然留在党内的左翼分子的一次会议开始，会议目的是夺取对第二天美国社会党正式代表大会的控制权。但是老执委会在警察协助下，成功地阻止了被开除集团的代表们占据会议大厅的议席；在代表们就座的权利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争执之后，仍然留下的左翼分子被否决了。于是他们退出了大会，单独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与各语言联合会和密执安州代表团已经成立的共产党迥然不同的劳工共产党。曾企图达成协议使这些对立的党合并，但是谈判破裂了，过了一年共产国际才促使他们相聚一堂。两党统一的主要障碍是：不久便将密执安州代表团作为中派开除的共产党，是建立在各语言联合会基础上的并且基本上是一个新近移居美国而尚未同化的人——大部分是斯拉夫人——的党；而劳工共产党则主要代表土生土长的或已同化的美国社会主义力量的极左翼，与包括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老战士在内的工会运动左翼有较密切关系。路易斯·弗莱纳和查尔斯·E.拉森伯格在那些曾设法促使两个共产主义集团合并的左翼领袖之列；但是各语言联合会否决了他们的建议，共产党在它们的影响下拟订了一个纲领，要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彻底反对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进行社会改革的计划。在此期间，劳工共产党在进行了导致左翼中相当大一部分不那么极端的人退

党的激烈的内部斗争之后，拟订了一个非常相似的纲领；两党都宣布它们加入共产国际。

可以料想，美国社会党的残余力量在摆脱了各语言联合会及其最左翼的派系之后，本来会向右急转，并接受像威斯康星州的维克托·伯格(1860—1929年)这样的稳健的老领袖的领导。然而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留在美国社会党内的另外一位杰出领袖是纽约的莫里斯·希尔奎特，他在整个这段时期一直因病没有视事，但是即便不在场，他仍然通过纽约代表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希尔奎特没有参加老执委会对左翼采取的严厉行动，他虽然不是布尔什维克，却比威斯康星州集团左得多。在他不在场时，纽约代表团负责人约翰·路易斯·英格达尔尖锐地批评了老执委会的政策，到了大会进行投票，选举一个代替被老执委会斥为依靠舞弊当选因而不予承认的执委会的新执委会时，老执委会中只有1名委员詹姆斯·奥尼尔(生于1875年)重新当选。大会上引起争议的一大问题是美国社会党对于几个对立的国际应采取什么方针。这个问题被提交大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互相对立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报告。两个报告都断然抵制被英国党和德国党控制的伯尔尼国际：<sup>①</sup>多数派建议，召开一次邀请所有接受阶级斗争的党——包括俄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以便成立一个新国际；以英格达尔为首的少数派建议加入共产国际，“倒不是因为它(美国社会党)支持莫斯科的纲领和方法”，而是以此表示重视莫斯科采取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联合力量的立场。大会没有接受这两个建议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将这两个建议都交由全体党员进行复决投票，1920年1月投票表决结果是赞成少数派的报告。于是美国社会党便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

---

<sup>①</sup> 见本卷上册第290页。

是这个机构已经收到了两个对立的共产党的申请，对美国社会党的申请便不予答复，当时国际正忙于制定“二十一条”，由于其中包括指责希尔奎特是危险的中派，简直不可能指望美国社会党会同意。在1920年5月举行的美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再一次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国际关系委员会又提出了对立的报告。这时多数派赞成只是在共产国际愿意把它自己变成一个包括“所有社会主义力量”的无所不包的国际、而且不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普遍适用的教条的条件下，才加入共产国际。包括英格达尔在内的少数派赞成无条件加入；维克托·伯格以极右翼发言人的身份提出了第三个报告，反对今后与共产国际发生任何联系。两个主要报告再次交付党员进行复决投票，结果以微弱多数赞成有条件加入。在1921年举行的下一次大会上，无条件和有条件加入共产国际的建议都被否决，另外一个要美国社会党加入“第二个半”维也纳联盟的建议也被否决。然而在第二年，最后这个决定被撤销了。美国社会党加入了维也纳联盟，不久以后该联盟便与伯尔尼国际合并而成为工党和社会党国际。这样美国社会党结果成了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希尔奎特和伯格成为该党在工党和社会党国际执委会中的代表。

到了这个时候，美国社会党的剩余力量已经大幅度向右转。但是转变是逐渐的，因为仍然存在的左翼分子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进行顽强的斗争。在此期间，1921年党再次提出它的忠诚的老战士尤金·戴布斯为其总统候选人，他曾在1916年拒不接受提名。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德布斯于1919年初根据反煽动法已被逮捕入狱，这时仍在狱中，威尔逊总统亲自拒绝一再为释放他提出的要求。戴布斯不得不从狱中进行竞选：他毫无机会发挥他的演说能力，他受到限制每星期仅仅能够与外界通讯五百字——这是一种严重的障碍，因为他虽善于辞令，却是一个蹩脚和噜嗦的作家。

尽管如此，他获得了915,000张选票——这是一个社会党候选人历来得到的最多票数。当然，竞选活动主要集中在呼吁赦免他以及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根据反煽动法判处徒刑的许多政治犯；但是威尔逊总统始终顽固不化，直到非常反动的哈定总统就职以后才释放了他和其它一些人。关于释放戴布斯和大赦的要求在社会党队伍外博得了广泛支持，就连塞缪尔·龚帕斯和美国劳联也赞同这项要求，龚帕斯还曾于1921年亲自到监狱探访戴布斯。对于戴布斯长期被监禁产生的同情毫无疑问增加了戴布斯作为总统候选人获得的选票，因为到那个时候，美国社会党已丧失其大部分影响。1919年，就在有人分裂出去组成共产党之前，其党员人数远远超过10万人。第二年在总统竞选时，党员人数减少到不到27,000人；两年以后，又减少到11,000多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党感到必须寻求新的行动方针，既是为了与共产党人斗争，也是为了拯救自己免于彻底毁灭。它的领袖认识到，它完全不可能把相当一部分无论如何应算是社会主义的舆论争取过来支持它自己的纲领，但是可以促使这部分舆论支持一种包含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改良主义政策，诸如实行铁路和其它公用事业的公有和公共管理以及实行一些社会改革措施，并反对大雇主赞成的所谓“美利坚计划”。

732 因此，莫里斯·希尔奎特在美国社会党的1921年大会上提出并使之通过了一项决议，责成全国执委会对美国所有的激进组织和劳工组织进行调查，以便查明它们是否可能愿意在一个与美国社会党的纲领并无矛盾的政纲下，并根据容许美国社会党在一个较广泛的政治结构中保持其“完整和自主”的条件，与社会党人进行合作。执委会应就这个问题向1922年的大会提出报告。在面对强烈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通过的希尔奎特决议明显说明美国社会党企图与非社会主义的劳工集团以及其它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并接

着企图在联邦和州的政治中建立某种进步的第三党，如果可能的话，以工会的支持作为可靠基础。希尔奎特心目中显然是想建立一种与英国工党相似的集团，但又有足够广泛的基础，可以至少把一部分农场主和其他可以不再效忠于现有的两大政党的进步分子吸收进来。在某些方面说来，1921年的形势有利于采取这样一个步骤。美国劳联力图促使对工联主义和社会立法持友好态度并反对“美利坚计划”的候选人当选为国会和州议会议员，而且还进一步阻止那些对工人阶级的要求极其敌视的候选人当选，但这种努力收效甚微，对此它感到失望；在美国劳联之外，还有若干日趋壮大的独立工会，比如混合被服工人工会和重要的铁路工人兄弟会；至少在某些方面，这些工会大体上同情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铁路工人兄弟会在1919年初提出一个计划，主张将美国铁路收归公有，并且在资方、工人和州当局三方提名的代表共同管理体制下营运。由铁路工人兄弟会法律顾问格伦·E·普拉姆拟订的这个“普拉姆计划”不仅得到这些团体的赞同，也得到了联合矿工工会和美国劳联的赞同，塞缪尔·龚帕斯实际上是曾在为这个计划进行宣传的普拉姆计划联盟的主席。在工会和广大的进步分子中间，<sup>733</sup>对于重大的公用事业进行公共管理和经营的建议也受到广泛支持；社会党人为之受到鼓舞，他们希望这些举动可能为一个新党铺平道路，认为尽管他们力量薄弱，在工会支持下他们在不久之后便能支配这样一个党。1921年秋，铁路工人兄弟会邀请美国社会党参加定于1922年2月在芝加哥举行的会议，以便通过“旨在把理应属于人民的主权交还给人民的根本经济纲领”，美国社会党接受了这一邀请。

拟议中的会议如期举行了，代表各种各样观点的团体参加了会议。除了铁路工人兄弟会和若干其它工会之外，与会团体包括：1920年成立的、企图恢复旧的人民党运动的新的农场主工党；一直

企图使两大党采纳进步候选人的非党联盟；还有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共和运动的残余力量；若干宗教性的社会福利团体以及美国社会党——更不用说还有相当多的难以言状的改革者，从具体的改革的提倡者到彻头彻尾的狂热分子，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芝加哥会议商定成立一个名叫进步政治行动会议的联合机构，其职责是在1922年的国会和州的选举中为不论是什么党派的比较进步的候选人积极竞选。这并没有使曾希望成立一个新的第三党的社会党人感到满意；但是他们决定支持进步政治行动会议，尽管他们在其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代表名额。

在参加芝加哥会议的团体中，农场主工党似乎是这个阶段最有希望的团体。1919年末，该党的前身美国工党在芝加哥成立，受美国劳联地方负责人约翰·费茨帕特里克(1871—?)和老资格社会党人马克斯·海斯领导，当查尔斯·拉森伯格(1882—1927年)为左翼夺取了俄亥俄州支部的时候，海斯在俄亥俄州退出了美国社会党。在为钢铁工人组织工会的工作中，费茨帕特里克曾与威廉·Z.福斯特有密切联系，并且是美国劳联左翼的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此后，在1920年7月，美国工党与四十八人委员会——老进步党的幸存者组织——联合组成了农场主工党，在1920年的选举中提出犹他州的派莱·克里斯坦森(1880—?)以及马克斯·海斯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获得30万选票。该党在1920年曾试图促使美国社会党撤回它所提名的德布斯并同意联合竞选，但遭到社会党人拒绝。1921年，由于社会党人改变策略，农场主工党似乎成了一个可能的盟友；但是翌年，共产党人就取得了对该党的控制，他们通过若干辅助性的“外围”组织，成功地渗透到了该党内部。费茨帕特里克和海斯退出了该党，该党于是瓦解；1924年，该党的明尼苏达州支部曾试图成立一个新的农场主工党，但由于共产党人再次成功地取得了控制权，这一企图遭到了类似的命运。



前社会党人阿瑟·C. 汤莱于1915年在北达科他州组成的非党联盟是一个不是那么有希望的盟友，虽然它的大部分主要发起人都是、或曾经是社会党人——其中有沃尔特·T. 米尔斯（1851—？）和查尔斯·爱德华·拉塞尔。因为该联盟是由于对组成“第三党”的前景的幻想破灭而产生的，它基本上奉行这样一种政策：使它同意的候选人在两个老党中任一个的主持下提出。在北达科他州，非党联盟曾经一度获得惊人成就，到1921年时老党联合一致反对它，终于破坏了它的影响。后来该联盟有了起色，并且终于使几名追随者当选为国会议员。当时该联盟自始至终基本上是一个人民党的、农场主的运动，除了赞成为了农场主的利益由州当局援助农场主并将谷仓收归公营之外，与社会主义绝无真正的密切关系。1921年，该联盟已经是一支迅速衰落的力量。

建立美国社会党所希望的那种第三党的前景，主要取决于能否取得至少是很大一部分工会运动的支持，首先特别是得到带头成立进步政治行动会议的铁路工人兄弟会的支持。但是不论是兄弟会还是派代表参加芝加哥会议的其他工会都不愿意走到建立新的政党的极端，以致与它们在老政党中的朋友们断绝关系的程度。1922年，进步政治行动会议曾在击败某些极为反动的候选人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并无多大成就。在1922年12月的第二次会议上，社会党人曾敦促立即成立新党，结果仅以64票对52票之差遭到否决，徒劳无功。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支持并非来自工会，而是来自资产阶级进步团体。就连铁路工人兄弟会也仍然喜欢在现有党派中交朋友的超党派策略。然而美国社会党仍然参加进步政治行动会议的工作，当该团体在其1923年的会议上决定在翌年的总统选举中单独提出候选人、而不赞同提出全国规模的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参加国会和州的选举时，美国社会党感到有了大得多的希望。总统候选人是威斯康星州的进步人士罗伯特·拉福耶特

(1855—1925年),进步政治行动会议发动了大规模的竞选运动。美国劳联暂时修改了它的超党派政策,决定支持拉福耶特和进步政治行动会议的副总统候选人,虽然并不参加进步政治行动会议或赞同任何成立新党的建议;因此,进步政治行动会议获胜的前景大为改善。拉福耶特的竞选纲领是一个进步的、但全然是非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得到美国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赞同,附加条件是美国社会党仍然恪守其社会主义原则。

在随后的竞选运动中,许多人企图诬蔑拉福耶特,说他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并将进步政治行动会议说成是秘密的共产党机构,虽然事实上拉福耶特曾激烈谴责共产主义运动,而进步政治行动会议则曾坚定地将共产党排除在它的一切事务之外。最后,拉福耶特获得将近500万选票——占总票数的大约17%,只在他自己所在的州获胜,但在主要是西部的11个其它的州,得票超过了民主党候选人J.W.戴维斯。共和党人卡尔文·柯立芝以绝大多数票当选。在国会选举和州的选举中,美国社会党单独提出了与其它  
736 进步团体不同的候选人名单,但结果不佳。维克托·伯格在密尔沃基的选举中赢得一个国会议员议席,但是整个说来,社会党人在州和地方选举中结果都很差。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总统选举中已表现有能力获得可观选票的进步政治行动会议是否应该将自己变成第三党;不过在1925年2月它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工会拒绝了这个建议,而听任赞成这个建议的一些团体——主要是美国社会党和一些农场主团体——去争论这个问题。后来这个方案失败了,因为虽然剩余的进步团体希望成立一个完全建立在个体党员基础上的党,美国社会党却坚持按英国工党的联合组织方式,建立一个会让社会党人作为自治团体加入的联合机构。这个建议遭到拒绝之后,美国社会党退出了进步政治行动会议,后者此后便迅速消亡,而使社会党再次成为独立的组织,不过已空前衰弱,党

员人数已从9年前的巅峰状态的108,000人减少到1928年时的不到8,000人。在这以后党在新的领导下略有起色。在1928年的总统选举中,党提出了一个新候选人诺曼·托马斯(生于1884年),他以前是一位颇有道德热情的牧师,在短暂的时间内崭露头角。在老一辈的领袖中间,希尔奎特和伯格仍然很活跃,但是由于他们出生于外国,都没有资格担任总统。德布斯这位党的“元老”为事业鞠躬尽瘁,于1926年去世;托马斯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宣传家,是德布斯的最杰出的后继者。德布斯在他健在并愿意竞选的时候,一直是总统候选人的不可避免的人选;因为尽管他一直是党的极左翼,却是到处知名并对人民具有真正广泛的号召力的唯一党员。此外,他一直竭尽所能、小心翼翼地超然于党内争执之外。右翼从不喜欢他,并曾一再试图物色可以取而代之的人选;但是除了1924年他拒绝提名那一次以外,他们不得不支持他作为唯一能够取得可观选票的候选人。德布斯的诚实和自我献身精神是毋庸置疑的。他不是伟大的理论家,但是他具有一种特别对于西部各州的许多纯朴的人有强大号召力的人情的温暖,而用比较世故的态度是难以打动这些人的。他首先是作为代表一种与塞缪尔·龚帕斯和美国劳联的工会精神大相径庭的工会精神——其实是代表一种与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阶级战斗精神相近得多的精神——的工会领袖享有盛名的。但是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工团主义者,而且像为社会主义出力一样,愿意为零碎的改革出力,最重要的是随时准备支持被压迫者的事业。尤其是最后一个品质使他像对产业工人一样对小农场主和佃农具有同样的号召力,并且使他为美国社会党在美国西部各州争取支持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他的精力在他去世之前的几年一直在衰退:其实,他从来没有从1919到1921年的监禁造成的损害中复元,因此美国社会党在西部的衰落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年里和这些

737

年以后他被免除了领导职务。没有了他，美国社会党就没有任何人具有类似的号召力。W. D. 海伍德（1869—1925年）由于对政治行动持敌对态度而被驱逐出党，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对矿工、石油工人和码头工人具有同样的号召力，但是对于农场主并非如此；再没有任何其他主要人物具有同样的号召力。

在1919年分裂之后，美国社会党的其他领导人之中有莫里斯·希尔奎特，他是纽约的一个律师，在法学方面以及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都颇有能力，但是他基本上是一个在群众领导方面没有任何高超本事的知识分子和城里人。战前他在第二国际中曾发挥过相当积极的作用，他的社会主义是正统的战前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社会主义。在1918年开始的革命动乱期间，有一个时期他曾略有左倾，但是还没有左到足以使他不成为共产党指责的主要目标，共产党斥他为中派路线的主要倡导人，而中派路线遭到了共产国际最严厉的攻击。在美国社会党与共产党人分裂以后进行的唇枪舌战中，他又向右转，成为导致美国社会党与非社会主义的进步人士联合支持拉福耶特于1924年竞选总统的那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为进行那场角逐曾企图成立一个联合的工党，在这一企图失败、美国社会党又恢复独立以后，他仍然作为1914年以前的那种正统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着它那支力量大为削弱的队伍，虽然他以律师身份承接了某些大案，负责维护多少有些令人讨厌的资本家权益，从而使其同事感到尴尬。在他拥有人数众多的追随者的纽约以外地区，他从来不过是一个二流人物。

如我们在本书前文所见<sup>①</sup>，维克托·伯格也是一位极为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过远比希尔奎特更具改良主义思想。1919年，对于席卷党的大部分人的革命热情，他完全无动于衷，而且在保持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805页。

他在党内的地位的同时，大体上超然于党内斗争之外，以等待党恢复其神智，在此期间，他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威斯康星州的事务上，尤其是密尔沃基的事务上，他在该地保持了他对地方党的控制，几乎未受损害。伯格是一位集体主义者，对国营企业的优点具有强烈信念；但是在实践中他首先是一位对于有效和进步的市和州的行政管理颇有兴趣的社会改革者。在国际事务上，他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深表钦佩，并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各种各样的革命政策深恶痛绝。在他原籍所在的州，他拥有很多的追随者，使他得以一再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做到这一点的绝无仅有的社会党人；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他并无重大影响，在群众中也没有广泛的追随者。在他于1929年在一次车祸中死亡之前，他在威斯康星州一直很活跃。在战后美国社会党的其他领袖中，唯有詹姆斯·奥尼尔负有盛名；而他与其说是起了一个建设性的社会党领袖的作用，不如说是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勇猛的敌人的作用。长期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劳工联合会主席的詹姆斯·H. 摩勒，以毕生忠于社会党的事业的杰出工会人物著称。他在工会中，尤其739在教育领域，为社会党做了勇敢而果断的工作，但是从未成为一个深孚众望的人物。

至于德·里昂的劳工社会党，尽管列宁称赞德·里昂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1914年德·里昂去世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真正重要的地位。该党的主要发言人是阿诺德·彼特森（生于1885年），他对美国社会党和美国共产党人都进行激烈的论战。但是，即便在德·里昂时代，从来也没有远远超出一个派系范围的劳工社会党，到了晚期也是派性日益严重，此处我们就毋须再加赘述了。

在共产党方面，1919年时的杰出人物毫无疑问是新闻记者约翰·里德（1887—1920年），他的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报道《震撼

世界的十日》具有革命古典文学的地位。里德是革命时期的一个新信徒，首先是一个浪漫主义的革命家。他在1919年争取美国社会党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作中以及在在这一企图失败之后建立劳工共产党的工作中都发挥了主要作用。在进行这些工作时，他曾与路易斯·弗莱纳密切合作，弗莱纳日后更名为刘易斯·柯雷，成了教授和著名的经济史学家。1920年，弗莱纳被指控为警察奸细，但是在共产党进行调查后得到宽恕。两年以后，他与党发生争执，被加上了在墨西哥组织反对派的罪名。他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但是毫无疑问，他在促成1919年的分裂方面起了主要作用，而且是一个具有高超的争论能力的新闻记者。

在美国共产主义事务中，还有另外一个杰出人物，他就是当时侨居美国的爱尔兰领袖詹姆斯·拉金(1876—1947年)。<sup>①</sup>拉金在1913至1914年都柏林大罢工失败后离开爱尔兰，打算到美国作短暂访问后就回国。在美国，他为社会党工作，与尤金·戴布斯关系十分密切，还为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和其它左翼团体的利益说话。740 他强烈反战，1917年支持俄国革命事业，并且与R. E. 拉森伯格和伯特拉姆·D. 沃尔夫(生于1895年)——许久以后以他的著作《进行了一场革命的三个人》(1948年)名闻遐迩——一同参加了一个为在1919年8月的代表大会上夺取对美国社会党的控制权而组织了一次运动的左翼委员会。几个月以后，他与其它左翼宣传工作者一道被逮捕，在监狱里待了一个长时期以后以从事“罪恶的无政府主义活动”罪名受审讯，并被判处监禁五至十年。他在狱中服刑直到1923年纽约州州长艾尔·史密斯释放他，并把他驱逐回国。他不在国内的整整9年期间，在名义上仍然是爱尔兰运输和杂务工人工会书记，但是在他回国后，他发现不可能与在他出国

---

① 关于拉金的事业，见第3卷上册第240页以下。

期间主持工作的领袖们合作。在与这些领袖发生激烈争吵的过程中，他率领一批支持者强占了工会总部，并一直占领到通过法律行动将他解职。然后他成立了一个新工会——爱尔兰工人工会，该工会尤其是在都柏林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还积极参加了该城的市政工作。拉金是一位最有影响和激动人心的演说家，他与他的同事詹姆斯·康诺利(1870—1917年)一样坚定地保持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与他的罗马天主教徒身份之间的和谐，但是他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只不过是一段插曲。

幸好本书似乎尚无必要详细叙述两个对立的共产党于1920年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合并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五花八门的种类和无休无止的争论。美国共产党人主要由东欧移民组成，但是在他们的领袖之中有若干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以及西欧人。他们显示了令人困惑的对派系争执的癖好，因此每一次合并都提供了新的分裂的机会。即使在1920年时，统一共产党的建立也立即导致了少数派的退党，这一派人指责莫斯科授意的领导违反真正的革命道路，并着手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俄国移民组成的对立的共产党。到1921年时存在的或者说曾经存在的不少于12个共产党，只是在对社会党、当然还有在对美国“生活方式”深怀敌意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面对整个左派受到的迫害，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即便它们愿意，也不可能竞选或者哪怕是进行公开宣传。1921年，共产国际鉴于世界革命的明显衰落而改变策略，此时得到莫斯科支持的主要共产党改变了方针并率先成立了一个公开的工人党作为“外围”组织，地下党则继续存在，企图将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1919年时的钢铁工人组织者 W. Z. 福斯特成了工人党的著名人物，并到适当时候成了1924年的总统候选人。在那些希望使工人党保持仅仅是地下共产党的工具的人和“取消派”之间迅速出现了争执，后者希望废除地下共产党并把他们的全部活动集中于

工人党，或集中力量渗透到其它诸如农场主工党这样公开的团体中去；大多数最著名的共产党人，包括福斯特、欧尔·白劳德（生于1891年）、查尔斯·拉森伯格（死于1927年）、杰伊·拉夫斯通（生于1898年）——他后来成了著名的反共分子和美国劳联的国际政策正式顾问——和詹姆斯·坎农（生于1885年），都具有“取消派”的观点，由于地下共产党在1922年8月举行秘密大会时被警方缴获了全部党的文件，这一点得到了补充证明。

这样一来，工人党就独立行事了，不久该党便分裂成为两派，一派以福斯特、白劳德和坎农为首，另一派以拉森伯格、杰伊·拉夫斯通和匈牙利人约瑟夫·波加尼为首，波加尼此时名叫约翰·佩帕尔，是共产国际驻美国代表。争执的主要问题是对于企图建立工党应持什么态度。福斯特最初反对参与这个举动，但是后来又转变态度，主张在1924年的总统选举中支持拉福耶特和强烈抵制工党的进步政治行动会议。然而莫斯科决定不支持拉福耶特，福斯特又再次转变态度去追随莫斯科的路线。

到了这个时候，在俄国国内，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已超越一切其它问题而居于首要地位。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文艺战士之一马克斯·伊斯特曼（生于1883年）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列宁去世以后》，这部对托洛茨基推崇备至的著作具体叙述了列宁的未曾发表的“遗嘱”，<sup>①</sup>并且猛烈攻击了斯大林；于是美共内部的斯大林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之间随即发生了派系斗争，而且斯大林分子又分裂成了若干各自都企图争取共产国际支持的对立派系。后来季诺维也夫又与斯大林发生争执，因而被免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时隔不久，接替季诺维也夫的布哈林被控以右翼偏差的罪名，因而又被驱除。在接连这几个阶段中，福斯特始终

---

① 见本书第583页。



设法保住了他在主要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直至 1929 年。1925 年时，由于福斯特派与拉森伯格派之间的争端，党几乎分裂，在这场争端中福斯特派是多数派。但是，为防止拉森伯格及其追随者被免去领导职务，莫斯科进行了干预，福斯特不得不让步。后来拉森伯格在 1927 年去世，就让福斯特掌权了。1928 年 6 月，以詹姆斯·坎农和马克斯·沙赫特曼（生于 1903 年）为首的托洛茨基分子因左翼偏差被开除出党，而后成立了一个对立的工人党，时隔不久，拉夫斯通和本杰明·吉特劳（生 1891 年）奉召前往莫斯科后，被指责为布哈林的支持者，并成立了另一个分裂的小党——共产党反对派。此时，莫斯科还决定惩戒福斯特，他被免去党的书记职务，由他以前的追随者欧尔·白劳德取代。曾与拉森伯格有密切联系的佩帕尔被召回莫斯科，随即在三十年代的清洗中消失。福斯特保住了党籍，当白劳德最终于 1945 年被免职时，他再次出任领导。曾经是 1919 年纺织工人罢工中的领袖人物的 A.J. 缪斯特（生于 1875 年），于 1929 年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进步劳工行动会议，<sup>743</sup>他在三十年代初的经济萧条期间建立失业者俱乐部的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1933 年，他成立了又一个日后夭折的党——美国工人党，曾一度吸引了一些著名的党员，其中包括有一定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悉尼·胡克（生于 1902 年）以及后来以《管理的革命》一书出名的詹姆斯·伯纳姆（生于 1905 年）。1934 年，该党与托派合并成为第三个工人党。

这还只不过是早期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无数分裂出来的组织中的寥寥几个。但是本文已对这个运动的极端派系倾向作了充分交代，产生这种倾向主要是由于这个运动未能在工人阶级的主体中深深扎根，同时也由于运动依赖于源源不断的东欧移民，而在 1913 年以后随着对移民实施的严格限制，这个来源便开始枯竭。

我意识到我在本章所述大部分是无足轻重的纪事。因为明显的事实是：在1914年以后的任何时候，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没有成为具有任何真正重大意义的运动。这种说法既适用于共产党人，也适用于美国社会党，或者是丹尼尔·德里昂的劳工社会党的幸存的残余力量；因为尽管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名声超过它的社会党对手，这种名声主要是它的反对者而不是它本身的所作所为造成的。从1914年到三十年代任何时候，不论是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都没有产生哪怕是像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在本世纪早些时候的为数不多的几年内产生的那种影响，或者哪怕是像社会党人在早先的一个时期产生的那种影响。1918年和1919年美国社会党党员人数的迅速增长，几乎完全是在俄国革命之后和随着欧洲战后1918—1919年的动乱，由于斯拉夫移民和其它欧洲移民大批入党的结果。这种动乱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曾波及现有党员，并且驱使几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在一段时期内大幅度向左转。但是，美国社会党并没有从工会的土生土长的或同化了的会员中吸收到大批党员，也没有可能哪怕是暂时从工

744 会运动的主要反社会党的老领袖手里夺过对运动的控制权。某些工会，尤其是铁路工人兄弟会，曾经提议要求实现公有制和工人参加工业管理。但是它们这样做时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具有革命性，或者甚至是皈依英国改良主义模式的工党的思想；就连它们曾在政治行动方面采取的步骤也并没有维持多久，或者在任何意义上改变它们的根本态度。毫无疑问，这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与其它交战国不同，战争并没有损害、而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生产力；也是由于美国资本主义非但不面临任何崩溃的前景，反而空前强大了。但我认为这还不是全部原因。如果说由于移民锐减，尤其是从较贫困的欧洲国家来的移民锐减，革命素材的主要来源就断绝了，这样说也是不够的——虽然在二十年代毫无疑问这是真正重要的因

索，因为这提高了美国劳联下属各工会的谈判能力，并为它们提供了较好的前景，可以通过对历史悠久的大党实施“压力集团”政策获得眼前的利益。在这些因素之外的一个因素是：在美国不存在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根本不满情绪，而且还存在一种适应美国“生活方式”的强大趋势，这种趋势大大妨碍人们接受从欧洲传来的革命思想，并且还使这些思想打上“非美”的标记，从而使它除了被看作对美国制度的威胁之外，不值得认真对待。

诚然，在1914年以前的一段时期，这种“美国精神”并未妨碍极有战斗精神的、由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主要体现的一个少数派工会运动的成长。然而这个运动从未扩大到美国劳联下属各工会所吸收的会员主体。在早期的几个阶段，它主要在人口仍然稀少、但开发却很迅速的西部各州的矿工以及石油和伐木工人中间壮大它的力量；在从这些地区发展到中西部和东部去时，其追随者主要是为大城市提供大部分不熟练工人的移民，而不是本地出生的美国人或完全同化了的移民集团。在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其它西部各州，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及其前身西部矿工联合会主要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爱尔兰人和同化了的欧洲人的运动。在劳伦斯、帕特逊和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基层支持力量主要是对美国情况相当陌生的工人。诚然，美国劳联下属的一些工会——尤其是联合矿工工会——由于大雇主的极端的反工会活动才加强了产业工人的战斗精神；但是，即便如此，在劳资关系中的战斗精神也没有能够使这些工会信仰社会主义或工团主义，这些工会的大多数会员似乎认为这些主义大部分是他们看不起的外国人带来的信条，这些外国人等级低下，命里注定要从事报酬较低而名气不那么好的劳动。即使“边疆”已经关闭，在一个其经济财富迅速增长的社会里，仍然存在社会流动的广大余地；同时还存在蔑视和不信任政客的普遍趋势，这就使得扩大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行动范围

745

的建议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事实上，1919年波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动乱完全没有扩大到美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尽管大雇主和国会采取了极其反动的态度。

既然如此，新老社会党人本身在大战结束以后有一段时期显然处于非常激动的状态，这又作何解释呢？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维克托·伯格及其威斯康星州的追随者立场原封未动，他们继续提倡和实践改良主义政策，一如过去多年中他们所做的那样。但是他们乃是例外；有一个时期他们几乎丧失了对美国社会党主体的全部影响。在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在密执安州和俄亥俄州，在土生土长和同化了的美国人中间以及在人数增长的各种语言联合会中间，社会主义舆论的主体大幅度向左转；因此，即使在有人分裂出去成立了两个共产党之后，美国社会党的残余力量仍然通过决议，主张加入共产国际，直到共产国际十分明确地表明它  
746 不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接纳他们。我不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在以合乎宪法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任何重大进展的前景至少在今后的一段长时期内已经不存在。这大概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都被凶恶地指责为布尔什维主义，而且是由于从美国参战的时候起各种各样的所谓左倾活动都遭受到了严厉迫害。除了少数例外，美国社会党的左翼和右翼都曾反对美国参战，因此很容易被人指控为叛国；由于大战结束以后迫害仍然继续，结果使得社会主义运动为自卫起见，左到了超过许多成员真正愿意的程度。但是无可否认，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的革命动乱尽管没有在有组织的工人主体之中引起反应，确曾一度强烈影响过社会党人，驱使他们暂时大幅度地向左转，只是在分裂以后他们遭到共产党人的猛烈攻击时才有所退缩，共产党人奉共产国际之命对中派攻击要比对合乎宪法的右翼的追随者的攻击更为凶猛。在这种毫无分寸的激烈言词的影响下，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只剩下空

架子的美国社会党不久便急剧地向右转,而且为了与工会、农场主和开明的资产阶级团体组成进步联盟,有一个短时期几乎将它的社会主义搁置一边,而在这样一个联盟中社会党人只能希望发挥次要作用。当这种努力主要由于缺乏工会支持而失败时,美国社会党再次陷于孤立的境地,并且发现自己不仅在经济繁荣持续高涨时,而且即使在美国经济陷入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都完全无能为力。

1929年华尔街的崩溃引起的三十年代的美经济大萧条已不属本章范围。在整个二十年代,美国经济尽管在农业方面遭到严重困难,在大多数人看来却是处于在资本主义庇护下迅速发展的繁荣过程,因此像 T.N. 卡维尔这样的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可以在几乎无人反驳的情况下在著作中说什么美国已经进行了经济革命而没有发生任何政治动乱,并且早就走上了在私营企业的仁慈统治下建立普世繁荣的道路。在这整个时期内,尽管工业经济向前发展,而面对着公司工会和“自由雇佣企业”的壮大,在1919年和1920年曾迅速增加的自由工会的会员人数却几乎在不断下降。1920年会员人数达400万以上的美国劳联在1923年时下降到了300万人以下,到1930年已下降到275万人以下。在同一时期内,工会会员总人数从500万人下降到不到350万人,或者说在有资格加入工会的工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从20%下降到大约10%。这些数字包括加拿大,但是这对这些数字的重要意义并无实质影响。实际上,除了采煤业外,雇主们将工会活动几乎完全排斥在所有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之外,而且摧毁了铁路工人工会在大战期间和大战甫告结束时逐步建立的强有力的地位。以“自由雇佣企业”为基础的所谓“美利坚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曾成功地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运动,而且还使工会活动没有能在最迅速发展的经济领域成为真正强大的力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变成了一些软弱无能的派

系的运动，彼此勾心斗角，水火不容，但是对于美国舆论的主体并无影响；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和实行“新政”之前，就连工联主义除了在多处为约翰·L·刘易斯的联合矿工工会和菲利普·穆雷的产联的上任铺平道路之外，自己也没有能够站住脚跟。

## 加 拿 大

在本卷所涉及的时期内，关于加拿大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可说的不多。如我们在前文所见，为统一已经存在的分散组织，1905年成立了加拿大社会党；名叫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个团体成立于1911年，它加入了第二国际；而加拿大社会党认为把英国工党和澳大利亚工党看作社会主义政党不适当，因而反对它们在第二国际中的存在，并因此拒绝加入第二国际。不论是加拿大社会党还是它的对手都没有为数众多的追随者，尽管前者有零星党员当选为艾伯塔省和曼尼托巴省议会议员。在大战期间，加拿大社会党多少强大了一些，尤其是在为征兵问题进行的斗争方面，战斗性大为增强。大战结束后，尤其在西部诸省，有一个时期战斗性继续增强；为了支持“大一统工会”的主张，以便在工业领域进行更积极和更密切的协调的斗争，曾形成了一个有相当声势的运动。这个运动在1920年最初几个月的温尼伯总罢工中达到了顶峰——这场带有相当多暴力行为的特色的斗争以罢工工人失败和加拿大左翼遭到严重挫折而告终。与此同时，主要与新兴的农场主组织结盟的一些工党在若干省里成立了；1920年，安古斯·麦克唐纳（生于1890年）作为安大略省农场主联合会和工党的候选人当选为联邦议会议员（代表安大略省）。翌年，以在温尼伯罢工期间主编罢工工人报纸《西部劳工消息》出名的詹姆斯·谢弗尔·伍兹沃思（1872—1942年）作为工党提名人当选为代表温尼伯的议员。伍兹沃思曾

经受过牧师教育,在反征兵斗争中采取了强烈反战的态度,并被解除了萨斯喀彻温、曼尼托巴和艾伯塔诸省的省政府联合设立的社会研究局局长职务。后来他成了巡回各地的社会主义宣传家,逐渐深得人心,因而使他成了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和劳工政治运动的当然领袖。在这些运动中,追随他的卓越人物是英国出生的教师M·J·科德威尔(生于1888年),此人与他积极合作,于1932年共同建立了一个有稳健的社会主义纲领的合作社联邦联合会,该会试图依靠这个纲领来争取比较进步的农场主以及工人的支持。<sup>749</sup>只是在世界性的萧条对加拿大产生最严重影响的时候,加拿大社会主义运动才开始产生全国规模的政治作用,不过这已经不属本书范围。事实上在1920年成立过一个加拿大共产党,但力量很薄弱并随即遭到取缔,转入地下之后,未能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 第二十四章

### 从1914年到三十年代初期的拉美劳工运动

在本书前一卷中曾企图笼统地介绍1914年以前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成长状况,但是由于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截止时间,文中有些部分远远超出了那个年代。<sup>①</sup>现在我发现自己处在类似的困境,因为要明确交代二十年代的事态发展就几乎不可能不行文过头,以致也涉及三十年代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都对拉美各国的劳工运动产生过深刻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因国而异,很不均衡,一直到本卷打算截止的年代——大约1931年——其主要后果才开始显现。因此我将力求简短,留待下一卷再作较详尽的叙述,如果我能活下来写作它的话。

1914—1918年的大战产生的第一个重大的影响是来自欧洲的进口货和资本投资——还有移民——减少了。欧洲消费品的短缺迫使拉美各国发展它们自己的轻工业——尤其是纺织品——,这就有助于促进主要是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方面的工业化。欧洲投资也愈来愈多地为美国投资所代替,在1914年以前,除了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其它地区以外,美国投资为数较少;对激发经济民族主义情绪来说,美国资本的流入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而与此同时,英国资本的减少却削弱了英国甚至在阿根廷的影响,阿根廷与英

751 国的市场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它对铁路和公用事业的投资有很大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22章。



部分来自英国。

美国于1917年参战后，许多拉美国家也因此放弃中立而加入协约国行列。在此之前，存在尖锐分歧，许多拉丁美洲人往往同情其代理人在拉美非常活跃的轴心国。对于整个左翼运动，俄国革命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影响。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在此之前，在大多数拉美地区，对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影响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即使在1914年以前，在凡属小规模手工业生产为大规模就业取代的地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已经开始失势。在俄国革命之后，更不用说在第三国际自1920年起开始积极从事世界革命事业之后，不仅是社会党内的左翼分子，还有许多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都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在拉美许多地区迅速建立了共产党。在许多工会运动中，共产党的影响变得强大起来，而其中大多数运动仍然处在初期阶段。在任何时候要衡量这些共产党的或共产党所支配的运动都绝非易事，因为尤其是在工会领域，共产党人成了主持具有冠冕堂皇的名称、但在许多情况下并无大量或可靠的实际追随者的组织的斲轮老手。此外，共产党本身经常被取缔，不得不要么是秘密存在，要么以所谓“外围”组织为掩护，在其它名义下开展工作。不仅于此，它们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下因素影响：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追随者之间无穷无尽的分裂；还有后来形形色色的托派集团的出现；以及感到幻灭的人物的脱党和以拉美特有条件、而不是以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全面学说为基础的各种对立理论的成长。

在二十年代初期，负有将共产主义的信息传达给拉丁美洲的 752  
特殊任务的第三国际使者首先是印度人 M. N. 罗易（1893—1954年），（从1920年到1922年），然后是日本人片山潜（1858—1933年），后者是在美国已经颇为出名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老战士。在有些国家，尤其是在乌拉圭和智利，1914年以前的社会党转而信

仰了共产主义，接受了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二十一条。在另外一些国家，尤其是在阿根廷，社会党中一部分人脱党，另行组成了一个共产党。在相当多的国家中，1914年时根本没有社会党，或者说至少没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党。比方说，巴西社会党只是到1916年才成立。1894年创立的阿根廷社会党是长期持续存在的绝无仅有的一个党。乌拉圭社会党到1910年才成立，而以路易斯·里加巴伦（1876—1924年）为首的智利社会党则是到1912年才成立的。因此共产党人进入了一个大体上仍未开垦的领域，当然，尽管在大多数国家中在许多情况下存在过昙花一现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会。自1920年以后，共产主义运动进展迅速。那一年，共产党开始在乌拉圭和玻利维亚进行工作；1921年在阿根廷和巴西；1922年在墨西哥和智利；1925年在厄瓜多尔和古巴。1929年，也就是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第一次大陆共产党代表大会的那一年，共产党在秘鲁开始工作，接着是1930年在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1931年在委内瑞拉。

在大战年代，美国对于若干美洲国家事务的干涉大大激发了拉美的反帝情绪。多米尼加共和国于1916年被占领，海地则是在前一年被占领；在1916—1917年，美国军队开进墨西哥，一支海军部队占领了韦腊克鲁斯。在二十年代，进一步继续进行侵略行动——比方说1924年对洪都拉斯，1925年对尼加拉瓜。结果是激起了反帝情绪的怒潮，这种情绪既是针对美国，也是针对外国资本各种形式的渗透，由于这种渗透，出现了外国人拥有和管理的一些企业。

753 反帝情绪波及范围甚广。这种情绪不仅影响工人阶级，还影响许多中产阶级——不仅有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有雇主和商人，后者担心受到掌握更现代化的和更有效的业务技术的外国企业的竞争的危害，并且对于生活在他们之中的外国专家的高生活水准感到愤懑，正如工人们对于支付给外国工人的工资高得很多感到愤

懣一样。诚然，人们普遍认识到有必要输入资本以便发展经济；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对外国资本家权益集团的控制普遍感到恐惧。民族主义的和仇外的情绪往往超越了右翼与左翼的传统划分界限，不仅在老的团体和党派中间，而且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内部引起了纠纷。总的说来，无论如何在城市地区的外资企业要比大多数本国人所有的企业支付的工资高和劳动条件优越；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即使在许多从物质意义上说从中受惠的人之中排外情绪高涨。在1914至1918年的大战之后的年代里，美国反动势力的支配地位往往使得美国政府和与拉美地区有利益关系的大实业公司都成了拉美最反动的政治人物——古老的地主贵族阶级以及与大规模经济发展有利害关系的人数不多的金融家集团——的盟友；这种结盟关系往往使得除了有组织的工人之外，还有民族主义者和中产阶级中的一大批人——包括许多小雇主——都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尤其是反对北美的经济渗透的力量。但是那里也存在相反的思潮。因为社会党人大部分自然希望工业取得迅速发展，以便加强产业工人阶级，而在拉美大部分地区，产业工人阶级与没有组织起来的广大的农业劳工和仍然大部分受到封建制度控制的贫困小农很少接触。

与共产国际及其在美洲的代理人密切合作的共产党人利用了这种形势。在1920年以后的那些年里，共产国际的政策旨在利用 754  
拉美各国的工人阶级作为工具，积极进行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然而这项政策也是以一种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这种学说排除了不论是与资产阶级左派还是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抵制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集团的一切形式的联盟。这就使共产党人在短期内无法使自己成为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们的领导，并且迫使他们主要集中力量争取工会和设法使它们在每一个国家的受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中央联合会中团结起

来。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相当成就，尤其是在备受剥削的矿工和石油工人中间以及运输工人中间，也就是说在直接体验到主要在外国公司保护下取得大规模经济发展成果的工人阶级集团中间。在这些集团中间，他们驱除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以前的主要势力，甚至使许多以前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相信了他们的观点。共产党人在熟练的手工艺人和雇人不多的单位的其它工人之中成就更为逊色；他们的活动的结果往往不是实现共产党控制下的工人阶级团结，而是工会运动分裂成为许多对立派系，每一个派系各有中央组织，而且许多工会由于希望维持内部的有限团结，拒绝与各种对立的中央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发生联系。

在此之前，拉美工会大部分与美国或欧洲的工会没有任何正式联系。但是1920年以后它们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要建立这种联系。当然，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地促使他们控制或影响的运动加入在莫斯科建立的工会红色国际<sup>①</sup>，并且使追随他们的拉美各国中央组织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755 附属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受社会民主党支配的各工会则进行反宣传，希望把非共产党的工会吸引到它们的轨道上来，但不是那么积极；美国劳联与墨西哥各工会携手于1918年初建立了泛美劳工联合会，获得了重大的初步成就。这个团体在名义上一直存在到1930年，但是从未在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引人注目。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和巴西的工会中心拒绝加入该联合会；在墨西哥和美国以外地区，该联合会取得的支持主要来自美国及其在中美的公司所能接受的军事首领所统治的专制国家中受到政府的强烈影响和控制的工会团体。就连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墨西哥人，在1919年以前也强烈抨击美国劳联未能采取有效立场反对美国政府在拉美以及在美国本土

---

① 见本卷上册第315页。

对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和其它左翼团体采取的高压政策。在此后历届泛美劳工代表大会上，争执日趋激烈；继墨西哥人在早期实际上退出该联合会之后，古巴人在1930年拂袖而去，此后泛美联合会就名存实亡了。

在此期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没有放弃战斗。1928年，在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阿根廷区域工人联合会领导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一个大陆劳工联合会，该联合会加入了欧洲工团主义国际——即国际工人联盟——但未能立足便迅速消逝。这时阿根廷区域工人联合会已经开始失势，而与之对立的工会中心——工人总工会——则开始得势，后者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主要致力于当前的经济问题而不是革命目标。翌年，阿根廷区域工人联合会与（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总工会合并，合并后的团体——工人总联合会——决定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而且不久之后便主要为社会党所控制。同年，共产党人在亚松森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一个总部设在蒙得维的亚的拉美工会联合会，作为工会红色国际的区域性组织。自称代表大多数拉美国家工会的该联合会在大部分地区只有为数有限的追随者，在有些地区，追随者有名无实。该组织存在到1936年，在此以后，其残余力量便并入了墨西哥人文森特·隆巴多·托勒达诺（生于1893年）组织和领导的、在当时远为重要的拉美工人联合会。 756

托勒达诺影响最大的时期已远远超出了本卷所涉及的范围。他最初以律师和教师成名，从1918年至1933年在墨西哥大学任法学和哲学教授。他积极从事左翼政治活动，作为1917年成立的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中的路易斯·摩罗纳斯（生于1890年）的副手参加了工会运动。此后，他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在三十年代，在共产党人改变方针、提倡人民阵线之后，与共产党人建立了友好关系。1936年，在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瓦解以后，他建立了一个

新的墨西哥工会中心——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由他自任书记；在这个基础上，他接着在国际工会联合会的莱昂·茹奥和当时的（美国）产联领袖约翰·L.刘易斯的协助下于1938年成立了拉美工人联合会，有一个时期该联合会是世界这一地区历来有过的最重要和最广泛的劳工组织。隆巴多·托勒达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还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和演说家。他被错误地指控为共产党人，但是他始终否认这项指控，实际上似乎从未真正加入过共产党。然而他不论是在三十年代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都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在大战期间，他在墨西哥运动中的优势衰落了，直到最后他于1948年被开除出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但是仍然保持了一度占支配地位的拉美工人联合会的残存组织的领导地位，并在拉美的许多地区仍有强大的思想影响。在托勒达诺领导下，墨西哥运动曾与卡德纳斯总统积极合作，推行总统在任期间（1934—1940年）开始执行的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这个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失败，而且再也没有恢复统一。隆巴多·托勒达诺的事迹充分说明，关于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和劳工运动发展的叙述，如果写到1939年以前的任何时候便嘎然而止，那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在凡属可能的情况下，我将尽力在叙述中剔除1930年以后的事态发展，除非有些事与早先的事似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本文所述已足以说明，在整个二十年代，拉美的日益成长的工会运动极为混乱，对立的团体——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不断争权夺势，因此，在任何广泛领域都没有可能采取联合行动。各社会党由于共产党人脱党而四分五裂，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共产党人夺权，以致作为少数派成立了新的社会党；它们在类似困境中挣扎。更有甚者，它们与工会同样容易被接二连三的独裁者分裂或赶入地下。一般说来，这些独裁者依靠军事政变上台并且得到在拉美出生的欧洲人后裔反动贵族以及

美国和美国各个实业公司的支持。这些年代里的拉美独裁者大部分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类型：以民族主义的蛊惑民心的宣传为基础并力图以兼有恐外仇外和物质诱惑成分的号召来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的新型独裁制度直到后来方才出现，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达到极盛时期。

在煽起反帝情绪以及更进一步建设性地利用这种情绪方面，共产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都因为接受了认为唯有工人阶级能发挥革命作用的革命理论而受到妨碍。即使在比较先进的拉美国家，产业工人的人数也远远不如农民和无地劳动者，而在后者之中几乎不存在任何组织。此外，除了大多数居民是欧洲血统的阿根廷和乌拉圭以外，拉美主要人口是土著印地安人和有着程度不等的非洲黑人血统的混血种。具体的统计数字不可能获得；但是根据最有名的一般估计，在巴西，总人口的大约30%是黑人，将近3%是印地安混血种；在墨西哥，黑人占5%以上，纯印地安人将近占28%。在危地马拉，纯印地安人占明显多数，而在玻利维亚、秘鲁和厄瓜多尔，纯印地安人占总人口的40%到50%——在这些国家中黑人较少。另一方面，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纯印地安人和非洲人都微不足道；在智利和巴拉圭，这两种人也很少。在加勒比海诸岛，黑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在1850年到1950年之间，前来整个拉美大陆的海外移民人数似乎是大约1,700万人，其中700万人移到阿根廷，400万人移到巴西，200万人移到智利，150万人移到古巴，100万人移到乌拉圭，但是只有50万人移到墨西哥，还有100万人则广泛分布在其余国家。在这些移民中，意大利人最多(600万人)，主要是去阿根廷。还有400万西班牙人、200万德国人、100万葡萄牙人、50万俄国人、25万法国人、25万犹太人；此外还有100万人左右的远东(主要是日本和中国)移民和50万人的中近东移民——其余150万人来自其它地区。

因此,除了阿根廷和乌拉圭以外,拉美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印地安人或混血人,在少数地区,还掺杂了大批黑人。在大多数国家,农业地区居民人数远远超过城市人口。即使到1950年,也只有智利和阿根廷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60%。在古巴和委内瑞拉占50%以上,在乌拉圭略低于50%。在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巴拿马和巴西占30%到40%,在大多数其它国家占30%到25%,或者甚至更少。在拉美大部分地区,即使到1950年,文盲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仍然极高。在主要国家中,阿根廷的文盲率最低,为15%。哥斯达黎加、古巴、乌拉圭的文盲率为20%到25%,智利为28%,巴拿马为37%,巴拉圭为40%,哥伦比亚为44%,巴西、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文盲率为50%,秘鲁为52%,委内瑞拉为58%,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为65%,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为70%,玻利维亚为75%,海地竟达80%。这些百分比中有许多尽管很高,却已经是本卷所涉及的时期中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以后的数字。当然,一般说来,农业地区的文盲率远比城市要高,从而严重妨碍了建立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工作。文化的障碍以及正式城市工人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也为有组织的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合作行动造成了严重障碍,而且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墨西哥的情况<sup>①</sup>,有时还导致他们之间的激烈对抗。

拉美的农业人口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是文盲和赤贫,而且大多数人没有土地,因为土地仍然大部分掌握在地主贵族阶级手中,甚至在人口压力甚大的地区,其中大片土地也听凭荒废。地主随心所欲地处理他们的土地,或耕作,或用于经营牧场,或以苛刻的封建劳役条件出租;这种耕作也由于缺水和使用极其原始的耕作方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839页。



法而在许多情况下受到严重妨碍。显然，如果不对土地所有制根本的改组并继之以声势浩大的土地开发、灌溉和农业教育运动，拉美的基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是完全无法解决的。但是历史悠久的地主贵族阶级对于可能损害他们的权力的土地改革极其敌视；外国的投资者则对除了在中美部分地区为出口而大规模种植果类以外的任何农业开发不感兴趣，对于除了采矿和开采石油以外的其它形式的土地发展也不感兴趣。对国外投资企业最合适的事往往莫过于与地主权益集团妥协，而不是鼓励可能煽起农民暴动的任何事态的发展。当地存在的资本主义势力倾向于采取同样方针并反对可能干扰非常廉价的劳动力的充足供应的任何运动，这种劳动力来源于从农村大量流入城市的食不果腹的剩余工人。就连墨西哥革命在很长时期内也没有对农业人口的主体的状况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即使时至今日，对此也只产生了非常有限的影响。 760

在1914年以前，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完全以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为基础，它从未产生任何真正独具特色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以及从欧洲输入的其它学说竞相争取人们的支持；许多竞争者本人便是西班牙、或意大利、或德国、或法国的移民。以J. B. 胡斯托(1865—1925年)为首的阿根廷社会党人曾与第二国际有最密切联系；胡斯托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他自己的解释，以便使之适用于阿根廷的条件。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他的论点是：为使一个国家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臻于成熟，它并无需经历一个先进的工业化过程。胡斯托辩解说，在阿根廷，发达的产业无产阶级的位置可以由为找工作移居城市的大批剩余雇农取代，即使在大规模工业中并无就业机会可向他们提供。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827页。

事实上，阿根廷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依靠大批这种移居者的支持，而远不是依靠在争取农业工人的支持方面取得任何成就。然而，这种概念尽管在工业发展还不是非常先进的阶段极为符合人口过多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况，鉴于在大多数地区农业人口对城市人口占有优势，它对于解决整个大陆的社会革命问题或社会发展问题，却没有什么帮助。拉美的决定性问题必然是土地问题——而这是大多数社会党人特别缺乏条件来建设性地加以处理的问题——，即使在墨西哥也是如此，墨西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时开始的革命，曾经强烈地引起了人们对于贫困的农业人口的权利要求的注意。

当共产党人在二十年代初致力于取得对拉美革命力量的控制时，他们确实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土地问题的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并曾竭尽全力主动领导农民起来造反，并且在凡属他们认为有希望的地方激发造反。然而他们的工作基础是这样一种理论：赋予工业无产阶级对革命力量的必要的领导权，只准备让农民在这种领导下居于次要地位。共产党人大部分是城里人，他们很容易不仅蔑视农民，而且在凡属农民处境有所改善的地方还把他們看作潜在的反动派。虽然他们在煽动零星的农民起义方面有某种成就，他们与社会党人同样缺乏奉行任何建设性的土地政策的条件，而由于不存在这样一种政策，他们往往作为反帝斗争的一部分，主要侧重消除种族歧视的要求，而不是侧重与土地分配和开发有关的经济问题。在三十年代，在共产党人奉共产国际之命支持人民阵线运动之后，他们的态度大为改变。但是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内，他们着重强调工业无产阶级的首要地位的阶级学说妨碍他们设想出任何真正符合整个拉美大陆形势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政策。

为设想出适用于当时的普遍情况的、具有拉美特色的社会主

义——如果是社会主义的话——，1924年在墨西哥创建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运动作了一次著名的努力，运动创始人维克托·劳乌尔·海雅·德拉托尔（生于1895年）当时是流亡墨西哥的秘鲁人，由于他在学生运动以及建立反对独裁者奥古斯托·勒古伊亚的人民大学方面进行的活动而被驱逐出了秘鲁。离开秘鲁后，海雅·德拉托尔先游览了北美，接着又去欧洲，包括苏联，此后在墨西哥住了一个时期，在那里创建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作为遍及整个拉丁美洲——或者如他经常耐人寻味地喜欢称作的“印地安美洲”——的一个国际运动。有一个时期似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可能在许多国家逐步争取到广泛的追随者，而不仅仅是在该联盟迅速成为得到最广泛支持的一个政党的秘鲁。然而从一开始，该联盟便与其阶级斗争概念遭到海雅彻底抵制的共产党人发生了激烈冲突。为了代替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的运动，海雅宣扬有必要建立工人、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以反对地主贵族阶级及其盟友——外国资本家和他们在当地的支持者。他反对拉美各民族的分散的民族主义运动，号召采取全大陆的统一行动，包括土地和其它资源的国际公有和发展大陆范围的社会保险制度。在组织方法上，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与共产党人颇多共同之处：海雅坚持必须建立一个在集中领导和控制下的有坚强纪律的党，他本人就是一个具有明显的独断独行和毫不妥协的气质的领袖。在1931年勒古伊亚最终被推翻之前，海雅从设在欧洲的总部——最初在伦敦，后来在柏林——指导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勒古伊亚下台后，他立即返回秘鲁，成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并正式当选，不过随即被桑契斯·塞罗推翻并被投入监狱。1933年，塞罗被暗杀后他被释放；但是新独裁者奥斯卡·贝纳维德奥剥夺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的公民权，海雅不得不前往哥伦比亚大使馆要求避难——此事引起了秘鲁与哥伦比亚之间的纠纷，最后这一纠纷提交到海牙国

际法庭仲裁。然而，海雅·德拉托尔生平事迹中的这一部分已不属于本章所涉及的时期。

763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海雅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运动要求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包括本地的资本所有人——结成联盟，以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本地的地主贵族阶级。于是该运动便着手改善除了与外资公司以外的一切劳资关系，从而与较有战斗精神的工会团体以及共产党人发生了抵触。后来成为拉美杰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家的、跛足的秘鲁印刷工人、记者和诗人何塞·卡洛斯·玛利亚特圭(1891—1930年)，作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支持者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到1928年才脱离该联盟，成立了秘鲁共产党。玛利亚特圭是一个离不开轮椅的长期残废者，但尽管如此，他作为组织者以及主编刊物和著书立说方面都很活跃。他在学生时代接受了一笔到欧洲学习的奖学金，归国时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并非正统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最著名的著作名叫《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但是根据他的解释，适用于拉美条件的马克思主义首先需要使印第安人成为土地主权所有人，从而解决土地问题。他拒绝接受可以通过恢复原始的土地共产主义的腐朽传统来实现这个目标的见解，并坚决认为土地共产主义与他认为是工业发展的产物的现代共产主义之间存在极大差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也具有城市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那种司空见惯的对农民的蔑视。与此相反，他对于争取印第安人与白人在一切问题上完全平等所具的献身精神压倒了他对工业无产阶级的偏爱，并使他于1929年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与他的共产党同事发生了争论，大会拒绝接受他提出的有关土地问题的论点。除了《为马克思主义辩护》(1927年)以外，玛利亚特圭还发表了《当代一览》(1927年)和《解释秘鲁现实论文集》(1928年)，以及他在一再遭到取缔的他的评论刊物《爱》上发表的许多篇文章。他的影响远远超出

了秘鲁，他在1939年去世，对于拉美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在试图给社会主义思想以新的方针，以便使之更为契合拉美的具体条件方面，值得一提的第三位理论家是萨尔瓦多人阿尔伯特·马斯弗雷(1891—1933年)，他有一个时期担任过萨尔瓦多驻布鲁塞尔领事，他在那里详细阐述过他的“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学说，其中不仅包括维持生活的工资，还包括各国立法应予体现的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险制度。马斯弗雷起初感兴趣的是教育改革，回到萨尔瓦多以后他按照弗雷在西班牙的事业<sup>①</sup>的路子创办了一所“理性”学校。但是他随即开始提倡他的更广泛的社会概念；当他发现政客们利用这些社会概念来作为他认为是沽名钓誉的口号时，他离开了萨尔瓦多，相继遭到中美洲几个国家的驱逐，最后在哥斯达黎加定居，1933年在那里去世。马斯弗雷认为，食不果腹的人无法革命，在复兴拉美方面必要的第一步在于采取影响深远的措施，为所有人实现过得去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实际上他是拉美第一个“福利国家”提倡者，而且对于此后若干拉美国家的社会立法过程并非毫无影响——虽然在所通过的法律中有许多法律很少付诸实施，以致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效果。

不论是从理论还是从政策的角度来看，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运动都对具有拉美特色的左翼社会运动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海雅·德拉托尔所阐明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政策具备以下五个要点：反对北美(美国佬)帝国主义的斗争，印地安美洲的政治团结，土地和主要工业的社会主义化，巴拿马运河的国际化，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阶级的世界大团结。这些要点中的第一点和第四点使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进入反帝行列，而第二点和第五点却使他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770页。

们与人民心目中往往与反帝联系起来的仇外民族主义相对立。第三点——社会主义化——在与整个印第安美洲的各族人民实现政治团结的要求联系起来以后具有了崭新面貌；因为这样一来，这个要求就成了国际化的要求，而不是在各国的国界之内实现单独的公有制和发展资源的结构要求。最后，作为改变生活条件的基本单位印第安美洲——而不是拉丁美洲——的概念，不仅蔑视较狭隘的民族主义形式，也蔑视认为白种人比当地民族优越的整个概念，实际上还意味着在黑人而非印第安人构成了赤贫和愚昧透顶的社会阶层中大部分人口的地区，黑人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海雅宣称：“美国佬资本主义在我们国家的资本投资额愈大，民族主权就丧失愈多。”他认为由于美国佬帝国主义的存在，不仅它所渗透的各国非维护其独立不可，而且人们还必须以印第安美洲大团结这样一个较广泛的概念与之分庭抗礼，并且在彻底的种族平等的基础上将印第安美洲逐步建成一个浑然一体的邦联。正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理论和政策中的这个因素为运动赢得了许多理想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热忱拥护，他们对于比较粗糙的民族主义形式感到厌恶，同时又感到共产党的工业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与拉美各族人民的需要和现实很不相称。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之所以有号召力，基础就在于这种理想主义；但也必须承认，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由于与比较粗糙的民族主义的形式相对立，要逐步建立群众支持的巩固基础就困难得多了。因为要设法使经济和人口条件大相径庭的这么多国家统一成为能够实施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纲领的、有凝聚力的政治单位，显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而在每一个国家，蛊惑人心的政客要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并许诺在现有的一个政治单位内能够实现改革，却要容易得多。人们不难把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说成是空想家，并且在产业工人中指责他们是阶级斗争的叛徒，说他们要工会与雇主媾和，而不是英勇地为无

产阶级的要求斗争。

面对这种种困难，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从未在整个大陆争取到大规模的追随者。当然，在秘鲁，它确实成了群众性的运动，不仅在城市和工业地区，而且在各地农村，到处都有分支机构。它在印第安人中间也有人数量众多的追随者，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它还在一些其它国家，包括巴拉圭、委内瑞拉和古巴，<sup>766</sup>赢得了众多的群众追随者。但是在拉美大部分地区，虽然它拥有热心的支持者，这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并没有能够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或者有效地公然反抗后来庇隆<sup>①</sup>成为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的、蛊惑人心的民族主义。即使在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拥有强大的群众支持、足以使海雅当选总统的秘鲁，他们也未能防止海雅被军事政变推翻，或者防止他们自己的党被取缔而被迫转入地下。当然，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具有旺盛的活力，非镇压所能扑灭：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结束以后许久，它仍不断卷土重来。但是它确实未能成为海雅所梦想的那种大陆力量，也未能把拉美社会党和工人阶级的舆论主流争取过来，使他们实际上同意有必要在整个大陆采取统一行动。此外，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纲领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强烈反对美国佬帝国主义——丧失了部分力量，因为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在三十年代宣布了他的“睦邻”政策，因而有一个时期群众“反美”情绪的力量大大下降了。

在1928年玛利亚特圭脱离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组成秘鲁共产党以后，共产党人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局面。但是当共产党人在三十年代面临着法西斯主义日益严重的威胁，改变立场而执行“人民阵线”的政策时，美洲人

---

<sup>①</sup> 胡安·多明各·庇隆(1895—1974年)，阿根廷将军、政治家、民族主义的独裁者(1946—1955年)。被军队推翻后流亡西班牙。后来得到允许回国，于1973年9月再次当选为总统。死后曾由其遗孀埃娃继任总统。——译注

民革命联盟的成员已能告诉共产党人他们从一开始提倡的正是这个政策，并力陈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本身已经是共产党这时表示愿意建立的人民阵线。自然，共产党人驳斥了这个观点；因为他们旨在建立的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和控制的人民阵线，而不是一个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甚至资本家都能以平等身份参加的党。尤其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其实是主张社会主义化的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提倡的是议会民主制度而不是任何种类的专政——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其它专政。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怀有一种道德热情要制止种族歧视，并使一种会取代种族隔离和一切形式的种族对立的新型印第安美洲超级民族主义具有自觉性和力量。从长远来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乃是提供解决拉美大陆的根本经济问题的有真正希望的唯一政策。但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诞生以来的三十年中迄未能够使其纲领中的任何重要部分付诸实施，这并不足为怪。国际主义者的道路最为艰险，因为他一方面面对着拥有极其优越的经济财力的帝国主义者，另一方面面对着能使其口号适应个别国家或地区的群众情绪现状的、日益高涨的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浪潮。在当时的环境下，海雅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但是尽管如此，有理由证明这个纲领远比它的任何竞争者的纲领更有重大的永恒价值。

此处还必须略微提一下在1914年到1930年之间，在工人阶级运动具有了一定的真正实力的某些国家里出现的较为重要的事态发展。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在智利，尤其是在北部的矿工中间，工人阶级运动在1914年之前已逐步发扬了很大的战斗性。1909年成立了中央工会联合会，它在开始行事稳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急剧向左转。1912年，以前在早已成立的老民主党内进行活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826页和834页。



动的社会党人脱离该党，成立了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初期对社会主义十分同情的民主党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从事改革的大部分动力；脱党行动的为首者是杰出的工会领袖刘易斯·里加巴伦（1876—1924年），他也是中央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大战结束之后，智利社会党在里加巴伦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国际，中央工会联合会则成了与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相对立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工会红色国际的成员。但是中央工会联合会内部不久便逐步出现了严重纠纷。铁路工人于1923年退出联合会，接着若干其它工会退出。中央工会联合会的力量日趋衰落；但是直到1936 768年才有新的工会中心取代它。在此之前，各行业中的工会有时在这个、有时又在那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影响下各行其是。

大战期间，智利的外国资本的活动大为减少；地主贵族阶级利用该国的经济困难重新建立了它的政治力量。这导致了自由党人、激进党人与社会党人建立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于1920年使自由党领袖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当选为总统。亚历山德里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和工业改革方案，并在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制订了规定意外事故的保险、解雇补偿和为解决劳资纠纷进行仲裁的法律。然而，1924年亚历山德里被军事政变推翻了；不过策动政变的军事集团内部壁垒分明，一方面是希望使贵族阶级重新掌权的保守派，另一方面是一个受社会主义思想激励、但缺乏任何明确的理论观点的左翼派别。第二个集团的领袖是玛麦杜克·格罗夫（生于1878年）上校和卡罗斯·伊巴内兹（生于1877年）上校。由于亚历山德里的改革进展缓慢而产生的反感，工会大部分支持格罗夫和伊巴内兹。当时属于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保持中立，而非共产党的社会党人则大部分支持反动的上校们。由于希望巩固工人阶级的支持，军人执政内阁制订了一个劳工法规，该法规承认工会为法人，限制女工和童工做夜工，规定最低限度工资并实施疾病

769 保险。然而军政府内部的纠纷仍然存在，比较保守的人物开始占了上风。这导致了格罗夫和伊巴内兹领导下的军方左派的反叛，他们在1925年推翻军人执政内阁，要求亚历山德里重新执政。共产党人开始时支持亚历山德里，但随即改变初衷，尽管亚历山德里提出了一个包括新的民主宪法的、进步的改革纲领。这个宪法除了作了其它变动以外，还保证政教分离和自由结社的权利，同时在法律上认可四十八小时劳动周。然而，当大规模罢工发生时，亚历山德里惊骇莫名，开始执行镇压政策，以致使他失去了他的大部分群众的支持。翌年，革命上校卡洛斯·伊巴内兹作为左派候选人当选为总统。然而他像一个独裁者治理国家；1931年，当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已经开始严重打击智利人时，一次总罢工使他不得不辞职，而把权力交给了保守的副总统。翌年，发生了以玛麦杜克·格罗夫上校为首的左翼政变，他在海空军支持下宣布智利为社会主义共和国。格罗夫立即开始实行有关救济措施的应急纲领，包括发还穷人在当铺典当的物品，为失业者开放垦区，以及为小企业提供贷款。这些措施已足以使反动派在大部分军队的支持下组织以卡洛斯·达维拉为首的反革命政变。但是新的军政府未能立足：不出数月，达维拉便出走了，不久之后，亚历山德里便再度当选为总统。

虽然1932年的智利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却产生了重要的长远后果；因为它唤起了人民的广泛热情，使工会实力再次迅速得到加强，并且同样使得在拉丁美洲组织得最良好和最有影响的共产党成长壮大。然而这些事态发展已远远超出了本章的范围。

在巴西，虽然社会主义团体早已存在<sup>①</sup>，但到1916年才成立社会党。在党内，在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为主的提倡战争中立的人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833页。

和以土著巴西人和葡萄牙人为主的赞成参战加入协约国方面的人之间立即发生了争论。1921年，党以多数票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分裂出去的少数派则于1925年成立了一个对立的党，但进展甚微。1928年，在工会相当有力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主要以英国工党为楷模的工党，1930年其党员人数剧增到80万人，不过到三十年代后期在格图利奥·瓦加斯建立了某种总体国家的时候，党员人数逐渐减少了。在1929年以前，不存在中央工会组织；但是在那一年，出现了两个分别受共产党和工团主义影响的对立团体。然而共产党人在1933年时失去了对巴西总工会的控制，并着手建立了第三个团体——统一工会联合会。1937年，瓦加斯解散了所有这些团体并迫使工人进入他的新的总体结构。在此期间，巴西运动的卓越人物是刘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生于1898年），这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物虽然后来被接受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并且成了共产国际执行局委员，起初与共产主义运动并无任何关系。他接受过军事工程师训练，早在1922年和1924年便与叛乱活动有牵涉。他领导一支军人和农民的杂牌队伍，转战各地，维持了两年多时间，直到1927年他最后到玻利维亚避难。在此以前，他只不过是一个反叛分子，没有任何明确的纲领，但是具有激起群众热情的非凡能力。应邀前往莫斯科以后，他在那里颇受重视，1934年他终于加入了共产党，翌年返回巴西参加反瓦加斯的斗争。他旋即被捕，系狱九年，直到瓦加斯下台才获释，恢复他在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

在阿根廷，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J. B. 胡斯脱博士和阿尔弗雷多·L. 帕拉西奥斯（生于1880年）所领导的、与第二国际有密切联系的强大的社会党于1913年分裂，当时，诗人曼努埃尔·乌加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832页。

特(1878—1932年)领导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主义集团脱离了党。在1914—1918年的大战期间,社会党赞成中立,虽然它的最著名的领袖都是协约国一方的坚决支持者。1917年,党再次分裂,左翼脱党后成立了一个国际社会党,随即加入了共产国际并正式改组成为共产党。尽管有此分裂,老党仍继续成长壮大,在1925年的大选中  
771 有18人当选为议员。它加入了改组后的第二国际,奉行严格的议会路线。然而,1927年它又遭到更加不幸的第三次分裂,当时以安东尼奥·德·托马索为首的一派人以党的正式政策不够民族主义为由脱党。脱党分子赢得了支持社会党的群众大多数的支持;1930年,独立社会党人获得109,000张选票,赢得10席,而老党得票83,000张,只赢得1席。同年,自由党人总统希波利特·伊里戈扬(1852—1933年)在奥古斯丁·胡斯脱将军和乌里布鲁将军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这个胡斯脱与1925年去世的社会党领袖J. B. 胡斯脱风马牛不相及。老社会党的残余力量与自由党人携手反对军事政变,但是没有进行积极的反抗。另一方面,独立社会党人站在将军们一边,并为胡斯脱当选为总统出了力。由于采取这种态度,他们不久便失去了大部分追随者,而且发生了内讧,立即陷于分裂。然而,老党虽然有一个时期恢复了元气,不久就一蹶不振,而共产党人却得势了。

在乌拉圭,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埃米利奥·弗鲁戈尼(生于1880年)于1910年组成了一个社会党。10年以后,该党以多数票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少数派在弗鲁戈尼领导下与党分裂。在整个二十年代,弗鲁戈尼的党力量一直很薄弱,尽管他于1927年在议会中再次获得1席。在乌拉圭的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之后,总统加布里埃尔·托拉依靠政变保持了她的政权,弗鲁戈里则

---

① 见第3卷下册第833页。

逃往阿根廷，但是后来又回国恢复了他在社会党中的领导地位。在随后的年代里，尽管社会党人在选举中势力单薄，乌拉圭却在伟大的激进党总统巴特尔·伊·奥多内兹奠定的基础上在社会立法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然而这些事态发展已超出了本章所涉及的时期。

似乎需要略加叙述的其余两个国家是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sup>772</sup>在哥伦比亚，二十年代的突出事件是工会对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工会在受共产党控制以前发动的，并且是从几次争取改善条件的局部性罢工开始并取得了胜利的。但是在斯塔马塔的香蕉种植园工人举行大罢工期间，共产党人取得了对运动的控制，试图将罢工变成一场政治斗争。在随后进行的镇压中，有1,000多人被杀害，3,000多人受伤，大约500人被捕入狱。工会的实力遭到削弱，而且在工人失败以后，严厉的镇压还继续了一个长时间。1930年，创建了一个新的哥伦比亚工党，但是直到1937年，工会才组织了新的工会联合会。这些事件发生在一个以前曾在异乎寻常的长时间内维持着稳固和相当开明的政权的国度里。

在尼加拉瓜，人们主要是对反叛的领袖阿古斯多·C·桑地诺（1893—1934年）的活动感兴趣，他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首先支持不幸的农业工人的事业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反帝激进分子。尼加拉瓜曾在接连几届美国政府任内四度被美国军队占领；这种形势一直继续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最后撤出美国占领军。争论的问题是美国根据布赖恩—查玛罗条约的条款修建一条穿越尼加拉瓜的运河并在该国建立海军基地的问题。在1927年第四次占领期间，当时只不过是陆军中尉的桑地诺拒不服从把武器交给美国人的命令，组成了一支人数不多的革命军，在此后6年中在山区坚持活动，主要依靠缴获的武器抗击美国

军队以及亲美的傀儡政府的军队。桑地诺往往被描绘成“土匪”；毫无疑问，为了他的部队的给养，他经常被迫在乡间进行劫掠。不过他本质上是一位反帝革命战士，他的业绩使他在整个拉美享有盛名。773 尽管如此，他招致了拉美各共产党的强烈敌意，这既是由于他拒绝在他的士兵控制的地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也是由于他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意见一致，希望不单纯以无产阶级，而是以农民、工人和反对外国渗入的本地中产阶级的联盟作为反帝斗争的基础。1933年美国军队撤退之后，他率领他的士兵们下山并要求为他们提供土地。他应邀前往参加索摩查总统的宴会，离开总统府时被国民警卫队逮捕，就地枪决。他的运动随着他消逝了，索摩查继续作为独裁者统治了尼加拉瓜多年。

本章所述已足以说明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内拉美社会主义的混乱状况。试图使自己具有整个大陆规模的、而不是较狭隘的一国范围的绝无仅有的运动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和共产党人的运动；而这两个运动尽管对美国佬帝国主义怀有共同的敌意，彼此之间却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曾在任何时候在大陆各地逐步争取到真正可靠的支持。当然，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在秘鲁以外的许多国家也有追随者，但是他们从未有效地扩大到不论是阿根廷还是乌拉圭。共产党人在较广泛的地区建立了“外围”组织和工会中心；但是在许多地方，这些组织和中心除了在纸上以外几乎不存在。在它们确有一定实力的地方，它们往往奉行因国而异的政策，而在它们从共产国际接受它们不喜欢的命令时，它们往往表现得相当执拗。共产国际本身也因政策暧昧而受损失，因为它既试图坚持各共产党应具有严格的无产阶级基础，同时又表示声援民族“解放”运动，即便在这些运动不在共产党控制之下时也是如此。三十年代有一段时期，共产党人的处境比较顺利，当时为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支持，反对法西斯主义，他们

转而提倡“人民阵线”；但是当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某些运动中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时，共产党的处境就不顺利了，这些运动后来被称作“庇隆主义”，它们把进取的民族主义与对传统的地主贵族的攻击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对相当一部分产业工人确有感染力。但是这些事态的发展大部分已远远超出了本卷所涉及的时期；为了避免过多叙述我准备留待最后一卷来写的时期，我只好在最不方便的时期中止关于拉美社会主义的介绍。

## 第二十五章

###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衰落和复兴

如我们在本书早先的一章<sup>①</sup>中所见,在中国,在1914年以前几乎没有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存在其卓越代表人物为孙逸仙(1866—1925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孙逸仙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主要表现在他认为政治行动应以之为基础的“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主义”的概念上。这个主义使他反对陷中国人民于贫困和奴役并浪费国家财富和阻碍它的经济发展的强大势力。它使他反对从外部剥削中国并力图为自己建立势力范围或力图通过“国际财团”共同统治整个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它使他反对确立了对某些地区的控制并浪费人民财富来从事两败俱伤的内战的“军阀”,在这些内战中,他们往往甘心情愿煽动帝国主义者,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来对付敌对的军阀。它使他反对地主和高利贷者——反对前者是把他们作为这样一个阶级:其剥削使农业耕作者贫困,因而没有财力来改进他们的耕作方法或根据公正的条件进入市场;反对后者是把他们作为乘农民之危、在给予他们的贷款上大肆榨取过高利息的集团。民生主义还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以不公正的条件雇用劳工的资本家;但是他对于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远不如他对地主那样敌对,因为大体说来资本家支持经济发展。因此就他们的情况而言,<sup>776</sup>他认为需要做的是强制改善工业条件而不是立即将他们废除。在

---

① 见第3卷下册第26章。



工业方面，孙逸仙希望实施计划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一种新型的政府会在一个迅速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带头，一部分在自己的主持下经营新工业，但是还有一部分在保证资本家所雇用的工人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管理制度下利用资本家作为代理人。

在本书前一卷曾讨论过孙逸仙的基本思想<sup>①</sup>，因而此处就毋需再加讨论了。他从根本上说是一位民主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民主制度必然要求保证全体人民享有令人满意的生活水平，因此他支持以民主方式控制经济发展的计划，这就需要利用从西方引进的、但经过改造以适应中国条件并且将发展而非破坏他十分尊重的传统中国生活方式的先进技术。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在1911年革命中应邀出任中华民国总统以后，由于希望全国能够统一成为袁世凯领导下的共和国，他放弃了总统职位，而接受了一个旨在使他成为一个宏伟的经济改组计划的负责执行人的职务。但是袁世凯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他想做皇帝；而孙逸仙则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实施其方案的权力。中国非但没有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全国民主统一，尤其在1916年袁世凯死了之后，反而分裂成了一些军阀割据的地盘，孙逸仙和共和派只在南方维持着一个朝不保夕的立足点，日本人则钻了各大国全神贯注于它们自己在西方的战争的空子，利用1915年的“二十一条”在中国大片地区建立了有效的霸权。

后来发生了俄国革命，接着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1914年以前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有一段时期俄国人没有能力在远东采取任何有效行动。只是在1920年内战结束时，俄国的亚洲部分才有效地为布尔什维克所控制；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仍需要时间来肃清日本的干涉军和残余的白俄部队。但是，俄国亚洲部分的内战一旦结束，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922页。

便立即具有了相当重要的意义。自认为是注定会迅速扩大到所有国家的一场世界革命的创始者的俄国人不得不就此作出决断：对待尚未完成的中国革命应采取何种政策，还有应向他们自己在中国的支持者推荐何种行动方针，这些人主要不过是一小批知识分子，但是已经在考虑成立一个作为共产国际成员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小规模起家，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直接结果。1918年春，在两位知识分子、北京大学的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下，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大约一年之后发生了所谓“五四”运动以及战后年代接二连三的反帝游行和示威的第一次浪潮。这个运动决不完全是或者主要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因为运动开始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还几乎没有存在。但是，虽然它主要起源于知识分子中间，尤其是学生中间，由于它吸引了大批工人阶级追随者并引起了带有政治目的的第一次罢工行动的浪潮，它是值得注意的。这个运动从一个城市扩大到另一个城市，它的内容包括广泛地抵制日货，并伴随着一个日益成长的、民族主义文化性质的文学和艺术运动。同年，即1919年，孙逸仙会同唐绍仪和伍廷芳在广州成立了一个与控制华北和华中的军阀分庭抗礼的新的共和国民政府。

翌年——1920年——春天，巴黎的中国留学生组成了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第一个具有明确的共产主义性质的中国组织；杨明斋在共产国际代表 V. S. 沃廷斯基<sup>①</sup>（生于 1887 年）的陪同下回到中国。沃廷斯基与北京的李大钊以及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接触，并与他们一起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初步行动。他们首先于 8 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该小组成了 1925 年成立的范围较大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核心。翌月，

---

<sup>①</sup> 中文名字是“吴廷康”。——译注

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会议来考虑建立共产党事宜，与会代表除陈独秀以外还有张太雷、邵力子和张东荪，但是没有立即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因为在举行会议时中国还不知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赞同共产党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合作的决定。几乎就在同时，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的张作霖联合起来以消灭控制着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的安福系——该政府随即倒台。其继任者立即与苏俄政府以及新近建立的远东共和国政府举行谈判，达成了临时协议，不过当北京政府由于希望讨好西方国家而中断谈判时，协议便废除了。于是俄国政府改变了方针，1920年10月，齐切林致函在华南的共和国总统孙逸仙，建议举行贸易谈判。然而，直到翌年7月孙逸仙才收到此信——此时已经朝着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方向采取了进一步的步骤。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并且后来在嘉兴继续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与会的12名代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由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任主席。毛泽东（生于1893年）是与会代表之一，印度尼西亚的C.马林（他的真名是斯尼夫涅特<sup>①</sup>）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了大会。同时，在上海成立了由张国焘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翌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在全国基础上将城市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作就此 779 开始。两三个月以后，在湖南建立了由毛担任书记的共产党支部，这是在建立一个与城市工人联合行动的革命农民运动方面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在广东，彭湃也开始组织了一个类似的农民运动。

所有这一切活动仍然规模甚小。同年，即1921年，南方人竭尽所能召集了1913年议会的许多议员开会，这个残余议会正式推选孙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然而，1922年南方军阀与孙的政府发生纠葛，将他暂时逐出广州，不过翌年他又回去了。1922年初，香港的

<sup>①</sup> 关于斯尼夫涅特，见本书第823页。

中国海员举行大罢工，罢工扩大到了广州和邻近地区，取得了出色成就。共产党人在这些运动中很活跃，并且在为指导运动而成立的工会中争取到许多有影响的职位。张国焘代表中国工人参加了1922年1月在俄国举行的东方劳动者会议；回国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并于1922年5月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170名代表代表了总共约100个工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了第一次代表会议，同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长。这次代表大会还发表了党的第一个宣言，阐明了党支持“民主革命”的政策。宣言宣称这种支持并不意味着“向资本家投降”，并称消灭封建制度对于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绝对有必要而且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宣言宣称，唯有在仍处于襁褓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取得进一步进展时，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才会发展，并称在达到这一阶段时，无产阶级就有必要与贫农联合发动“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以

780 反对资产阶级，但是眼下首先需要制订符合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纲领，作为使他们从当前压迫下得到解放的先决条件，还需要“建立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统一战线”。然而工人“在这个民主统一战线内绝不要成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而必须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斗争”。“因此，工人必须加入党〔即共产党〕和工会。”中共宣告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宣称其宗旨是“组织无产阶级，为建立工农专政、铲除私有制和逐渐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它的当前的纲领包括“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包括满洲在内）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解放蒙古、西藏和新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使它们与中国统一成为自由联邦；不论性别，让所有工农在所有议会和市议会选举中享有无限制的投票权，并给予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和举行罢工的绝对自由；并

为工人、农民和妇女制定保护法——除了其它措施以外，还包括八小时工作日、工厂法和保险，废除合同制，保护失业者，限制地租，征收全国土地税，征收累进所得税，废除像厘金这样的一切苛捐杂税，废除一切限制妇女权利的立法并实施经过改进的教育制度。”

这是革命和改良主义合而为一的纲领。它那专门为劳工提出的要求是改良主义的：它小心翼翼地将它那革命主义限制在有别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革命范围内。它的直接意图是努力建立由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民主统一战线，同时781在这个统一战线内保持它作为一个党的特性，并力求在其中组织一个在共产党影响下的独立工会运动。据该纲领宣告，长远目的是发展工人战斗组织的实力，以便“和贫农一起为建立苏维埃铺平道路并实现彻底解放”。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宣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称“唯有与世界无产阶级和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导致全世界的解放”。

在凡此种种宣告中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之处。中央号召“全中国被压迫的群众”在党的旗帜下与工人和贫农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因此似乎在考虑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或者甚至包括在共产党内的统一战线。它没有提及预定要构成拟议中的统一战线的一部分的任何其它的党——比方说没有提到国民党，即孙逸仙的党，民主革命党。不过，代表们几乎不可能料想到当时规模还很小的共产党在为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中能够成为人民的群众性政党，即使他们希望在民主革命之后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共产党可能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此外从措词中也无法明确看出：“无产阶级”一词除了意指产业工人以外是否也指农民；或者农民的作用与产业工人的作用之间的关系是被看作平行关系还是从属关系。在这个阶段，明确的仅仅是存在两个接踵发生的革命——国民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还可以明确看出中共在目前有意为前者的利

益而努力,而且为后者组织和准备力量。1922年夏制定的政策的暧昧不明之处不久之后便引起了许多困难和争论;但是它们暂时提供了一个基础,可以据以考虑共产党人根据何种条件参加以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某种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国民革命才是切实可行的。人们当可注意到,宣言没有提到大资产阶级构成这样一种统一战线的任何部分,也没有建议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或者哪怕成为它的盟友。

782 当时国民党是孙逸仙的组织松散的政党,也是从事国民革命的政党。它是一个基础广泛的民族主义政党,党内有大资产阶级分子,并且绝不是一致支持孙的激进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尤其是在军阀对峙、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华中和华北,国民党拥有多少党员和追随者确实颇成问题。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一个党,不如说它是一些权益集团的松散的联盟,这些集团为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而联合起来,并主要献身于争取在某种民主共和国下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然而,尽管它有种种局限性,它却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唯一群众性组织,因此共产党人不可避免地要阐明对它的态度。

共产党人在他们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于1922年8月举行的、有共产国际的马林(斯尼夫涅特)参加的全会上这样做了。当时决定共产党人在不解散他们自己的党的前提下应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以“钻心术”——用一句美国话来说——的办法设法在国民党内谋取重要职务。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得到了1922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同意,在会上拉狄克为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结盟辩解,虽然莫斯科并未正式表示是赞成还是反对共产党渗入国民党队伍的政策。这项具体决定似乎是由马林个人负责作出的,而在马林就此取得孙逸仙的同意之后,中共领袖稍有犹豫地接受了。孙随后在一份传留至今的笔记手稿中表明,

他这样做有一个唯一的条件：有关的共产党人必须接受国民党领袖的纪律约束。

无论如何渗透是实现了。这时越飞（？—1923年）以苏俄政府代表而不是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到达中国。他首先前往北京，企图与在军阀吴佩孚控制下在北京成立的新的中国政府谈判，在此之前，吴与他昔日的盟友张作霖发生了争执，把他赶回了满洲。然而吴丝毫无意以开罪西方各国为代价与俄国妥协；越飞在徒劳地等待了几个月之后便南下到上海会见了孙逸仙，而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孙在那年6月被赶出了广州。越飞由于放弃了与北京达成协议的希望，此时已愿意与孙打交道；在几经磋商之后，两人发表了本书前一卷已部分引述过的著名的1923年1月公报。<sup>①</sup>在这项文件中，孙和越飞一致认为中国还不存在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必备条件；越飞还进一步宣称“中国永远存在的和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彻底的民族独立，”并保证俄国和俄国人民对这些目标给予最热烈的同情和支持。这一宣告显然与共产党渗入国民党的政策十分吻合；而且也为俄国进行协助将国民党本身改组成为中央集权的和有纪律的群众性政党铺平了道路。不久以后孙回到了广州，这里便再次成为南方共和政府的总部。

在此期间，主要在共产党领导下，1923年2月在京汉铁路上爆发了总罢工。吴佩孚残酷镇压罢工，枪杀了大批工人，包括参与其事的著名共产党人，其中有林祥谦和赵施洋。为粉碎罢工而采取的极其严厉的措施使工会看到，面对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来对付他们的军阀，他们多么软弱无力，从而加强了共产党领导要控制国民党的愿望。6月，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号召与国民党在民族斗争中进行合作，这一次在意识到受压迫的集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926页。

团之中列入了“爱好和平和有节制的商人”。宣言声称国民党“应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力量，应该担负起革命的领导”，同时批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指望外援并集中力量于军事行动，而“忽略在人民中进行宣传工作”。宣言敦促国民党改正这些错误并在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中带头，但是同时又声称共产党自己的特殊任务是在工农之中进行宣传，并重申党献身于工人阶级利益。陈独秀再次当选为总书记和政治局首脑。中央委员会于8月举行会议，决定保持工会对国民党的独立，同时继续奉行共产党渗入国民党的政策。翌月，鲍罗廷（1890—1954年）以俄国派往孙逸仙处的使者的身份到达广州，他会同孙逸仙着手将国民党改组成为以俄国党为楷模的中央集权的党。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贯彻改组事宜，并宣布赞成与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联合并支持工农运动。在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有3名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和于树德，还有6名候补委员，其中一人是毛泽东。时隔不久，为了为一支新的革命军训练军事领袖，国民党成立了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生于1898年）任政治部主任。这样，改组后的国民党为了向盘踞在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军阀发动进攻，开始了准备工作。

在整个1923年，北京一直存在一个受吴佩孚保护的影子共和政府。有名无实的总统是曹锟，在他的主持下，那年10月颁布了一部共和宪法。但是在1924年，所谓基督教徒将军冯玉祥将吴佩孚赶出了北京，在冯的赞助下，1916年时曾任总理的段祺瑞出任总统。段由于意识到自己势单力薄，便着手与南方政府举行谈判，是年岁末，孙逸仙北上与他和冯共同商讨统一的可能性。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先是在广州、然后在上海举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发展其组织，特设分别由蔡和森和张国焘领导的华北局和华中局。2月，段与孙和其它领袖就全国改组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但是



在此期间孙逸仙身患重病，于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从而使国民党和中国革命丧失了它们的卓越的和最受爱戴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拟议中的解决办法成了泡影，敌对的军阀继续自相残杀。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次有代表166个工会的281名代表参加，林伟民当选为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同月，上海出了大乱子，公共租界巡捕向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群众开枪，枪杀13人。上海接着爆发了总罢工，并扩大到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其它地区，香港工人撤往广州，封锁了该英国港口。在广州附近沙面的一次事件中，英国海军陆战队向罢工工人开枪，死伤多人。一个反英和反日浪潮席卷了大多数中国城市。共产党人主动领导了这个以“五卅运动”著称的运动；中共党员人数从不到1,000人猛增到2万人以上。同时，毛泽东在湖南开始把农民组织成为一支革命力量；但是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领导不大重视他，他们忙于在国民党内部的工作，主要注意工会和城市工人阶级。

中国各地纷纷举行大规模游行，哀悼孙逸仙的去世。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他身后留下一个“遗嘱”，至少在名义上可以作为国民党民族复兴政策的基础。为纪念他的功绩并为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培养领袖，1925年在莫斯科成立了孙逸仙大学，由拉狄克担任第一任校长。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786进程主要为共产党人所控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委员占7名，候补委员占24名。然而这超出了国民党右翼所能忍受的限度；3月，蒋介石组织了一次对共产党人的突然袭击，促使国民党执委会通过一项决议，禁止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然而即使是这一举动也并没有导致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分裂，后者

---

① 见第3卷下册第922页。

仍然希望大部分人会追随他们而不是蒋介石，蒋正忙于进行最后的布署，准备对华中和华北的军阀进行北伐。此时已拥有50万名以上工会会员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于5月在广州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苏兆徵当选为主席。7月，北伐开始，长驱直入华中，于1926年9月占领汉口。11月，包括3名共产党人的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湖北省的武汉，这个政府代表了国民党中仍然愿意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人物。另一方面，蒋和国民党右翼此时已公开联合反对左翼。在北伐开始前，主要负责改组国民党的鲍罗廷已被解职，当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M. N. 罗易于1926年12月到达中国时，他发现鲍罗廷作出的整个安排已经解体。

武汉政府继续作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结盟的代表机构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该政府丝毫控制不住蒋及其统率的武装部队。蒋继续取得军事进展，得力于罢工、农民骚乱以及企图反抗他的军阀部队士兵的大批逃亡。到1927年3月，他已占领南京并向上海进军。当他兵临上海城下时，这个城市里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一次起义，起了帮助他占领上海的作用；但是翌月，已与武汉政府分裂的蒋在787 上海和南京组织了一次反共政变，解散了左翼组织，处决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工会以及其它左翼的活动家。当这种恐怖统治正在进行时，中国共产党在汉口举行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汉口仍在蒋介石已经不承认其权力的武汉政府手中。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中共称它拥有党员5万人。代表们严厉谴责蒋和国民党右翼，但是仍然不愿意承认与国民党的联盟已彻底瓦解，还希望与武汉派保持良好关系。中共仍由陈独秀领导，他继续提倡与国民党左翼联合行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除了其它人以外还包括：党的华北区负责人蔡和森，党的左翼领袖李立三，不久以后继陈独秀出任总书记的瞿秋白，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主要工会活动家张国焘，武汉政府农业部部长谭平山，武汉政府劳工部

部长苏兆徵以及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长期斗争中毛的主要副手之一周恩来。因此这个政治局代表了所有主要的共产党集团，但是这种表面的团结是短暂的。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吁请国民党左翼领导革命并领导反对蒋介石及其右翼支持者的斗争；7月初他们仍试图与武汉政府达成协议。但是接着在莫斯科的指示下，他们突然改变了政策，命令他们的代表退出武汉政府，并改组政治局以便把陈独秀及其支持者排除在外。这样，共产党与国民党任何部分的合作以及与此同时还有陈独秀对党的领导都宣告结束。在此期间，鲍罗廷离开了武汉，并偕同他的副手中没有沦为蒋的镇压的牺牲品的人逃回俄国。陈独秀被当作中共企图与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合作未果的主要的替罪羊。

为了充分实行事态的新转折要求作出的共产党领导和政策的变化，中共于1927年8月举行了紧急会议。瞿秋白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接替陈独秀；会上选出了排除陈的支持者的新中央委员会，并决定采取比较激进的纲领，今后不再迎合国民党的情绪。在蒋的命令下处决了无数共产党领袖和劳工领袖，而且强制解散了许多左翼组织，这给了中共以沉重打击。中共还发现难于彻底从与国民党的瓜葛中自拔。对左翼的镇压日益严厉，迫使共产党人和工会愈来愈转入地下。这种镇压还在许多地区引起了局部的暴动——特别是在湖南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暴动。湖南的这种暴动基本上是一个农民运动，虽然它自称是工农起义。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在过去两年毛一直在忙于组织湖南农民；1927年他的运动已经有追随者200万人以上。湖南的暴动者此时要求完全脱离国民党，建立工农革命军，没收地主财产，建立共产党地方政权和苏维埃组织。起义迅速遭到镇压，毛甚至因为发动起义受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申斥，但是农民运动仍然没有被征服，毛继续领导这个运动。

还发生了其它局部性起义。9月，共产党队伍占领了汕头，占

789 领数日后被赶走；10月，彭湃在广东建立了苏维埃，维持了好几个月；11月，毛再次在湖南部分地区组织了一个苏维埃地方政权。接着在12月，广州工人在张太雷领导下举行起义——他在战斗中阵亡——，建立了为时短暂的广州公社。这次起义与毛领导的起义不同，得到了共产党领导和共产国际领导的充分支持。随后在1928年1月发生了又一次农民起义，这一次是在湖南南部，由朱德领导，数月之后他与毛会师，组成了红军第四军——仍然没有得到中共领导支持，因为他们仍对农民运动很少重视，坚持唯有城市无产阶级能在革命中发挥主导作用。鉴于国民党军队控制着城市，而且城市工人遭到严厉镇压，这样一种政策毫无立即成功的希望，甚至还有招致对工人运动祸患无穷的镇压之虑。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已处于极其迷失方向的状态。在蒋介石叛变之前，共产党人指望能够夺取对国民党的控制，利用它作为他们的工具，首先用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后用来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奠定基础。主要在城市知识分子领导下并且为俄国革命所吸引，共产党人的组织工作主要集中在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会方面，到1927年时，这些工会的会员人数已增加到将近300万人。他们确实认识到革命要成功必须得到农民支持；然而他们认为农民无非是人数少得多、但比较有发言权的城市工人所领导和控制的运动的附属品，而另一方面，毛已经懂得中国革命为了进展到超出纯资产阶级阶段，首先必须是一个以对农民具有直接吸引力的纲领为基础的农民运动。毛在这个时期还不能影响全国领导机构，因而坚持走自己的路，多少超然于党的历次中央会议之外，并且抵制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由于他这样行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才没有遭受1927年蒋对它野蛮进攻时似乎面临的灭顶之灾；但是他的影响暂时只达到范围不大的地区，而在中国大部分地方，共产党人及其劳工盟友都濒临彻底的失败。

在此期间，俄国人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就中国事务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托洛茨基尖锐地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他攻击他们不该一直支持蒋介石直到他的1927年4月政变，并且认为中共非但没有如斯大林希望的那样把国民党夺取到手，反而几乎被国民党夺取了或被消灭。然而即使在蒋发动政变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然硬要维持与以武汉政府领袖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的联盟；但是汪由于深知中共决心夺取他的政府而且由于无意接受共产党的控制，乃于1927年4月发动反击，驱逐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并在当地将领们的支持下发动了只不过不像蒋那样凶残的反共镇压。面对这种情况，中共和共产国际都不得不设想出新的路线。在与国民党结盟期间，他们一直是从建立一个不仅包括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大资产阶级中、甚至地主中的民族主义分子的统一战线的角度出发来采取行动的。当然，他们曾考虑到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后两种人会立即背弃联盟；但是他们指望像得到工农主体支持一样还继续得到小资产阶级主体的支持。他们试图从阶级的角度把蒋的叛变解释成大资产阶级投靠到地主和资本家一边，甚至是投靠到外国帝国主义者一边，来反对革命；接着他们又寄希望于在国民党左派协助下重建统一战线，以便仍然把以武汉政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吸收进去。在汪对他们翻脸之后，这一希望破灭，于是就有必要设想出一个新政策，并想法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作出可以掩盖他们所犯的灾难性判断错误的解释。他们想出的办法一部分是谴责蒋和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另一部分是对武汉的小资产阶级政府的变节行为进行类似的谴责。然而，他们却无法掩饰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遭到了十分惊人的失败这样一个事实。

在中国，共产党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可能再在中国境内举行正式代表大会。它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夏与共产国际第六次

代表大会同时在莫斯科举行。特别是有鉴于党所处的瓦解状态，这样一次集会必然远远不会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也必然会异乎寻常地受到共产国际领袖们的压力。大会奠定的政策企图采取一条介乎陈独秀的已遭谴责的所谓右倾偏差与所谓“盲动主义”之间的路线，后者意指煽起毫无取得持久胜利希望的直接暴动。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在1927年和1928年的头几个月，在农民之中以及在一些城市里爆发了接二连三的起义；大会把鼓励这种形式的行动部分地归咎于党的新总书记瞿秋白。瞿受到了申斥，他奉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在莫斯科，他的总书记一职由曾经是武汉政府共产党部长之一的向忠发担任。周恩来被任命为组织部负责人，后来又负责最初由胡文江(译音)负责的军事部。前青年团领袖李立三奉命主持宣传部，后来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主持党的劳工部。最后，前一年曾在广东领导农民苏维埃运动的彭湃被任命为农民部负责人。

第六次代表大会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并通过了一系列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彻底重新制定党的政策的决议。大会首先承认失败：它说，革命浪潮肯定已经衰退，必须过一段时期才会重新高涨。但是它也坚决声称可以怀有信心地期待新的革命浪潮的到来，并声称中共必须立即着手为这一革命浪潮的到来进行准备。世界革命仍被看作是肯定会到来的事件，武装暴动仍被看作是世界革命的必要步骤。因此，虽然需要谨防只会耗尽工人运动的力量而毫无好的结果的形形色色的“盲动主义”，但为衰退时期一旦结束就需要举行的武装起义作准备仍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大会没有指出——其实也不可能指出——衰退会持续多久；但是显然认为衰退时期不致于长到会使得为即将到来的暴动作准备一举马上失去它的重要意义。即使“低潮”已经过去，要完成的革命也不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只会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虽然在完

成这种革命时现在必须抗击已投靠军阀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他们的支持。但是这还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条件还不成熟。也绝不能将这场革命说成是“不断”革命——这是托派言论，乃是十恶不赦的大罪，这个名词意味着革命浪潮的不断高涨，而这是不符合实际形势的。共产党的任务是：不再以大小资产阶级的暂时盟友身份，而是不顾他们对统一战线的背叛，来完成第一次革命——彻底消灭封建制度、地主所有制和帝国主义干涉。

只有在中共能够领导工人和农民——他们共同构成了仅存的革命力量——的真正群众运动的情况下，方能做到这一点。为了做到这一点，党需要在性质截然相反的两种危险之间谨慎地前进。一方面，它必须避免对群众运动采取专制态度，因为这会招致群众的反感和破坏党的影响。中共不得命令工人罢工和农民反叛。它必须渗入和激励群众运动，而又不力图以党取而代之。即使在工会处于反动影响之下时，共产党人也必须参加工会并在工会内部工作，同时协助建立新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以此类推，他们还必须与农民运动合作并予以鼓励，而且避免对它们发号施令。但是在这方面中共遭遇到了最可怕的困难。它的真正盟友是贫农和中农而不是宁可与资产阶级站在一边的富裕农民；但是强调这一点是危险的，因为当务之急是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鼓动群众性的农民运动，这就需要对全体农民具有号召力，而不是煽起农村中的敌对情绪——除了对地主阶级的敌对情绪以外。此外，群众性的农民运动动辄以没收地主财产以便在内部均分作为运动的目标；中共莫斯科代表大会表示强烈反对这种平均分配，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态度的表现，而且认为这与共产党提出的使土地成为应控制其分配和使用的农村苏维埃拥有的公产这个目标背道而驰。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一再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要与农民平均分配

土地的计划发生任何关系，并强调实现苏维埃对土地控制的决定意义。当然，由于担心招致农民运动的反感，它没有强调曾经是它宣布为政策的土地国有化。它找到一个折衷办法，力主由苏维埃控制土地，并告诫共产党人一方面要避免与富裕农民对立，同时又要记住为了贫农利益、对他们的压迫者进行斗争的责任——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不是容易的事情。

共产党对土地和农民的政策问题的确是第六次代表大会企图正视的困难的核心。1927年以前，或者甚至是1928年以前，中国的共产党人从未承认农民在进行革命时不止发挥纯系次要的作用。几乎没有什么例外，他们总是注重城市，指望城市无产阶级在他们指导下率先行动，带动农民，而实际上不容许农民在革命政策的决策工作中起任何作用。他们对于毛泽东念念不忘革命的农民那一方面，表示不满，甚至不时非难他。然而现在，在他们在城市中的力量面临崩溃的情况下，军阀和国民党无法有效管辖的农村成了他们用来达到革命准备的目的最广阔的地区；不论他们是否愿意，794 他们不得不重新估量农民运动并在较大程度上承认其重要地位。即令如此，他们仍然绝不愿意在革命领导层中给予农民独立地位；他们坚决认为城市工人必须领导农民并继续发挥支配作用。然而他们确实认识到，在最近的将来，在农村能比在城市有作为得多，并认识到最迫切的任务是为土地问题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他们认为这个解决办法就其最直接的方面而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认为农业集体化暂时完全行不通，并且意识到这种解决办法会使小地产和小规模耕作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危险。

中共在重新阐述它对农民的态度时面对的一项严重困难是：土地制度和农民运动的性质在中国因地而异。在华南和华中的大部分地区，农民的主体是贫农和无地劳动者，农民运动往往主要掌



握在这两种人手里。另一方面,在华北,与佃农和大地产并列的有大批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比较富裕的农民。在这两类地区,中农都是人数众多而重要的成份;因而中共着重宣称,没有这部分人支持,革命便不可能成功。但是相反,在华南和华中许多地区已经存在的激烈阶级斗争中,较富裕农民却联合反对贫农和无地劳动者,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华北——,情况却并非如此,各种类型的农民主要是联合一致反对军阀、地主和苛捐杂税,因而只要革命是针对这些祸害,他们就是革命的支持者。因此,要推荐一个可以对全国执行的统一政策,似乎并非切实可行。在华北以及其它类似的地区,似乎甚至需要避免招致富农的反抗,免得把他们推向反革命的怀抱;相反,在华南大部分地区 and 华中许多地方,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因此可以听凭中共站在最受严重剥削的那些人一边。然而,即使在这种地区,招惹中农反抗也是与成败攸关的,对于中农,必须诱导他们支持革命,而且如果重视他们对于没收他们有希望分享的地主产业的要求,如果丝毫不威胁他们拥有的财产,是可以说服他们这样做的。这意味着不可能有单一的、简单的政策:对每一个地区必须分别加以考虑,所采取的行动必须适应该地区的具体条件。各地共产党人都应该在农民运动中努力发挥主要作用,至于应该具体发挥什么作用则要因地制宜。

795

因此,代表大会在关于政策的总决议中曾严厉谴责了平均分配土地的运动,而有关农民问题的特别决议措词则要含糊得多。特别决议承认,在许多地区必定会产生平均分配土地的要求;决议规定,在贫农和无地劳动者占很高比例的地区,在这种要求显然来自当地农民运动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该支持这种要求,“但是也应该批评这种要求。”作为导致土地封建制度的消灭的一个步骤,他们应该支持它,但是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幻想,”又应该批评它。在中农占多数的地区,他们也不应该同意平均分配

土地的做法，因为在这种地区，这样做势必会引起中农不满，使革命获得成功的一切希望成为泡影。这肯定是一种可以作出大相径庭的各种解释的含糊其词的答案，但是要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又谈何容易。

关于农民组织问题，这项决议说了许多。在一方面，决议非常强调有必要把“农村无产阶级和包括手工艺工人和无地农业劳动者在内的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既为这些人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组织，又为他们在整个农民运动中争取到颇有影响的地位；同时又非常强调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需要在附近的小城镇建立密切联系，而且城市工人也需要渗入农村组织，以便赋予这些组织以更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议还着重指出需要吸收妇女积极参加农民运动，并指出青年组织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决议敦促共产党人在保持农民组织在农民大众中的广泛代表性的同时，不要错过任何机会夺取这些组织的领导权，并敦促他们在这些组织的日常斗争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决议规定，在农村中“游击战”将是斗争的主要工具。这一项下包括拒付地租和赋税，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镇压压榨成性的乡绅和地主”，以及成立农村代表委员会和村苏维埃。然而单是游击战还不够，它应该在适当情况下，在有希望的地区发展成地方起义，导致苏维埃接管一切权力并建立农民军。然而，共产党人同时还被告诫说，这种起义“能够成为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的群众起义的起点，唯一的条件是：它必须与城市无产阶级中新的革命浪潮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没有城市工人全面参加并予以指引——一个似乎暂时排除的举行这种起义的条件——，农民不可能有希望进行革命。然而决议接着说，“党应该领导农民的自发起义。”对于这种模棱两可的意见如何理解，那就听凭党员了。

尽管如此，决议明确指出，它期待苏维埃控制的边区出现，在

这种地区，苏维埃地方政权将能够立住脚跟，对付它们的敌手的军队。决议敦促这种地区的苏维埃逐步建立它们自己的可靠而有纪律的武装部队，并为将要逐步加强的、作为革命力量的重要工具的工农“红军”建立核心。为这支军队训练干部的工作将认真承担起来；同时，共产党人应在地主拥有的民团内以及无地和失业的人拉起的土匪队伍内积极工作，以便把他们之中的尽可能多的人争取到革命方面来。 797

可见，莫斯科代表大会竭尽全力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一项新政策，用这种方法把过去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左倾“盲动主义者”的过错，而不是归咎于实际主要应该为导致灾难的政策负责的共产国际或俄国政府。过去正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国的影响下，中共企图先是从外部、并进而通过渗入其内部来与国民党合作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曾得到共产国际领袖们的衷心赞同，在蒋叛变之后，排除了大资产阶级的、缩小了的统一战线也是如此。在蒋开始杀害共产党人和解散劳工组织以后，鲍罗廷积极参与了继续与武汉政府合作的企图。根据1928年代表大会决议的说法，国民党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是清一色的反动分子，但是只是等到汪精卫继蒋之后也赶走中共的时候才发现这一点。然而在代表大会上不得发表任何言论对俄国人或共产国际进行批评——尤其不得发表任何可能对托洛茨基激烈反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的态度表示赞同的言论。全部责任不得不由国民党的“叛徒”以及中共本身的错误和无效率来分担。

中共代表在莫斯科通过的决议包含对政策进行根本性修改，这首先是因为决议承认土地问题和农民在革命运动中所占地位的首要意义。然而这些决议仍然大体上是以幻想为基础。它们大大夸大了产业工人能够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在俄国，1917年在农业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工业部门只占一小部分；但是，出于战略考

798 虑，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建立了庞大的现代化的工业企业，以便在关键时刻发挥决定性影响，其中包括主要雇用男工——他们为革命武装力量提供了核心力量——的大批重工业。中国工业没有这种高度发达的重工业部门；中国的任何城市也不可能据有彼得格勒在俄国革命中据有的那种关键地位。在上海，纺织业占支配地位，外国势力是妨碍革命行动的强大障碍。广州是最革命的城市，但是它是一个商业中心而不是一个工业企业中心。中国的产业工人中有很高比例的手工业工人，或称工匠，他们广泛地分布在一些小团体中或者从事个体经营，难于把他们组织到广泛的阶级运动中去。要是认为工业无产阶级可以成为中国革命——不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缔造者，或者甚至是引路人和领袖，那纯粹是想入非非；但是不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都难于承认这一点，因为工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起主要作用乃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即使把农民运动提高到革命战略中的头等重要的地位，共产党人仍然不能认为这个运动是真正领导革命的，而是继续坚持必须引导它在产业工人的鼓舞和指引下行动。

尽管如此，政策的转折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1928年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的革命者完全是通过农民运动才得以采取算得上是大规模的行动。在此以后，在中共领袖中间毛不再是一个备受批评的次要人物，而是一跃而为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因为他继续按照他为之经常受到批评的原则行事，从而得以不断保持高水平的革命活动，并且对蒋介石为消灭他的运动而作出的巨大努力满不在乎。1928年以后，中国始终存在依靠红军的有组织的力量维持的苏区，在这些地区里对地主和其它剥削者采取了革命行动，分配了土地，赋税也比较公道，而且对蒋及其副手的正规军进行了全面战争，互有胜负，但是大体说来获得了十分出色的成

就。这些业绩大部分已超出了本卷所涉及的时期，因为本卷的下限是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但是在1927年到1929年之间，随着在湘、赣、鄂建立第一批红军和成立第一批中华苏维埃，已经做出了开端。到1930年时，这个新运动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于是在上海举行了苏区全国代表会议，并打算建立中华中央苏维埃政府和拟订该政府的组织法。当然还要经历漫长的道路方能真正建立这样一个政府，但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已经奠定。 739

在此期间，中共整个说来一直在经历进一步的兴衰浮沉。远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丝毫没有充分的代表性，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党员才普遍知道代表大会的决议。1929年6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终于批准了莫斯科决议，使党开始执行新的方针。8月，毛和朱德在江西部分地区建立了苏维埃制度；同月，1927年广东苏维埃的创始者彭湃被捕，并被国民党在上海处决。翌月，在前中共书记陈独秀领导下，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反对派会议，企图炮制一个与莫斯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策分庭抗礼的政策。与陈合伙的有诸如彭述之和刘仁静这样的中共主要人物。陈随即被中共开除出党，此后他和另一些人成立过一些反对党，这些党往往被指责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据说托洛茨基曾劝陈另组反对集团。

这时李立三已成为中共统治集团中的领导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上遭到申斥时，他接替了瞿秋白。因此李就不可避免地要执行新的莫斯科政策；在“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之间走一条规定的中间道路，并且为暴动作准备，可是实际上在新的革命浪潮到来之前并不举行暴动。问题在于应该由谁来决定新的革命浪潮是否已经到来。李发现莫斯科动辄要求他奉行更积极的政策。1930年7月，李由于以为复甦即将到来，便决定采取行动，命令湖南苏区的一支农民部队进攻和占领长沙城，结果惨败；李被指 800

责为“盲动主义”并有被解除领导职务之虑。尽管有此失败，在1930年9月应瞿秋白要求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李立三依然得到了大多数的支持，瞿秋白在此之前不久从莫斯科奉派回国就中国形势提出汇报。但是5月份代表共产国际前来中国的帕维尔·米夫却对李采取了极其敌视的态度而且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与他同来中国的有在莫斯科的孙逸仙大学学习的大批学生，这些学生采取了强硬方针，并且在米夫的支持下，着手夺取对党的控制权。11月，共产国际正式谴责李的方针，他被迫辞职。经过激烈斗争后，新来的人在米夫支持下取得了对党的机器的控制权，赶走了老一辈的罗章龙和何孟雄，前者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后者于翌年被国民党逮捕和处决。李被罢免后不久便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公开承认了他的所谓错误，随即又得到了宠信。与此同时，与米夫从莫斯科同来的那批人之中的主要人物陈绍禹，作为总书记取代了李的党内领导地位。

在此期间，虽未出席莫斯科代表大会、却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一直在湖南和江西的高原巩固他的地盘。差不多一直到1930年底，他在那里一直没有受到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的骚扰；但是在1930年12月，蒋介石对地处交通不便的山区、有利于进行非正规的防御战的苏区发动了他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势。进攻最初获得了胜利，但是不久便被击退；不过在1931年的春天和夏天，蒋接着以愈来愈多的部队发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攻  
801 势。这些新的进攻也被击退；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毛担任共和国主席，朱德担任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毛还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样，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人物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承认。这时日本已入侵满洲，而且正在暴露它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卫星国的意图，于是中共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新的敌人。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本宣战,开始呼吁建立新的统一战线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然而蒋介石宁可与日本人妥协而不愿放弃推翻中华苏维埃的企图。他对苏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规模愈来愈大的进攻,直到最后毛于1934年10月决定撤出他曾如此英勇地守卫过的地区,率领他的苏区部队与已在陕北建立的其它苏区的部队会师。穿越中国的著名“长征”开始了,大约一年以后毛的军队到达了目的地。又过了一年,于1936年秋,毛的部队与驻在四川的朱德部队会师;翌年初,在中国西北部成立了新的陕甘宁苏维埃政府,首都延安,主席是曾任中共组织部部长而且早在1921年初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张国焘。接着发生了1937年的全面的中日战争,导致了张国焘脱党后投靠国民党并于1938年被开除出共产党等等问题。然而这些事态发展已超出本卷打算涉及的时期。

因此,我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叙述不得不在这样的时刻半途中止:共产国际满怀信心地希望世界资本主义立即崩溃和革命浪潮重新到来,这个希望在中国仍未实现,虽然经济大衰退已经降临世界,关于资本主义早日死亡的预言再次甚嚣尘上。在中国,革命运动在恢复它对城市的控制方面殊少进展;它的成就在 802  
农村地区,是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起了带头作用,表现了他们反抗蒋介石企图消灭他们的战斗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毛的鼓舞下愈来愈摆脱了共产国际和俄国的影响而奉行自己的路线,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条作出了自己的解释。1932年当选为中共总书记的秦邦宪于1934年初由张闻天取代;但是有朱德和周恩来作为主要副手的毛泽东成了杰出的人物和杰出的民族领袖。

## 第二十六章

### 日本，1914—1931年

在日本，如我们在本书前卷所见<sup>①</sup>，由于在1910年到1911年之间对所谓“无政府主义者”的逮捕和处决，以及取缔全部社会主义报刊和禁止所有社会主义者集会，社会主义运动几乎被消灭。这些措施也对主要在社会党和其它左翼领导下的工会产生强烈反响。其中有许多工会消失了，另外有一些工会被迫转入地下。只有一个以铃木文治(1885—1941年)为首的、在一个中央机构友爱会中组织起来的稳健集团仍在一些希望引导工人走和平道路的雇主支持下，获准公开存在。铃木及其追随者当然遭到了仍然逍遥法外的社会党人的严厉谴责；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中止活动的。

然而大战助长了工业的迅速发展。日本虽然根据英日条约与英国结成了抗击德国的联盟，除了占领中国的一些以前由德国人据有的地区、控制远东的海洋并为运载日货前往欧洲的船只护航以外，殊少参加战斗。日本人倒是一方面主要致力于迫使中国接受他们的要求——“二十一条”<sup>②</sup>——并确立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致力于为欧洲协约国提供大量出口商品，并在世界市场的许多地区取代交战国的地位。这些情况导致了产业工人人数的迅速增长，并导致了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要求的充分就业状态。

---

① 见第3卷下册第27章。

② 见本书第776页。



随着物价猛涨，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尽管不断遭到镇压；甚至不富 804  
战斗性的友爱会也卷进了活动，并成为其性质远比它成立伊始时  
更像真正工会运动的某种机构。这使得曾经支持过它的雇主们不  
再给它帮助并成立了一个名叫调和劳资协会的对立机构。此举没  
有产生效果。友爱会改名为日本劳工联合会并迅速增加了它的会  
员人数，其纲领体现了对八小时工作日、六天工作周和普选权的要  
求。1918年期间，由于粮食——尤其是米——短缺和价格高昂，骚  
动四起，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和经济力量再次出现。

这就是大战结束时的形势；日本政府不得不作出决断，决定对  
迅速壮大的工会运动以及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日益强大的压力所  
应采取的态度。协约国的胜利就其对日本的影响而言，看来像是  
民主制度对专制制度和军国主义的胜利，从而使人们对西方的开  
明的民主思想的兴趣大为增加。许多西方的政治和经济著作被翻  
译和出版，有的普遍发行，有的由知识分子的专门社团有限制的出  
版发行，在许多情况下与大学有关；一些进步刊物，比如《改造》，发  
表西方民主主义作家的文章，并对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政策进行  
热烈讨论。与此相对立的是，有一个时期日本在远东似乎可能卷  
入反布尔什维克的大陆战争；但是在欧洲协约国军队撤退和柯尔  
察克失败之后，日本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逐渐听从劝说，从他们  
在西伯利亚的冒险行动中撤退并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日本参  
加了导致1922年2月签订华盛顿条约的谈判，是五国海军公约和  
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前者控制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五国  
舰队的相对规模，后者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并为各国的工商业 805  
在中国全境提供平等机会；这些条约有助于为1925年的苏日条约  
铺平道路。

在工会方面，日本政府不愿给予工会任何程度的积极承认；但  
是，继续奉行以前的镇压政策已经行不通，实际上，虽然工会并无

明确的法定地位,它们却获准存在和发展。由于根据凡尔赛和约,要成立国际劳工组织作为国际联盟的一个机构,这个问题就达到了严重程度。国际劳工组织以一种三方结构为基础,它要求参加国政府在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磋商后任命半数代表。友爱会声称它作为最大的工会团体有权受到咨询,但是政府拒绝了它的要求,而且不顾国际劳工组织的章程规定坚持由它来任命全部代表。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1919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会议上日本政府仍然持这种态度,然而后来它在国内和国际的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却被迫让步,与日本劳工联合会和铁路工人组合——联合会以外的最大工会——都进行了磋商,并且吸收铃木和铁路工人领袖奈良崎(1865—1932年)作为出席以后的几届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的代表。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麻烦,1919年时政府忽略印度工会代表大会的被提名人M. N. 约希而属意B. P. 瓦迪亚,但是在这件事上他们两个人同意共同参加代表团,而约希在名义上担任的是候补代表。

在选举权问题上,日本政府拒绝关于普选权或成年男子选举权的要求,但是1918年初通过降低限制条件,即把纳税从10日元减少到3日元,曾大大扩大了选举权。但是骚乱依然继续存在;1924年大选之后成立的联合政府于1925年通过一项确立成年男子选举权的法案。至于给予妇女选举权,还谈不到,在大战之前,她们甚至不得参加政治集会。

806 除了作为主要通过工会或通过大体上与大学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小团体行事的压力集团,在1918年以后的年代里,不论是劳工运动还是社会主义运动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政治力量。两大政党是传统的保守党政友会以及主要代表实业界权益的、后来称作民政党的宪政会。在选举改革后于1928年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有8名工人代表当选,但是并非作为巩固的工党或社会党的党员。事实上

他们分属于3个团体——以大山为首的劳农，以阿苏为首的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以及以阿倍教授为首的社民党。然而，组织工作已从产业工人中扩大到小农中间，并且为实现两者结盟作了尝试。1925年，在东京举行了一次有这两种人的代表出席的会议，但是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劳工联合会和其它稳健的团体退出了会议，余下的代表成立的劳工农民党立即被当局以它的一些要求危害国家为由解散。在此以前，共产党人已开始活跃，而且对一些主要的左翼工会团体的影响有所增长；但是他们只有少数追随者，而且老的工会运动仍然强烈反对他们赋予经济动乱以政治倾向的做法。

第一个日本工厂法——一个非常温和的法案——于1911年通过，并于1916年生效。主要由于日本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1923年通过了一项新的法令，并在进一步修正后于1926年生效。该法令限制十六岁以下的童工和女工的劳动时间为每天十一小时，并禁止让这两种工人上夜班，但是没有限制成年男工的劳动时间。该法令还为因职业病或工伤致残者提供非常有限的补偿，并实行一种津贴制度，补贴因公牺牲者的丧葬费用。1926年还开始实行健康保险；政府还通过了一项关于解决劳资纠纷的修正条例，并废除了以前规定罢工行动为刑事犯罪的一项治安条例——这是早就发现无法贯彻的一项规定。这样，日本本着与其工业发展所达到的时期相一致的精神，朝着采用劳动法规的方向迈出了最初的几步。

然而这个相对开明的时期注定不会持久。随着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开始和1931年至1932年之间满洲危机的发展，这个时期便嘎然而止了。在中国，在蒋介石与共产党人分裂之后，国民党取得的胜利使中国大部分地区统一在了一个保证坚决反对外国特权和租借地的政府之下；在蒋介石与苏联决裂之后，英美对蒋大体上采取了和解政策，因此中国的怒气主要是针对苏联和日本，特别是在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事务方面。满洲独裁者

张学良于1929年对俄国对中东铁路的管理进行了新的攻击，借口俄国官员利用铁路管理来达到政治目的，驱逐和逮捕了他们。苏联立即进行武力报复，不经正式宣战便武装入侵满洲，在一系列的战役中击败了张的部队。张被迫让步，恢复了俄国人对铁路的控制。西方国家多次向苏联提出抗议，但没有效果。

接着在南满铁路方面也发生了纠纷，张主要通过拒绝支付建筑该铁路时所欠款项的利息来削弱其地位。日本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任何纠正；而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发展，更加损害了因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打击而严重动摇的民政党政府的地位。到二十年代末日本才勉强从1923年大地震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民政党的经济后盾是旨在与西方搞好关系的大企业，正当大萧条开始时，该党恢复了金本位。在很早的阶段，日本便受到了经济萧条的严重打击——首先是由于向美国的生丝出口急剧下降；为了维持支付平衡，财政上采取了大刀阔斧的紧缩通货措施，这就必然带来严重失业和深重的农业灾难。这些情况非但没有加强左翼力量，反而引起了一阵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的浪潮，并且使得人们不仅要求改变经济政策，而且要求采取积极的军事干涉措施来制止中国对输入日货的民族主义抵制以及蒋介石在东北的不妥协态度，从而设法挽救局势。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这股民族情绪的潮流，决定对满洲进行公开战争，于1930年9月占领了首府沈阳。不到年底，民政党内阁倒台，政友会再次执政。短暂的比较和平和开明的统治时期突然告终，此后，日本便坚持实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而一心想着本身的经济困难的西方国家则表明无力加以制止。1933年初，希特勒在德国取得政权，这似乎只是进一步确认日本自由主义已黯然失色，并鼓励对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厉行动。从1931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日本占主要地位的情绪是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情绪，它利用“共荣”作为

幌子来掩盖日本要在中国和整个远东取得支配地位的要求。在这种民族舆论的气氛下，社会主义运动或者哪怕是工会活动，都没有产生影响的可能。当然，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深受迫害的地下运动保存了下来；但是其它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已被消灭，直到1945年日本人民才发现有必要在失败中使自己适应彻底改观的亚洲的环境：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朝鲜还有目前的印度支那都成了独立国家，中国本身则陷入了新的内战，而共产主义运动不久便成了这场内战的胜利者。

## 第二十七章

### 印度，印度尼西亚

要记载有些国家在1914年到1930年之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一件徒劳无益的工作，对于大部分国家说来，甚至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在这些年里，这些国家曾出现过意义重大的发展，却没有产生一些其思想或行动独具特色、足以使人据以区别社会主义因素与其它与之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的因素的运动。这种说法尤其适用于印度，这个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中的许多思想家和领袖曾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其中有几位，比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生于1889年），已经宣称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不可调和，并盼望社会主义成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民主斗争的必然结果；但是在印度，直到三十年代初，除了共产党以外，没有关于社会主义政策的意义重大的系统规划，并且没有重要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印度取得独立之前，这两项中的任何一项都没有大量出现。对1931年以前印度社会主义运动的叙述只能是东拼西凑的一鳞半爪；因为除了它的共产主义运动形式以外，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在印度国大党主持下开始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范围内存在；在这个时期内，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是圣雄甘地（1869—1948年），可以公正地说，他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反社会主义者，这倒不是因为所牵涉的问题他没有想到，而是由于在他看来另有一些问题要迫切得多，而且也更具有根本的意义。我相信，在有些场合，甘地曾在私下谈话中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但是

这样说只是为了强调他不喜欢中央集权的国家行动，而相信**在强** 810  
有力的道德观念直接激励下采取的自愿行动。如果说他厌恶议会  
道路的社会主义，更厌恶共产主义，那么他对资本主义及其一切  
形式的剥削也是厌恶的。他首先相信受互助精神激励的地方社区  
的优点，而极不信任那些以与纯朴的普通百姓格格不入的精神编  
织阴谋网和追逐权力的“政客”。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具体体现为  
1924年成立的印度共产党，但是在其早期的杰出理论家和印度在  
共产国际的主要发言人 M.N. 罗易的著作中也有所表现；不过  
就其实际表现而言，更多的是关于反帝和世界革命的思想，而不是  
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政策，当然，罗易曾经企图在日益发展的  
阶级斗争中探索革命的基础，他确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旦看  
到革命威胁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便会力图制止革命，甚至背  
叛革命。

在印度与在其它一些不发达国家一样，共产主义主要是在人  
数有限的知识分子集团中作为一个运动开始的。事实上，鉴于工人  
阶级运动的性质受到很大限制，它几乎不可能以任何其它形式开  
始。然而在初期它却在工会领域取得了成就。起初与印度国大党有  
密切联系的全印职工大会到1920年方才成立——主要是战争期间  
工业大发展的结果。由于缺乏具有足够文化程度的工人担任主要  
职务，许多工会不得不依靠从受教育的阶级吸收高级职员；毫无疑  
问，这是一个有利于政治进入工会事务的重要因素，并有助于共产  
党人在1918年的大战结束后工业中发生普遍动乱的时期加强他们  
的影响。到1927年时，共产党人已取得对全印职工大会的控制；但  
是该团体从来就不曾代表整个工会运动，共产党的胜利随即导致  
了一个对立的工会联合会的建立，并导致一些重要工会拒绝与两  
派中的任一派发生联系。在此期间，1926年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印 811  
度共产党人成立了一个旨在扩大他们的号召力的新的工农党；但

是社会党人,就他们作为一种公认的力量存在这一点而言,仍然留在印度国大党内,并没有企图单独建立一个独立的党,在1934年以前,甚至没有企图在国大党运动内组成一个社会主义派。

马纳宾德拉·纳特·罗易(1893—1954年)曾非常活跃地参加了早年在莫斯科就共产党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政策问题进行的辩论;在共产国际的早期,他不仅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也是该机构派往拉丁美洲<sup>①</sup>和中国<sup>②</sup>的使者。他强调的观点是:殖民地国家的本国资本家会迅速与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因而非常需要加强站在革命方面的无产阶级分子的力量,而又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作出没有成果和伤元气的让步。在这个问题上,他甚至曾与列宁交锋并且产生了影响。然而不出数年,他就对共产国际和印度党奉行的方针感到极其不满,1928年他作为“异端分子”被后者开除出党。以后有一段时间罗易处境非常孤立,不断遭受他以前的共产党同事及其反对者的攻击。不过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直言不讳,直到他于1931年被政府逮捕和受审讯,尽管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也参加的一个营救委员会作了努力,他仍然在狱中度过了此后的一些岁月。他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英国反对德国并在战后年代领导他所建立的激进民主党,关于这一段生涯已属于本书的后一部分。

印度战后时期是以1919年开始实施蒙塔古—契尔姆斯福德宪法改革开始的,这次改革旨在以邦为基础给予一定程度的自治,不过选民必须具备很高的财产资格,而且必须将治理领域一分为二——即分为“保留”臣民和“转入”臣民;此外,还保留了凡属主要由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通过的、印度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无法

① 见本书第752页。

② 见本书第786页。



接受的议案即归于无效的权力。这就是印度国大党领袖们完全不能接受的那种叫作“两头政治”的制度。起初国大党抵制选举，结果新议会由“温和分子”组成，这些人愿意执行这种制度并遭到了追随国大党的人的广泛谴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甘地作为印度民意的全国领袖上升到了无可争辩的杰出地位。新宪法使印度中央政府仍然掌握在印度总督和他的最高行政会议手中，主要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两院在有限程度上参与政事，它们是在极高的财产资格基础上选出的，但即使如此，其决定仍然随时可被印度总督推翻。此外，在蒙塔古—契尔姆斯福德改革付诸实施之前，根据臭名昭著的“劳勒特法”，中央政府掌握着镇压“叛乱”和对付任何种类的革命或阴谋行动的广泛的特别权力。开始实施这些措施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全国民怨沸腾；为回答这些措施的实施，甘地发动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萨特雅格拉哈”——此字的意思与“有组织的消极抵抗”庶几相当——运动。在劳勒特法得到印度总督批准时，甘地下令举行一天全国哀悼和总罢市，作为还击。与他的愿望相反，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在旁遮普邦——爆发了暴力骚乱；1919年4月13日，奉民政当局之召前去阿姆利则镇压骚乱的戴尔将军命令他的士兵向人群开火，枪杀了大约400人，击伤的人数则更多。

阿姆利则大屠杀使印度民情大为激化，戴尔此举后来受到亨特调查委员会和英国下议院（1920年7月8日）决议的谴责，但是得到上议院的支持。紧接着，甘地被捕，这时尽管颁布了戒严令，813骚乱仍然扩大到了旁遮普邦。因此是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实施蒙塔古—契尔姆斯福德改革的：在举行第一次选举之前许久，在1920年后期，甘地就已经颁布了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全国政策，来与他“既不尊敬、也无感情”的政府对抗。在1920年圣诞节的国大党会议上，提出了在翌年9月印度实现完全自治的要求，甘地被

授予几乎没有限制的权力来组织这个运动。此后不久，里丁勋爵于1921年4月接替契尔姆斯福德勋爵为印度总督，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迅速蔓延的非暴力反抗运动，这个运动预定于翌年初在全国范围开始。但是在1922年2月，在北方邦的乔里乔拉，农民和国大党志愿人员的愤怒人群杀死了21名警察和乡村看守；面对这种情况，忠于自己的非暴力信条的甘地取消了整个运动。尽管如此，他仍以不忠诚和阴谋推翻政府罪被逮捕并被判处6年监禁。进一步的镇压运动随之到来，面对甘地的行动，国大党发现自己陷于严重瘫痪状态，党内也出现了深刻分歧，一派人希望继续奉行抵制选举和进行非暴力反抗的政策，另一派人赞成参加竞选，以便利用根据蒙塔古—契尔姆斯福德宪法改革建立的议会作为反对政府的讲坛。在1923年后期举行的第二次选举中，一大批国大党人与甘地决裂，作为印度自治党参加竞选，在中央议会中赢得了将近半数席位，在6个邦议会中的至少2个议会里赢得了明显的多数。在中央，在他们提出的印度自治要求遭到政府拒绝之后，他们在1924年集合了足够强大的支持力量，否决了财政法，以致印度总督不得不使用他的特别权力使该法生效。然而印度自治党并没有发展到进行绝对抵抗的程度：实际上它或多或少是作为合乎宪法的反对派行事，不断要求在10年期限到期之前便修改蒙塔古—契尔姆斯福德宪法，在10年期限到期时，这个宪法反正要提出来重加讨论。

814

特别是1920年和1921年，这些事态发展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由于1920年的歉收和1921年的工业衰退，经济正陷于严重灾难。但是在1921年以后，一系列丰收使灾难大为减轻；在1922年和第二年，在包括对童工、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进行控制的保护性工业立法方面，有了一个开端。1921年是一个不仅发生农民骚乱、还发生广泛罢工的年头；但是随着丰收的到来，群众性的动乱

减少了,虽然政治鼓动仍然如火如荼,孟加拉邦的严重骚乱仍然遇到新的镇压法令。在此期间,甘地于1924年1月被无条件释放;但是他忠于他的非暴力学说,发现自己与国大党领袖中许多人的政策对立,没有能够恢复他的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在1926年到1927年之间,有一年时间他退出了政治活动。但是在1928年,他恢复了他的运动,主张除非在一年之内给予印度充分的自治领地位,否则将进行非暴力抵抗;这项政策于那年12月得到国大党批准,并得到穆斯林联盟的全力支持。

在此期间,英国政府决定提前重新考虑宪法问题;1929年,成立了一个不包括印度代表的西蒙委员会来进行调查并向英国议会提出报告。国大党在甘地影响下抵制了该委员会,在该委员会在印度开展工作的同时,各地不断发生罢工和群众骚乱,但是多亏甘地有所克制,暴力行为少得出奇。1930年,甘地发动了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再次被逮捕并被判处无限期拘留。

但是运动仍然继续进行,尽管甘地的追随者中有27,000多人被逮捕和监禁。在他被捕之前,他曾拒绝参加英国工党政府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圆桌会议;但是翌年1月他被释放,在与印度总督举行谈判后同意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并听从劝告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会后回到印度时幻想破灭了。于是他重新开始了非暴力抵抗,并于1932年1月再次被逮捕。那年9月,他宣布有意绝食至死,除非政府放弃为最下层阶级——即印度教的“贱民”,他一向为这些人奋斗,而反对种姓差别的维护者——单立选区的建议。主要是由于怕他死,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折衷办法。接踵而来的是进一步的逮捕、恐吓和实际举行饥饿罢工,以及对甘地的仓促释放;但是要记载这些事件,我就会远远超出本卷所涉及的时期。在政治上,甘地的影响盛衰互见;在第二次圆桌会议失败后有一段时间,他愈来愈多地致力于反对种姓制度弊端的运动,而较少致力于

直接的政治问题。不论他作为一位政治领袖的影响上升还是下降，他作为一位道德导师的地位却不断提高，许多无法完全接受他抵制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做法的人，也受到了影响。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在经济问题上，就西方所熟悉的社会主义一词的意义而言，甘地并非社会主义者。他并不是指望产业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甚至不是任何阶级——，而是指望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群众以及他曾要求他们给予农民协助的、各阶级的理想主义者，来完成他寄予希望的非暴力革命。他最相信简单的社区生活方式以及对印度乡村进行革新，使之不论在农业还是在以制造家用什物或公用物品为基础的小规模手工制造业方面，都成为社区组织的生产中心。在这方面，他极为强调卡达尔——一种家庭纺织的土布——的优点，这既是为了减少对进口货以及动力驱动的工厂的产品的依赖，也是由于他认为这种简单手工业的实践对于人类精神具有宝贵价值。甘地关于潘查雅特（即农村社区）的坚决主张与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的观点有共同之处，因为两者都强调非暴力的、小规模的合作公社生活的价值；但是他的着重点不同，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位道德家而不是一位政治革命家，他否定整个阶级斗争概念。后来在印度民族主义队伍中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局面，一方面是指望以现代工业技术作为手段来解脱最贫困状态的工业化论者，另一方面是认为大规模工业主义是人类自由和真正民主制度之敌的甘地主义者。但是只要印度仍然是一个被奴役国家，国大党就必须在党内兼容并蓄这两种观点的坚决支持者以及许多坚持中间态度的人，正如它不得不同时容纳孟买磨坊主以及造他们反的工会会员一样。这种内部矛盾导致了紧张形势的多次出现；但是在整个二十年代唯有共产党人愿意脱离民族解放运动，因为该运动致力于团结一切阶级反对英国统治而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世界无产阶级阶级起义运动的一个部分。

即使在战争时期和 1918 年以后动乱年代的分裂之后，印度国大党仍然基本上是一个稳健的团体，将其要求局限于印度自治，而不要求完全独立或单独建立主权国家。更确切地说，印度国大党要求的是作为一个自治领的有保证的地位。直到 1930 年，它才宣布其宗旨是争取彻底的民族独立。虽然像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教占支配地位的印度本身一样，国大党不是在宗教基础上而是向不论其教派如何的全体印度人民发出呼吁。事实上它有大批穆斯林追随者：1906 年初为了在接受英国主权的基础上力促穆斯林少数民族要求的实现而成立的穆斯林联盟，除了在富有的阶级中以外，仍然比较没有影响。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建立单独的巴基斯坦国的概念本身还没有出现。最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仍然大部分不是附属于国大党就是愿意在国大党内工作；尤其是在乡村，地方自治主义的纠纷和宗教冲突要比三十年代少得多。在大多数居民杂居的地区，信印度教的农民与穆斯林农民以及属于其它教派的人往往 817 并肩生活而并无多大摩擦，他们在经济上对于地主、放债人和税吏有着共同的怨愤，但几乎不参与国家政治，而且很少在本地范围以外联合起来。诚然国大党自称拥有大批农民追随者，而甘地本人不久也争取到了人数众多的农民追随者，但是农民中有很有一部分人十分贫困，没有文化，以致政治呼吁不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即使是有圣人名气、并且有把政治问题转变成道德和人性问题的能力的甘地，充其量也只能暂时克服在团结他们支持共同的改革运动方面存在的巨大困难。他的非暴力学说尽管对于信仰印度教的民族中的广大人民极有吸引力，对于大多数穆斯林、甚至对于信仰印度教的民族中比如麦拉塔族这样的具有坚定的尚武传统的民族，吸引力却远为逊色。甘地的影响一再起落，通常在他向他发动的伟大运动之一发出召唤时，影响便上升，而在他竭尽所能仍未能防止暴力行为发生、忧伤之余便下令中止他的运动而不是听任运动

继续受暴力行动糟蹋时，影响便下降。然而，即使在他的政治影响处于最低潮时，他仍然有着很大的道德影响；即使在那些拒绝接受他的政治处方的人之中，也有许多人仍然深为他的道德所鼓舞。

在这种环境中，社会主义运动几乎没有任何成长的余地。当然，人们一直大声疾呼要求进行土地改革——要求结束查明达<sup>①</sup>制度，在实行这个制度的广大地区，当地地主根据这个制度扮演了地主和政府税吏的双重角色，向佃农收地租，然后将45%以上的收入作为土地税上缴。对于放债人（巴尼亚）的勒索也是怨声不断，他们强行索取惊人的高利率，在印度许多地区，实际上不仅村民几乎人人欠他们债，而且债台高筑，没有任何希望会有朝一日还清债务，以致他们死了以后，债务还要传给子孙。在这些地区，严重的营养不良几乎司空见惯；疾病到处可见，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会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治疗。毫无疑问，许多城里人的经济情况要好得多；但是产业工人中大部分人的工资极低而且严重失业，因而往往使他们回流农村以谋生计，在那里他们对提高生产作不出任何贡献，因为在太少的可耕地上已经人满为患了。普遍存在的负债和赤贫状态使村民们不可能改善他们的生产方法，即便他们当初知道如何改善；因为他们既无资金，也告贷无门，除非按极不上算的条件去借钱。我并不是说印度到处存在这种大伤元气的状况，不过尤其在北部和中部诸邦，这种状况非常普遍。只有在极少的几个地方，在政府监督下，在相当大的规模上开始出现信贷合作社。印度大部分农业地区在对于改善土地和改善农村毫无贡献的地主制度以及敲骨吸髓的放债制度的双重压迫下苦难深重；虽然政府的大部分公务人员竭尽所能公正执法，政府在与农民的关系中基本上是警察而不是帮助的来源。

---

<sup>①</sup> 查明达，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印度孟加拉邦一带向英国政府缴纳土地税的地主。——译注

在这种环境下当然总是怨声载道，因此当歉收使广大群众嗷嗷待哺时，就有可能发生民众暴动。但是即使在年景最坏时，由于农村地处穷乡僻壤，要把人民大规模组织起来也极为困难；民族主义运动还由于这样的事实而进一步受到妨碍：它的领袖主要来自富有阶级，而且在争取实现国家统一时，不论是在孟买的磨坊主中间或者甚至是在地主中间，它都不愿意冒风险去招惹有钱的支持者。甘地确实总是站在老百姓一边；但是即使是他，更为关心的也是为印度教贱民的利益大力推行反对种姓制度弊端的运动，而不是为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经济上所受的基本上是不公正的对待。他与“马哈沙巴”——主张正统的印度教教义和保持种姓制度的一个全国性组织——不断斗争，同时又迫切希望印度教徒的主体赞同他，而又不要造成可能摧毁国大党的力量的分裂。他主张在他争取自治的强大的运动中，所有团体和信仰一律平等并进行合作；但是他不愿意在任何会使国家统一从属于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推行他的强大的运动。 819

然而甘地的力量在于：由于他个人的崇高威望，国大党中任何相当有势力的派别缺了他都不行。他个人的这种优越地位迫使有钱人修改他们的政策，以便与他妥协，并防止站在工人或农民一边的左派脱离国大党而成立献身于这些阶级的利益的政党。只是在三十年代，除了共产党以外，才开始出现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政党或农民政党；而在这些政党出现时，它们是作为国大党的轨道之内的、只要国家独立尚未实现便忠诚于它的政党出现的。因此，在本卷内，关于印度社会主义运动几乎无话可说，所存在的只不过是一种知识分子潮流，这股潮流在一定程度上赞同社会主义，但是——除了事实上是革命的提倡者而不是任何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倡者的共产党是例外——并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人数众多的群众追随者。

然而，必须谈一谈镇压的事情，那些企图在印度工人阶级中间组织和领导抗议和坚持集体要求的运动的人，在凡属这些运动具有任何种类的战斗形式的地方，都遭到了镇压。说明这种镇压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29年和第二年的异乎寻常的对米鲁特阴谋案的审讯，此案中有31名犯人——其中3人是英国人，其余是印度人——以“阴谋剥夺国王”对英属印度的“主权”罪被控告。由一名文职人员权充法官并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的米鲁特案的审讯，实际上持续了三年半，其中起诉过程占去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一半。在这整个时期内，被告一直待在监狱里，而且在审讯还远远没有结束时，为辩护筹措的经费就已经告罄。在审讯开始时，英国是保守党政府执政，但是刚开始不久便换上了工党政府。不过政府的更迭对犯人毫无益处：工党在整个执政期间听任审讯继续进行，直到所谓“国民政府”执政一年多以后，审讯才告结束。受审讯者主要是共产党人，但其中包括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的左翼社会党人。对那些被宣判有罪者判处了重刑，其中一人被判处终身流放，另有8人被判处10年或10年以上流放，判刑最轻的是监禁3年。诚然在上诉后刑期大为缩短；但是就连那些判刑最轻的人在被宣布为有罪之前也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半时间。不过他们甚至没有被控犯有任何叛乱行为，或者哪怕是暴力行为。他们的主要罪名是组织颠覆性的工农党，作为印度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并且在阶级斗争以及反对印度的雇主阶级和英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成立工会。

第二届麦克唐纳政府最丢脸的一件事情是：甚至当它在圆桌会议上企图与印度协商解决办法时，它仍听任此案的审讯继续进展到不幸的结局。毫无疑问，工党政府的借口是它不愿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对印度政府施加压力，印度政府决心毫不留情地不仅追击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而且追击一切可以认为是与这个运动联合



的颠覆力量。然而这绝不能成为工党政府无所作为的正当理由，印度对于英国工党的良好意图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工党的这种无所作为而毁于一旦。在英国，许多社会主义者强烈抗议米鲁特诉讼案；但是工党政府对他们的抗议不予理会，而由于普通人对于印度问题殊少兴趣，这些抗议没有产生效果。

正是在米鲁特案的审讯工作正在进行时，为在印度某些地区建立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组织采取了最初的步骤。在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倡者的老一辈的印度领袖中间，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是旁遮普邦的主要领袖拉拉·拉杰帕特·腊伊（1856—1928年），他不仅在印度，而且在英国和美国也是一位著名人物；正是在旁遮普邦，1930年12月举行了一次会议，成立了以H.N. 布赖尔福德为主要代言人的社会党。该党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但是得到工人阶级运动中最强大和组织最好的一部分铁路工人工会的支持。该党发起人中既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大约在这同时，在孟买逐渐出现了以M.R. 马沙尼和阿索卡·梅达为首的类似运动，在其它地区也出现了并行的运动。这些留在国大党轨道内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团体主要致力于建立和指挥工会，并且对既与共产党人又与甘地的追随者对立的印度工会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愈来愈多的贡献——因为印度的工会活动到处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大多数工会主要由这样那样的政党或政治团体的有文化的拥护者领导。

这些最早的社会主义组织主要由年轻人组成，他们在非暴力抵抗运动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在监狱中，互相接触了，并且开始认为社会主义者有必要在不离开国大党的情况下成立有特色的宣传机构。直到1934年，地方性的社会主义组织才在全国基础上联合起来成立了国大社会党，直到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赢得独立之后，它与国大党一直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国大社会党中，

阿查雅·纳伦达·德瓦和贾伊·普拉卡什·纳腊扬迅速上升到了领导地位。在早期,印度社会党人曾多次企图与共产党人合作,但是在三十年代,他们之间的鸿沟更深了。因此,印度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的历史就超出了本章范围。

1914年以前,英国社会主义者对待印度问题一向持正确态度。  
822 基尔·哈迪的小书《印度》(1909年)是他在1907年环游世界的旅程中访问印度后所著,此书辛辣地抨击了英国的统治制度——特别抨击了种族歧视、人民的经济状况以及由于英国输入的工厂制造品的竞争,手工业遭到的破坏。哈迪由于在印度的言论,首先是由于与当地的“煽动者”亲近并且说印度应该与加拿大一样成为完全自治的自治领,而在英国报刊遭到痛骂;但是事实上他在印度的言论颇有节制——要比他在有闻必录的那本书中有节制得多。H. M. 海德曼在早年也是英帝国主义政策的尖锐的批评者;但是他的《亚洲的觉醒》(1919年)是在由于他支持英国在1914—1918年战争中的事业而使他在社会主义左翼中的影响遭到损害之后才问世的。安妮·贝赞特在1889年信仰了通神学之后成了印度的自治要求的杰出的支持者,而且她在长年侨居印度期间不仅就宗教问题、还就政治问题多有著述,因而大大影响了国大党运动。印度在英国的其它显要朋友包括乔治·兰斯伯里、H. N. 布赖尔斯福德和贝特朗·罗素,后者有几年时间担任克里希纳·梅农<sup>①</sup>所组织的印度联盟的主席,非常活跃。拉姆齐·麦克唐纳早年也是印度自治的坚决拥护者,虽然他在1929年至1931年担任首相期间当人们吁请他采取行动时犹豫不决。工党在它的历次会议上通过了许多赞成印度自治的决议;当印度社会党或激进民族主义的演说者

---

<sup>①</sup> 克里希纳·梅农(1896—1974年),印度政治家,在印度独立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曾任印度驻伦敦高级专员(1947—1952年)和印度国防部长(1957—1962年)。——译注

访问英国时，他们受到了工党听众的欢迎。然而必须承认，不论是英国工党支持者的主体或者整个选民都对印度问题没有真正浓厚的兴趣；历届英国政府一向可以不理睬社会主义者对英国在印度的暴政表示的抗议，而又不致于招致群众的愤懑。由于英国工党政府采取这种冷淡态度，印度的社会党人和民族主义党人往往指责英国劳工运动有关支持印度的主权要求的表白乃是言不由衷。然而，麻烦的根源并不在于工党言不由衷，而在于大多数工党党员有他们似乎认为更为迫切的问题萦绕脑际。他们对印度毫无第一手的知识，因而在日益高涨的印度国大党民族主义浪潮迫使他们给予注意之前，他们除了偶而表示抗议之外，不愿意有其它行动。后来作为工党首相的C. R. 艾德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接受了印度独立的要求，签署了西蒙报告，这份报告导致了1930年的圆桌会议，而且虽然遭到印度国大党抵制，却为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提供了主要基础。当时艾德礼认为给予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根据与英国的条约安排，由当地统治者治理的印度各邦的地位；以及立即建立一支独立的印度军队的不切实际。到1945年时，由于根据1935年法令实行的邦自治的进展，由于本地军官领导的军队的壮大以及最主要的是继续实行英国统治显然已不可能，艾德礼改变了初衷。然而，在三十年代艾德礼曾签署过一份遭到印度舆论主体抵制的报告的事实，起到了使英国工党在印度人眼里丢脸的作用，印度人以前在争取自治的民族斗争中曾盼望英国劳工运动给予支持。

## 印度尼西亚

在印度尼西亚，甚至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存在小规模的社会

主义运动。主要人物是前面几章中已提到他的活动的荷兰人H. 斯尼夫涅特(1883—1942年)——化名马林。这个运动尤其在铁路工人之中有其支持者：它的主要的地方领袖是塞马俄安。斯尼夫涅特和塞马俄安后来在共产党内都很活跃。在战争结束之前，这个运动只在爪哇存在，后来爪哇一直是它的根据地。1918年，主要的民族主义组织伊斯兰教联盟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选出塞马俄安为其执委会委员。翌年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会组织，但是不久之后便分裂成为对立的稳健派和极端派。老的社会党改变立场，信仰了共产主义，并在1920年成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老的社会党曾加入过民族主义伊斯兰教联盟；但是1921年它明确成为共产党时便退出了伊斯兰教联盟，尽管如此，在此后两年内仍然与伊斯兰教联盟有着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接着它成立了一个左翼民族主义组织伊斯兰教联盟，作为与老的伊斯兰教联盟相对立的组织。1926年和1927年，在爪哇和苏门答腊都发生了民族主义起义，阿哈默德·苏加诺(生于1901年)成了卓越的民族主义领袖。

## 第二十八章

825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澳大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爆发时，在大多数州里都是工党政府执政，翌月，安德鲁·费希尔（1862—1928年）再次出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1915年10月，费希尔辞职并前往伦敦担任澳大利亚联邦代表，威廉·莫里斯·休斯（1864—1952年）继他出任工党政府首脑，关于休斯早年的生涯，本书前一卷已有所交代。<sup>①</sup>工党起初不顾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和一部分受其影响的工会的激烈反对，支持战争。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自1907年在汤姆·巴克尔领导下在澳大利亚成立之时起，就一直大力提倡产业工会主义纲领，以“大一统工会”作为最终目标，并一直进行日益激烈的运动，反对工党和工会温和派所赞成的仲裁制度。由于布罗肯山的罢工、1908—1909年的封闭工厂以及1912年布里斯班的纠纷，左翼领袖被判重刑，引起了非常强烈的愤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影响扩大了，虽然它从未有过众多的会员，也从未接近于使大一统工会成为切合实际的方案。它的宣传曾使相当数量的工会合并成为范围较大的产业团体，从而加强了赞成扩大阶级团结的思想感情。在政治领域，认为需要扩大团结的情绪也有所发展，1915年，澳大利亚工

826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853页。

党第一次成立了由各州的工党代表组成的联邦执委会。然而这丝毫无助于缩小右翼与左翼之间的鸿沟。相反，这道鸿沟由于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而扩大了。到1916年年底时，工党本身已由于征兵前往海外服役问题而陷于分裂。休斯政府改组成为反工党联合政府之后，根据反非法结社法，禁止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活动，对它进行破坏，同时还忙于控告反对战争努力的左翼领袖。从此以后，休斯在对德国人“战斗到底”的政策上与劳合一乔治联系日益密切，成了英国战时内阁的阁员，并且在澳大利亚不仅对工会左翼，还对拒绝在征兵问题上追随他的前工党同事，进行坚决斗争。

早在1914年之前，费希尔政府就已在澳大利亚实行义务军训制，但是这并没有随之产生强制在澳洲大陆以外服役的任何权力。在欧洲服役的澳大利亚部队由志愿兵组成，随着战争的拖延和对兵员的要求日益增加，这些部队的兵源愈来愈困难。因此在休斯仍然担任工党总理时，他建议为此目的实施义务兵役制；他终于说服他的同事将此问题交由选民进行公民投票。这次使工党在联邦议会中陷于严重分裂的公民投票结果是总理的建议以相差无几的票数被否决——1,060,033票赞成，1,087,557票反对。因此，休斯和65名工党议员中的25名于1916年11月退出了工党核心小组；而休斯非但没有辞职，反而劝说以前反对过他的反工党分子与他的集团共同组成了联合政府。工党多数派进行报复，开除了休斯及其支持者，并竭尽全力改组了党。这次分裂使工党在联邦停止执政12年。直到1929年工党才再一次组成一个政府——在新领袖詹姆斯·亨利·斯卡林(1877—1953年)领导下，他从那一年执政到1932年，但由于在参议院中缺乏多数而受到严重掣肘。在1916年遭到失败后的一年，休斯又将同一个问题交付公民投票并再次失败——这一次是由于较多数票反对，1,187,747票对1,015,159票。但是他在再次遭到失败后仍然继续执政，担任总理直到1923

年。

在征兵问题上双方争执十分激烈。休斯及其集团竭尽全力把所有反对征兵的人说成是反战的“不忠诚分子”；但是事实上许多反对者并不反对战争，而是认为强制服役有违澳大利亚的自由原则，或者只不过是不同意在一场他们认为与澳大利亚只有很少牵涉或利害关系的斗争中，自己作为军人或者是他们的亲戚作为军人被派到天涯海角去。不过在休斯的反对者之中，有一个强有力的反战激烈分子集团；新政府既根据1914年当时的战时警戒法，又根据新的反非法结社法，对这些人采取了严厉行动。反非法结社法将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作为非法团体加以取缔，并被用来进攻其它富有战斗性的产业和政治团体。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是主要受害者。它的最著名的领袖中有12名于1916年11月被逮捕，并被控以阴谋纵火和煽动叛乱罪。另有一些人，包括巴克尔在内，已在狱中。对12人中的大多数人判处了重刑。爱尔兰领袖詹姆斯·拉金的兄弟彼得·拉金被判处10年徒刑，与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成立以来便在其中很活跃的查尔斯·里夫一道被送进监狱。还有一些人被判处了5年徒刑；所有这些人都在监狱中待到1920年，当时在新南威尔士执政的工党政府在劝说下任命了一名法官作为特别专员来调查此案。埃温法官先生发现，犯人中虽有少数人理应判罪，其它人却根本不应判罪，还有一些人的量刑与罪证极不相称。彼得·拉金属于最后一类，他服刑不到一半时获得释放。不过，此事发生在战争结束已将近两年的时候。在此期间，在战争结束之前，汤姆·巴克尔于1918年被放逐到智利，从智利他随即辗转设法到了苏联。

世界产业工人工会领袖的被捕和受审，虽然无疑削弱了产业工会的左翼，却未能防止翌年在新南威尔士爆发严重的劳资纠纷。由于实施“卡片”制度，劳资纠纷首先在铁路工场出现，工人感到愤

慨，认为这是为在产业工人中征兵而采取的一个步骤，也是不公正地提高劳动强度的一种计谋。这场纠纷首先蔓延到了其它铁路工人，然后又波及矿工和码头工人；一场激烈的斗争出现了，在这过程中，政府和雇主使用工贼来代替罢工工人，当罢工工人终于因为饥饿而屈服时，政府和雇主又对工会积极分子进行了广泛的迫害。在这次事件中，新南威尔士的斯托雷工党政府终于在1921年下令进行特别调查，结果表明许多铁路工人仍然由于他们在纠纷中所起的作用而正在受到迫害。但是斯托雷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就调查报告采取行动就倒台了，结果没有为受迫害者伸冤。

在战争结束时，再次爆发了工人的骚乱，镇压后幸存的若干左翼小团体又公开露面。其中有一些团体宣布声援第三国际，并申请加入。1920年，其中有几个聚到一起成立了共产党，被接受为第三国际的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成了极左翼舆论的中心。起初新的共产党只有很少的追随者，并没有企图提出候选人参加无论是联邦的还是州的选举，向工党提出挑战；但是它逐渐在一些工会中站住了脚，1925年以后便单独提出候选人，在少数情况下得票甚多，但未能取得任何积极成果。在此期间，休斯领导的联邦政府一方面听任它的某些战时特别权力中止，另一方面又根据1920年的废除战时警戒法的法令保留了一些特别权力；同年还修改了仲裁法中的规定，以便授权法庭对蔑视一般于工人的要求颇为不利的联邦仲裁裁决、煽动罢工的工会课以巨额罚款。即使在1914年以前，就存在这样一种倾向：仲裁法庭和各州决定工资的团体所裁决的条件远不如法庭在1907年著名的“收获者判决”中所强制执行的有利。希金斯法官先生关于实行生活标准的高的、不断上升的最低限度的方案首先由于最高法院决定限制仲裁法庭的权力、后来又由于他的继任者们——其中大多数人以前是反工党的政客——持敌对态度而遭到失败。就生活



费用而言,在1914年之前工资已开始下降,在战争期间和以后,工资继续下降。尽管如此,许多工会由于担心劳资冲突带来恶果,坚持仲裁制度,这个制度也得到了劳工运动的大多数政治领袖的不断支持。

然而,反对进行仲裁的情绪继续增长,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骚乱,联邦政府于1926年促成了防止犯罪法的制定,这道法令授予它更多的进行镇压的权力。两年以后,1928年,罢工再次蔓延,一直继续到1930年。由于实行就业许可证制度,引起了码头工人强烈不满,1928年在码头上爆发了重大的罢工,工人认为这是企图将奴役条件强加于他们;翌年在伐木工人中也爆发了罢工,仲裁法庭在一个经济繁荣和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刻使他们的工资遭到削减和就业条件恶化。在后一事件中,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伐木工人举行了罢工,反对接受仲裁法庭的裁决。为此,几位主要的工联主义者被逮捕并被课以罚款;联邦政府援引了仲裁法中授权它就复工问题举行秘密投票的规定。大多数工人拒绝参加投票,而果真参加投票的少数人,除了其中一小部分外,也都投票反对接受裁决。于是政府下令逮捕主要罢工领袖——其中有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老资格领袖、从1916年起服刑10年之后刚出狱不久的查尔斯·里夫和新南威尔士劳工理事会秘书J.S.加登。陪审团没有邀请辩护律师H.V.伊瓦特博士(生于1894年)出庭便以罪证不能成立为由将他们无罪释放。但是一些以设立纠察线罪被逮捕的人运气欠佳,他们由于攻击工贼而下狱6个月到18个月。结果,尽管没有卷进劳资纠纷的其它工会捐献了大笔款项,伐木工人仍然不得不中止罢工,这时正当联邦工党政府在长期下野后又重新执政。在同年——1929年——的大部分时间,新南威尔士北部的煤矿工人被关闭在矿外,矿主要求削减工资,他们拒绝接受。这次事件的纠纷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工人与奉派前来保护工贼的警察发生了冲

突，有1名矿工被警察枪杀，7名受伤，结果以工人的失败告终。

当这些斗争正在进行时，刚成立不久的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统一联邦各地的工会力量的一次为时已晚的努力——鼓足勇气对仲裁制度进行了谴责并宣布抵制仲裁法庭。但是工会在码头、铁路、伐木业和采煤业方面遭到的失败使这个决定流产；在这些失败之后接踵而至的是1931年和翌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结果引起了严重失业和工会力量的一蹶不振。在面对萧条的情况下，工党政府竭尽所能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它的权力非常有限，特别是由于反工党的参议院能够阻挠政府的立法议案。1932年，它丧失了在下议院的多数，因而下台，权力又移交给了反工党联合政府，该政府一直在联邦执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831 在1914年到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之间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这段历史中，很少有迹象说明存在新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崭新运动的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接收了战前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和工会左翼的追随者，它以“民主集中制”这个新的教条代替了早年的半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尽管两者在理论上存在很深鸿沟，实际上差别却小得出奇。澳大利亚与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以及与对立的国际之间的冲突中心相距太远，不可能受到冲突的多大影响；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与战前在第二国际事务中只起过很小作用的澳大利亚工党之间存在重大差别。诚然，澳大利亚工党于1921年接受了它的昆士兰支部和其它先进团体长期以来敦促它接受的社会主义化目标。以前它只要求“将垄断资本收归集体所有”，并且笼统地要求“扩大国家和市政机构的工业和经济职能”，而现在，在1921年，它却宣布赞同“对工业、生产、分配和交换实行社会主义化”——一个使它与欧洲社会党的宣言趋于一致的、无所不包的公有制方案。然而，鉴于它不再处于联邦的执政党地位而且在好几个州里丧失了权力，该方案并未在实

际上使形势改观。在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国营企业曾有一定程度的扩大；但是在新南威尔士，这种情况主要在 W. A. 霍尔曼影响下发生在战前，1916 年霍尔曼在征兵问题上与工党决裂后于 1920 年退出政坛，重操律师旧业。<sup>①</sup>即使在工党在 E. G. 西奥多（生于 1884 年）领导下继续执政的昆士兰，国营企业的发展也没有大大改变总的经济结构；在联邦一级，即使在 1914 年之前就已经证明 1911 年成立联邦银行后引起的希望并无根据，而在 1924 年当其决策权实际上交给商业银行之后，它在管理方面发生的变化又使这种希望成了泡影。在实际政治中，澳大利亚工党采纳社会主义化目标作为它的长远目标，并未使形势发生多大变化；它肯定丝毫没有使工党政界人士与二十年代愈来愈受到共产党影响的、主要是工业界的左翼之间的对抗得到和解。 832

由于工党下台，在社会服务和社会改革立法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在联邦一级受到了阻碍。旨在作为对大地主的特权地位进行重大攻击的第一步的 1910 年的联邦土地税法，由于征税范围缩小而且未能根据时常改变的币值加以调整，不断被削弱了；该法不久便不再对地产的分配和地主的收入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州一级，在工党得以继续产生影响的那些州里，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工党先是在 T. J. 赖安领导下、后来又在西奥多领导下（1915—1929 年）执政的昆士兰，于 1923 年实行失业保险；而新南威尔士则于 1926 年颁布了儿童基金法，向前迈出了值得注意的一步。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在甚至对温和的劳工要求都普遍不利的环境中取得的孤立成就；当工党确实在 1929 年终于再次在联邦选举中获胜而由 J. H. 斯卡林出任总理时，在反对派继续控制参议院和随后几年开始了工业大萧条的情况下，如我们在前文所见，

---

① 见第 3 卷下册第 873 页。

已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澳大利亚劳工力量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一方面是大体说来为在不作根本社会改革的情况下推行澳大利亚经济体制承担责任的温和派，另一方面是一个活跃的左翼少数派，这一派人缺乏任何可以作为代替的中心点，主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实他们所感到关切的远远不是作为一种世界革命运动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是对眼前经济上的不满，这种不满起源于仲裁制度的执行以及历届政府对比较有进取精神的工会及其左翼领袖所采取的镇压方法。实际上在这些年里，澳大利亚对社会主义思想几乎毫无贡献，虽然在昆士兰，西奥多在国营贸易和生产领域作了一些冒险尝试。在所涉及的时期内，没有出版过一本具有任何实际重要意义的社会主义书籍或小册子，除非我们应该把涉及诸如征兵争议这样的问题的偶一为之的作品或 V. 戈登·蔡尔德的苛评《工党在澳大利亚是如何治理的》（1923 年）考虑在内。H. V. 伊瓦特所著霍尔曼的未删节的传记《澳大利亚劳工领袖》也是一部批评苛刻的著作，直到 1940 年方才出版。

## 新 西 兰

如我们在前一卷<sup>①</sup>所见，在新西兰，劳工运动在 1914 年以前的几年之中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在一系列的罢工和骚乱中，左翼劳工联合会的力量分崩离析，因为在这些罢工和骚乱中广泛使用了主要从农场主和中产阶级中吸收来的工贼和民防队；原来为了保护 and 帮助工人而制定的仲裁制度已经转变成了对付他们的武器，因为这个制度授权仲裁法庭让“温和的”或者甚至是工贼的工会注册，并在它们的申请下可作出对有关行业的所有工人都有约束力

---

<sup>①</sup> 见本书第 3 卷下册第 885 页。

的裁决——甚至不顾代表有关工人大多数的、未注册工会的反对。工会运动已经分裂成为互相角逐的集团，有的接受仲裁制度，有的拒绝承认仲裁制度；在政治上，运动也分裂成了对立的派系。在1914年的大选中，两个对立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和统一劳工党——都参加了竞选，但是只分别获得2席，另有1席归于不属于两党之中任何一党的劳工候选人。保守党人似乎牢牢掌握了政治权力，工会一蹶不振，政府深信会得到随时准备对工人战斗精神复活的任何迹象采取强硬路线的公民保卫组织的支持。在巴伦斯和塞顿领导下曾使产业工人与小农场主和一大批中产阶级分子联合起来的、老的自由党-工党联盟已分崩离析。这时在一个由小农场主而不是大牧场主和在外地主控制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度里，产业工人在企图单独行动时便一定会显示出他们的弱点。 834

战时的条件不久便导致了居于支配地位的保守党（或称改革党）与自由党的联合。剩下为数不多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和工党代表则形成了反对派。这种形势不久便导致了对立的工党与社会党团体的合并，1916年它们合并成为单一的工党，主要由杰出的人物H. E. 霍兰德（1868—1923年）<sup>①</sup>的老的左翼团体领导。新党宣布它的目标是全面社会主义化；但是实际上时隔不久它便开始主要关心比较直接的问题——首先是战争直接引起的问题，后来又关心战后的失业和保护工资标准等尖锐问题，以及发展社会服务以防止工人在经济萧条年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问题。到1918年时，工党在不撤销其长远社会主义目标的情况下，宣布了它的近期政策并非实现社会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并且宣布其纲领是“实验性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实际上，尽管它的大多数领袖以往是左翼，它正开始把自己变成先进的“福利国家”政策的

---

<sup>①</sup> 关于霍兰德的早年生涯，见第3卷下册第870页和第900页。

提倡者，希望以此争取战前在劳资斗争激烈的年代里失去的大部分舆论重新支持它。

835 在左翼，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在战争的后期，尤其是在战前左翼的劳工联合会的残余组织里，实际的反战情绪有所增长。俄国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和期刊流传甚广；1919年以后，如同在澳大利亚一样，出现了同情共产国际的小团体。1915年，以前是劳工联合会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矿工们退出该会，成了澳大利亚矿工联合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从而使劳工联合会奄奄一息。然而战争带来了充分就业，工会会员人数有了回升；1919年，成立了一个名叫劳工联盟的新的中央机构，取代了劳工联合会的位置。零星的共产主义小组于1921年联合组成共产党，起初附属于澳大利亚共产党，这种联系一直维持到1928年它作为一个独立支部终于加入共产国际。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内，它的规模始终很小。

1922年，新西兰遭到了战后经济萧条的打击。政府削减了公务人员的工资，仲裁法庭就一系列大幅度裁员作出了裁决。在产业工人中，失业再次大规模出现；由于缺乏任何由社会供养那些失业者的制度，城市里到处是一片困苦不堪的景像。海员和矿工在1923年、铁路工人在第二年举行了多次罢工，都以失败告终。此后有一个短时期，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在1926年，严重失业现象再次开始出现。工党领袖霍兰德于1923年去世，取代他的位置的是彼得·弗雷泽（1884—1950年），1926年弗雷泽在议会提出了一个失业救济法案，该法案规定了工作权利或利用一笔经费来维持失业者的生活，经费部分来自预算，部分来自按每雇用一名工人缴纳两英镑的比率向雇主征收的赋税；当然，这个法案根本没有被执政党接受的可能。

从1926年开始直到三十年代初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就

业情况始终不好，当然，大萧条使它更加恶化了。农产品价格暴跌，支付困难的严重失衡使新西兰经济深受其害。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危机，政府采取了严格的紧缩通货措施，并着手尽可能将公共开支削减到最低水平。工业界的雇主和农场主都采取了大幅度削减工资的手段，而且公私赈济款项都大为减少。尽管大批工人被解雇，公共工程仍限制到了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在此以前多半支持仲裁制度的雇主转而采取了反对态度，理由是这个制度未能将工资在失业者愿意接受的限度内削减到最低水平。他们要求给予他们随心所欲削减工资而不受国家干涉的权利；政府向他们作了让步，规定诉诸仲裁法庭不再是强制的而是自愿的行动。于是为嗷嗷待哺的失业者实行经常的赈济制度随即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这时在前身为自由党的统一党手中的政府却坚持除非作为工作报酬、否则不应支付款项的原则，而且就连这样支付的款项也只应该是仅足糊口的水平。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大批没有工作的人从事几乎无效的工作，他们完成工作所用资本的设备乃是最廉价的，为的是使尽量多的人得以从事某种劳动，而不管可能多么不合适或不经济。这使得许多雇主、尤其是农庄的雇主解雇他们的正式工人，以使用低得多的工资将他们作为“以工代赈”的工人重新加以雇用。一种斯比恩哈姆兰德式的济贫制度产生了，它对工资率和道德风尚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1928年，政府召开了一次全国工业会议，雇主们在会上力促废除国家的仲裁，但也同意必须采取某种措施来组织一个总的赈济失业者的体制。政府还设立了一个包括工会会员中的少数派在内的失业事务委员会，以考虑应予采取的措施问题，这个机构在1930年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资助赈济的方案，主要办法是对所有成年男女征收人头税，辅之以对一切200英镑以上的收入以及未分配的利润按每英镑一便士的比率征税，并且考虑到农场主并不缴纳所得税这一事实，征收为数极

837 小的土地税。委员会拒绝接受实行捐助性失业保险的建议，理由是如果规定雇主必须捐助，会强加给工业过重的负担。政府随即提出了一个法案，规定对所有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征收每人30便士人头税，但是免征委员会所建议的其它赋税，而代之从总税收中拨给补贴。这笔经费主要用于提供工作；但是在经费容许的情况下，应支付给不可能为其提供职业的男子。妇女则全然不必支付人头税，也全然不享受这个方案提供的福利。

在新西兰即将感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充分影响时，这个法案成了法律。面对着经济大萧条，政府加紧了它的紧缩通货措施，暂时放弃了无需工作便发放生活维持费的建议。在严重萧条的年代，究竟是否有任何先进国家对待失业者像新西兰那样恶劣是可以怀疑的。1931年，劳工联盟召开了一次所有工会参加的大会，以便对削减工资组织协调一致的反抗，会上有人提出了普遍拒付房租和举行总罢工的要求；但是大多数工会深知它们无能为力，以致不愿考虑这个计划，大会结果一事无成。工会运动仍然陷于分裂，一方面是代表比较富于战斗精神的团体的劳工联盟，另一方面是维护仲裁制度的、老的地方性的行业和劳工理事会；为实现两者的统一所作种种努力均告失败，直到几年以后，当大萧条的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的时候才取得成就。接着，在1935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并开始执政以后，随即成立了一个新的总的劳工联合会，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是翌年又再次出现了左翼的分裂。

838 在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那些年头，包括产业工人以及小农场主和职员在内的新西兰人民经历的深重苦难，对于不得不十分注意制定总的改革政策的工党以及小农场主、商人和职员对工党的态度，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政府所采取的严厉的紧缩通货政策，以及它对那些甚至在最羞辱的条件下被迫寻找赈济的人所采取的不人道待遇，使得中间舆论的主流转而支持工党，工党为了



迎合和吸引人们入党，已大大改变以前采取的立场。这种舆论和政策的改变使工党在 1935 年的大选中获胜，并且使得迄今在社会立法领域十分落后的新西兰有了一个关于社会保险和为了经济稳定而对私营企业进行国家控制的、异常先进的纲领，从而使它走上了建立福利国家的道路。然而这些成就已不属于本卷所涉及的范围。由于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那几年遭到的挫败以及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权益集团决裂造成的孤立，在 1914 年至 1935 年之间，新西兰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一团混乱，无法为保护工资和劳动条件——更不用说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取得任何进展——采取任何有效行动。在这个苦难的时期，这些运动一直在改组和发展它们的力量，在政治领域恢复的程度要比在工业领域大得多。在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压力下，工党一直在向新的政策摸索前进，1935 年以后，它着手将这项政策付诸实施。在这项政策中，社会主义或称彻底的社会主义化只起着次要的作用，虽然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主要是那些在青年时代曾属于左翼的人。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受到了亲身经验的惩罚；他们开始相信，当务之急是结束使工人在漫长的反动统治时期备受压迫的深重苦难。因此，他们按眼下的条件需要制定了他们的政策；虽然说他们没有发挥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带头作用，他们却使人民的处境发生了值得注意的迅速变化，并在工党领导阶层有所改变的基础上，重又建立了与昔日约翰·巴伦斯曾是其中杰出先锋的老的激进联盟有些相似的联盟。

## 第二十九章

### 社会主义运动和妇女的权利

(1914—1931年)

在本卷所涉及的时期内，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许多国家，而且远远超出了它以最惊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领域——选举权的领域。在1914年以前，只有少数几个存在代议制政府的国家给予妇女以选举权。新西兰是这方面最早的一个国家(1893年)，接着是澳大利亚(1902年)，芬兰(1907年)和挪威(1913年)。芬兰是妇女不仅有选举权，而且在1907年至1914年之间的历届议会中还有大批妇女当选为议员的第一个国家。然而在所有主要国家中，在1914年以前，妇女在议会选举中仍然没有选举权，尽管在其中有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存在历史悠久的、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大规模鼓动。英国争取妇女政治和社会解放的运动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下半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1792年就已经出版了她的著作《为妇女权利辩护》。从此以后，对妇女权利问题不断进行讨论，这项讨论在十九世纪初扩大到了美国。在英国和美国，妇女都在早期的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美国，这个运动由于1848年7月在纽约州塞尼卡瀑布举行的妇女权利大会而具体化，并且在1869年怀俄明州妇女按照与男人同等的条件享有被选举权时取得了初步成就。继怀俄明州的率先行动而来的是科罗拉多州(1893年)，以及犹他州和爱达荷州(1896年)；但是美国妇女直

到1920年才获得联邦选举权。在英国,当第二个改革法案于1867年成为法律时,据称法案中“人”一词包括妇女在内,于是许多妇女实际上是作为选民登记的。但是翌年,法院拒绝承认这项权利。1884年,选举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但妇女依然被排除在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8年,这一年三十岁以上的妇女终于获得选举权。10年以后,选举权扩大到所有妇女,她们享有了与男子同样的选举权利。在英国,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在1906至1914年间达到了高潮,当时,英国独立工党内早年在曼彻斯特的知名人物埃米林·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年)领导了妇女社会和政治协会所组织的一个富有斗争精神的争取选举权运动。妇女社会和政治协会于1903年创建,与密利森特·加勒特·福塞特夫人所领导的一个资格较老的运动形成对抗之势。潘克赫斯特夫人指责这个运动只注意中产阶级妇女的权利要求,还指责它只利用纯属合法的方式施加压力,因而没有效果。许多社会主义者参加了富有斗争精神的新运动。但是不久潘克赫斯特夫人便与工党意见相左。尽管工党坚决支持妇女提出的她们应得到平等对待的主张,作为一个团体,它不愿赞同潘克赫斯特夫人所提出的妇女问题应绝对优先于其它一切问题的要求,也不愿支持“从事妇女参政运动的妇女”所采取的暴力方法。妇女社会和政治协会与其前辈一样,实际上主要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的运动,以致它在伦敦东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在潘克赫斯特夫人的一个女儿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的领导下分离出去,成为伦敦东区从事妇女参政运动的妇女联合会,该联合会主要是工人阶级的追随者,也主要是对工人阶级具有吸引力,这促使它在改名为工人社会主义者联合会之后于1920年成为英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遭到列宁非难,认为它犯有“左倾幼稚病”。早在这次分裂之前许久,主要由于潘克赫斯特夫人及其长女克丽斯特贝尔的专制领导,妇女社会和政治协会已经发生过几次

分裂。1914年大战爆发时，潘克赫斯特夫人以及妇女社会和政治  
841 协会曾对战争努力给予过热烈的支持，并将主要力量转移到招募  
妇女从事战时服务工作和军火生产，声称选举权是对妇女在战争  
年代所提供的服务的报偿。她们在1918年人民代表权法中得到了  
报偿，年满三十岁和三十岁以上的妇女在那一年都参加了大选的  
投票，并在劳合一乔治的联合政府大胜工党的选举中发挥了她们  
的作用。<sup>①</sup>然而新工党容许妇女按与男子一样的条件入党；而且它  
坚决支持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尽管废除对年轻妇女歧视的、1928年  
的最终授予选举权法是由一个保守党政府通过的。

在所有交战国中，战争使妇女就业人数大为增加，首先是在工  
业中的就业，并且它还使妇女参与许多社会和经济部门的活动的  
情况有了长足发展。不仅在政党机构和专业岗位上，而且在工会  
和合作社中，许多妇女代替了应征服兵役的男子，而且人们几乎普  
遍认为效果圆满。在破除非理性的偏见、从而为承认妇女的平等  
公民权利铺平道路方面大有成就。然而，如果像有些人那样断言，  
1918年以后妇女之所以立即在这么多国家中获得选举权乃是对她  
们在战争中所作贡献表示赏识，那就未免言过其实。因为妇女不  
仅在交战国中而且在中立国中也取得了选举权，还因为争取妇女  
选举权的运动在战前就已经有了非常迅速的发展。情况甚至也可  
能是这样：在一些国家里，本来对扩大选举权范围持敌意的保守集  
团由于发现它们只好向所有要求享有选举权的成年男子让步，便  
默许将妇女也包括在内，这样做是希望妇女至少在今后一段时期  
会成为比男子容易受到宗教影响的、占优势的保守派选民。无论  
842 如何，到1920年年底，妇女在议会选举中享有选举权的国家已经从  
1918年的4个增加到28个，还不包括俄国在内。在俄国，革命所

---

① 见本书第412页。

建立的制度以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男女完全平等为基础。1920年以后，妇女仍被剥夺选举权的国家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还有比利时。在比利时，妇女享有被选举权，但是除了为数有限的特殊情况以外，她们没有选举权。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确立了男女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奥匈帝国崩溃以后建立的新国家的宪法也有这项规定，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虽然匈牙利与英国一样，只有年过三十岁的妇女才享有选举权。在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妇女不得不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获得议会选举权。如果不把西班牙计算在内，瑞士是目前仍然不给妇女选举权的唯一重要的代议制国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根据共和国宪法曾短期实行过普选权制度，但是不久议会制度便遭到了破坏。社会主义运动显然不能自称从1914年以来在男女地位的关系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应完全归功于它，或者甚至主要应归功于它。然而可以公正地说，妇女争取享有平等公民权利的要求得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凡属社会主义掌权的国家，平等权利的原则都得到了坚决的肯定——首先在俄国就是如此，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几乎与俄国不相上下。第一位出任内阁大臣的妇女是丹麦人尼娜·本格。她在1924年担任教育大臣。那一年一些妇女在英国工党政府中担任了次要职务。1929年，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进入工党内阁担任劳工大臣。在苏联，妇女实际上并没有在政治领导阶层中起重要作用。她们中的杰出人物有曾数次担任重要外交职务的亚历山德拉·科龙泰。俄国的另一位杰出妇女是左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玛丽·斯比里多诺娃，但是她在1917—1918年间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会革命党的为时短暂的联合政府中没有任职。在美国，弗朗西丝·佩金斯是第一个担任高级政治职务的妇女。她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府中曾担任过12年 843  
劳工部部长。

在战前时期，第二国际结合本身的代表大会，举行了一系列由下属各支部妇女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了关于制定要求男女平等的纲领，以及保证国际的妇女成员积极投身和平事业的决议。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克莱拉·蔡特金在放弃了1914年举行维也纳代表大会的方案之后，她作为第二国际妇女支部书记如何成功地就召开一次社会主义妇女会议作出了安排。这次会议于1915年在瑞士举行，发表了反对战争和主张立即议和的声明。在战争年代里，事实证明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已不可能，但是当新的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在汉堡举行成立大会时，召开过一次特别妇女会议与它相配合，会上成立了社会主义妇女国际委员会，后来还在工党和社会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中获得一个代表席位。此外，还配合1925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举行了一次类似的妇女会议。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一项由奥地利的阿德尔赫德·波普提出的决议，要求成立社会主义妇女国际咨询委员会，其委员将由参加国际的各国党推选，并在执委会领导下负责组织国际妇女会议，这种会议与（国际的）每次代表大会配合举行，并代表第二国际总体负责处理妇女问题。决议案竭力强调在政策和原则上根本不存在男女有别的问题，而且强调妇女委员会不应单由妇女推选，而应由党推选，作为既代表妇女也代表男子的组织；这种安排使那些对于代表妇女作为一个单独集团的任何组织形式一概持敌意的人感到满意。此后，妇女会议继续配合历届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经常举行，妇女咨询委员会在其工作中起了众所公认的作用。在许多主要国家，经常举行盛大的吸收新成员的集会和游行来庆祝国际妇女节。到1930年底，参加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妇女已增加到100万人以上，据记载，有65名妇女成了各国议会的议员。1929年，比利时社会党人在参议院的表决中投票反对天主教党提出的把选举权扩大到妇女的提案，尽管党纲中明文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选举

权。此事在党内引起了激烈争论，于是在1931年党的代表大会上不仅重申了党章中关于平等选举权的规定，还责成其议员在天主教党再次提出这个提案时投赞成票。然而不论在比利时还是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在这方面都一事无成。

不论是在一国范围内还是在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会议上，各国的妇女社会主义团体内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在一些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分歧。比方说，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妇女大部分反对制定保护女工的特别法律，认为保护性法律应对男女一视同仁，而大多数其它党派则支持以现有的工厂立法为准绳为妇女制定一些特别的措施。人们激烈辩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节育问题。天主教徒和还有一些担心支持节育会分裂工人阶级运动的人强烈反对节育。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妇女采取了中间立场，她们赞成由官方的医疗机构和福利机构提供节育知识给希望节育的人，但是拒绝保证劳工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支持或反对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的节育。然而，总的说来并没有使这些分歧趋于极端；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妇女支部对于它的历次会议辩论的大部分问题采取了共同方针。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在国际活动这个领域中发挥了特别积极的作用。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方面的活动由于妇女组织的软弱而受到阻碍。阿德尔赫德·波普和埃米·佛罗恩德里希都是杰出的奥地利代表，后者也是国际妇女合作协会的主席；法国妇女运动的重要人物是路易丝·索蒙努，英国是玛里恩·菲利普斯和A.苏珊·劳伦斯，后者从1929年至1931年曾在工党政府中任职。

845

## 第三十章

### 结论：从1914至1931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我在撰写拙作《社会主义思想史》第四卷时，原计划打算包括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到1939年大战再次爆发这一整个时期。我以为，考虑到拙作的第一卷和第二卷跨越的时间达40年以上——大致分别为1789年到1850年和1850年到1889年——，第四卷涉及四分之一个世纪无疑为时不算太长。诚然，为了交代紧接着第二卷以后的25年（从1889年到1914年）时间，我曾不得不把拙作第三卷的篇幅扩大到1,000页以上。可是一俟我着手具体开展我的计划，我就发现我的原计划行不通，因为我不可能在不丧失论述的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在一卷书中既包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发生和接着发生的革命，又包括随着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大萧条和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胜利而来的反革命和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时期。因此我修改了我的原计划，并在略事踌躇之后决定写至1931年，以便只论述大萧条的早期阶段，而集中笔墨来写1917年伟大的俄国革命在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竞争激烈的两个派别方面产生的后果，在这两个派别之间，任何中间的或异端的舆论主体都极难倖存，或者至少是极难对事态发展产生强大影响。

从1889年到1914年8月解体的走完自己路程的第二国际，尽管在内部发生过尖锐的政策分歧，曾经确实代表了作为单一的和根本上统一的世界力量的社会主义概念。1914年在组织上陷于破



裂的这种统一，由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带来俄国模式的世界革命福音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出现，不仅在行动领域，而且在思想领域也消失了。因为1919年以后的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包含着一个谨慎的和世界性的企图，即将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分裂成为竞相争夺工人的忠诚而尖锐对立的派别，并导致了不仅是对立的共产党与反共的工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共处，还有相互竞争的工会运动之间的共处，而且使得各国工会内部的冲突连绵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共同目的激励的单一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不再有丝毫踪影。对立的社会主义运动非但没有联合起来摧毁资本主义，反而专心致志于在彼此之间进行斗争；那些由于希望使它们重归统一而强调它们之间有共同之处的人，发现他们的努力到处受到双方的狂热分子的阻挠。在共产党人看来，改良主义者以及目前的革命“异端分子”——即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都打上了“社会叛徒”的烙印，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所谓“叛徒”的主体则大声疾呼说，没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所谓民主政治是指以普选权和“自由”选举条件下的多数派统治以及相互竞争的党派结构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

因此，任何一个着手撰写1917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或行动史的人都必须不再是研究一个单一的运动或趋势，而至少是两个运动或趋势——至少是两个，除非他准备将其中之一完全排除在外，从而缩小他的社会主义概念。这种排除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论作者对于其中不论哪个集团自称是共产的社会主义传统的真正传人的说法持何种见解，实际上他都不得不涉及它们之间的冲突以及与它们之中的任一个都不尽相同的、不可胜数的社会主义思潮。即令他愿意——我则不是如此——认为一党制共产党国家中的思想和行动的发展与任何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作社会

主义的事物风马牛不相及，他仍然不得不论述其它那些其国内共  
848 产主义运动与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直接争夺工人阶级和农  
民的国家的发展；而如果不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就不可能对事  
态或理论作均衡的和充分的叙述。不论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民主  
主义运动或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它们的哲学和行动方法方面存在  
多么尖锐的分歧，无可否认，它们确实存在某些共同因素——比方  
说，提倡公有制和对主要资源和生产工具进行控制，相信工人阶  
级实现从资本主义到国营企业的过渡的历史使命。要做到这一  
点，是通过工人或自称代表他们的党用革命方式夺取政权，还是通  
过在普选制度下的议会行动来和平夺取政权，这个问题不论有多  
么重要，都不可能在各国以同样形式出现；因为一方面并非所有国  
家都具备第二个方法的先决条件——自治的议会制度，另一方面，  
在一些确实存在这种制度的国家里，实际上又不可能进行暴力革  
命或实行一党专政。如果在1917年初告诉俄国共产党人，他们只  
应该以合乎宪法的议会方法行事，那是胡闹。如果今天向沙特阿  
拉伯、或暹罗或拉美的某些国家的社会党人——或者向南非联邦  
的黑种社会党人——提出同样的意见，胡闹的程度也不在以下。  
如果敦促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或英国或美国的社会党人为建立无产  
阶级“一党”专政而致力于革命，那也同样是胡闹——虽然这两种  
荒诞不经的行为中哪一种都不乏提倡者；因为当他们把特殊情况  
的基础误以为是普遍原则的问题而据以作出概括性结论时，什么  
蠢事都做得出来。

拙见以为，写社会主义历史的人一旦进入以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1917年俄国革命为起点的时期，便无法避免在他的综合评述中  
849 列入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以及与此有关而不能完  
全归入这两种意识形态中的任一种的、形形色色的思潮。因为这  
两者以及所有变体都是历史悠久的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一如

新教和天主教都是以前统一的基督教的继承者，而异端和宗教裂教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许久便已在基督教内存在。

在这样确定进行全面论述的总的做法时，历史学家仍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他不得不主要涉及必然激起他自己和他的读者的热情的、非常激烈的现有争执，而不是主要涉及他可以希望对之作出相当客观和不带偏见的判断、或者可以留待他的读者根据合乎情理的、对事实的客观叙述来自己作出判断的往日的争吵。因此他几乎不能希望由于公允地论述他需加讨论的问题的两个方面或所有方面而受到称赞。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与现在和将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致我们都倾向于从萦绕在我们脑际的、我们自己现在的或未来的态度和行为出发来看待这些事情，并根据从这些来源得出的结论来追溯既往、加以解释。比方说，我们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列宁在其中所起作用的判断往往被我们对今日苏联的看法所歪曲；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对1918年以后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社会党人的行为的看法也受到我们目前对社会党国际下属各党派所持态度的影响。

就这些问题而言，我以为我比我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同事具备较优越的条件，可以在两种极端的见解之间持论公允，因为我从未发现我自己能够接受两种见解之中的任一种。基于原则，我强烈反对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我认为这种理论势必导致集权的官僚主义，破坏个人自由以及思想和行动自由。但是我也在同等程度上反对资本主义以及它所包含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而且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见解：除了使用合乎宪法的议会手段，对这些弊端采取行动都是不合法的，即使在这种手段要么不存在、要么显然无效的地方也是如此。我反对在采用合乎宪法的手段实现根本改变的道路向人民有效地敞开的地方进行暴力革命，或者哪怕是采取违宪行动；但是我无法同意民主制度是实现社会主

850

义的必要先决条件的提法，如果所谓“民主制度”意味着是那些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代议制政府的传统、也没有议会制度可以被用来引起社会主义变革的国家所独特使用的议会方法的话。这种态度使我在成年以后始终站在左翼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一边——如果我当初是一个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空想的”或学院式的政治家，我可能发现在我的国家里这是一种非常难于维持的立场。我从来没有、哪怕是片刻时间考虑过成为共产党人的可能性——这整个念头使我反感；但是当我感到西方的工党和社会党以及种种运动似乎背离社会主义原则时，我往往深感恼怒，我决心绝不由于我对共产主义运动持敌对态度就参加与社会主义的公开敌人的任何种类的同盟。这经常使我的处境多少有些孤立，可是由于我除了作为一个作家十分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国家以外，从未容许自己积极参与政治，我可以忍受这种处境而不是那么不舒服。因此我得以观察——而且在我自己规定的这种限度之内还可以参与——意见的冲突，而根本不致于作为任何一个党或派系的代言人深陷其中，虽然将近50年来我一直是工党党员，而且先是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中、后来又有四分之一世纪在改组后的费边社和新费边研究局中担任过职务。我并非暗示这就必然使我在回顾本卷所涉及的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史时能够公正不阿，或者甚至能够不加个人偏见；但是我确实认为这使我比起那些已经完全被吸收进西方式的议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来，具有某种优越条件。

本卷所涉及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主要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已发展成为一方面是资本帝国主义和现有社会秩序的世界范围的挑战者，另一方面是各种改良主义或温和的渐进社会主义的挑战者。这种双重的挑战一直继续到今天；但是拙见以为，当法西斯主义在三十年代初的世界经

济大萧条之中在德国——它在德国的表现形式是纳粹主义——上台时，这种挑战具有了新的和不同的形式。当然，在此之前法西斯主义早就征服了意大利，而且法西斯主义趋向也已经在若干其它国家出现，比方说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更不用提在中国了。然而只是到了希特勒崛起，法西斯主义才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危险；因为只是到了希特勒手里，法西斯主义才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形成世界规模的挑战，从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严格地说，是否应该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的新的、说不定还是终极的形式呢，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全然不同的信念和生活方式。拙见从一开始便认为后一种见解比较正确，并且认为全世界的人面对着一种无可逃避的挑战，为应付这种挑战，有必要在斗争中联合一切可以争取到的反法西斯力量。因此，暂时来说，反抗法西斯主义成了比企图推翻资本主义甚至更为紧迫的问题。毫无疑问，结局必然是这样：许多资本家，尤其在德国，会站在纳粹党人一边，并力图利用他们来为资本主义目的服务；但是我认为这绝不证明纳粹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在我看来，纳粹主义是一种根本不同的事物，如果蔓延，很可能使资本主义从属于纳粹主义的军国主义和种族优越的理论——这是人类礼仪和生活艺术的进步的凶恶得多的敌人。

法西斯主义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仅仅对工人进行公开进攻的、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凭它本身的权利——或者不如说是凭它本身的邪恶——存在的第三种力量，这种信念对于我作出以下决定起了它的作用：本卷写到希特勒在德国当权搁笔，留待日后单独论述三十年代反法西斯斗争以及法西斯主义对事态发展和苏联的政治思想模式的影响，以便集中注意力 852  
撰写1917年和此后数年的几次革命与法西斯主义的挑战以清晰可

辨的形式出现之间这段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因此在本卷中，我主要关心的首先是这些革命动乱及其对破坏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其次是关心在经济大萧条开始之前，社会主义运动在战后世界的命运，并为此目的写进了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同盟者。我深知，就某些国家而言，这需要在不合适的时候中断记载；不过这种情况所涉及的国家大部分并非在我目前所关心的时期需要着意论述的国家。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事业之间来划分界限就已经足够了，这不仅对于德国和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大部分地区来说是如此，对于大萧条和罗斯福的新政将三十年代与前十年截然分开的美国来说也是如此，而且我相信对于苏联来说也是如此，在苏联，斯大林主义开始体现了一种与列宁的或者与托洛茨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尽管这种态度依然嫁接在列宁主义的根上。

因此，在写了有关战争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方面的影响、有关俄国革命及其对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因素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这个序言性的一章之后，我开始了我的论述。在这一方面，最根本的一点是要领会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思想，这个革命对于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来说并不是局部的、一国范围的革命，而是所有其它国家——首先是整个欧洲，其中德国是将革命扩大到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的要冲——的工人应以布尔什维克革命作为典范来进行的世界革命中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他们相信，出于历史的必然性，革命一定会以这种方式扩展，相信除非果真如此，他们自己的局部革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虽然他们有信心：即使革命暂时失败，也会像1905—1906年的灾难以后那样再次兴起。因此他们竭尽全力在其它国家——首先是德国——煽起革命，并引导德国等地的革命力量依从他们从他们本身成就中获得的有关进行革命的正确方法的概念，而很少考虑其它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工联

主义者的大不相同的处境，或考虑在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中逐渐形成的不同传统。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极为自豪——通过反对资本主义大国的干涉这些成就仍能保住，他们更为自豪——，于是要求其它国家尽量不折不扣地仿效苏维埃榜样，并彻底抛弃一切妨碍准确效法布尔什维克楷模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行为传统，从而表示他们对苏维埃榜样的钦佩。他们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而在其它更为先进的国家，本应起带头作用的工人阶级却可耻地落后了，而且听任自己被资本主义的战争制造者赶进了自相残杀的屠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显而易见的任务当然应该是弥补失去的时间，将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或者在凡属做不到的地方，至少应该给他们本国的统治阶级尽量制造麻烦，从而牵制他们，使他们无法动用人力物力来推翻苏联。对俄国布尔什维克来说，这种行动似乎是显示对一个起了十分重要和鼓舞人心的带头作用的国家的责任和忠诚的简单问题。其寓意似可一目了然：“不拥护我们便是反对我们。”

在国内面对反革命的重大威胁的布尔什维克正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处心积虑地着手分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当然，他们对自己就不是那样来提这个问题的了。他们认为，他们的目的不是分裂工人，而是使他们脱离他们的那些背叛革命事业的好诈领袖。在他们看来，每一个工人都是一个潜在的革命者，除非错误的引路人诱骗他们，将他们引入歧途，他们是不可能成不了真正的革命者的。正如他们所设想的，未来的前景并不是对立的革命的和改良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竞相争夺胜利，而是一个单一的革命运动，只面对着被以前的广大追随者抛弃的一小撮声誉扫地的改良主义领袖。苏联共产党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共产国际从一开始便对他们改变 854  
群众信仰、使之接受他们的观点的能力异常有信心。他们确信历史的必然性在他们一边——还不仅如此，因为他们自己的革命成

就本身就说明对其它人来说时机也成熟了。因此，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使工人阶级因内讧而削弱的分裂问题。右翼领袖很快就会失去追随者，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真正的危险来自中派——来自那些反对右翼、但拒绝共产主义信条的人——，因为他们的态度中固有的矛盾会使他们无法遵循任何真正建设性的政策。归根到底，他们也注定要丧失其影响；但是就眼前而言，他们可能博得足以妨害世界革命扩展的支持。因此，为了破坏他们对于大体上用心良好、但头脑糊涂到了把他们的花言巧语当作真正革命意图的工人的影响，必须千方百计与他们斗争，甚至应该比对右翼领袖的斗争更激烈。

共产国际本着这个精神拟定了它的“二十一条”，主要宗旨在于把出于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同情、希望与之建立兄弟般的关系而并不认为俄国的方法适用于全世界而全盘加以赞同的所有集团摒于门外。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在季诺维也夫和俄国共产党的敦促下，本着这个精神着手破坏法国的龙格的少数派（这时成了多数派），奥地利的弗·阿德勒和奥托·鲍威尔及他们的“第二个半”国际，意大利的塞拉蒂的几乎全然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派别，英国的独立工党，而最要紧的是破坏德国的独一社会党。更有甚者，他们的这项破坏工作大部分获得了成功。独立社会党四分五裂，被击败的少数派被迫与右翼社会民主党重新联合；维也纳国际被迫与复活的第二国际重新联合；法国社会党为共产主义运动所取代，中派被迫与右翼重新联合；在意大利，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土崩瓦解，以致为法西斯主义敞开了大门，使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都淹没在一场共同的灾难之中。至于世界革命，它并没有发生。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迅速被推翻，为霍尔蒂的白色恐怖所取代；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刚一成立就遭到破坏；德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结果遭到了惨败；在英国和大部分其它西欧国家——更不用提美国——，根



本从未出现过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革命运动。以它早期所希望和追求的标准来衡量，共产国际遭到惊人的失败。它非但没有能使右翼孤立并丧失其追随者，反而将一大部分以前的中派集团拱手送给了他们。它非但没有实现世界革命，反而由于分裂社会主义力量和工人阶级力量而帮助促成了法西斯主义起初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德国和大部分东欧国家的胜利。即使对于俄国人来说也已经很明显，他们对于世界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估计存在严重错误，必须做的事情实际上倒不是修改他们的根本理论，而是承认有必要等待他们仍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到来并引起革命热情的新的迸发。

由此可见，共产党关于未来的设想开始愈来愈多地受到这样一种思想的支配：世界资本主义在大战的混乱之后虽以某种方式设法进行了改组，必然迅速地接近它的“最终危机”，正如四十年以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正在发展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相信的那样。当然那次危机结果证明绝不是“最终”危机，它并没有引起任何革命行动的爆发，倒是导致了若干遵循愈来愈不革命的方针的社会民主党的兴起。然而“下一次”再要发生危机必然大不相同。在“下一次”危机中，世界资本主义会由于全然没有能力使轮子继续不断转动而解体，各地群众会转向革命作为唯一的出路。这样，希望和相信的事物只不过推迟了出现的时间，而并没有被放弃。与此同时，一切优秀的社会主义者的典型职责是保护苏联反对它的敌人，而苏联统治者的典型职责则是论证以前曾被认为是行不通的事情——“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典范，供其它国家在一旦下次危机使时机成熟时仿效。

在二十年代早在危机到来之前，更没有疑问的是在纳粹党人在魏玛共和国的废墟上当政之前，便在根本思想毫无改变的情况下发生了这种方向的改变。在那个阶段，这并不牵涉对共产主义

世界观作任何根本修正，虽然它的确需要共产党人修改对不忠实的党派的策略。他们必须使自己适应一种等待政策，同时随时准备保卫苏联。在危机到来之前，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与他们本国劳工运动中的右翼或改良主义倾向作斗争，在工会中树立影响，并且在凡属可能的地方使他们被某些组织（他们打算一有机会便刺杀其领袖）认可为盟友。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但是鉴于世界革命必须推迟，并鉴于首要责任在于不论在何种条件下都必须保卫苏联，舍此以外别无它途。只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和纳粹党人征服德国之后贯彻了一种新方针，形势才发生了变化。因为危机所带来的并不是一阵革命热情的浪潮，而是德国和其它地方的反革命，而在一向存在代议制政府的地方则带来了工人阶级运动的严重的、暂时的削弱，尤其是在工会领域，同时也是在政治领域。在英国，工党政府的衰落虽然结果导致了工人阶级舆论的暂时左倾，却使工人阶级运动大为削弱，只能缓慢地恢复元气；在美国，新政之后虽然工会活动蓬勃发展到了在此之前从未征服过的大规模工业领域，却完全没有能够使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恢复到哪怕是二十世纪头十年所曾达到过的适中的水平。

857

尽管经济萧条引起了普遍的灾难，在资本主义大国中世界革命似乎很快就变得空前遥远，不仅如此，此时它还不得不面对着一个新的、显然冷酷无情的敌人，这个敌人毫不尊重在此之前在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起了缓和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的作用的文明行为传统。因此，即使只是为了帮助保护苏联免受法西斯危害，共产党人也开始有必要在凡属可能的地方寻求盟友，并且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大声疾呼，而不要使一切不愿意接受整个共产主义信条的人产生反感。当然，这仍然只不过是“党的路线”的改变而不是基本态度的改变；因为共产党人所希望要的“统一战线”是这样一种“统一战线”：它能使他们担任领导，并尽可能使他们得

以支配他们认为在对法西斯进行的讨伐中需要与之合作的其它团体。可是,比如在英国,他们本身只拥有为数甚少的追随者,而且“统一战线”的建立会使他们处于毫无希望的少数地位,在这种地方,他们的目标与其说是与他们的工人阶级反对者组成单一的战线,不如说恰恰是去吸引以前他们谴责最凶的那些中派人物,并且尽可能多地争取被纳粹信条的非理性主义和残酷弄得毛骨悚然的、没有根基的分子和大学生。因此,三十年代成了“同路人”的时代,这些人由于迫切希望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团结在共产党人周围,把共产党人看作是法西斯主义的最能表达意见和直截了当的敌人,而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细节并未多加考虑,在许多情况下对于它所包含的内容并不真正理解。这样的新成员对于斯大林领导下苏联所发生的事情是比较容易轻信,因为他们要考查别人要他们相信和他们希望相信的事情是否正确殊少依据,也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似乎使他们站在了当前斗争的正确方面。

我知道,从来不存在真正有利的理由来欺骗自己或听凭自己受骗。然而在三十年代,却存在非常有利的理由说明应该将反法西斯斗争远远置于所有其它问题之上。另一方面,在二十年代,要知道应该把什么问题置于首位却要困难得多——至少在西方各国武装干涉俄国的直接危险消失以后情况是如此。随着新经济政策开始产生明显的结果,许多非共产党人便对苏联寄予厚望,即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前,苏联的经济和社会计划在早期阶段似乎就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就。有许多人在比较绝望的经济匮乏现象克服之后盼望极权控制有所放松,并希望苏联会安定下来,采取一种与西方对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价值观念并不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形式。在西方像在其它地方一样,尤其在青年人之中,确实存在一种钦佩苏联和十分重视它的真正出色的经济和教育成就的强烈愿望。在某些断然料想不到的人士中间,甚至还存在

858

这样一种倾向：由于共产党员的忠诚的服务而钦佩共产党，并且把西方社会党的追随者联结到一起的松散纽带与共产党人的严格纪律相比较——相形之下前者大为逊色。韦伯夫妇以其篇幅很大的著作《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吗？》（1935年）日后成了这种态度的最直言不讳的代言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苏联是向来自许多国家的旅游者开放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归来时十分推崇苏联在经济和教育方面正在取得的进展，尽管他们对其极权方面有所抨击。

毫无疑问，有人可能辩解说，许多在二十年代对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成就表示钦佩的社会主义者并非真正为这些成就本身所打动，他们的赞美来自一种精神状态：不管实际质量如何，只要是苏联做成的事情就想加以赞美。当然，任何访客或真正从事研究的研究者都必然会明显看出这样的事实：苏联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其生活水准要比资本主义西方的生活水准低得多。因此，所赞美的并非在经济或社会方面真正达到的成就水平，而是为改善经济和  
859 在人民中间广泛普及教育——或者至少是发展先进的工业技术以及为迅速发展的城市工人阶级提供社会服务和教育——所作的艰巨努力。对这种赞美者来说，实际的水准低到什么程度几乎是无关宏旨的：重要的是努力提高生活水准，并在这样做时努力巩固革命和使苏联强大到足以对抗资本主义包围的危险，并在短期内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准。当然，情况确实是这样：许多社会主义者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对苏联深表钦佩——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是因为苏联的生活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他们在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追求不到的一种理想而英勇地生活，因而更加钦佩。共产主义世界的“血和汗”非但远远没有使这种观察家产生反感，反而在他们心中激起了一种当时的实际成就本身受之有愧的钦佩之情。只是到了苏联在农村实行大规模集体化，竭力企图不仅使庞

大的农村人口的农业耕作、而且还使他们的思想社会主义化时，那些对整个制度深怀敌意并认为它一无是处的人的批评才蔓延到了好心的观察家，后者不仅对于集体化使牲畜被大批屠宰以及许多大规模的新的国营农场实验工作显然管理不善感到困惑，而且对于实行集体化时的冷酷无情感到惊骇。农业歉收以及过于仓促的集体化所造成的乌克兰和其它地区的大饥荒，对于使西方的同情态度趋于冷漠并且引起对主要牺牲者——所谓“富农”——的相对的同情的同情，起了很大作用。尽管如此，在1939年以前，1917年革命以及工业发展的毫无疑问的成就所产生的友好情意，仍然在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以及认为苏联是反法西斯斗争的自然领袖的人们之中存在。

然而到二十年代后期时，不仅在由于俄国在执行政策时冷酷无情而感愤怒的人中间，而且在共产党人中间也出现了激烈批评苏联的人。从托洛茨基被罢官的时刻起，或者至少是从他被驱逐出俄国的时刻起，他的观点便在许多国家的少数派中间获得支持。“托洛茨基主义”成为可耻的标签，并被用来诽谤以任何理由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纪律的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是后来的事情；但是大部分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而不仅仅是斯大林的反对者的早期托派分子，早就开始对共产国际所要求于外国共产党人的磐石般的纪律产生某种分裂性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集团自然要同在更早的时候与官方政策发生分歧的其它持不同政见者联合起来——比方说，与产业工联主义者和拥护民主的工人管理的左翼分子联合起来。共产国际起初曾着手将各国反抗过老资格的社会党的产业工联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工厂工人代表运动吸收到它的队伍中去；它成功地同化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且使他们接受了认为工会应坚定地隶属于共产党控制的理论。然而他们之中存在不少天生的反抗纪律的人，他们认为“民主集中制”概念

860

根本不合他们胃口。在苏联，这种反叛者迅速遭到了无情的清洗或流放；但是在其它国家，党鞭长莫及，只能以恶毒的辱骂来追踪。其中有一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都继续存在的人数不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中进行他们的宣传。另有一些人，比方说在美国，成立了一些短命的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和社团，其中有一些日后在教育学家约翰·杜威主持的对托洛茨基事件的大规模调查中很活跃。然而这些派系中没有一个曾大规模地确立自己的地位，虽然在三十年代，甚至在一些亚洲国家也出现了托派党。实际上从未有过机会逐步形成对立的共产主义运动，来与以俄国为后盾的共产国际的以纪律控制的势力分庭抗礼。所曾存在的无非是“分裂的小党派”，这些党派既互相倾轧，本身也存在内讧，而且除了十分狭隘的圈子以外，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发言机会，所以毫无效果。

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激烈争执发展到严重阶段的那一刻起，就很难弄明白争执的真正实质。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这场争执主要以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影响下的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化所进行的理所当然的攻击开始。但是攻击迅速涉及到广泛得多的领域，而且在分裂以后不出几年，当斯大林似乎在执行托洛茨基一直大力提倡的一些政策时，形势就使人大惑不解了。托洛茨基是最初强调向农民过分让步的危险以及下达命令必须迅速实现工业化以便加强产业工人阶级的人之一。但是正是斯大林创始了着重强调工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后者的目标既在于解放剩余劳动力来从事工业，也在于将农民转变成与产业工人有些相似的人。诚然，托洛茨基作为“不断革命”学说的倡导者，最先竭力认为唯有将革命扩大成为世界革命，革命才能在俄国幸存；

---

① 见本书第572页。

而斯大林则很快使自己成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概念的主要倡导者。这至少是一个实际的差别，就斯大林这方面而言，这个差别的基础是他更明确地认识到，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发生革命的前景如果说确曾存在过，也已经消失了。然而这种差别虽说对于二十年代中期以后苏维埃政策的形成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却远远不能解释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何对一切可以被指控为站在托洛茨基一边或在他影响下行动的人这样残酷。愈来愈明显地可以看出，真正的争端在于以下两者之间：所谓“民主集中制”这个铁板一块的概念，其实它意指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从一个单一的中心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控制；以及一个对立的观念，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毫无疑问应在严格的中央纪律的约束之下开展活动，但是应通过党的活动分子之间的自由讨论来形成其政策——也就是说，在真正作出至关重要决定之前，在党内进行自由讨论。后来这继续成为真正根本性的争端，但是主要由于不得不面对大量其它争端，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斯大林主义者在痛斥其批评者并诽谤托洛茨基的名声——当他们不完全隐瞒他的名字的时候——时不分清红皂白进行辱骂所构成的压力，人们就看不见这个争端了。

862

当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这些争端日趋激烈时，如我们在前文所见，中派夹在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与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上下两块磨盘石之间已被磨得粉碎。大战结束以后1919年时存在的中派处境愈来愈艰难。它的主要实力存在于战前社会民主主义拥有强大力量的一些国家——首先是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在奥地利，与其它社会主义派别相比，中派最为强大，这时奥地利已不再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的首都，而是一个几乎纯德意志民族的小国，它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而且其征服者不准它通过与新的德意志共和国重新统一来谋求补救。从问题的表面来看，战后

奥地利最使人感到意外的事实是共产党人并没有从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大规模分裂出来。在“红色的”维也纳和少数次要的工业根据地处于巩固地位的奥地利工人仍然几乎一致地忠于老的社会民主党，并在共和国建国的最初几年左右政局。但是一俟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奥地利革命动乱后有了时间来改组他们的力量，人们便可以明显看出，社会党人不论对维也纳的控制多么牢固，都不可能在全国取得多数，而不得不在这样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与他们的  
863 主要反对者基督教社会党人联合，付出放弃把奥地利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的代价；要么放弃他们在中央政府中分享的权力，以便保持他们的独立，并在不受与政治右翼的任何联盟束缚的情况下进行宣传。这并不仅仅是暂时的选择，因为根据战后的解决办法产生的小小的奥地利的结构，造成了过于庞大的首都维也纳为一方与社会党人无法对之产生任何有效影响的奥地利农业地区为另一方之间的持久冲突。在基督教社会党内，起初存在一种社会党人发现与之合作并不太困难的、进步的农民成份。但是天主教会对这个集团施加了强大压力；在基督教社会党右翼还存在一些公然反动的集团，它们憎恨共和国，梦想消灭叛逆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还梦想使哈布斯堡王朝复辟，或者以霍尔蒂的匈牙利为榜样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

面对着这种政治僵局，奥地利社会党人由于无法取得多数以便统治国家，只得集中力量充分利用他们对于维也纳的不可动摇的控制。在维也纳，尽管在经济上困难重重，他们在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对失业者的照顾、为工人阶级建造著名的公寓、保持很低的房租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鼓励通俗文化等方面，依然创造了奇迹。他们保持了这些政策，从而赢得了不仅是国内的、而且是许多外国访客的高度赞扬，直到在经济上从来无法生存的奥地利被经济大萧条打翻在地。此后，尤其是在希特勒在德国执政以



后，社会党人的地位愈来愈衰弱。面对着反动的奥地利法西斯党的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以及基督教社会党的反动的一翼对中央政府的控制，社会党人只得不断在这样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作出让步以避免内战，要么进行抵抗，这就必然使他们介入将意味着维也纳发生饥荒的内战。他们一再让步，直到基督教社会党人、元首恩格尔伯特·道尔福斯终于在家乡自卫团<sup>①</sup>协助下，将民主共和国践踏在脚下，只不过时隔不久他的政权就被将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的、入侵的纳粹党人推翻了。然而这部悲惨历史的后一部分已不属于本卷范围而属于下一卷了。此外与我们有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战后欧洲的所有社会民主党之中，奥地利党似乎有一个时期是最有建设性和代表性的非共产党左翼。

由于这个原因，它自然就受到了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党正统派理论家的最猛烈攻击。在那些以中派当作最危险的敌手加以攻击的人之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成了最厉害的贬词。奥托·鲍威尔和卡尔·伦纳以坚持文化民族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的著述遭到了斯大林及其信徒的讽刺和公开的激烈指责。奥地利人被指责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背叛唯物主义真理，追求康德唯心主义和马赫唯心主义这两个奇怪的神，背叛成性，不去驰援贝拉·孔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后来又未能抵抗塞帕尔和斯塔赫姆伯格所领导的反动派的进军。当然，当他们企图在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努力最终失败之后，他们曾转而效忠于把复活的第二国际与他们自己的“第二个半国际”——即维也纳联盟——的残余力量重新统一起来的、新的工党和社会党国际。<sup>②</sup>但是除此以外他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在毫不妥协的共产国际中不可能有他们的栖身之所，他们也毫无能力单独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成立的半军事性的法西斯组织。——译者

② 见本书第683页。

存在。奥地利所处的国际形势岌岌可危，在国内方面陷入了政治僵局，这两者都迫使他们在凡属可能的地方寻求盟友。

865 中派运动的其它主要支柱在德国和法国，在不同的意义上说，还有在意大利。在德法两国，对于逐渐形成中派立场最举足轻重的因素是反战情绪的高涨。以马克思的外孙让·龙格为首的法国少数派人物以及德国的独立社会党人——哈阿兹、累德堡、狄特曼和以理查德·缪勒为首的柏林工厂工人代表——逐渐变成了主张战斗到底并支配着多数派社会党的“社会爱国者”的对立者。在这两种人中起初都包括许多日后成为法共和德共的坚决支持者的人；但是这两种人起初都受“走中间道路的”社会党人支配，其中的一些人除了信奉非战主义以外甚至还在本质上属于右翼。这种右翼非战主义的一个杰出的榜样是老资格的修正主义领袖爱都阿·伯恩施坦，在战后问题居于显著地位以后，他旋即脱离独立社会党，回到社会民主党。在英国的独立工党和美国社会党中也有类似人物。然而大体说来，中派政党和团体的确要比“社会爱国者”左得多，但是绝非与共产党人一致。他们希望使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围绕着一个在应用时因国制宜、容许大有出入的政策重新联合起来，而不是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派系。所谓“第二个半国际”并不打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而是打算成为使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重新统一的媒介。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在德国，独立社会党在大战期间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接着有一个短时期又与后者一道参加了1918年革命中成立的政府，在此以后独立社会党从政府中撤出了它的部长，恢复了独立，只不过在1920年的哈尔代表大会上又落到了共产党人的手里。但是有一大部分人随即脱党，企图将独立社会党作

---

① 见本书第143页。

为一个非共产党的独立的党继续支撑下去；但是时隔不久这个党便发现在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冲突中站不住脚；1922年，独立社会党的剩余的追随者中大部分人同意回到社会民主党，于是只剩下一个以老资格的格奥尔格·累德堡为首的小团体，该团体由于既抵制共产主义运动也抵制社会民主党，就不再产生任何政治影响了。这样，德国的中派运动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便丧失了战斗力，听凭德国的运动由于共产党人与占支配地位的右翼冲突而陷入灾难的深渊。由于这种衰落，人们不难宣称独立社会党失败了，而且应该失败，因为它从未有过任何明确的或者真正共同的政策或纲领，而只是由厌恶社会党多数派的、观点大不相同的人结合起来的，当然，这种指责大体上言之成理。在1918年到1920年之间，866独立社会党是心怀不满的主张议会道路者、工厂工人代表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他们联合的基础是他们都不同意艾伯特和施埃德曼以及还有诺斯克的政策，但是他们的积极的态度则出入很大，有的人相信议会方法和魏玛共和国，有的人则认为1918年的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有必要采取革命行动将那场革命大力进行下去。在哈尔代表大会之后，后一种观点的拥护者大部分转入了共产党，而主张议会道路的人则企图将苟延残喘的独立社会党继续维持下去。在介于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大批人之中，有许多人完全退出了中派运动，所以这个运动作为一种姿态仍然存在，作为一种有组织的舆论主体已不复有效。事后看来，我想有一点是明显的：1918年独立社会党在没有把握有效地对政府加以控制的情况下参加政府，是犯了致命的错误。当独立社会党的部长们领悟到他们的错误而退出政府时，为时已晚，因为政府权力已牢固地掌握在他们的反对者手中，共产党的威胁力量而不是他们的威胁力量成了左翼反对派的有效集中点。这表现在哈尔代表大会上，这次代表大会最后摧毁了在魏玛共和国出现任何有效的中

派运动的可能性。

867 在法国，事态进程与德国不同，但其结果就某些方面而言是与德国一样的。在法国，反战的少数派在大战结束前成了多数派，有一个时期，看来龙格领导的法国社会党会成为中派党，在党内，被击败的“社会爱国者”会被迫听从命令。然而，在法国，主要由于共产国际继续得到左翼工会舆论或工团主义舆论的主体的拥护，共产国际的宣传要比在德国成功得多。由于这些因素的帮助，共产党取得了对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控制并接收了老的社会党的机构，虽然从未接收该党议员的多数。结果是反共的主张议会道路者在党员中被击败的少数派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党，在该党内取得支配影响的并非中派而是他们在1918年击败的老的右翼。像德国一样，这里也出现了两个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处于优势地位，得到工会主体的支持，而在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大体相反。法国共产党人开始不仅成为得到大批手工业工人支持的主要政治力量，而且在适当时候成了工会运动中的支配力量。在德、法两国，中派运动作为一个有效运动已经几乎被消灭。

可是法国与德国的形势大相径庭，因为德国曾有过一次勉强称得上革命的经历，而法国在二十年代却从不存在哪怕是渺茫的革命可能性。当然，这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1918年法国已经是一个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民主共和国，而德国在大战结束之前却是一个专制的军事国家，需要推翻它的霍亨索伦王朝和小王公贵族这两种罪恶统治，既是为了安抚胜利的协约国，也是使自己适应战后世界的状况。不论德国人是否喜欢革命，他们必须进行一次革命。获得战争胜利的法国人则毫无进行革命的需要——即令他们之中有些人在理论上是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看作是他们的阶级敌人的革命者，这些人无论如何根本无意以强制手段来推翻共和

国。因此在法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形势：存在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却没有进行革命的真正愿望。从此以后，这种形势产生了一种对法国政局一直祸患无穷的后果，即在共和国内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它既不能在推进共和国方面起建设性作用，也不能采取行动来反对共和国——除了三十年代短暂的实验性的统一战线时期以及1945年以后甚至更短暂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插曲以外，工人阶级的一大部分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

在意大利，又是另一番不同的经历，结果是法西斯主义毁灭了868  
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左翼、右翼和中派在一次共同的灾难中全部覆灭。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大战结束时，意大利社会党远比其它协约国的社会党要左，它一贯反对战争，并在战时团结国际社会主义力量来反对战争的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事实上几乎可以说，除了在某些工会中以外，意大利社会党并无右翼，老的右翼已在1914年以前被开除出党。此后领导社会党的较稳健和合乎宪法的一翼的屠拉蒂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中派人物，而不是“右翼分子”一词的任何一般意义上说来的右翼分子。意大利社会党立即证明了它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同情，并随即申请加入共产国际。

然而，麻烦也就开始了，因为意大利人虽然希望加入新的国际，大部分人并不愿意接受国际所要求的严格纪律，或接受决定其行为的命令。尤其是在取得了党对于先进的左翼政策的赞同以后，塞拉蒂以及与他同事的其它领袖根本不希望将主张采取较为妥协的方针的持不同政见者开除出党，从而促成分裂。倘若屠拉蒂愿意为了统一留在党内，尽管他与党的现行态度不一致，那么塞拉蒂也不愿意以丧失他们的议会支持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代

---

<sup>①</sup> 见本书第372页。

869 价，将屠拉蒂及其支持者撵出党去。不论在意大利还是在其它国家的社会党人中间，屠拉蒂都深孚众望，他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二十一条”所体现的共产国际对中派的战斗到底的斗争是最不受试图使党团结一致的意大利领袖们欢迎的；而由于意大利社会党有着不愿接受集中的纪律的传统，党在这方面的反对态度更加坚决了。不仅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也是意大利运动中一支真正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央集权和控制极不信任。因此，意大利党拒绝接受“二十一条”，并卷入了与共产国际的长期争执。极左的少数派脱离了党并完全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即使是他们也动辄拒绝接受莫斯科的纪律。然而共产国际仍然坚持己见；结果不是在右翼、而是在左翼产生了分裂。

与此同时，意大利社会党人不仅在他们的国际关系中，而且在国内也遭遇愈来愈大的困难。会不会发生意大利革命呢？或者会不会发生战争呢？与法国相比，或者甚至与德国相比，意大利国家的力量都显得非常薄弱；在1918年以后的时期中，政府大体上陷于瘫痪。然而，虽然反社会主义的政府力量十分薄弱，无力进行有效的统治，他们的反对者并无共同的革命意志。议会中的大多数社会党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中派而不是革命者；工会运动则壁垒分明地分裂成为积极分子和改良主义者两派。此外，还必须认真对付以丹农齐奥为首的浪漫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前社会党人墨索里尼为其鼓舞者的、仍处于创始阶段的法西斯运动；这两者都可以利用失望的民族主义情感以及由经济混乱和灾难产生的灰心丧气情绪。后果是意大利工人阶级运动在革命道路上半途而废，并接着实行退却。如果当初领袖们不准备进一步发动真正的革命，占领工厂一举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发动真正的革命恰恰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足够信心去做的一件事。他们倒是尝试了一种游

击战，这种游击战使墨索里尼在大实业权益集团的协助下，获得了再好不过的机会来建立他的由暴徒和流氓组成的非法队伍来对付他们；由于这支队伍诉诸武力，他们被迫节节退让，直到墨索里尼强大到足以彻底摧毁他们，并在适当时候在总体组织和民众的民族主义热情的装饰下建立第一个法西斯国家。面对这种理论上可鄙但实际上有效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不论是哪一翼或哪一种的社会党人都发现他们只好不光彩地退却。有将近一代人时间，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被消灭了；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它要卷土重来时，又重新出现了与旧日格局多少有点相似的局面——870一个在萨拉盖特领导下的人数不多的社会民主党右翼，一个在南尼领导下的人数众多的中派党，还有一个陶里亚蒂领导的强大的共产党，这个共产党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道地的共产党强大得多。在意大利，不同于法国和德国的是：中派运动虽然在法西斯长期执政的插曲中衰落了，后来还是再起来了。

在意大利的形势中的确存在过有助于说明这种差别的因素。意大利比起法国或德国来是一个更加可以分作两个地区的国家，主要在北部有一些先进的工业区，但是首先在南部也存在极其贫困和落后的农村。它也是一个只有薄弱的和断断续续的代议制政府传统、然而却有着政教冲突以及教会与工人阶级运动冲突的根深蒂固传统的国度。意大利是一个具有强大的地方情绪的地区，不论在政治事务还是工会事务方面都难于在全国规模上组织起来。毫无疑问，自二十世纪以来，意大利国内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因素仍然存在，并且继续妨碍意大利工人阶级从两者之中的随便哪一方面进行工作，即以某种统一的态度承认有必要通过现有的议会机构进行符合宪法的工作，或者联合各种力量来推翻这种机构——因为他们几乎不知道他们希望以什么来取而代之。他们的政策——这主要不仅是指南尼的社会党人的政策，

也是指共产党人的政策——有几分像是退而求其次的中派政策，这不同于我一直谈到的法国和德国的中派政策，而是一种介于按宪法行事与革命之间的中间立场，正如意大利本身处于工业主义与原始主义之间——也即极端先进的都灵与穷困得可怜的南部之间——一样。

最后谈一谈英国，在1918年和此后几年，主要由独立工党所代表的中派从未成为一股令人注目的力量。当然，在大战刚结束时，尤其在主要的工会中，发生过相当大的左翼骚动；但是这场骚动在政治上从未得到很大程度的支持。在1919、1920和1921年，举行了总罢工，接着在1926年又举行了总罢工，这次总罢工曾暂时使1921年的矿山斗争中被击退的左翼力量再一次团结起来。但是只是在1919年的少数几个月期间，当资本主义在桑基煤矿委员会上遭到指责时，左翼才似乎有了胜利的把握。即使在那时，也随即可以明显看出，不仅是对于工党的控制权，就连对于职工大会的控制权也牢牢掌握在稳健派手里。即使在1919年工人的骚乱达到高潮时，甚至也不存在任何革命意向的暗示。工党刚在1918年的大选中被劳合一乔治的联合政府所压倒；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工党接受议会道路作为既定的政策，因为它满怀信心地认为英国甚至并不存在一个需要加以考虑的革命团体。矿工联合会和其它一些人数众多的工会毫无疑问在力促实现关于国有化和“工人管理”的影响深远的要求；但是就连这些要求也绝非革命要求，而在矿工号召其余工会在工业中采取行动以支持他们时，他们也根本不是要求采取革命行动，而只是要求举行完全合乎宪法的罢工——就连这样一项要求在运动的其余部分也没有获得支持。确实存在一些随即组成了共产党的小团体；但是它们是极小的少数派，并且与别的派别一样懂得英国革命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还存在一个非共产党的左派，但是就其大部分成员而言，在理论上并不是革命的



——在实践上就更不用说了。它想要有一个更有进取精神的和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党，希望工会更富有战斗精神，但是这只是希望通过非暴力手段更迅速地向社会主义前进。

在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独立工党享有比工党要左的名声，而尽管两党在战争政策上存在分歧，独立工党仍隶属于工党。在战争进行期间，独立工党所支持的一个议员小组实际上几乎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党行事，虽然他们继续算作工党党员。大战结束时，由于新工党党章首次准许接纳个人党员并规定在议会选举的每个选区成立正式组织，还由于新工党纲领《劳工和新的社会秩序》<sup>872</sup>保证工党致力于明确的渐进的社会主义目标，独立工党发现它在工党内的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使独立工党既丧失了声称自己是工党内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的权利，也丧失了它作为向个体社会主义者开放的唯一的大规模组织的地位。独立工党的党员人数在大战期间大为增加，新成员中既有非战主义者，也有左倾社会主义者；当它企图明确说明它对战后国内和国际领域中的种种问题的态度时，党内出现了相当多的争执。它的最著名的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与工党内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自1918年以后，与其说他是独立工党的代言人，还不如说他是工党内的主要人物。有一个时期，主要作为独立工党领袖继续积极活动的菲利普·斯诺顿强烈反对共产国际和一切形式的共产主义学说，还反对强烈影响独立工党的许多青年党员的左翼工业主义趋向。独立工党领导由于被看作是并自认为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中中派的国际主义的代表，迅即与共产国际在“专政”和“二十一条”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一个人数不多的左翼少数派不久便脱党，并与共产党联系起来。党的主体尽管在工人管理和罢工政策上存在尖锐分歧，仍然团结一致。1921年矿工遭到失败后，当这些争端不那么有直接关系时，工党与独立工党之间的分歧就不那么明显

了。麦克唐纳之所以能够在1920年重新出任工党领导，主要是独立工党内最强大的克莱德河畔集团负有责任，因为它错误地认为此举将加强工党的左翼。1924年第一届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经历以及工党在此后几年的态度使该集团的幻想迅即破灭；在1929年第二届工党政府出现时，他们很快就对它采取了强烈反对的态度，尤其在它对失业问题的处理方面。到1931年时，已经出现这样的形势：独立工党拒不接受工党执委会的纪律约束，后者则以拒绝认可独立工党的议员候选人作为报复。这些争执使独立工党于1932年真正脱离工党，在上次大选中在独立工党主持下当选的少数候选人以后就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党的议员了。从那时起，除了在克莱德河畔以外，独立工党只拥有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它继续作为一个小党留在议会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至今日，它还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小组织继续存在，但是已不再有任何议会追随者。在国际方面，在二十年代初期，独立工党从一开始便追随维也纳“第二个半国际”，这个组织消逝以后，它又作为工党的一个下属组织成为新的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追随者。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在二十年代，它曾大力开展支持“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的运动，克利福德·艾伦是这个运动最有鼓舞影响的人物。有一段时间，这个运动似乎是在恢复独立工党作为附属于工党的一个“骨干”团体的已失去的影响；但是当它终于在1931年与工党闹翻时，它的大批党员拒绝追随它退出工党；而是与工党内的其它左翼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进行进步的社会主义宣传的团体——社会主义联盟。<sup>②</sup>然而这个团体的历史以及构成这个团体的集团的历史已不属本卷所涉及的时期了。

在英国，在整个二十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始终是一支微不足道

---

① 见本书第448页。

② 见本书第21章。

的力量。英共在议会中几乎没有议员，在地方政府选举中也只获得了寥寥几个席位。它也无法在工会中逐步建立强大的势力，尽管它曾通过“少数派运动”——这个名称本身就有助于强调说明它的号召力的局限性——力图做到这一点。在失业者以及由于不断失败而痛苦的某些煤矿的矿工中间，共产党人的成绩算是最好，这一点并无反常之处。但是即使在这些团体中间，共产党人的影响也非常有限。由于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种影响在三十年代大大扩大；但是即使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有争取到大批追随者。中派运动虽然追随者较多，在二十年代出现时也是作为工党内部的一种倾向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有组织的运动；因为不是整个工党左翼都与独立工党有某种联系，而独立工党本身尽管进行了支持“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的运动，也绝不全部是左翼或中派。在1914年以前，英国的运动虽然属于第二国际，除了基尔·哈迪之外，在国际社会主义事务中只起了一点儿小小的孤零零的作用；1918年以后，这种走向比较孤立的状态的趋向仍保持了它的部分势头，尽管在战后的几个国际中，工党和职工大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由于认为议会行动是它的基本的政治方法，而且至少在1926年以后在工人事务中只好奉行纯防御政策，英国劳工运动在国际上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有一个时期挪威人除外——以及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一样，属于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稳健和最爱好和平的力量。麦克唐纳和斯诺顿的背叛以及少数其它领袖在1931年危机中的背叛使英国劳工运动在一个短时间内向左转；但是运动的领导权从来没有不掌握在稳健派手中，在麦克唐纳和斯诺顿离开后，这一派的杰出人物是阿瑟·汉德逊。曾经是1918年新工党的主要缔造者和组织者的汉德逊，在二十年代愈来愈多地致力于国际事务——首先是致力于逐步加强国际联盟，作为实现和平和通过国际协议实现裁军的有效力量。由于他专心致

志于这一方面，他对于与国内政策有关的日常活动多少是冷淡的；但是他的影响很大，而且总是利用他的影响，通过奉行稳健的政策并同时拒绝与主张奉行较有战斗精神的方针的人争吵——除非万不得已——，使党保持团结。

875 如果进一步继续分析主要国家的中派倾向，将分析范围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那将是令人厌烦的。我只是试图说明，为什么和怎么会在1917年以后的几年中似乎在许多国家里得到相当多的人支持的非共产党左翼和中派瓦解了，并且如同在法国和德国一样，他们大部分被迫回到了改良主义的右翼所支配的组织中去，或者如同在意大利以及后来的德国和奥地利那样，与其敌手一道一蹶不振。就世界范围而言，这意味着正如对立的几个国际所体现的，一方面是共产党与另一方面是占支配地位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较量仍在进行，并意味着中间立场的观点即使没有被压制下去，大体上也只能在一国范围内表现出来，而不可能找到国际性的恢复点。

事实上，过去在中派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存在时曾经是中派分子中的许多人违反了他们的真正愿望大幅度向右转了，因为他们在遭到共产党人抵制以后被迫重新参加了议会右翼所控制的社会民主党。即令他们仍然保持着左派的忠诚，他们也发现难于将这种忠诚付诸行动；而且共产党对他们的不断指责使他们的左倾倾向逐渐消失，驱使他们接受右翼的领导，并随即在许多情况下完全投向了右翼。从心理上说，要对不断谴责和辱骂你的人保持同志般的感情并非易事，何况共产党人的辱骂往往特别厉害和令人不能容忍。因此，右翼便赢得了许多中派分子的甚至是违背他们的意愿的支持；而中派运动虽然从未被完全消灭，在大多数国家中，即使只是在全国范围内，也只不过是少数派的一种不起作用的思潮。

在本卷所涉及的整个时期内，社会主义运动除了它的共产主义运动形式以外，基本上是一种欧洲的运动。共产党人确实作了很大努力，将其影响扩大到其它大陆，特别是扩大到亚洲和拉丁美洲，在这两个地区都主要以资本帝国主义的对抗者以及公开和隐蔽的殖民统治的对抗者的姿态出现。在非洲，在这个阶段他们还几乎抓不住任何东西作为哪怕是开端的手段。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在工会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没有完全能够建立任何有效的政治运动。在亚洲战线上，得力于苏联不仅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亚洲国家，有一个时期他们在与国民党结盟的基础上似乎在中国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就。但是在孙逸仙去世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北伐以后，蒋介石对他们翻了脸，驱逐了俄国顾问并且清除了国民党左翼，于是这些成就便毁于一旦，只是由于毛泽东以及与他共事的领袖们进行了由农民而非产业工人承当斗争主力的、持续的游击战，共产党的影响才得以继续维持。在亚洲其它地方，共产党人设法巩固了苏赫巴托尔（1893—1923年）和乔巴山（1895—1951年）领导的蒙古共和国作为卫星国，并在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其它地区获得一些支持；但是这些成就极为有限，即使在蒙塔古—契尔姆斯福德改革后仍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以 M. N. 罗易为其主要理论倡导人的共产主义运动面对着甘地和印度国大党的支配性影响，在群众中也只取得了微乎其微的进展。确实，在二十年代的印度，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甚至更无足轻重了——事实上在国大社会党在三十年代使这个运动出现之前，它几乎不存在。到二十年代末期，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似乎实际上成了一支精疲力尽的力量：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压力下，它略有起色；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反抗帝国主义控制的亚洲民族主义的再次高涨创造了条件，它才成长到不可轻侮的程度。

尽管共产国际作了努力，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开始增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号召力之前，这个运动也没有在拉美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在秘鲁，而且在其它地方，建立在对产业工人以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有吸引力的基础上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运动，适应当地的主要条件，做到了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它极少数发达的工业中心以外比共产国际所能希望做到的做得更好。此外，在拉丁美洲，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传统在无产阶级的许多派别中根深蒂固，为共产主义哲学所要求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的概念形成了强大的障碍。即使在墨西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之前的那几年里所发生革命之后，也出现了很长时间的间歇，只是在本卷所涉及的时期以后，共产主义运动才具有了重大的影响；而在美国，所有共产党人所能取得的成就只不过是许多派系的增加，它们忙于彼此斗争，腾不出多少精力来从事转变美国工人阶级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信仰这样一项绝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共产国际在它的历次会议上一向能够集合来自欧洲以外国家的一帮形形色色的代表；但是这些人大部分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几乎不代表任何人，虽然莫斯科的流亡分子有大批是经过训练的并被送回本国传播共产主义。

为了在对抗资本主义大国方面取得进展，共产党人至少曾企图在欧洲以及在其它国家逐步建立共产主义运动，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则几乎从未企图使其信条具有世界范围的意义或应用。毫无疑问，英国工党曾给予印度的自治要求以相当冷淡的支持；但是它的领袖并没有考虑印度独立这一点——更不用说考虑印度脱离英帝国的问题了。法国社会党人将阿尔及利亚看作是法国的一部分，认为它与法国其余部分的差别仅仅在于它拥有大批非欧洲种的、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口；他们将摩洛哥、突尼斯和印度支那看作是受法国统治的领土，

认为已完全同化于法国文化的当地居民中的少数人可以有限度地参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殖民地或其它经济落后地区也不存在任何非共产主义的社会党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与之建立联系的、具有重要作用的集团。他们的渐进的社会主义哲学引导他们不是从革命或殖民地起义的角度、而是从充其量是逐步向有限的自治形式前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种自治形式可以与殖民统治的结构相适应，或者在政治独立的国家里可以使得与受他们本国政府某种约束的外国投资商的和平合作协调起来。由于不喜欢在本国进行革命，非共产主义的社会党人也倾向于不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进行革命；而且即使他们在理论上反对种族不平等和种族歧视——因为并非他们所有人完全如此——，他们所考虑的也是让这些弊端逐渐消亡，而不是用强制手段来消除这些弊端。此外，许多社会党人对于在他们本国主要作为一种反动的军国主义势力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感到深恶痛绝，而且对于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外国统治下的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加区别。他们根本不准备像共产党人那样抓住几乎一切机会，支持抵抗资本主义大国统治的几乎一切民族主义运动，从而给资本主义大国制造麻烦。我是说“几乎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因为甚至共产党人在经历了与国民党人的合作以后，也小心提防那些与工人阶级运动直接敌对、或者通过蛊惑人心的法西斯主义或半法西斯主义的号召来着手摧毁工人阶级运动的民族主义运动。尤其在拉丁美洲，共产党对付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政策颇多曲折；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要设法调和下列两个方面从来不是易事：一方面要坚持严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要与其主要支持——或者至少是其领导——来自中产阶级的排外运动结成联盟。在三十年代，调和这两者比较容易了，因为反对法西斯主义有

878

一个时期已成为共产党的国际政策的主要动力；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调和也往往是困难的。

然而，共产党人曾竭尽全力试图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反之，社会民主党人和工党分子则甚至回避进行尝试。复活的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一开始便毫不含糊地宣称社会主义与“民主制度”——他们意指代议制政府——乃是不可分割的，并强调指出了“民主制度”与“专政”之间的极其明显的矛盾，认为这是他们与共产国际争执的根本关键。这种说法即使与1918年以后西欧的状况十分吻合，也几乎不可能为他们提供任何令人满意的途径，使他们得以接近全然没有采用过代议制政府的各族人民，尽管这些民族在工业上十分落后，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对他们具有任何实际意义。879 这样一来，至少是在暂时，社会主义只有在存在代议制政府的先进国家才是在实践中可以实现的目标，从而使社会民主党人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对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几乎无话可说。实际上，在巴尔干各国以及在某些新近从外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东欧的国家——比如在波兰——都存在可以从这些角度去吸引他们的西方化的社会党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国家，议会民主的吸引力对广大群众也不可能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久之后便在以暴力手段贯彻的种种形式的专制统治下遭到压制。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或称“民主的”社会主义，在二十年代开始成为主要局限于比较先进的代议制国家的一种主义，并开始丧失了战前第二国际至少表示赞成的、比较全面的国际主义。

我并不是说，这就是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在战后年代没有能在西欧和中欧以外地区产生有效影响的主要原因。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早期阶段必然为资产阶级以及主要来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



子所控制，而且即使是那些同情贫苦阶级的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大部分人也认为旨在逐步建立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做法要比领导穷人反抗富人、从而使民族主义运动分崩离析的做法有希望得多。这是当时主要的态度，即使反共的社会党人当初曾努力调整他们的理论，使之适应处于从属地位的不发达民族的需要——如我们所见，他们也没有这样做。由于他们没有这样做，要在大多数有关国家建立一个哪怕是力量薄弱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便不存在丝毫动力；除了少数几乎是孤立的个人有这种思想之外，只是到了三十年代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才开始在这些地区出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本卷中仅以很少篇幅叙述先进国家和苏联以外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尽管如此，某些读者还可能认为，关于这里所记载的材料，我还 880 是写得太多了。

在本书前一卷<sup>①</sup>中，我曾试图说明，在美国这个欧洲以外唯一的先进的西方大国中，社会主义运动在本世纪最初十年经历了一个相当迅速、但仍然只是小规模的增长时期之后，早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开始衰落。我认为这种衰落与以下事实有关：美国社会主义在整个成长时期主要是一种外来的学说，是接二连三的欧洲移民浪潮带到美国来的；而且当移民的人流滚滚而来、不受遏制的时候，它往往使美国工人阶级分裂成两个集团——那些已采纳美国“生活方式”并取得熟练工人地位的人，以及大部分来自欧洲不那么发达的地区、主要从事不熟练劳动、生活水平低得多的新移民。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统一的工会运动的建立，也阻碍了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组织起来的、完全同化了的和待遇较为优厚的集团团结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周围。再者，大战以后对移民的限制既

---

① 见第3卷下册第775页。

使欧洲移民入境速度放慢，又加速了已在美国的人的同化过程。在1919年和1920年拥护共产主义运动的美国人之中包括很大比例的新近从东欧——尤其是从俄国——移居美国的人；而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非共产主义部分则愈来愈多地被来自西欧的、在美国定居已久的移民——其中包括很大比例的犹太人——所控制。在二十年代条件下，这两个集团中的任一个都没有条件对美国工人中的主体产生有效的号召力；当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激发了较多的人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时，这种情绪大部分说来仍然并不具有社会主义形式，尽管它在一个时期内曾大大增加了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和近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西欧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党对美国工人所能说的话并不比它们对亚洲人或非洲人所能说的话多许多。它们从本身处境出发设想出来的信条并不适合美国的情况。

881 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对1918年以后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必须取决于读者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信念的基本性质的概念。对于像考茨基这样的正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只可能作为一种发达的资本主义结构的不可避免的继承者在实践中出现，他们认为这一点乃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资本主义和先进的工业化被当作是将社会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成长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布尔什维克革命被认为是一个彻底的错误，因为这次革命要求充其量只代表一个仍然以农民为主的国家中的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党夺取政权。因此，它必然在废墟上崩溃，或者，如果得以站住脚的话，成为与社会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专制独裁政权。即使考茨基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哪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对比较少数已经达到所要求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外，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绝不可能有直接的或眼前的意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方法普及到世界各国之前，

考茨基的社会主义为它的性质本身所决定，不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信条或者拥有世界范围的追随者。毫无疑问，考茨基既相信长远说来必将出现此种情况——难道他不是一直在预言农民必将衰落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将愈来愈托拉斯化吗？——，也相信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通过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能够在全世界起带头作用，从而极大地加快各地的工业化步伐。尽管如此，他对于不那么发达的国家的人民或工人只能说他们必须等到轮到他们的时候，而且必须经历作为通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上的必要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除此以外他就没有多少话可说了。

这种观点的基础是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在每个国家达到适当阶段时逐国到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共产党人，尤其 882 尤其在开始时，提出了浑然一体和不可分割的世界革命的观念，这种革命并不根据每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是一俟被看作是单一的、虽然是复杂的结构的世界资本主义达到——如马克思所预见的——其固有矛盾使之不可能自我维持或取得不断的经济进展的地步时便将到来。据此看来，革命居然在俄国开始而不是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就几乎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个事件其实是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最先被折断了；这就为各地无产阶级加入这场革命、将它转变成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范围的起义，提供了他们责无旁贷地应予利用的机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一个口号，它不仅意味着每个国家的无产者应该帮助其它国家的无产者，而且意味着实际上存在一个单一的世界范围的工人阶级；这个口号是号召工人阶级采取统一行动反抗浑然一体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

正如事态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态度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它至少确实为共产党人提供了一种信条，可以在各地而不是仅仅在少数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采取行动的号召加以宣讲。与此相比，在这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外，社会民主主义的信条就似乎没有号召力，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与当地的形势毫无关系。当斯大林由于他对迅速发生世界革命的希望落空而着手逐步“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时，他立即丧失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范围的号召力所具有的部分力量，因为这时他不得不号召其它国家的工人共同保卫苏联，而不是为他们自己进行革命。但是即使在共产党的号召力像这样被削弱以后，社会民主党人仍然拿不出任何他们独有的世界范围的主义与之抗衡；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号召不那么发达的国家的工人来共同保卫他们，而且当初即使发出了这种号召，那些国家的工人也不可能为保卫他们采取任何行动。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得不在得不到其它不论是落后还是先进的国家的工人协助的情况下，进行它的反法西斯斗争，或者不得不向法西斯主义屈服；因为它不论是否战斗都是孤独一身，而不是代表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阶级的无产阶级。

这种形势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议会道路社会主义的信条必然要求以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单位的独立存在为基础，主要在国家一级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以便给予每个国家以自由，使它自己适应本国国家结构中选举时特有的紧急状况以及国民舆论的气氛。除非国际联盟当初成立时是一个具有凌驾于它的所有成员国之上的至高无上立法权力的和行使其权力的手段的超级国家，才可能不存在上述情况；当然，在存在强烈的民族情绪以及不论是建立在阶级还是在人道主义情绪基础上的国际团结相对薄弱的情况下，这样一个超级国联甚至极少可能行得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仅必须冲淡社会主义纲领以适合选举的前景，还必须分别按照各自国家的方针来制订纲领以适合每个国家的条件。这就排除了出现任何种类的统一国际行动纲领的可能性，而共产党人则认为

这样的纲领是世界革命的原则问题。

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人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人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人的世界革命信条，不论它具有多么普遍的号召力，是极其不切实际的。它建立在至少两个完全错误的假定之上——其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几乎山穷水尽，其二，全世界的工人即使不是已经成熟到了可以采取革命行动的地步，一俟共产党人揭露他们那些背叛的错误领导人并从而使这些领导人失去追随者，他们会几乎全部地成熟起来。资本主义在二十年代取得非常值得注意的复苏之后，的确曾十分接近于使这两个预言中的第一个实现，这是因为他们对于大萧条作了愚蠢的处理——尽管如此，在1939年以前资本主义早就大有起色。但是一些事件证明第二个预言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先进国家的工人中有很大大比例的人非但没有抛弃他们的“社会叛徒”，反而由于共产党人的攻击和恶言中伤而更加坚定地团结在他们的周围。

然而，这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就是正确的。主要出于对共 884  
产党人的敌意，他们缩小了社会主义的范围，使之基本上成了一种西欧的信条而不是世界性的信条；他们也没有为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广大群众提供任何信息，甚至没有为任何不可能牢靠地走议会道路的人提供任何信息。三十年代当纳粹党人征服了德国并开始蹂躏欧洲时，当经济大萧条使失业成为使工人的力量消耗殆尽的毒瘤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遭到了恶报。唯有在极少数像瑞典和丹麦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国家，这个运动才在这个时候取得了不断的进展。在资本主义大国中，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大风暴前充其量也只能完全收缩风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为它提供逃脱的机会。

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党人在战后年代的遭遇要比在其它西欧国家好得多。事实上，他们直到后来才得以在几个议会中赢得

了明确的多数；但是他们在选举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并得以在资产阶级或小农场主中较进步的人物的支持下组成了好几届少数派政府。总的说来，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党是稳健的，从来不曾企图实行社会主义；它们主要集中力量制定进步的社会法律，改进赋税制度，并力促通过公共工程来为救济失业者采取有效的措施。唯有在挪威，在马丁·特伦麦尔的影响下，工党有一个时期奉行一种进取的左翼政策，这个政策使它进入了共产国际——然后时隔不久，由于它拒绝接受共产国际对它的党内事务发号施令，又使它退出了共产国际。在瑞典和丹麦，虽然在大战期间或大战以后都出现了左翼运动和左翼党派，它们的追随者只不过是人数很少的少数派，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仍保持着它们居支配地位的影响。在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 H. 布兰亭早在 1918 年就在联合内阁中担任财政大臣，但是几个月后便辞职了，1920 年他领导一个清一色的社会党  
985 内阁再次执政，但由于没有多数的支持，只执政 6 个月。翌年，布兰亭仍然在没有明确多数的情况下再次执政，这一次他一直保持他的职位到 1925 年去世，中间只有短暂的间歇。后来他的同事理查德·桑德勒（生于 1884 年）接替了他的位置，但是 1926 年主要由于维持失业者生活问题而下台。此后社会党人一直是反对党，直到 1932 年，当时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使他们在佩尔·阿尔宾·汉森（1880—1946 年）的干练的领导下重新执政；汉森在整个三十年代一直执政，并且第一次使他的党的本质上是稳健的政策的基本部分付诸实施。

在此期间，早在 1916 年，以托瓦尔德·斯道宁（1873—1942 年）为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激进党领导的联合内阁。在 1920 年和 1924 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的实力大为加强；1924 年，斯道宁出任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内阁首脑，这届内阁虽然没有多数支持，却执政了两年。1926 年，社会党人在选举中遭到了小小的挫

折，一个右翼联合内阁重新上台；但是1930年他们再次执政，这次是在激进党人的支持下执政的。此后斯道宁一直担任首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挪威，工党在与共产国际决裂后一直处于反对党地位，直至1928年。当时，它作为最大的政党，但是在没有多数派支持的情况下组成了一个清一色社会党的政府，这届政府在提出了一个多少比较严厉的、重新分配财富的建议之后几乎很快倒台。在1930年的大选中，该党的反对者指责它想要实行布尔什维主义，从而进一步确定了它的失败。接着，J. L. 摩温克尔领导一个反社会党联合政府直至1932年，这一年他的政府主要由于未能采取有效行动来处理失业问题而倒台。接着工党在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1879—1952年)领导下在整个三十年代一直执政。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积极成就是在三十年代取得的，并且主要是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这次危机加强了对于社会保险以及采取积极行动来增加就业人数的要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由于其主要出口货大体上保持比较好的水平，在危机中所受打击其实不如大多数其它国家严重。然而，它们所受打击却足以使社会党增加许多新成员，而且由于困难并不具有压倒一切的势头，这些党得以采取有效行动。当然，在建立“福利国家”方面采取这种成功的行动的基础是早先奠定的；但是在萧条之前，社会党只有过非常有限的机会将其政策付诸实施。不过在二十年代期间，它们的影响一直在不断增长。因此，更详尽地考虑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不属于本书这一卷的范围，而是属于下一卷的范围了。在三十年代，不仅许多社会党人，还有许多非社会党的进步分子，都公开地分外赞美瑞典，认为它是“中间道路”的典型，显示了在不必大为扩大社会化的企业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正面攻击的情况下，在“福利国家”方面可以

取得多么重大的进展。在1932年之前，这种赞誉中有一部分已经出现，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在夺取政治权力的道路上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同时又受惠于他们的反对者的分裂，而且相对而言没有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阻碍，在挪威人与共产国际决裂之后共产主义运动从未得到很多支持。然而，斯堪的纳维亚形势是自成一体的；因为当这些国家一旦躲过了在1914年以前用以遏制进步力量的不民主的宪法以后，在这些国家内，民主情绪就对于贵族的主张或彻头彻尾的反动主张居于明显的优势，资本主义权益集团就难于有效地抗拒不仅得到产业工人的支持、而且得到大多数白领工人以及在许多情况下还有小农场主支持的主张。首先在丹麦，还有主要在瑞典，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方针并不是对所有其它集团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进行使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减少的改革，也不大力强调在少数关键的垄断企业范围以外进行社会主义化。在丹麦和瑞典，在消费者和农场主之中存在的合作运动的巨大力量强有力地加强了走向福利立法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化的这种趋势；还有社会党与工会的紧密的联盟，以及雇主的严密组织，也对工人的战斗精神起了牵制作用。在资本主义大国，或者甚至在其它先进的西欧小国，都不存在与此真正相似的状况。瑞典人、丹麦人和挪威人大体上都能自行其是；但是在大多数其它国家，社会党人并不能任意仿效他们的榜样。在上述所有情况下，社会党人都需要迎击危险得多的死敌；在其中大多数情况下，尽管不是在所有情况下，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还必须面对来自社会党左翼和共产党左翼的许多较大的困难。

虽然在整个二十年代，尽管苏联控制着共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一支左翼力量，而不仅仅是公开宣称有意要成为一支左翼力量。它的宗旨是革命，以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为领导，以首先在资本主义大国中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它的直接



的和尽可能的近期的目标。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已经在竭尽全力谆谆教导别人：无产阶级的首要责任是保卫苏联反对它的敌人；但是，应该尽量利用机会去煽动更多的国家中的共产主义革命，或者在这样做显然行不通的地方，则对社会民主党领袖进行无情斗争，希望借此从他们手中夺过追随者。共产国际在二十年代经常谈到的统一战线并不是指共产党人在三十年代中开始提倡的那种统一战线，在三十年代，他们转而注意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反法西斯主义和反纳粹主义的共同运动的工作。当然，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试图尽量建立接受他们自己领导的统一战线；不过在需要时，他们愿意与几乎一切主张联合起来抵抗法西斯独裁者的人合作，而在二十年代，除非为了达到破坏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影响的目的，否则与这些领袖合作就是十足的离经叛道行为。直到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纳粹主义、而不是带来了所希望的资本主义的最后崩溃，共产党人的态度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到了那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不愿承认这样一点：法西斯主义就其本质而言，绝不可能是在其不可逃避的“矛盾”的压力下注定要迅速崩溃的资本主义所作的孤注一掷。

888

在本卷中断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叙述的时刻，在苏联已不再实行的世界资本主义——在那里它根本从未达到高度发展的阶段——，在一些肤浅的观察家看来，似乎在经过战争的混乱之后已终于重建起来。几乎处处恢复了金本位——先进国家的国际兑换的传统基础——，而且尽管这种恢复必然同时需要紧缩通货，带来许多困难和失业，<sup>⑤</sup>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却觉得有权庆幸自己已度过最危险的时期，而没有让社会革命蔓延到苏联以外的地方；因为虽然中国发生了革命，其结果却远没有像当初看来那样有破坏性，而且并未导致中国与苏联的任何联合——甚至适得其反。毫无疑问，有充分的迹象说明，资本主义摆脱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最初崩溃

以来造成的影响而出现的这种起色是朝不保夕的；较有先见之明的人可以看出，在已经恢复的国际交换结构的背后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平衡。但是无论如何，世界革命的危险和哪怕是工人阶级普遍具有战斗精神的危险似已消退，纵使并未全然消失。苏联由于开始实行它的全面计划和工业发展的初步工作，而且刚投入农业集体化的庞大计划，似乎并无多大余力到边界以外去捣乱；而且除了少数狂热分子以外，通过外来军事干涉推翻苏联的概念已经放弃。概括说来，世界大部分地区看来已经在与1914年以前的年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无根本不同的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下安定下来。889 国王少了，有权选举议员的选民多了。至少在名义上是民主和负责的代议制政府有了相当广泛的普及，只不过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胜利，以及在东欧和东南欧出现了向极权主义和高压的独裁政体发展的趋势，这种普及的作用被部分抵销了。在经济领域，除了个别情况以外，这种政治变化似乎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虽然再次兴起了经济民族主义，而国际联盟除了通过不太成功的“关税休战”来对此加以遏制以外就无能为力了。为实现一定程度的裁军措施进行了谈判，而且看来这并非全然没有成功的希望。在已经成为决定世界经济前景的关键地区的美国，尽管股票市场状况不稳定，仍然有许多所谓的专家<sup>①</sup>预言了日益增长和不断繁荣的前景，而且他们还大叫大嚷地辩解说，美国人民不需要革命，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次革命，这次革命已经解决了基本问题，而且把工人的幸福与雇主阶级的昌盛牢靠地联系了起来。

在这种环境下，只有少数人在1929年或者甚至在1930年时对于即将来临的风暴的规模有某种预感。当然，共产党人仍然预言资本主义在其内部矛盾的压力下注定很快就要爆炸，并预言世界

---

<sup>①</sup> 例如T.N.卡维尔教授。

革命只是推迟了一个短时期，并不是失败了。但是大体说来，这些预言是从原因推出的结果，而不是以对于眼前的事实和趋势作出的任何直接观察为根据；经济大萧条到来时共产党人感到的意外几乎不下于资本主义世界或者社会民主党人感到的意外，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正忙于在社会服务、工业立法和为失业者提供公共工程方面策划作影响深远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1917年的大动乱似乎被成功地限制在落后的俄国，而在欧洲其余地区则被挫败了。1929年在英国上台的工党政府显然对于它必须面临的形势事先毫无所知，因此在1930年和1931年风暴突然降临在它头上时便毫无办法和没有政策了。当然，由于没有它自己的多数的支持，麦克唐纳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贯彻大胆的社会主义政策；但是该政府的历史明显地表明，它根本无意这样做，或者哪怕是接受它自己的左翼支持者的意见和以 J. M. 凯恩斯为首的一个进步的自由党人的有影响集团向它提出的意见。事实上，凯恩斯的自由党人以他们争取对失业者采取更大胆的政策运动起了大部分带头作用。没有一个保守党的财政大臣可能成为比菲利普·斯诺顿更正统的传统资本主义财政政策的维护者；没有一个首相可能比拉姆齐·麦克唐纳更犹豫不决；没有一届内阁可能比麦克唐纳内阁在发现它面对一次危机而其大多数阁员又完全不理解其性质时更大惑不解。以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社会党或工党中最强大的和条件最好的党著称的英国工党于1931年遭到惨败后下台，这次惨败使人们对于社会民主党的道路的正确性产生了严重疑问，而且要不是共产党人同时在对德国问题上处理的全然失误，本来有可能对共产主义的情绪给予强有力的激励。

这次处理失误比英国工党政府的可耻失败甚至更要祸患无穷。由于严重误解了纳粹主义的真正性质，由于对于奉行向反动压力节节退让的政策的社会民主党深怀敌意，德国共产党和共产

国际犯了致命的错误，把社会民主党人当作他们的主要敌人对待，甚至有时还与纳粹党人联合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人。诚然，对社会民主党的方针极其不满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这个方针听任魏玛共和国愈来愈遭到希特勒以及军国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暗中破坏而不进行任何真正的抵抗。但是，在一种唯一的希望在于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形势下，站在反动势力中最危险的势力一边是不可饶恕的愚蠢行为。毫无疑问，之所以比较容易做出这样的蠢事来是由于许多纳粹党人以前是共产党人，他们是在感到绝望和幻想破灭之后转到纳粹队伍里去的。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不可饶恕的愚蠢行为，为此，德国工人不得不付出可怕的代价。因为纳粹主义的动力并非资本主义——当然，尽管它得到过资本主义的许多帮助——，它的动力是由于物质和精神的苦难而提高到疯狂程度的、咄咄逼人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成功地扑灭纳粹主义的唯一希望在于联合一切可以吸收到争取礼仪和理性的进军中来的人与之对抗，而不是以一种拒绝和排斥大多数潜在的成员的相反的狂热与它相对抗。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1918年的德国革命确实是以错误方式进行革命的最完整的例子。目标只是实现逐步的和不太彻底改变现状的改良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把旧结构的主要部分带到新结构中来的——利用现有的公务员和法院，甚至利用现有军队中的军官，虽然他们在这一点上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必须取决于这些社会集团的精神态度。另一方面，一次真正的革命要获得成功，即使没有必要全部撤换旧人员，也必须至少是决定性地改变行政、司法和武装部队的高阶层的成份，还必须立即将能够指望的支持革命事业的人安插在关键岗位上。鉴于大多数高级公务员以及法

---

<sup>①</sup> 见本书第133页。

官和德国军官阶级的极其反动的观点，绝对有必要剥夺他们的权力。在一个既在战争中战败、又由于战争状况而陷入严重混乱、而且还有继续受到敌人干涉之虑和甚至是发生真正的饥荒之虑的国家里，毫无疑问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是除非做到这一点，革命必然会失败，而溃乱的反动力量则必然会恢复元气和信心。在1918—1919年德国所处的环境下，拒绝在通过普选选出制宪议会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之前为将来作出任何安排是祸患无穷的——892

这种情况由于以下原因，还会更加严重：社会民主党人自己对于他们希望要什么没有任何明确的先见，而且这种方法几乎肯定将引起左翼的暴动，而暴动又必然要使革命政府枪杀革命的一部分积极支持者，从而使工人阶级陷于致命的分裂。暴动者听任自己愤而采取肯定失败的行动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他们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能原谅犯了灾难性的错误而造成这种局面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

当然，如我们在前文所见事实：就是艾伯特和施埃德曼以及其余的多数派社会党领袖——还有许多独立社会党人——并非心甘情愿的“革命者”，而是由于在1918年11月的环境下万般无奈才成了“革命者”。霍亨索伦帝国在混乱中崩溃，他们不得不企图用某种制度来代替它。这种崩溃是在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曾引导他们的追随者期待的情况迥然不同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理论家曾盼望议会中的社会党代表权取得长足的进展，最后在议会中赢得多数，议会随即要求皇帝接受新的民主宪法，而且议会以合乎宪法的方式接掌权力。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未真正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皇帝非但不接受他们的要求，反而下令军方逮捕议员并进而枪杀民主人士，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对这样一种可能性要作认真的考虑是十分令人不快的，尤其是因为德国工会已表明极不欢迎使自己为任何情况下举行的总罢工负责的概

态。工会领袖们曾十分明确地表示，为任何政治目的举行的总罢工的责任必须由党而不是由工会来承担。实际上举行这样一种罢工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虽然罗莎·卢森堡以及考茨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企图正视这个问题；至于如果帝国崩溃而权力落到社会党人在其中仍居于少数的议会手中，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的问题，则根本没有正视过。然而这却是1918年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必须处理的问题。结果是他们不知所措，只好求助于建立民主共和国，与此同时却听任旧制度的高层公务员留职，听任大地主和资本家继续掌握他们的经济权力，而军官团虽然在名义上帮助他们，却仍然能够暗算他们。

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本应在1918年以俄国为模式——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以及其它种种策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在德国，如果进行这样一次革命，那就非但不会团结工人，反而只会分裂工人，而且别的因素姑且不论，仅仅是由于革命会导致协约国军队的军事干涉，它也注定要失败。然而，存在他们可以采取的中间路线。他们本可以利用社会党临时政府立即颁布法令，以分解大产业，将资本主义大联合企业社会主义化，并首先以对革命友好和愿意忠诚地为之效劳的人在帝国各地取代担任要职的人。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做，这不仅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害怕做这些事，也是由于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对于当前社会的崩溃所存在的恐惧远远超过了他们对于真正新的社会秩序所存的希望；而由于存在这种恐惧，他们背叛了革命，并促成了共和国的可悲的崩溃。

由此可见，在战后严重的紧急情况下，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奉行了错误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人听凭自己成为议会道路教条的奴隶，这与共产党人事事受俄国神话束缚如出一辙。俄国人自己在以广义而言极可能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手段进行了他们的革命之后，不仅误解了外界——尤其是先进西方国家——

的形势，而且还把有纪律的党这个权宜之计变成了一党制政府的教条，并听任所谓“民主集中制”主要在斯大林的影响下蜕化成为没有民主的集中制。这种颠倒的最恶劣的影响直到三十年代才显现出来；但是在此之前许久，对托洛茨基的报复已经发出了说明十有八九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警报。社会主义运动似乎已经不幸地分裂成为这样两种社会主义者：一种社会主义者甚至已经不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另一种社会主义者拒绝承认在不同处境的国家里可能有不同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承认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纯粹模仿俄国人被迫走的一条道路。这两种错误都没有犯的少数人在这两个互相争斗的派系的一致谴责下一筹莫展。

然而，俄国革命尽管在国际和国内方面结果都产生了种种弊端，仍不失为伟大而光辉的成就。革命所推翻的沙皇专制统治是一种穷凶极恶、愚蠢透顶的暴政，它完全阻碍了俄国人民——不仅是农民和工人，还有知识分子——走向美好生活的道路。沙皇专制统治是一种陈旧而令人反感的结构，需要加以推翻，并且不是用全然的混乱来代替，而是用有强大力量能够引导俄国人进入现代世界的新政权来代替。当时倘若布尔什维克在机会来到时没有抓住机会，看来任何其它集团未必能使俄国保持完整，击退入侵者，并且为先进的经济以及为生产技术的教育和训练的比较民主的机会开放奠定基础。诚然，只是在经历了直接的深重苦难，给予了革命的所谓敌人以惨无人道的待遇，并且发展了一个间谍和警察控制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机构之后——只是在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之后，才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取得了这些成就。在上述代价之中，苦难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反过来，只要有好的领导，不人道的行为以及警察国家的种种弊端本来是可以大部分避免的。对于领导的错误，斯大林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但是如果完全委过于他或者委过于以他为首的一小批不以道德标准为依据的“现实主义者”，那是荒

895 谬的。麻烦的根源并非所谓的“个人崇拜”，这只不过是讨厌的赘疣。麻烦的根源倒是对集中制及其伴生物——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机器——的崇拜，那些可以操纵这个机器的人都是旧俄国的罪恶传统的继承者，他们把力量与冷酷无情等同起来，并认为道德是“资产阶级偏见”而弃如敝屣。

尽管存在这种种情况，我仍然确信俄国革命确实作为一种巨大的解放力量起了作用。如果说它压制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它在同时也使愈来愈多的俄国人从旧政权的残酷无情的社会和经济压制下解放出来，并且创造了一个不仅比较熟练和操作机械的、而且还有很多接受文化和知识的机会的工人阶级。由于滥用政治权力，这些成就受到了严重损害，但是这些成就并不因此就毫无价值。除了政治暴政和压迫之外，还有其它种类的暴政和压迫，除了在西方国家得到恰当重视的开明的民主自由之外，还有其它种类的自由。要正确评价俄国革命的善与恶并非易事，但是我至少可以感到毫无疑问的是，长远说来它将证明是善多恶少。



## THE PRINCIPAL CHARACTERS

### 附：主要人物表

姓名年代	出现章次
Vaillant, 1840—1915(1), (2)瓦扬	13
Greulich, 1842—1925(1), (2)格雷利希	14
Hyndman, 1842—1921(1), (2)海德门	12
Kropotkin, 1842—1921(1)克鲁泡特金	17
Guesde, 1845—1922(1), (2)盖得	13
Meiring, 1846—1919(2)梅林	5
Nieuwenhuis, 1846—1919(2)纽文惠斯	15
W.G. Spence, 1846—1926(2)斯潘斯	28
Sorel, 1847—1922(2)索列尔	13
Axelrod, 1850—1925 阿克雪里罗德	3
Bernstein, 1850—1932(2)伯恩施坦	4
Gompers, 1850—1924(2)龚帕斯	23
Iglesias, 1850—1925(2)伊格列亚西斯	16
Ledebour, 1850—1947累德堡	4
Natanson, 1850—1919 纳坦森	6
Vollmar, 1850—1922(2)福尔马尔	4
Blatchford, 1851—1943(2)布拉奇福德	12
Zasulich, 1851—1919(2)查苏利奇	3
V. Adler, 1852—1918(2)阿德勒	7
Malatesta, 1853—1932(1), (2)马拉特斯塔	11
Kautsky, 1854—1938(2)考茨基	4
Debs, 1855—1926(2)德布斯	23
Anseele, 1856—1938(2)安塞尔	14
Bertranù, 1856—1943(2)贝特朗	14
Hardie, 1856—1915(2)哈迪	12
Mann, 1856—1941(2)曼恩	12
Shaw, 1856—1950(1), (2)肖伯纳	12
Lazzari, 1857—1927 拉查理	11
Plekhanov, 1857—1918(2)普列汉诺夫	3

Smillie, 1857—1940(2)斯梅利	12
Turati, 1857—1932(2)屠拉蒂	11
Zetkin, 1857—1933 蔡特金	29
Burns, 1858—1941(1),(2)伯恩斯	12
J.A.Hobson, 1858—1940(2)霍布逊	12
Katayama, 1858—1933(2)片山潜	26
Lansbury, 1858—1940(2)兰斯伯里	12
B. Webb, 1858—1943(2)比·韦伯	12
S. Webb, 1859—1947(2)悉·韦伯	12
Jaurès, 1859—1914(2)饶勒斯	13
Branting, 1860—1925 布兰亭	14
Troelstra, 1860—1930(2)特鲁尔斯特拉	14
Bracke, 1861—1955 白拉克	13
Legien, 1861—1920(2)列金	5
Briand, 1862—1932(2)白利安	13
A. Fisher, 1862—1928(2)费希尔	28
Sembat, 1862—1922 桑巴	13
Vliegen, 1862—1947(2)弗利根	15
David, 1863—1930(2)大卫	4
Hasse, 1863—1919 哈阿兹	4
Henderson, 1863—1935(2)汉德逊	12
Chkheidze, 1864—1926 契赫泽	3
Hughes, 1864—1952(2)休斯	28
Jowett, 1864—1944 乔伊特	12
Snowden, 1864—1937(2)斯诺顿	12
Scheidemann, 1865—1939 谢德曼	4
N. Bang, 1866—1928 尼·本格	29
MacDonald, 1866—1937(2)麦克唐纳	12
Sun Yat Sen, 1866—1925(2)孙逸仙	25
Vandervelde, 1866—1938(2)王德威尔德	24
Wells, 1866—1946(2)威尔斯	12
Pilsudski, 1867—1935(2)皮尔苏茨基	19
Jogiches, 1867—1919(2)约吉希斯	4
Gorki, 1868—1936 高尔基	3
Cachin, 1869—1958 加香	13
Gandhi, 1869—1948 甘地	27

Emma Goldman, 1869—1940 埃玛·戈尔德曼	23
Hillquit, 1869—1933(2) 希尔奎特	23
Krupskaia, 1869—1939 克鲁普斯卡娅	6
Connolly, 1870—1916(2) 康诺利	12
de Brouckère, 1870—1951(2) 德·布罗克尔	14
Ebert, 1870—1925 艾伯特	5
Krasin, 1870—1926(2) 克拉辛	3
Largo Caballero, 1870—1946 拉戈·卡巴勒罗	16
Lenin, 1870—1924(2) 列宁	2
Luxemburg, 1870—1919(2) 卢森堡	4
Ryazonov, 1870—1935 里雅佐诺夫	3
Dan, 1871—1947 丹	3
Hollman, 1871—1934(2) 霍尔曼	28
Huysmans, 1871— 休斯曼斯	2
K. Liebknecht, 1871—1919(2) 卡·李卜克内西	4
Merrheim, 1871—1925 梅兰	13
Renaudel, 1871—1934 雷诺德尔	13
Soukup, 1871—1940 苏卡普	7
Blum, 1872—1950 布鲁姆	13
Chicherin, 1872—1936 齐切林	6
Savage, 1872—1940(2) 萨维奇	28
Serrati, 1872—1926 塞拉蒂	11
Bogdanov, 1873—1928(2) 波格丹诺夫	3
Brailsford, 1873— (2) 布赖尔斯福德	12
Chernov, 1873—1952(2) 切尔诺夫	6
Martov, 1873—1923(2) 马尔托夫	6
Orage, 1873—1934(2) 奥拉奇	12
Rakovsky, 1873— (2) 拉科夫斯基	6
Stauning, 1873—1942 斯陶宁	15
J.H.Thomas, 1873—1949(2) J.H. 托马斯	12
Griffuelhes, 1874—1923(2) 格里甫埃勒	13
Naine, 1874—?1927 夏尔·南恩	2
Kalinin, 1875—1946 加里宁	6
Lunacharsky, 1875—1933(2) 卢那查尔斯基	3
Larkin, 1876—1947(2) 拉金	12
Litvinov, 1876—1951 李维诺夫	6

J. Longuet, 1876—1938 让·龙格	13
Dzherzhinsky, 1877—1926(2)捷尔任斯基	6
U. Sinclair, 1878— (2)厄·辛克莱	23
A. Thomas, 1878—1932 阿·托马	13
F. Adler, 1879— F.阿德勒	7
Jouhaux, 1879—1953(2)茹奥	13
Stalin, 1879—1953 斯大林	17
Tranmael, 1879— 特伦麦尔	15
Trotsky, 1879—1940(2)托洛茨基	3
Tawney, 1880— 陶尼	12
Tomsky, 1880—1936 托姆斯基	6
O. Bauer, 1881—1935(2)奥·鲍威尔	7
Bevin, 1881—1951 比万	12
Fimmen, 1881—1943 芬门	15
Foster, 1881— 福斯特	23
Grimm, 1881— 格里姆	14
Kerensky, 1881— 克伦斯基	3
Rykov, 1881—1938 李可夫	6
V. Tanner, 1881— 瓦·坦纳	15
Voroshilov, 1881— 伏罗希洛夫	6
Wigforss, 1881— 威格福斯	15
Dimitrov, 1882—1949 季米特洛夫	8
Attlee, 1883— 艾德礼	12
Kamenev, 1883—1936(2)加米涅夫	3
Zinoviev, 1883—1936(2)季诺维也夫	9
Vyshinsky, 1883—1955 维辛斯基	17
Popovic, 1884—1919 波波维奇	8
Sandler, 1884— 桑德勒	15
N. Thomas, 1884— 诺·托马斯	23
Chiffley, 1885—1951 齐弗莱	28
Hansson, 1885—1946(2)汉森	15
Radek, 1885— 拉狄克	6
Spiridonova, 1885— 斯比里多诺娃	6
Bela Kun, 1886—1936 贝拉·孔	7
Ben-Gurion, 1886— 本·古里安	—
Thaelmann, 1886—1944 台尔曼	20

Dalton, 1887—	达尔顿	12
Karolyi, 1887—1955	卡罗利伊	7
Morrison, 1888—	莫里森	12
Sokolnikov, 1888—	索科尔尼科夫	6
Bukharin, 1889—1938	布哈林	9
Nehru, 1889—	尼赫鲁	27
Cripps, 1890—1952	克利浦斯	12
Molotov, 1890—	莫洛托夫	3
Pollitt, 1890—	波立特	21
Tito, 1892—	铁托	8
Nenni, 1891—	南尼	11
Laski, 1893—1950	拉斯基	12
Lombardo Toledano, 1893—	隆巴多·托勒达诺	24
Togliatti, ?1893—	陶里亚蒂	11
Bulganin, 1895—	布尔加宁	17
Haya de la Torre, 1895—	海雅·德·拉·托尔	24
Mikoyan, 1895—	米高扬	17
Zhukov, 1895—	朱可夫	—